

鄧演達先生遺著

黃琪翔
著



舊

鄧演達先生遺著

目錄

重印鄧演達先生遺著序言

鄧演達先生遺像

鄧演達先生傳略

中國到那裡去？

一、南京統治的性質

二、北方擴大會議——北方政府？

三、中國到那裏去？

怎樣去推翻反動的統治勢力



世界經濟的危機與內戰中的中國

中國內戰與文化問題

南京統治的前途及我們今後的任務

- 一、北方軍閥與改組派等系政客聯合反蔣底失敗及其原因
- 二、誰擁護南京政府
- 三、南京統治的具體力量政治組織及其財政基礎
- 四、南京統治的意識形態
- 五、世界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與南京統治
- 六、南京統治穩定的先決條件
- 七、我們今後的任務

南京欽定的國民會議和我們所要求的國民會議

一、「亞細亞」的官僚國家——東方專制國家

二、中國傳統的官僚政治

三、一直到現在為止的人民參政運動——「民權」運動

四、南京欽定的國民會議底性質及其前途

五、我們所要求的國民會議

現時國際及中國的形勢與我們鬭爭底路向

一、國際底形勢

1. 世界經濟危機之現狀

2. 世界經濟危機底核心問題——世界問題底核心

A. 農業的危機

B. 銀價低落問題

C. 擴大世界市場問題

D. 各國關稅壟斷問題

國家圖書館



001707600

F. 德國賠款問題

F. 蘇聯領域外內底市場問題

二、國際形勢底前途

三、中國本國的形勢

1. 中國農村經濟的繼續崩潰

2. 反動南京統治底對外關係

3. 南京統治能穩定嗎

4. 現時中國各政黨底現狀

四、中國形勢底前途

五、我們底鬥爭路向

怎樣去復興中國革命——平民革命？

一、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及南京統治形成的過程

1. 中國革命之史的回顧

2.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黃金時代

3. 革命黃金時期的社會矛盾

4. 革命黃金時期的人民武裝

5. 革命領導的矛盾

6. 南京反動統治形成的過程

二、復興中國革命的手段

1. 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

2. 革命運動中農工及商工業資本的作用

3. 怎樣去發動革命？

4. 怎樣去解決農民耕地問題？

5. 怎樣去組織平民革命軍？

6. 怎樣去肅清新舊士大夫的成份？

7. 平民政權的特質

我們爲什麼要推翻南京的蔣政府

蔣政府——南京統治——必然要崩潰的原因及全國人民當前的急務

附錄

十六年十一月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衆宣言

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對時局宣言

二十年四月反對南京的國民會議宣言

革命行動發刊詞

卅治主張

我們奪取政權之直前及直後應該做的是什麼？

編完以後

重印鄧演達先生遺著序言

鄧演達先生遺著原本，是一九三二年間在上海出版的。當時收集從一九三〇年五月間鄧先生歸國之日起，至一九三一年八月間被捕之日止，所手寫的政治主張，歷次在「革命行動」雜誌所寫的文章及各種宣言等十四篇文章。鄧先生全部遺著應該包括一九二五年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報告「世界革命與國民革命」的演詞，一九二六——二七年在武漢所發表的文章及各項演詞，尤其是「我們現在應注意的是什麼」？和「我們現在應注意的又是什麼」？先後輝映的兩篇文章，以及討論到各項問題的函件等等。當時因環境惡劣，無法收集，只得付諸缺如，實在是不勝遺憾之至。

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出版「鄧演達先生遺稿選集」，是根據上海版中選擇出來付印的。先後付印過兩次遺著，不下六千冊，二十年來，流傳海內，是極得珍視的。可是，在十餘年的內戰和八年抗戰當中，本黨同志承繼着鄧先生的精神，接受了鄧先生遺教，始終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中的正確立場，與一切惡勢力——從反動的南京統治，封建殘餘勢力，帝國主義及買辦以至日本

研盜——搏鬥，所遭遇的艱難困苦，所懷抱的光明遠大，暗行苦幹，罕有寧處。同志們的犧牲損失已多，所藏之典籍文獻散失更不可勝計。因之兩次所印遺著，寥寥無存。在天旋地轉人民大翻身之日，鄧先生當年所理想，所祈許的局面，逐漸實現。鄧先生之政治先見，得到事實上的證明，益足令人折服不置，重印遺著供大眾的參詳，作同志們的實踐指導，是刻不容緩的。鄧先生的全部主張在本遺著內可觀全豹。鄧先生其人及其思想輪廓，在重印本遺著當中，作簡單敘述，是有助於了解其主張。

鄧先生對於中國革命有深刻，切實的認識，提出了具體的政治主張，他從中國的社會結構作詳盡分析，指出當前的中國革命：「是一個複雜性的一種革命，具有民族、民權、民生三種革命性而以社會主義為歸宿的革命」。因此主張：「要澈底的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一定要喚起並組織廣大的民衆，使其覺悟的參加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並且應該與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階級聯合起來作爭鬥的同盟」。及堅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孫中山先生遺囑。他主張：「農工平民羣衆要取得政權……去推翻千餘年來傳統的官僚政治。過去換朝與革命，都只是新舊的封建統治的交替。」同時：「要實現社會主義，一定要在直接生產的工業為重心的平民政權確立以後，運用政權去發展生產，使生產組織化及社會化」。他堅決的信仰這種主張，認為這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途徑。他

號召全國農工平民羣衆起來解放自己，解放中國，他領導全黨同志們身體力行去作實際鬥爭，他個人更是「艱苦卓絕」「奮不顧身」的去求實現主張。

一九二六——二七年武漢大革命時期，他很透澈的看出中國革命非有廣大的農民實際的參加到革命行列，不能保障革命的勝利，同時并指出解決土地問題爲農民參加革命的先決條件。一九二六年冬他寫了一篇「現在我們應注意的是什麼？」的長文，在報上發表，主要的就是提出解決土地問題，實現「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他爲着要使當時在武漢的工作同志了解土地問題的重要和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特別請有解決土地經驗的蘇聯同志，來講解蘇聯解決土地問題經過詳情。當時因工作忙碌，白天沒有時間，每每在晚間召集座談。鄧先生於百忙中每會必到來主持，問題複雜而繁重，常至深夜始散。與會諸人因白天工作繁忙多感疲勞，鄧先生獨精神奕奕，提示精警遇有重要關頭，必遍詢在座各人意見，親筆記錄，綜合作成結論。他用洪亮聲音指出解決土地問題的意義說：「在政治上是摧毀封建勢力，在經濟上是改良生產，使國民經濟向前發展」。對於農民問題的重視和扼要的指出解決土地問題的意義，是最足珍貴的。

一九二七年春間革命陣營裏起了變化，以蔣爲首的一羣在南昌計劃背叛革命，鄧先生曾向蔣苦口運告，唇焦舌弊，知不可藥救，臨行前復與蔣作竟夕談，力爭解決土地問題，以挽回革命危機，蔣終不悟，而鄧遂絕裾而去。「壯士斷腕」的精神，表現對革命的英勇和忠實。

一九三〇年五月間鄧先生從海外歸國，再次從事於實際革命鬥爭，生活刻苦，無可倫比。盛夏閉戶作文（當時鄧主辦「革命行動」雜誌），所居又湫隘不堪，赤膊赤足，汗流滿背，不揮扇亦不取涼，旁置麵包數片，隨食隨寫，似乎不知有大暑天。同志中勸其稍作休息，則稱：「倘無所苦」。他常常說生活不應該和農工平民大眾相差太遠，不止在目前要有勞苦平民生活的鍛鍊，即在將來革命進展到獲取政權時，我們革命者的生活標準，一樣不應提高。假若我們不能把自己生活標準與一般勞苦大眾拉平，則腐化，貪污以及脫離羣衆的結果，必不能免，革命亦必不能成功，並且根本失却革命者應有的修養。只有農工平民大眾生活提高之後，我們的生活才有提高的權利。他認定刻苦是革命者的「倫理」。

鄧先生最討厭那朝三暮四的偽善者，他特別指出汪精衛那種變幻無常，軟弱無能為可恥。他常常說忠實於自己主張，言行一致，雖失敗也不失為「殉道者」。他比喻自己是一匹負重的驢子，在漫漫長途中行進着，也許有一天背負着重担，倒斃在路傍。孰料竟符語讖遭反動派毒手，負着重任，中途倒斃。

一九三一年鄧先生在上海因工作活動的結果，反動的南京統治必欲置之死地，特務密布，環伺左右，鄧先生深知危險，本擬往海外稍避耳目。有一次已經購好船票來香港，後因事不果行，復留居上海，竟為南京特務勾結租界當局所捕獲，即移交南京，八月間被捕，十一月底遇害。

鄧先生被捕入獄，南京當局威迫利誘意欲鄧先生放棄主張，結果凜然不可侵犯，毫不為動。同時被捕的有十餘位同志，在獄中同樣的大節凜然。某次將此事告知鄧先生，他沉着臉說：「苦了我們同志」。

鄧先生在獄間有字跡傳出，大都用紅鉛筆寫在草紙上，除勉強在外面同志工作外，多為索取書報之語。最後一次傳出之字條僅寫着：「現移南京城外炮壘中，今後恐不能通一字矣。」寥寥數語，竟為訣別之辭，傷已！

鄧先生以至大至剛的革命精神，力行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同時又是受過由陸軍小學而中學而保定軍官等校的嚴格的軍事訓練，加上他那種魁梧奇偉的體魄，龍馬不羈的精神，在想像中是會以為一位剛烈不過的人。其實鄧先生除開生活嚴肅，不苟言笑之外，與人接洽和治事，總是和藹可親。他在工作繁重時精神非常緊張，表現出「沒厲無前」的氣概，但祇覺得「威而不猛」，仍然是很可接近的。與接談問題總是「滔滔不竭」，「頭分縷析」使人樂於接受。在接談中偶爾間加入一二幽默語句，使人莞爾，助長談興。對人接物，態度誠懇，更是與接觸過的人們所稱道的。

鄧先生出自農家，父親到是一位讀書人，還是前清的秀才。在遜清末葉內外憂患環生的時期，頗寄望於他的兒子，家庭教育頗為完善。母親是一位慈祥婦人，偉大的母愛，常常引起鄧先

生童年的回憶。由於和愛的家庭生活以至由陸小而部隊的團體生活，三十多年時光淘養出對人類偉大的愛。另一方面却非常憎惡那些吸人膏血的剝削者，壓迫者，咀咒他們為臭虫虱子。他為早年離開家庭過着團體生活，接觸事物非常的多，由於他的聰明知慧，體會出社會上各種形態，這即是所謂懂得「人情世故」。他最看重友情，他認為他的朋友都是出入生死的戰友。對於舊社會的禮教道德，他指出片面性的禮義廉恥——下對上的一種義務，應該加以改造。只有流行在下流社會的那種俠義精神，還可以提倡。他對於朋友間的交誼，不單正在事業上以道義相勉勵，緩急上通有無，而且在死生危急當中，挺身赴難。在戰場上他英勇的照顧袍澤戰士，如十二年肇慶之役在火線上揮軍搶救陳誠（當時陳在鄧部任連長，受傷不能行動），同年在東江戰役從火線上抱着受傷的某營長，血淋淋的離開火綫。這些都是在萬分危急時候，捨己救人的至高道義。至於撫卹照顧烈士遺族，更是仁至義盡，這些都是事實，有很多人都知道的。

在友朋，同志間的來往，最喜歡傾聽他人意見，偶有不同意見以至爭論時，鄧先生必反覆辯證，不厭其詳，從無疾言厲色，使人屈從己意之意圖。雖然每次觸問題，尤其是政治問題，鄧先生很少放棄他自己的意見，但從事實與理論的證明和闡發，使人心悅誠服，從不採取教條，訓令形式，埋沒他人意見，勉強他人接受。

私人來往，周旋進退，「娓娓深談」，「戟言截笑」，天真活潑，幾忘人我。朋友中偶有因

難，有所求助，無不力謀解決，樂誠懇切，體貼溫厚，每使人覺得人間友情之可貴，刻薄寒澆的世風，他給人間以溫暖。這點是和他相識，和他交手的朋友們所樂道的。

鄧先生的思想根源是出發於歷史唯物論，這點在一九三〇年夏在上海舉行結黨式時候，特別提出的主要信條第一項，標明：「我們哲學根據是歷史唯物論」。他從這種思想出發點觀察世界，觀察中國，觀察萬事萬物，確定了他的人生觀，世界觀。從他手寫的「我們政治的主張」以及其他論文，處處都可發現他的思想根源。對於中國社會分析完全運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唯物史觀去勘定：「中國現時的社會，在形式上固有異於古代的封建制，但，就其內容的性質而論，的確還離不了封建勢力的支配，因此，整個的中國社會，還在封建勢力支配階段，還是前資本主義的時代，同時又因為帝國主義勢力支配中國的緣故，使中國社會益呈複雜的狀況。這兩重支配都是中國社會不能向前進展的大障礙」。他不單止運用這觀點去觀察中國現社會，他還觀察到中國社會所存留的各種學說，思想，各種社會現象，社會病理。「他認定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是帶着民族性的「平民革命」，但中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有其不同點，即中國無比較發達及自覺的人民（資產階級包括在內）因此，中國革命性雖為民族解放的廣大運動，且為破壞封建殘餘的民主革命運動，然却不能為資產階級所領導。中國革命又不同於俄國十月革命，因為中國無廣大的自覺的產業工人，無法建立無產階級獨裁的革命政權，應該是農工及其他城市鄉村的被壓迫剝削

者的革命，但却帶着非常濃厚的「社會革命」的色彩。因此，這種可以叫做「農工平民」的「民族革命」。不過這個「平民」的涵義和舊時代僅與「貴族」相對待的解釋，並不相同，凡自食其力而不剝削他人，却直接參加生產的近代工廠工人，手工業者，自耕農，佃農，僱農，設計生產者，管理生產者，以及担任運輸分配者，和其他輔助社會生產的職業人員，而現時又是被政治勢力所壓迫着，統稱之為「平民」，換言之，也就是以農工小資產階級的聯合，作階級鬥爭的同盟，以爭取政治，經濟的解放，求得民族的獨立和自由。」鄧先生是依據着歷史的觀點，指出當前的任務，和歷史的前程，其正確性自然要歸功於他的研究社會現狀的方法論。

鄧先生對於中國現在還殘留着的如老莊的空幻虛無思想，孔子的中庸愚蒙思想，耶穌的妥協調和思想，佛教的厭世虛空思想，都所深惡痛絕。他要把禮教和庸師宿儒紳士道學家者流一概摧陷廓清，把孔廟，貞節坊，祠堂，廟宇一齊掃除干淨，而代以新的「人」的，社會的，樂觀的人生觀，社會觀，使男女同胞一齊都衝出目前這個中國的黑暗地獄，跑上新鮮活潑的大道。

對於歷史的研究，鄧先生似乎特別注意。他主張史的研究，尤其是世界通史的研究，有了史的研究，才曉得世界的由來，才曉得世界各部的相互關係（一定要站在社會的觀點上研究，才能適合於要求）。中國近代史更是切要，因為一切社會變遷的條件，都是在最近百年內才急劇的發生和變化的。研究歷史不單止可以曉得已往的成敗得失其原因及其結果，並且可以曉得歷史的行

程，由何處來往何處去。此外對於經濟史的研究，認為是確實說明現世界各國的實際狀況，與其由來及其客觀的要求。對於經濟學的研究，認為是說明現時人類社會的生活要求，及其要求的法則。對於政治制度，各國政治的研究，也認為很是重要。從歷史的由來，指明歷史的去路，鄧先生把握着這點，所以常常說「歷史的任務」，或「歷史所賦予的使命」。鄧先生是想促進歷史行程，使中國早日達到獨立，自由，民主，康樂的中國。

鄧先生最光輝最寶貴的精神是酷愛真理力求實踐，尤其重視批判的精神。所以在無間斷的鬥爭與無間斷的求知中，不僅能堅守革命的原則；而且能不斷批判・前進・創造。當北伐軍途中，鄧先生即警惕到革命陣營中軍事獨裁的危機。在武漢政府時代，從羣衆的反帝反封建運動的開展中，實際批判了資產階級革命與妥協的雙重性。因此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他是打破了國民黨的傳統觀念，把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加以嚴肅的批判而求其發展：第一明確指出民族民主革命的階級基礎，把扶植農工的觀點發展爲農工中心的觀點，揚棄了階級協調和全民政治說法，完全採取被壓迫階級聯合向壓迫階級進行鬥爭的方針。從而確定革命政權的性質是民主聯合的平民政權；第二・確定實行土地革命，發展國家資本，容許私人資本在一定限度內的自由發展，作爲走向社會主義過渡階段的經濟政策，并確定實現社會主義爲革命的前途；第三・對於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確定聯合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的總方針，聯蘇政策是其中主要一環。這都是鄧先生

革命精神之所在。他以這種判批的前進的革命精神，繼承孫中山·朱執信·鄧仲元·廖仲愷·諸先烈的革命遺緒而超出於他們的向前昂進，負起革命階級聯盟的重大任務，從勞動黨內革命鬥爭到組織第三黨，給國民黨反動陣營一個致命的打擊，增加了以中共爲首的左翼陣勢，加強了整個民族民主的革命力量，這些革命的業績就是構成今天中國人民大勝利的因素。如果只看見鄧先生生前的赫赫功名，崇拜他的英雄氣魄，或者認爲他是超人的人，當他的主張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教條，都是沒有懂得鄧先生革命精神之所在，這樣去崇拜他恰恰是違反他的精神，惟有最能學習他在革命實踐中批判，不斷揚棄陳舊的東西，不斷補充新鮮的東西，隨着時代前進才是真正認識鄧先生崇信鄧先生。

鄧先生正在壯年，遽爾殉難，春紅夏綠，雹碎霜凋，其損失是不可補償的。然而他的正確主張，他所手創的黨，他所領導的工作同志，依然遵從他的遺志，繼續前進，繼續奮鬥。今天中國的新形勢已經到來，殘暴的無恥的舊統治宣告結束，廣大的人民，覺醒的英勇鬥爭的成果，將產生在現實的，合理的國家，社會的建設上面。我們謹以崇誠告慰鄧先生及其他死難同志諸先烈之靈，我們堅決的在新中國建設下完成使命！

陳卓凡

楊逸棠

一九四九年五月作於香港

鄧演達先生遺像



鄧演達先生傳略

繼承孫中山先生中國革命的使命，站在廣大的勞苦的農工平民大眾的立場，革命領導者鄧演達先生，於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被反動的南京統治——主犯蔣介石及其同僚走狗——所殺害而與世長辭了。先生盡瘁於中國革命，一生艱苦奮鬥，不避勞怨，其對於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正得到結論，領導農工平民羣衆與反動的統治者開始鬥爭，無恥的殘酷的敵人在它挽救沒落的途徑中，竟用卑鄙的手段，戕害了中國垂危的民族生命象徵！在先生爲中國革命而犧牲，爲民族解放而犧牲，是算盡了責任，而他的一生革命事蹟，却是革命後死者的典式，他的革命任務，却待革命的後死者去完成！爲着永留後蹟規範；爲印證中國革命的途徑，爰述先生事畧如下：

一 革命的童年

先生諱演達，字擇生，廣東省惠陽縣永湖墟鹿頸鄉人。先世是由梅縣丙村遷居該鄉，世業農。兼作永湖淡水開船夫，到了他的父親鏡仁先生開始讀書應考在遜清光緒年間考取了秀才，爲人曠達豪邁，老而彌堅。母親葉氏，是本鄉一位慈祥親切的農家淑女。兄誠生是一位純粹的軍事家，專以技術上爲國家服務的。夫人鄭立貞女士亦是同鄉農家淑女，在兩禮教下所結合。伉儷間的生活極機械，平淡，却絕少遺言。先生生長於農村家庭，賢明的父母在幼年時代所給予的教育，使他向上的激勵。從小生長於農民區域中，對於農民生活狀況，殊爲了解。其故鄉組織地主與佃戶，分區而處，有所謂地主區，又有所謂佃戶區。地主與佃戶間的界限極嚴，因此地主壓迫佃戶的現狀，遂層見疊出。加以地主區的人們，豐衣足食，優遊餘裕，而佃戶區的人們則胼手胝足，鳩形鵠面，苦樂的懸殊特甚。先生適生是鄉，童時對於地主的橫暴與佃戶的困苦的印象甚深，遂構成先生的農民革命及土地改革思想的最原始的基礎。先生出世，適當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之後，當時國人受二次戰敗的創傷，對於國際地位以及中國的國勢，已漸漸明瞭。且適值革命運動，活躍甚烈，革命黨人時常將中國國勢的凌夷與帝國主義的侵畧，向農村方面宣傳，先生耳濡

目染，遂又種下先生民族解放與反抗帝國思想的胚胎。當時先生已獲得了革命的基礎，又因與革命運動接觸的機會極多，風起雲從，慨然興嚮往之志。清末幾次的革命黨人在廣東起義，尤其是惠州一役，使這位年幼的農村兒童，對革命，戰鬥，犧牲，的事蹟，感受到很大的刺激。又因在中法，中日戰爭之後，先生習染於革命黨人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富國強兵的思想，所以年稍長即志願做一個為國家民族服務的軍人。這就是先生學習軍事的動機。

二 早年的軍事教育

先生於十四歲那年（民國三年）入廣東陸軍小學。清季編練新軍，需要大批軍事幹部，在各省設立陸軍小學，考選各縣青年入校訓練。廣東於光緒末年設陸軍小學於廣州附近之黃埔，先生入校為第四期學生。軍事機構為當時革命黨人所重視，滲入該校傳播革命種子，以鄧仲元先生主持其事。先生在校為同學中年事最幼者，而聰穎奮發，每試輒列前茅，為師友所驚奇，鄧仲元先生尤所器重，獎飾不已。辛亥革命陸小同學大都參加革命行列，先生亦隨北伐軍出發，在姚雨平總司令部任職，初露頭角。南北議和，民國建立，所有參加革命工作之陸小學生，回粵重修軍事，或派往外國留學。先生派往陸軍速成學校，於民國二年畢業。民國三年進武昌陸軍第二預

備學校，除軍事科學之外，稍稍涉及經濟，政治諸科學的研究。當時中國政治在袁世凱的軍事統治下，黑暗落後，社會窒息。中間經過袁氏稱帝，北洋軍閥的跋扈專政，政治愈加黑暗，經濟愈加破碎。先生目擊當時情勢，不勝憤激，擬棄其所學從事工商業，屢屢寫信給他的父親，痛陳國事日非，慷慨激昂，放言救死圖存之道。父親溫慰有加，勸畢所業再報效國家。民國五年冬預備學校畢業，升業於保定軍官學校。在學期間研究軍事科學之餘，輒致力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民國八年，畢業於保定軍校，被派赴邊防軍入伍見習，充下級軍官，時先生年僅二十四歲。

民國五年討袁之役，廣東方面驅逐了袁氏羽翼龍濟光，舊桂系陸榮廷入粵，把持軍政。陳炯明率軍二十營，不容於粵省，奉命授閩，入漳州，據有閩南十餘縣，與北軍對峙。時鄧仲元先生在陳部任參謀長，振軍經武，力謀以此區區部隊作革命武力。聞先生已畢業軍校，急召回勸助。先生奉召問道南下至漳州，與仲元先生暢談竟日，對於振軍之道貢獻已見，仲元先生深許之，乃組織憲兵，使先生統率，於是先生脫離學校生活而致全力於革命事業了。

三 初期的努力

民國九年孫中山先生命陳炯明由漳州率師回粵，驅逐舊桂系。先生亦率領憲兵隨軍出發。井

組織督戰隊由先生任隊長，出入火線，激勵士率。淡水一役，回師之粵軍爲林虎部桂軍所阻扼，無法進展。先生乃獻間道出河源直搗惠州，抄過淡水之計，鄧仲元先生深是之，加兵出河源，先生亦督率戰隊參加河源戰役。由於士兵奮勇，擊破河源守軍，直趨惠州，淡水之桂軍，倉皇引退，回粵乃竟全功。廣東恢復之後，鄧仲元先生成立第一師，先生卽任師部參謀兼步兵獨立營營長。團結上下，羅致人才，仲元先生倚如左右手。當時在粵之軍隊，統屬於陳炯明指揮，隊伍龐雜，思想腐敗，紀律廢弛，封建氣息尤爲濃厚。如此之武力去負擔革命，自然是不能勝任，并且還要壞事的。當時孫中山先生已回粵，觀此現狀，深知不能負擔革命，此意仲元先生最爲了解，乃致力於第一師之創建。先生深知仲元先生之意向，仲元先生亦深知先生之能力，經營肇創，不遺餘力，同心合力發展第一師，鞏固革命基礎，發揮革命機能。不久，先生又受命組織工兵營，悉心經營，努力訓練，全營精神奮發，起模範作用。時間和人力的累積，第一師已漸漸的具有基礎。當時孫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和推進計劃，爲陳炯明所不了解，漸漸的發生矛盾。鄧仲元先生週旋其間，彌縫調解，煞費苦心，但終於不能挽救，而反遭陳部反動軍人之刺殺。這是代表兩種不同勢力——新興的革命力量和封建殘餘勢力對立，矛盾的暴發。當時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發展計劃和陳炯明的封建割據主張，兩不相容。第一師在粵有左右局勢的力量，尤其是對於革命方面多方維護，怨忌叢集，消滅第一師的陰謀，是時刻存在着的。行刺鄧仲元先生的舉動，乃是陰謀的第

一着。仲元先生被暗殺之後，先生悲痛領導同志之慘死，革命危機之暗長，報仇與鞏衛革命，唯有維持第一師的存在，努力團結振奮軍心，使不發生動搖，保存此革命的武力基礎。

四 革命的護持者

民國十年孫中山先生率師北伐，假道廣西，進駐桂林。原請陳炯明率部留粵，維持後方，供應餉糧。到北伐出發之後，陳氏違反原議，攪權跋扈，扣押餉械，使北伐軍不能進展。孫先生乃由桂林回粵，重行布置，當時叫做「改道北伐」。孫先生回抵廣州，陳氏退居惠州。第一師因先生之斡旋，首先擁護孫先生北伐主張，各部出動，參加北伐。民國十一年先生隨軍出發，經始興、南雄向北推進，前鋒已過贛州。先生指所部工兵營英勇作戰，首先進入贛州。正在待命前進之際，廣州方面忽有粵軍將領請孫下野之事變，以葉舉爲首的粵軍圍攻總統府，宣稱「請孫下野」，孫中山先生幾及於難。事變之後，北伐軍事奉孫先生電令回師截平叛亂，許崇智率第二軍及李福林部爲前鋒，由贛回師。帥次韶關，爲陸部粵軍所阻，不能前進。第一師內部上層份子，惑於謠言，發生動搖，幾無法維持，先生乃急會同陳銘樞部第四團，間道由信豐退據河源。當時交通阻滯，真相不明，先生乃潛赴香港經上海，見孫先生請示善後計劃。孫先生告以保存實

力，相機圖再舉，並促即返軍中主持。對殘部流離轉徙，疲憊已極，上下矛盾，軍容不振。陳銘樞陷於苦悶中離開部隊。先生堅持信念，聯絡全師上下，苦力支持。事定之後，移駐西江整理補訓，漸復舊觀。

民國十一年冬孫先生撤調在廣西之楊希閔、劉震寰所部滇、桂軍東下，驅逐陳炯明。事先派人通知先生聯絡各部，準備策應。楊、劉兩部在廣西部署之初，陳炯明在廣州已有所聞，乃派葉舉率軍西上堵截，兼督促西江部隊協同防禦。葉舉率部進駐肇慶，素知先生（按葉與先生同鄉）思想意識，懷疑或有異動。當日先生率部西上堵截楊、劉東下之際，葉舉實在放心不下。出發之日，葉舉約先生至其司令部，要先生表明態度，以釋其疑。動以抱情，許以大利。并置血酒要求當天誓願，先生於此時絕無猶豫，舉杯向天高聲說道：「鄧演達有對不住廣東人民的事，天地鑒之」。一飲而盡杯酒，葉乃釋然。先生遂得無阻礙的揮軍西上，連夜進抵封川，將部隊結集在封川境內，自己乘小汽船溯江西上，與第一師其他起義部隊會合及東下部隊首長會晤，決策東下，自任前鋒。葉舉在肇慶聞訊，驚惶失措，率軍逃竄。先生經肇慶，三水而達廣州，聲威所及望風披靡，兵不血刃，與滇、桂軍進佔廣州。先是，先生受命起義之初，聯同第一師部復發查、葉挺等秘密舉事，陳濟棠時任該師團長，所部盡隨同起義，而陳尙在夢中。事發之後，陳如夢方覺，走報旅長陳修爵，瑣所部爲鄧演達等勾引他往，自請處分。陳修爵怒斥陳無用，謂不跟叛變

部隊同走，復何面目見人？陳無奈追蹤前來，諸人見陳來歸，乃得復任團長。其餘未參加起義之部隊，由陳修爵統率跟其他粵軍退據東江一帶，第一師部隊從此分化了。先生於此時毫不顧惜，與諸將領會商結果，將軍隊重新編配，推李濟琛爲師長，而先生則任第三團團長。廣州已定，歡迎孫中山先生回粵，組織大本營，孫先生自任大元帥，時民國十二年春間事也。陳炯明部粵軍已退出廣州，仍盤據東韓江一帶。而楊、劉所部滇、桂軍入粵之後，羽毛漸豐，轉而把持財政，劫奪稅收，革命局面復陷於困頓境地。先生於此時期愈加奮發，不避艱險，首先設法團結內部使第一師全部討滅叛將沈鴻英，更移駐江門四邑，綏靖地方，復轉戰西江一帶，收復肇慶以西各地，地方大致救平，部隊復加訓練，漸成勁旅了。時孫中山先生以大元帥名義，坐鎮廣州，外有陳部粵軍竊據東江，抗不服命，內則楊、劉部滇桂軍，驕兵悍將，陽奉陰違，局促廣州，一籌莫展，乃檄調先生部拱衛大本營，藉作警衛。孫先生討逆心急，屢調滇桂軍進攻惠州，皆遭阻不前，師久無功。乃親駐石龍督戰，志克惠州，而各軍志不在此，反藉寇自重。孫先生憤怒之餘，親率先生所部一團之衆，奮攻惠州，當時孫中山先生所倚靠軍隊，僅此而已。不惜破釜沉舟，背城借一，蓋欲一伸義憤，以愧此驕兵悍將耳。惠州天險，易守難攻，更兼單薄兵力，自難迅奏膚功。先生受命攻城，奮勇指揮前進，槍林彈雨中營長某陣亡，終無功而還。

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標明主義，確定政策，以聯合陣綫方式，實行國民革命。先生

日夕追隨孫中山先生，耳提面命受主義薰陶，特別興奮。所統率之第三團首先接受政治訓練，先生對於三民主義以及國民革命的理論，時常召集全團幹部開會研究，同時對士兵公開講演，不厭其詳。時惠州久攻不下形成對峙局面。先生所部奉調西江駐防肇慶一帶，整頓編練，不遺餘力。同時極力啓導廣西新興將領李宗仁、白崇禧、黃紹雄等以革命大義，取得相幫聯絡，由是肇慶以至梧州連成一氣，聲勢益壯。當時形勢是需要擴大戰綫，所以先生不辭勞苦努力爭取人們參加革命。

五 黃埔軍官學校的建設

孫中山先生在廣州雖以大元帥名義指揮革命，可是外受陳炯明部粵軍的攻擊，內受楊希閔、劉震寰 部的挾持，感覺到非訓練真正爲革命負擔任務的武力，決不能建立革命的基礎，並以消滅黨內反側。此時履行三大政策（聯蘇、聯共、農工）已經與蘇聯代表商及籌辦軍校，養成革命軍事幹部之議，蘇方亦極贊同，乃着手籌備，委任先生爲訓練部主任，先生力推李濟琛先生而自居其副。全付精神致力於該校之創建，辭去第一師第三團團長之職，遷居黃埔，並招引嚴重、季方、葉劍英諸人分別主持籌備事宜，以及訓練規劃。悉心籌劃，不遺餘力，終於民國十三

年春宣告成立，蔣中正任校長，先生任教育長，軍校開始時學生不過四百餘人，在其所屬的社會成分上說，十之八九是小有產者，鄉村小農的子弟也不在少數。但在當時的複雜的政治環境——楊、劉霸佔廣州的時代——與全國的凝固於政治局勢中，頗足以激動大多數青年的憤激與努力。先生在這時候，盡力於國民革命任務的宣傳與訓練，構成當時黃埔學生的靈魂——因為得着了這點靈魂，所以在後能和陳炯明的殘部及楊、劉作戰，所向無敵，發揮時代的機能——這時蔣學生對於先生的愛戴，和先生對學生的嚴肅與慈愛，構成當時的革命的中心團結。該校校長蔣中正，別有懷抱，對於先生的努力，心存嫉忌，轉倚王柏齡為心腹，授引羽翼，深相結納，隱然對先生成一種敵對形式。先生以革命的事業，久受軍閥的摧殘與壓迫，不能有所建樹，乃悉心經營黃埔軍校，希望造成革命的武力，以保障革命前途的發展。而此時日擊着這純粹的革命武力基礎，又漸為野心之所劫持，所利用。在當時革命基礎未固，局促廣州一隅，委曲求全，冀能使野心家有悔誤之一日。同時深深感覺到中國的革命事業，應從政治、經濟的解放以達到國家的建設，乃決然辭去黃埔軍校職位，赴西歐遊歷，在德國研究政治、經濟，冀學有成就，貢獻祖國。先生出國未久，孫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廣東全省雖告統一，而黨內糾紛日增。落後份子破壞革命，陰謀日亟，廖仲凱先生被刺殺，黨內形勢日非，革命前途危險狀態，岌岌不可終日。先生此時不能再事學術上研究，乃適返祖國，參加實際行動。民國十四年冬初由德國柏林起程，假道蘇聯返國。經

滿莫斯科畧事逗留，參觀蘇聯政治上經濟上各種建設，又與蘇聯人士相接觸，交換革命意見。途中將觀察所得，寫成數萬言記事，對於世界革命與國民革命關係，敘述尤為詳盡。十四年冬末回抵廣州，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主席團以先生初由歐洲經蘇聯返國，見聞必廣，對於中國革命必有貢獻，乃請先生作一報告。先生目親當時黨內部分落後分子，對於中國當前任務，盡了了，對於孫中山先生手定之三大政策，有表示反對者。趁此機會提供中國革命的意見。力言現階段的國民革命，其任務為反帝國主義，反封建殘餘，求得民族解放，民主自由。其性質為各階級聯合，構成統一陣綫以履行其任務，所以叫做國民革命，任何一個人，或某一階級違反這原則，都是離開了革命陣綫，變成革命對象。在這聯合陣綫中的主力軍，自然是農、工大眾，本黨的農工政策，其中任務，便是如此。復言國民革命的完成，是加速帝國主義的崩潰，亦即加速世界革命的進程。先生於此次大會被選為第二屆候補中央委員。這時黃埔軍校自先生離開之後，百事廢弛，精神不振，當日創辦黃埔軍校的精神，漸漸湮沒，黨內負責同志共促先生重任該校教育長，先生富仁不讓遂再度任教育長，銳意整飭，漸復舊觀。在當時革命環境，祇有在團結前提共同前進；祇有在工作上批判出錯誤，故先生在校每遇事直陳，不稍顧忌，聽者雖心不謂言，但終以先生光明正大的革命立場，無懈可擊，轉而虛與週旋，極力敷衍。

六 北伐前後

民國十四年間廣東宣告統一，革命武力中心，隱隱然寄託在黃埔軍校。校長蔣中正表面上極力左傾，高喊「中國革命應在第三國際指導下」，以欺騙羣衆。骨子裏抓住軍校，佈置爪牙，消滅異己武裝，收編成若干軍隊，造成左右局勢的力量。廖案發生之後，放逐胡漢民，把當時在廣州的革命政權，劫持操縱，漸漸變爲私人的勢力，而口頭上仍然高談革命，掩護其私圖，所謂「言足以掩其行」者是也。先生於此時復任黃埔軍校教育長，雖深悉蔣氏之爲人，但仍希望其翻然覺悟，改變其自私自行爲，以工作上矯正其錯誤，言談間屢勸其私圖，對於軍校則悉心經營，訓練學生，使不致走入歧途。唯時蔣不特無悔悟之心，並且勾引落後的右派分子，造成三月二十日的事變。這是一種信號——落後的右派分子向革命進攻的一種陰謀行動，試演軍事獨裁的第一幕。先生在這事變當中，身當其衝，蔣氏臨時派人將先生監視，禁止與外界交通。這一閃雷不特先生不明究竟，卽當時政府當局亦莫名其妙。蔣氏此舉實爲背叛革命之示威運動，國法黨紀，均所不容。當時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懦弱無能，對此事變，空有憤激，不能制裁，結果沉默的出亡，全黨默然。蔣氏試演獨裁之計已酬，但終不能掩其罪惡，乃藉名排共，聊作解嘲，而先生亦不能

安於工作。會潮州軍分校成立，乃調往主持該校。兼任第一軍黨代表及政治部主任之職，時民國十五年春間事也。

廣東革命內部的矛盾，日益發展，當時領導人士謀一解決的辦法，乃倡北伐之議，此蓋求矛盾之統一，圖在北伐的進程上暫時放下矛盾——大敵當前，團結奮鬥。北伐成議之後，組織總司令部，以蔣中正任總司令，並因事實上的需要，以先生任總政治部主任。

先生受任總政治部主任，將原日之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改組，加強戰鬥組織，延攬革命人士參加工作，當時有孫炳文、章伯鈞、郭沫若、郭冠杰、李民治、季方、楊逸棠等數十人，分別担任各部工作。民國十五年夏間正式成立總政治部，籌備北伐工作，倍形忙碌。先生主持策劃，日無餘晷，曾召集各軍師政治部主任開工作討論大會，決定工作計劃及各種口號，著名的「實行三民主義」，「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剷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等標語，口號，即於此時確定為基本口號，從廣東沿途宣傳直至長江流域。

在北伐出發之前，先生對全部工作同志說：「我們應該要明白中國的農工平民大眾，受了帝國主義和軍閥的二重壓迫。我們此去要喚起廣大的農工大衆自己起來解除自身的痛苦，同時我們要剷除軍閥制度，永絕祖國禍亂的根源，我們更注意並防止我們自己造成爲軍閥的趨向。」大軍出發運輸頻繁，總政治部隨軍出發之日，先遣部隊前鋒已過衡陽，先生趕赴兩錢，率少數隨從工

作人員，先行出發，及前鋒部隊。大部工作同志隨後出發，直至衡陽，始與先生會合。

北伐軍因事前接納唐生智的轉變而順遂地進行，總政治部到達衡陽之後，特命前進，因得餘時間開工作會議。先生親自主持，首先指出軍隊愈是前進，便愈和敵人——吳佩孚的軍隊接近。政治工作要點是提高軍隊戰鬥精神，同時要加強軍隊與民衆合作的精神，增加摧毀敵人力量。我們要達成這種任務，我們更加倍努力，我們不單止在戰場上，工作上顯示出革命的犧牲精神，而且要在起居飲食，言談行動上處處起模範作用。喚起民衆，組織民衆，積極參加革命，也是政治工作的任務，所有經過地區在農村間應該鼓勵農民組織農會，在城市裏應該鼓勵人人組織工會，農民工人有了組織，自然要參加到革命行列。總政治部領導全體政治工作人員，必須完成這種任務，以加速革命的成功。最後又指出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是在解決農民問題，農民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農民問題解決了，即解決中國問題百分之八十。因此先生要全體工作人員及各軍、師以下政治工作人員，努力調查沿途的農民生活狀況及土地分配情形。這種調查工作，應該有詳細報告，定爲工作考績之一。先生在北伐途中，除指導政治工作之外，並兼任行軍參議事項，尤其是担任前鋒之第四軍，更與先生血肉相關，參與我機，領導戰鬥，事務紛忙，日無餘晷，在忙碌時常徹夜不寐，平且又治事如恆，其精力實有過人之處。

北伐軍事進展總政治部移駐長沙，先生率領若干工作人員會同前鋒部隊先行出發，渡汨羅，

入岳州。平江一役，北軍全潰，先生入第四軍軍中參與指揮作戰，進迫汀泗橋，渡河一戰，北軍解體，乘勝追至賀勝橋，吳佩孚僅以身免。革命軍長驅直下，抵達武昌城下，劉玉春陳嘉模固守孤城，先生任攻城司令，指揮圍城各軍奮勇攻擊。武昌城池堅固，城內守軍更爲吳部精銳，負隅死守，久攻不下，先生親臨城下指揮，與士卒同生死，槍彈如雨，屹不爲動，卒於十五年雙十節攻破武昌，俘劉玉春，陳嘉模以下萬餘人，革命旗幟高揚黃鶴樓頭，全國形勢爲之一變。城下之後，先生始有餘暇入浴，發覺骨肉腐爛，其任事之艱苦卓絕，蓋可想見。

七 武漢時代

武漢已下，先生被任兼湖北省政府主任，經營肇劃，鞏固革命的新土。時北洋軍閥開始崩潰，被壓迫的民衆驟然失去了重壓，民衆運動勃興起來。特別是在武漢，因爲當地的工商業者都有相當的基礎而經濟及政治又足以縉縉長江各省，因此在武漢的政權掩護下的民衆運動，自然可以推進並影響全中國的主要地區，民衆起來的信號到了，這足以動搖軍閥的基礎，並可由民衆的力量，發展革命的事業。此時先生所領導的總政治部爲發動民衆工作的樞紐，由於領導的適當和工作的努力，在武漢當時改了舊觀，搖撼着舊社會的基礎，新的希望，新的憧憬，一切被壓迫的民

衆先後有組織的起來，城市中的工人及青年學生固能表現其鬥爭的成績，即在鄉村中的農民也開始醒覺了起來搖撼地主的政權。革命的羣衆的聲勢，攝服了當時服務於政府中的文武職員，叫他們不敢爲非作歹；叫他們不能不日夕勤勞。總之，當時的情勢，人人心中都感覺著舊的一切在動搖，新的一切生長，社會是起了絕大的變化。先生於此時提出嚴肅革命陣營，提防軍事獨裁傾向，同時提出解決農民間題，鞏固革命，發展革命。寫了一篇「目前我們應注意的是什麼」？各報競相登載，影響一時。

民國十六年一月間漢口英租界發生民衆與英軍衝突事件。原因是武漢市民在解放之後，活躍自尊心理充滿每一個市民胸海中，工人宣傳隊在漢口租界江邊馬路，作革命宣傳，聽衆圍觀甚衆，英軍數名武裝干涉講演，圖驅散羣衆，羣衆不服，齊起反抗，當場奪得英軍槍械。英軍逃回報告，租界戒嚴，江面英艦，脫去炮衣，實彈指對武漢兩岸，情勢險惡萬分。時先生在九江參加軍事會議，總政治部在武漢將實際情形急電報告，先生得電即在會議中提出報告（按該電稱英租界英軍與民衆發生衝突，租界戒嚴江面英艦炮衣已褪隨時可粉碎武漢云云）憤激陳詞，力言武漢租界和炮艦，威脅革命，並稱民衆自動奮起爲政府後盾，應執行驅逐帝國主義在華之勢力的任務。慷慨激昂，一席動容。報告時蔣中正氏亦在座，獨謂該電危言聳聽，將惹起嚴重後果。蓋此時蔣氏已暗中計劃與帝國主義取聯絡，惡聞反帝之語，故獨持異見。先生於會議終結後，即遣返

武漢，一方力勸民衆鎮靜，聽候政府解決，一方面則準備向政府建議，收回租界。直至政府遷到武漢時，乃將漢口，九江兩處租界收回，獲得外交史上光榮之一頁。

革命勢力發展到武漢之後，民衆起來，舊社會基礎是震撼得動搖了，因此一切的反動勢力，勾結起來反對革命，一方面社會舊勢力，舊統治暗裏反動，企圖傾覆革命，一方面當時黨內右傾的腐敗份子伺隙而動，企圖奪取革命果實，另外操縱主持的則有帝國主義者，暗地裏將這些反革命勢力集合在一起，而以蔣中正爲代表主持人，有計劃的實行破壞革命。最先由昏庸老朽右傾分子如吳稚暉輩，攻擊先生暑綽：總政治部不過總司令部一機關，但鄧演達主持此一部門，擴大工作比國民政府還更大。語句中含有鄧演達越權工作，以及批評，干涉，民衆運動。再而製造民衆「過火」，「黨軍可愛，黨人可殺」等輩語，中傷當時在武漢之革命人士。國民政府由廣州遷往武漢，途次南昌，蔣中正擬將全體中央人員留在南昌，供操縱利用。中央各人到達南昌之後，遲遲不獲前進，羣情惶惑。彭澤民先生時任中央海外部長，隨遷在南昌，遇先生於寓所，因四爲何逗留不得遷往武漢，先生稱「政治作用」。蓋此時先生已深知蔣氏有異動，不能不在忠實同志之前透露真相。當時國民黨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依照決議遷移武漢，使能領導革命，蔣氏此舉其用心實不可問。先生認爲這是革命危機，如果不設法制裁，則革命將一敗塗地，而且所有努力，所有犧牲也完全爲所用，因此非常痛心。曾盡力圖挽救，與蔣氏作長談，曉以革命大義，並逃言

農民解放，解決土地問題之重要。蔣氏終不採納，形勢無可挽回，乃連夜由南昌趕回武漢，大部分國民黨執監委員，亦衝破羅網，紛集武漢，提出反對軍事獨裁，黨權高於一切的主張，成立中央黨部，組織武漢國民政府，以圖制止陰謀，而挽救革命。武漢的中央黨部和政府先後成立，先生選補為中央執行委員兼農民部長，並於此時向中央提議成立土地問題委員會，將北伐途中所搜集關於農村中各種材料，提供中央參考，又令中央農民部和總政治工作人員，合組農民問題研究會，各軍隊政治工作人員，隨時隨地組織農民問題研究會，盡量招致農民實際參加討論，使中國革命核心的農民問題，普遍地令人注意。又由中央農民部籌辦農民運動講習所，訓練實際工作人員，先生任所長，特聘請毛澤東先生任副所長，日後湘、鄂、贛各地農民工作幹部，有許多是該所的學員。那時寧漢分裂逐漸明顯，以蔣中正為首的反動派集結在南京，一面在帝國主義的掩護下，一面涸集土劣，買辦，軍閥的勢力也成立了南京的國民政府極力向武漢政府攻擊。及至十六年四月十二日舉行清黨，屠殺了無數青年及農工份子，反動的面目完全暴露了，寧漢成了對立狀態。當時武漢政府對於革命的大計劃，舉棋不定，討伐南京與繼續北伐兩議，遲疑不決，最後以奉軍已深入河南腹地，西北軍被困守潼關以西，當時決策擊破河南奉軍迎接西北軍東出，會師河南，完成北伐。十六年夏大軍由武漢出發進擊河南奉軍，先生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資格，督率所部工作人員隨軍出發，並親自參預第四軍的指揮工作，臨關決戰，全軍傷亡過半，

準備犧牲，先生從容不迫，往來於火線上表示與該軍同生死，其勇敢負責，官兵無不感動。

河南一戰擊破奉軍，會西北軍亦東出曾師於鄭州。西北軍領袖馮玉祥先生抵洛陽，先生往晤暢談革命形勢，因約在鄭州開一會議，馮及武漢上層領導均出席，意見畧有出入，無結果而散，北伐軍乃回師武漢整補。

河南回師之後，武漢政府形勢日非，外受帝國主義的封鎖，經濟窒息，物質缺乏，內受土劣等封建殘餘的搗亂，威脅恐怖，布置陰謀，因此，人心惶惑，謠言紛紜。革命陣營中的上層領袖們開始動搖了。湖南的地主們爲壓迫廣大農民的抬頭，利用湖南土著軍隊，首先反叛革命了。何鍵，許克祥等湖南地主武裝，於廿一日開始屠殺人民，反對革命，當時叫做「馬日事變」。接着在武漢的湖南軍隊唐生智的其他部隊，與之起了默契漸有不穩形勢。這時候所謂革命的領袖們，如汪精衛，陳公博，孫科等，首先動搖了，並且撮拾反革命的餘孽，痛罵民衆運動的「過火」，「農民黨如豕鹿」了。先生於此時認爲革命到了最嚴重的階段，非民衆直接起來參加政權，主持政治，不足以鎮壓反動派的企圖，不能繼續革命事業了。要民衆起來參加政治，只有由民衆發動切身的生活鬥爭，工人們參加生產管理的鬥爭，農民們參加解決土地問題的鬥爭，只有如此，革命然後獲得拯救，免於失敗，流產。他寫了一篇「目前我們應注意的又是什麼」的文章，在報上發表，說明了當前形勢和工作方針，引起人們很大的注意。先生爲着挽回革命顛

勢，很嚴正的向那般動搖的領袖們提出警告，高呼：「我們不能自毀革命，自掘墳墓」。曾於深夜往訪當時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勸他堅持革命，不要動搖，並且指出只有依靠民衆，才是生路，依靠軍閥槍桿，結果是死路一條。當汪精衛表示要走他的反革命方向，不能接受先生勸告時，先生感受到革命又須重造，人民的痛苦又延長其解除時間，以憂鬱的眼光仰望着熒熒的燈火，堅決的語調指出國民革命到今天已是告流產，孫總理革命任務又一次失敗，然而人民終歸要起來，起來解除自己的壓迫、束縛的，我們今天不做，不切實去履行任務，明天自會有人去努力，去求實現，時代的任務是不能移越的，時機的把握稍縱即逝的，我們各奔前程罷！可是，這時候的矛盾，絕非警告所能解決，而那些所謂領袖的覺悟，至多亦不能超過本身的利害，革命的民衆剛是抬頭，便遭壓迫以至屠殺，無從再結果。先生此時感到孤掌難鳴，革命的頹勢已無可挽回，形格勢禁，遂於十六年初冬毅然跳出漩渦，化裝工人，間道從西北出國。

八 再次奮鬥到犧牲

先生離國後，經莫斯科，國際共產黨會開盛大的歡迎會，歡迎中國革命的指導者，在會中先生將革命的性質，詳爲解釋，並指出中國革命的任務。時蘇聯反對派與幹部派戰鬥正烈，牽及中

國革命問題，先生只能自守其主張。因此先生遂離開莫斯科，轉赴柏林。

十六年冬抵柏林，專研究政治經濟，博覽羣書，並考察各種實際問題，尤其是對於歐洲各國的農民問題，曾經極留心地考察，並且親自到歐洲各國農村裏面去探訪，調查各當地的農民生活狀況。考察各國解決農民問題的方案。他在德國時最久，英、法、匈、奧、波蘭、立陶宛、意大利、巴爾幹半島諸國家，斯干拉維亞半島諸國家，以及新興的土耳其，殖民地的印度，皆遍留足跡，實際地體驗各國政治，並借此作中國革命的參考，十九年春先生從歐洲回到中國來，回到反動勢力籠罩的中國來，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集中一切革命的力量，準備與惡勢力奮鬥，復興中國革命。

先生在歷年來的經驗，和理論上的推斷，決定「中國現時的社會，在形式上因為異於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就其內容的性質而論，的確還離不了封建勢力的支配。因此整個的中國社會，還滯留在封建勢力支配的階段，還是前資本主義的時代。同時又因為帝國主義勢力支配着中國的原故，使中國社會益呈複雜的狀況」。因此決定中國革命是以農工為中心的平民革命。在歷史的體系說是繼承孫中山先生革命未竟事業，打倒一切孫中山主義的叛徒們，恢復中斷的中國革命，具體的說「是要平民羣衆運用自己的力量取得政權，澈底肅清帝國主義的在華勢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根本的推翻封建的軍閥官僚政治，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以國家資本主義的建設過

渡到社會主義的實現」，所以，對中國革命核心問題，在經濟上主張中古時代殘餘的肅清，對小農經濟生產加以改造，同時對帝國主義侵入後的冒辦高利貸經濟，應加以消除，而以集體的力量，構成「計劃經濟」或「國家經濟」，向着社會主義的路推進。在政治上主張剷除官僚政治及軍事獨裁，使士大夫地主豪紳專政的傳統的政治形態澈底清除，而由人民直接掌握政權。在社會上主張掃除「名分」「偶像崇拜」甚至於買賣人口，役使人民的社會意識及社會行爲，特別在文化上掃除士大夫階級的「寄生文化」，而代之以人人所應有的「生產文化」，創造「勞動文化」，爲達到上述的目的；認定一切爭鬥的總和是政治鬥爭，標出建立以「農工爲中心的平民政權」爲鬥爭目標。對於農民問題的解決，「則在原則上主張土地國有，而用「耕者有其田」爲過渡的辦法。」這是先生解決中國問題的主張底大畧。

先生本着他的見解考慮又考慮，深思復深思，甚至廢寢忘餐地和學者研究，和同志商討，和朋友交換意見，結果認「復興中國的革命任務，是非常迫切的落在自己身上，於是察度客觀的形勢需要。遂專力從事於革命綱領的草擬。」

先生認定中國現階段「革命，是帶着民族性的「平民革命」——但中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有其不同點，即中國無比較發達的及自覺的人民（資產階級包括在內），因此，中國革命雖爲民族解放的廣大運動，且爲破壞封建殘餘的民主革命運動，然却不能爲資產階級所領導，中國革命又不

同於俄國的十月革命，因為中國無廣大的自覺的產業工人，無法建立無產階級獨裁的革命政權，應該是農工及其他城市鄉村的被壓迫剝削者的革命，但却有着非常濃厚的「社會革命」的色彩。因此，這種性質可以叫做「農工平民」。「民族革命」！不過這個「平民」的涵義和舊時代僅與「貴族」相對待的解釋並不相同，凡自食其力而不剝削他人，却直接參加生產的近代工廠工人，手工業者，自耕農，佃農，僱農，設計生產者，管理生產者，以及担任運輸分配者和其他輔助社會生產的職業人員，而現時又是被政治勢力及資本勢力所壓迫着的。統稱之為「平民」，換言之，也就是以農工小資產階級的聯合，作階級鬥爭的同盟，以爭取社會政治經濟的解放，求得民族的獨立和自由。牛生的政治主張，都是以這種階級聯盟的共同利益為出發點，絕對不容許有任何破壞聯合戰線的鬥爭行動及綱領。所以他對外主張，絕對的抵抗帝國主義，收回一切租界，取消不平等條約，凡贊助中國民族作解放鬥爭者，皆願與之作友誼的聯合，對於第三國際及蘇聯，固極希望並需要他們的援助，然決不能以民族革命的命運概委託於他人。至對於中國共產黨在階級的聯合戰線上，固亦極願與之作友誼的聯合，但在政策與主張上則保持獨立的立場。對內主張：以真正的全國人民會議建立平民政權，肅清官僚政治，組織各種職業的自衛軍，以造成人民自己的武裝，發展國家資本，以備備社會主義之條件，這個具體的綱領，經過許多同志的集體討論，終於一九三〇年的八月十九日由十個省區十九位幹事同志的決議一致通過——即現在流傳於國內國

際的「政治主張」。同 並舉行莊嚴神聖的結黨式，中國革命行動委員會通告成立。

自行動委員會成立後，全國的革命羣衆，有若百川入海，萬流歸宗，各地方之請求接見者，遞達報告書及意見書者，日必數十起，先生概行親自批答處理及親自接見，兼且撰著論文。普通事件，多逕交機要工作同志辦理，重要者則提出幹部會議決定，從無遲誤拖延，此蓋爲先生生平治事的一貫精神。白日工作既如上述，下午一到電燈放光，先生立即出外 分赴各處會晤同志及來賓，指導或接洽工作，每夜多在十二時以後，甚至到三四時始能返寓就寢。除個因身體過於疲乏，始一乘車外，常自徒步歸寓。蓋先生白晝每偈促一室，苦無健足之餘地，一至夜深路遠，反正可以藉勞其筋骨，以步行爲運動也。先生嘗自況其此種生活爲「耗子的生活」。

先生爲鼓吹革命在上海親自主編「革命行動」月刊，發表主張，批評時事，提出「復興中國革命」的口號，領導同志從事鬥爭。他特別注意到東北和華北實在情況，於二十年春間秘密親自到該地調查，不久即回到上海，據所觀察，日本對東北不僅僅是政治上經濟上有野心，並且對領土也有野心，而且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他寫了一篇文章指出日本對中國的「三段姿勢」，指出危機必然的爆發，那時「九一八」事件還未發生呢。先生主張和行動直接搖動反動的統治者基礎，所領導的組織，更是日漸形成堅強的戰鬥體，以蔣中正爲首的南京統治感受到革命勢力的伸張，人民快要抬頭，遂欲羅捕先生撲滅革命運動，知先生秘密在上海主持工作，乃派王柏齡主

持此項工作。王氏輩重金來滬，勾連上海租界當局，暗中出重大賞格購捕先生。同志間有以此項消息告知先生，並勸先生遷地他往，暫避其鋒。先生深知購捕甚急而又不忍離開正在發 之工作，乃以行動謹慎以寬慰同志。其時各地工作幹部調集上海舉行分組研究及訓練，舉行結業之日，假座上海愚園坊二十，先生親自出席。其中有一反叛同志陳某，事先勾上了王柏齡，也藉入訓練班裏，且先生蒞臨，即稱疾退出，不久邏捕者十餘人至，先生遂遭逮捕。同時被捕之受訓同志十餘人外，另在上海各秘密機關亦被破獲，計被捕同志有鄭太朴、周力行、羅任一等十餘人。民國二十年八月十七日也。翌日即轉解南京，受盡蔣氏之威迫利誘，終不爲動。同時被捕之廿餘同志亦繫囚獄中，大節凜然，始終如一。「九一八」事變發生之漢、寧、粵合作，以釋放政治犯，蔣中正下野等爲條件，蔣氏於下野之前夕，即民國廿年十一月十九日深夜秘密將先生殺害。是年十二月營救先生最力的孫夫人宋慶齡女士，親到南京要求釋放先生，萬惡的蔣中正不能再事掩飾，始行公布已經殺害。孫夫人憤恨之餘發表宣言公布反動派罪惡，著名的「和平分贖，統一作惡」之詞句，即指此事。先生遇害時年僅三十六歲，遺體葬南京麒麟門外小邱上，即當時遇害處。

一九四九年六月楊逸棠記述於香港

中國到那裏去？

一 南京統治的性質

民十六（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失敗，產生了南京統治。南京統治的權力範圍雖然是只限於蘇皖浙三省的城市，但是，代表南京統治的意識及手段的，長江以南的省區差不多都是一樣，所以我們可以把那區域裏的許多政權統稱為南京統治。

甚麼是南京統治的性質呢？這個問題的答覆，在兩三年前或者是很難正確，很不易爲人所了解。到了現在，差不多讀死書的教授們，爲歐美的民治意識所迷惑的留學生們，甚至爲反動的政府所蒙養僱傭的工具（如軍官）及站在南京統治行列內的工商業家，寺觀裏的和僧道士們都先後的明白了——至少明白了一部。至於那天受捐稅租利的剝削，官兵的掠奪屠殺，吃『洋大人火腿』的小民與吃草根的農村貧民們，却老早就曉得：統治他們的是向來所未有的苛政，向來所未有的屠手，向來所未有的剝削與壓迫。

這種向來所未有的剝削與壓迫爲什麼發生的呢？我們只要明白南京統治的社會基礎就可以答覆這個問題。每個城市裏都有成千整萬的大小官員黨棍，這些文官們或官員們做些甚麼，人們都已經明白；却是那些官兒們的生活享用至少爲普通人民的百倍，而貪婪勒索的孽錢還不在賬內。東南財富幾乎完全集中於幾個重要城市，工廠只管停工，運輸交換機關只管停歇，而公債的買賣，地皮的買賣，煙賭的買賣却十二分的發達，利息總在三分以上。鄉村地主說出了從前減租及土地革命的危險而入於反攻的時期；以誣告報復，以加租利的手段補償過去的『損夫』。像這樣：在城市的軍閥官僚政客黨棍與高利的投機商人銀行家，在鄉村地主豪紳，都已分別接收了『歐洲文明』的一面，過着靡奢淫佚的生活；如果小百姓們一旦不安本份，起來和那些老爺先生們算賬，那麼老爺先生們必定更要起來接收『歐洲文明』的另一面，多買些飛機大砲，多招些人馬，去教訓他們（南京的『調政』！）。南京統治下每月要搜括三千萬（只是南京支出已一千五百萬左右！百分之九十以上爲軍費的支出，）就是軍閥、官僚、政客、黨棍、高利商人，地主豪紳聯合對抗小百姓造反，教訓小百姓們的成績。要得到這大宗人民血汗，不剝削怎樣行呢？要鎮壓人民的反抗，不壓迫那裏行呢？

我們知道，歷史上的中國統治者都是代表地主利益的士大夫，而統治的形式是——特別是元代及清代——軍事獨裁與官僚政治。現時的南京統治是由與革命勢力鬥爭的局勢當中產生出來

的，牠當然要包含舊社會的一切支配勢力——反革命的勢力。我們知道：滿清統治與太平天國革命對抗的時期，只有由民團的組織者曾國藩及帝國主義的英美勢力的援助才挽救了滿清統治毀滅的危機，現時的南京統治，一面以『禮義廉恥的假面去復古，使與曾國藩所代表的社會秩序和諧，一面更通過了基督教徒與美國相結，爲鎮壓革命勢力的外援，所以現時反革命的南京統治在本質上實與太平天國革命時代的滿清統治無異。所不同的祇是：有衆多的買辦及銀行家做牠的基礎，及反映這個基礎的基督教意識。

二 北方擴大會議——北方政府？

黃河以北地區爲官僚政治的巢穴，地主政權的中心已數百年。一切舊統治的規模與組織都還整個的存在，雖然因爲農業破產的緣故，舊統治的內含（『國粹』！）已日就毀滅。一九一一年辛亥的革命未曾搖動他的下層的毫末，整個的承繼下來。一九二八年（民十七年）的『北伐』只是伐了一個張作霖，而張作霖的大部遺產却由閻錫山馮玉祥蔣介石平分。閻錫山所得到的是『山西票號』的地盤，馮玉祥所希望的是海口與軍火與帝國主義交合。恰好蔣介石所求的是要擴大甯波商閥紹興師爺的場面及包承美國日本的恩惠，那裏不會相爭！現時閻馮聯合反蔣的局勢，從

一方面看是整個舊統治勢力內部的爭鬥衝突，從他方面看是地主的勢力與買辦商業資本勢力的衝突。無論南北統治，雖然都是負擔反革命的歷史任務，而從反革命的性質去區分，則蔣介石的南京統治還比較的近代些，北方軍閥的反動，祇是袁世凱統治的複寫，真正的「亞細亞式的」統治的複寫。

「鬼要找閻王，閻王也要找鬼」的！因為南京的統治已經很巧妙的把「聖諭廣訓」換成了「總理遺囑」及「三民主義」，把「宣講所」及「接官亭」換成了「黨部」，把「大人老爺」換成了「同志」，把「八股文」換成了「紀念週的演說」及「黨義」，於是乎舊的士大夫不中用了，北方的閻王因為要和南方的閻王鬥爭，一定要找些新鬼——新的士大夫——找些能文善說的人去充實鬼窩，接換鬼窩，才能旗鼓相當的去對抗南京的統治。恰好改組派的先生們正在魂不附體的亂撞，有博士銜的新士大夫自然是非常的合格。於是乎改組派的先生們就戴了桂花冠到北京榮任了；這就是北方的所謂「黨統」，這樣就成功了北方「擴大會議」。北方擴大會議成立已一個月了，從牠的成份上說，是治閻系、馮系、桂系、的軍閥代表與西山、改組兩系的政客官僚於一爐。這些都是革命的對象，都是反覆了好幾十次的腳色，現在都從新戴天喜地的「彈冠相慶」了！從綱領上說，擴大會議自成立到現在，打算做甚麼？並且已經做了些什麼？我們把牠的宣言及政綱翻來覆去的看，連擴大會議成立以前牠們所謂領袖們的主張一齊拿出來看看，從頭到

尾，除了反蔣及一些與人民毫不相干的具文以外，只看見「樹立民主政治」六個抽象的字樣。他們爲什麼反蔣呢？關於閻馮的已經說過了。至於桂系及西山派呢？要答覆這個問題，現時已不必引經證典，只要檢出頭幾期的「革命評論」關於西山派及桂系軍閥的文章來看看就夠了。如果改組派先生們認爲過去的言論是不負責的，是和事實不符的，那我們再來答覆似乎還不晚。改組派的先生們爲甚麼反蔣？我們如果不是神經病者，我們大概還記得，「勞苦功高」的蔣總司令自民十六年秋被桂系軍閥驅走之後不久即由改組派的領袖們恭恭敬敬的請回來的。他們所以痛恨於蔣的祇是民十五年三月二十日汪精衛被蔣「迫宮」的耻辱，及所謂三全大會不被改組派包辦（就是說，不把現時擴大會議式的代表大會在二年前由改組派召集於南京）而由陳果夫一手包辦。像這樣的反蔣，從黨員的立場來看，只是領袖們的私鬥，領袖們爭位置的鬥爭；從革命民衆的立場來看，只是黨閥黨官黨棍們的鬭架，不但無絲毫利益及於民衆，而且只有雙方行賈官鬻爵（改組派軍事投機運動聲勢正大時，一般大小財閥出錢預定位置的不在少數！）的競賽，一切剝皮及骨的捐稅劫奪更加利害。到了現在，北方擴大會議及將來擬成的北方政府，只有爲一切最腐朽最臭爛最卑賤的軍閥、官僚、政客、的集合場。所謂民主勢力象徵的領袖們祇有分別到石家莊向閻錫山請訓，到北戴河向張學良問安。像這樣能用能伸的「大丈夫」，當然是「民主」的極致了！誠然，蔣介石之於南京統治，他的威劫利誘的手腕，毒狠驕橫的發行，與對於民衆的屠殺與剝削，

比袁世凱的統治更加慘酷，人民應該聲罪致討，革命黨黨員更應該聲罪致討。但是，人民的反蔣是要顛覆蔣介石所領導的軍閥、官僚、政客、黨棍、高利商人、地主、豪紳的聯合統治，要實行召集國民會議，建立平民政權，要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要立即實現耕者有其田，向着社會主義建設。」像現時北方擴大會議所領導的政權無論從下層的社會基礎及上層的成份來說，只有比蔣所領導的南京統治更加反動，更加黑暗。像這種反蔣的勢力，綱領和手段，不但不會把蔣的統治推翻，而且會更抬高蔣氏的政治權威，無形中更穩固了蔣的統治。因為人民對於南京統治固然是深惡痛絕，而對於將來的北方政府更加絕望。退一百步說，也至多不過是把蔣氏個人推翻，把新式的袁世凱推翻，而形成一個新式的黎元洪統治，形成一個新督軍團的割據形勢而已，對於人民利益仍絲毫不相干涉。如果以黎元洪式的統治為民主政治，為「民主政治」的楷模，那也怪不得無政府主義到中國即成為做官主義。我們只有嘆息，決不會再有話說。一個政黨，特別是一個革命的政黨，所以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解決歷史的任務，有一個唯一的原則：主張一貫與言行相符。有真實的代表民眾利益的一貫主張，而且時時刻刻努力的實行他的主張，才是真實的政黨，真實的革命政黨。如果三年之間，主張反覆至於無數，祇有個人的位置虛榮得到滿足，則一切民眾的要求及自己的言論都拋棄如敝屣，我們不知道這種的領導究竟是一些甚麼東西？

現時的北方形勢，告訴我們：無論日本帝國主義是否已經令牠的代理人張學良參加北方軍閥

的聯合（當然，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命令或制止張學良助蔣助閻，是要看：南京還是北京孝敬日本恭順些，隆厚些）對於革命民衆的意義，反動的性質是一樣，北方的擴大會議及其政府和南京統治一樣是人民的仇敵，是革命的障礙，我們決不能因為北方的反蔣而輕忽了寬恕了牠的反動性。

三 中國到那裡去？

中國現階段的革命實在是繼續太平天國（一八五〇——六四）的革命使命。太平天國時代的平民政權，一方面因為敵不過地主及士大夫的力量（由會國藩所代表的），一方面因為帝國主義幫助滿清，更是因為太平軍的內部組織不健全，成了新的封建政權，所以失敗。但是太平天國革命雖然失敗，而太平革命的遺志是由孫中山先生繼續起來。民族的解放，民權的建立，社會主義的實現等主張，更由孫中山先生加以光大發揚，因此有現階段的蓬勃的革命運動。民十六年（一九一七）革命失敗之後才發生了反動黑暗的南京統治，才發生了投機傀儡北方擴大會議。這些都是革命失敗的餘燼及迴光，說不到解決中國的革命問題。

中國究竟到那裏去？

擺在我們眼前的只有兩條大路：或則是永久的爲外國的殖民地——或則是由廣大的平民羣衆

自己起來，推翻現時的南北反動政權，建立以農工爲中心的平民政權，實行耕者有其田，立行取消不平等條約，使中國完全解放，向着社會主義建設。

被壓迫被剝削的中國平民們！大家應該覺悟：究竟是誰壓迫我們，誰剝削我們？誰叫我們受着更加利害的壓迫和剝削？南京統治及北方擴大會議都是帝國主義與一切中國舊勢力聯合壓迫剝削中國人民。統治，我們必須起來推翻牠們。我們現在處在四面環攻的境地，我們除了「紮硬寨打死仗」的辦法外實在再沒有旁的出路。我們的環境雖是困難，而歷史的前途是我們的。我們只有努力集中一切真實革命份子，在我們綱領上面積極行動起來。我們敢相信於最近期間必能奪取新的革命根據地。立刻實行我們的口號：

復興中國革命！

推翻軍閥統治，肅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

即開國民會議，建立平民政權！

立即實現「耕者有其田」！

發展產業，并使產業組織社會化！

(十九年九月一日)

怎樣去推翻反動的統治勢力

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的平民革命運動，大家都承認已受了一個致命的打擊。虛弱的人民組織和整個舊社會的統治勢力相抗，自然免不了一時的失敗。却是，失敗的總原因雖然是由於人民組織的脆弱，而領導的諸政黨底不負責任和轉入反動的陣營裏去，也是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國革命運動是失敗了，舊社會的勢力更加兇惡的抬頭。舊社會的諸統治勢力——地主，豪紳，官僚，軍閥，買辦——被革命的人民勢力威脅最利害的時期曾經有着一度的夢想：在共同的兇惡的屠殺人民之後去「和平建設」，去穩定他們的政權。這個傾向特別在民國十七年南京所謂五院成立時來得顯著。

却是反動的大聯合究竟得些什麼結果呢？怎樣的去「和平建設」？現在的人民羣衆——連最落後的在內——都是已經先後由事實的證明，大部份了解了；不但了解，而且都要先後被捲入爭鬥的陣綫中，準備着新的決戰。這個就是目前以及最近的將來底政治局勢。

代表着大部份的舊勢力，一部份的新興買辦，大銀行家底南京統治，牠的「建設」的成績

是：對外，把日本帝國主義者從張作霖的密室中迎接到南京主席室裏去，把美帝國主義者從吳佩孚的總司令部迎接到南京總司令部裏去；把一部份的強制賣身的不平等條約，改訂作『自由』賣身的契約。對內，人民負擔的租稅一天比一天的增多；由二五減租改作十足交租；農民的生活水平一天比一天低；工人的實際工資一天比一天減少；工商業的破產到處可見。官吏的貪污比從前北洋軍閥時代更加利害。

南京的領導，在其主張及行動上我們老早已經斷定牠必然的要反對人民，要繼承舊的統治。因為甚麼？因為當時牠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場——軍閥的利益——上去反對北洋軍閥而不是反對軍閥的制度。十七年的攻下北京，實際不是新勢力與舊勢力爭鬥的結果，而是兩個舊的勢力底集團底互相交替，所以軍事上雖把北京攻下，而實際是繼承舊的統治，所以雖然犧牲了土地問題，而結果得到了舊統治勢力的承繼。其次，舊勢力底文件之一是官僚政治。官僚政治的產生是由於人民和政權隔離。當革命軍克武漢以後，到處去發動人民，組織人民，使參加政治及經濟的爭鬥，所以當時的政府雖還不能算做人民的政權機關，而實際已受着人民嚴重的督促，所以政府能向廉潔的方面做去。能十二分努力，官僚的弊病能相對的減除。在武漢中央降服南京以前，南京的領導實際已被人民仇視，已根本與舊勢力合一，更不要說到以後。因此南京及各地統治的黨老爺實際是勾結文武官僚豪紳地主的中介人物，黨部成功了新官僚的衙門。剝削人民的舊官僚機關，不

但未減少銷滅，而且新官僚——黨老爺——的機關又重新添加了少，於是乎舊勢力的鋒焰不能更形利害。再次，支持舊勢力舊制度的武器是僱傭的軍隊，奴屬的軍隊。要把僱傭軍隊的制度打銷只有積極的使人民羣衆自覺的編入軍隊，消極的使憲章及統御權激的變更。但是脫離了人民，仇視人民的隊伍，除了用個人的恩惠及威迫利誘之外無法維持。所以單純的依靠武力的軍事獨裁政治，結果必要成爲最反動的統治。蔣介石就是走上了這個路子。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鬥爭，當然只有廣大的人民羣衆確實有力的參加才能做成，因此在武漢時代的漢口租界及九江租界，能在數十萬的羣衆要求中數日間完全收回；拉洋車的本國奴隸能把坐車子少給錢的洋大人打幾個嘴巴（這是漢口的事！），給他一點教訓。但是南京「統一」後的政府却要哀求日本濟南暫時撤兵，明白承認一切新的喪權辱國的契約，仰求帝國主義的鼻息。

一個統治，一個政府的好壞，原因不在個人，而在支配那個人的社會力量。

因爲三年以前我們已經看見蔣的領導，南京的領導，反對人民的要求，脫離了人民，所以我們敢於早下判斷：蔣所領導的南京統治，必然要繼承舊的統治。

我們知道，所謂南京統治，不過是中國統治勢力中的一個，實際是南東西山好幾個巨頭分治着，一切的現時統治，他們的社會基礎都只是：官僚，豪紳，地主，銀行家，買辦。

他們掠奪的對象是農民，工人，中小商人及一部份的工業家，特別是農民。內戰的爆發，統

治者更加緊進行剝削，結果是工人失業，工銀降低，工商業破產，農民不但不能維持生活的最低水平，而且餓死的以百萬計。在現在全中國人民生活計走到絕路的時候，統治的勢力，當然不能如常安穩。失敗了的人民，在現時要重新整理隊伍來和諸統治勢力決戰也是必然的事。這個就是擺在人民面前的的工作，也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黨的重要任務。

有人說：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民主。我們說：『民主』當然是十二分的需要，但是甚麼叫做民主呢？蔣介石的軍事獨裁當然不是民主，是不是改『軍事獨裁』為『軍閥巨頭聯合』就算民主呢？南京的大小官僚親戚嬖倖所構成的中央黨部及國民政府當然不是人民的機關，因此他們的政府不是民主政治，是不是把那大批的官僚親戚嬖倖除去（其實要接收政權的先生們一定不能除去）換上了一批新的就算民主呢？南京指派代表，包辦三大大會，當然算不得民主，是不是由二屆中央的老爺們開恩，開了甚麼擴大會議加入多少『文人同志』及『武裝同志』成功了『新』的中央『新』的政府就算民主呢？

有人說：現在人民所要求的最急切是『廉潔政府』。我們說：廉潔的政府當然是十二分的需要，但是廉潔政府怎樣產生呢？有人說：蔣政府是『偽』三大大會產生的，所以必然會貪污，我們問：如果由擴大會議產生出『新』政府，那可以担保是廉潔麼？有人說：蔣政府的貪污是由蔣個人流氓性所造成，那我們必須要個個帶着一個照妖鏡，去照一照『新』舊政府的人物。

有人說：將來要『以黨治軍』，文人和武人要精誠的結合，天下就太平了。我們問：『以黨治軍』的『黨』是誰的黨呢？如果說是南京的黨，那現時正是以黨治着，爲甚麼要反對牠？如果說：擴大了的『整個的黨』才是黨，那我們要問：是不是由『武裝同志』們一樣的『努力負責』？如果是的，那所謂『以黨治軍』是不是『以軍官治軍』的代名詞呢？

并且我們要問：『文人和武人精誠的結合』這話怎麼解法呢？如果武人是指着『拿鎗桿的粗漢子，文人是『拿筆桿的細漢子』那現時的南京統治及一切南北東西的統治勢力都包含拿鎗桿及筆桿的漢子』也用不着先生費心。自古到今，每個統治勢力，甚至如廣州的楊樹時代都十分用得着能文善說的人裝幌子，文武結合的話是『正合孤意』也用不着先生們費心。

我們摘出了上面幾個流行的主張，大膽的批評了幾句，并不是挑鬪，只是要說明時局的出路——不，革命的出路，只有推翻南北軍閥的政權；開國民會議，由人民職業團體代表所組成的國民會議去接收政權；由國民會議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立即實現耕者有其田的主張，立即舉行職業團體抽丁入伍的辦法，去組成人民武裝。實現了上述的主張，其他一切問題才有辦法，民主政治才能確立，官僚政治才能推翻，廉潔政府才能樹立，人民的武裝才能組成，土地的問題才能解決，帝國主義在中國勢力才可以肅清，師儒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士大夫意識，如『文』『武』底界限，才可以毀滅。舍棄了革命馬上實行的問題，而談什麼黨統，合法不合法的問題，却祇是

『隔靴搔癢』的閑言，或者是開玩笑的戲法，和人民解放是不相干的。

我們相信：不馬上舉行國民會議及地方的人民會議（如省民會議，鄉民會議，市民會議等），談民主政治只是騙人騙自己的話。不使農工等職業團體直接參加政權，而只是靠『有良心』『有學問』的先生去代議，那不但必然的要產生新豬仔議員而且要產生無數的黨老爺，而且官僚政治的毒害永遠無法撲滅。『不發動大多數的民衆立行干預政治，則政府永遠是貪污。不設法立行把政權給人民，由人民職業團體先行抽丁入伍，則所謂『人民武裝』或『以黨治軍』都是替軍閥解說的宣傳員。不馬上執行停止繳納佃租，不耕種的人不能有土地的辦法，則所謂土地問題的解決都祇是蔣介石說法，是欺騙人民的老手。』

我們——革命的孫中山主義者，爲着要泯滅年來中國國民黨的羞耻，爲着復興中國革命，爲着號召廣大被壓迫剝削的平民羣衆起來向南北軍閥進攻，在目前應該很忠實地把人民的要求擺布出來，同時我們要用去實現人民的要求。祇有這樣才能推翻現時的反動統治，只有這樣才能永久不會發生反動的統治，也只有這樣，人民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

世界經濟的危機與內戰中的中國

關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危機問題，佔着理論經濟學的廣大領域。而危機理論的不同，也為資本主義經濟學與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分水界之一。

歐戰以後，歐洲本部一面忙於資本主義內部秩序的恢復，一面却急於進行高度合理化的改造，（除英國外）以恢復及統制世界市場。故生產力的增進甚大。美國由歐戰到一九二八年間，生產的擴大與合理化的進行并不因當中數次短時間的恐慌威脅而減小其速度。

東方各國特別是日本與印度（中國的紡紗工業在戰時擴大很快很多）。在戰時與戰後資本主義的發展都足以使歐美統制的世界市場更加狹窄，更加縮小。

在這種景況中發生了由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以來從美國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

因為這次的危機是與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高度合理化的進程相合的，而且是在合理化的

程度最高的美國首先發難的，所以經濟危機——資本主義危機——的理論爭鬥在現時更加集中於生產過剩論。而生產過剩即生產力與購買力之不能適應為危機發生的原因，在現時似乎已經為一般理論經濟學者所認許，雖然還有許多人反對着。

由生產過剩的結果發生了危機是已被事實證明了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作事實的證明，在現時的流行文獻及刊物中間，已經是非常之多而且明確。現在我要說明的是現時世界經濟的危機與內中國戰的關係。

二、

現時的世界經濟危機，可以由下述幾點做一個概括的說明：

a. 這次危機是首先由美國開始的。漸次及於世界各國。

b. 為世界資本主義的領導國家如美英德日法意等國，除法國尚未完全被捲入漩渦之外，其他各國均先後發生鉅大的危機。此危機的狀態可以用下面四點表現出來：

1. 生產力制限及降低（註一）本年第二季的生產力比上年（一九二九）第二季的在德國減少一〇%英國減少一七%

2. 對外貿易的激減（註一）

國家

一九三〇上半年的貿易與一九二九年上半年
的比例百分數
（一九二九年上半年爲一〇〇%）

入口

出口

德國

八六・〇

九九・五

英國

九〇・〇

八五・〇

美國

七六・三

七九・〇

法國

八七・五

九〇・〇

意大利

八〇・〇

八六・五

3. 失業人數 激增（註一）現時（截至八月止）的失業人數依據大約可靠的材料，有如下概
數。都是超過從來的紀錄：

美國

六・六（單位百萬）

德國

四・〇

英國

二・一

日本

〇・五

意大利

〇・八

4 工人生活標準的降低。因為危機的到來，各國資本家紛起閉廠及減低工資。因此工人的生活標準隨形式工資而低降。

c. 農業——特別是美洲及中歐東歐農業國家，本來已發生重大的危機，而在現時的經濟危機中所受的影響更大。農產品價格之低落為向所未有，因此農業的破產在上述國家中到處可見。

d. 現時危機尙正在蔓延還未有好景現的端緒。

e. 此次危機，因為各國金融資本的集中，救濟比較容易之故，形勢比較緩慢不似從前的兀突；但因此而範圍更加擴大，時間更加延長。

三、

我們知道現時的經濟生活，一面是各個國家有其獨立支配的範圍，形成國民經濟，一面全世界却已有不可分離的分工及合作的關係，以構成世界經濟。目前世界經濟的危機，雖然是由美國爆發，而深入於資本主義的領導國家中；但是，一切農業的國家落後的國家，一樣的是要被捲入漩渦，並且因為落後的農業國家之被捲入更使危機加大加深。

中國，誰都知道是一個以農業手工業生產為主的國家。牠和世界經濟的關係主要的是：

1. 中國每年輸出約共值十萬萬一千萬海關兩（一九二九）的產品。而輸出品中約有二〇%屬於手工製品及美術品爲洋大人裝飾之用；有七〇%以上屬於農產原料品爲工業製造之用。

2. 中國每年輸入約共值十二萬萬七千萬海關兩（一九二九）的商品。內中有七〇%以上是機器製品，約二〇%爲原料品及農產品。

3. 外國在中國直接及間接的投資約八十萬萬元。每年平均要對外國納利潤及利息等約八萬萬元（註二）。

四、

在上述的關係上，世界經濟的危機對於中國發生甚麼影響呢？

第一、因爲危機到來，帝國主義國家所製的工業品及農產品底價格當然低落。並且因爲各國企圖消滅危機之故必須更加設法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落後的國家競售商品，更兇惡的去爭奪市場。

第二、因爲帝國主義者在危攪當前時，能以更廉價販賣商品於落後國家，所以更容易使落後國家的工業和農業凋落，使中國人民失業。

第三、現時世界經濟危機有一個特殊的現象。這種現象和以前的相反：現時各國都有過剩的金融資本，——特別是在法國美國——急於找尋出路，因此帝國主義對於落後的國家急於投資。

第四、我們知道中國是一個用銀的國家。現時的銀價恰好與世界經濟危機同時發生大大暴落，差不多比一年以前低降了一倍。因此中國人民所需要的洋貨，就要用加倍的銀幣去購買，就是說，無形中把中國人民的實際生活標準降低了一倍——但是中國人民形式的工資與收入並未減少。因此，外貨的進口必因此打擊，大大的減少，而使世界經濟危機的因素加多了一個。

第五、上述第四項本可以為發展中國農業及工業的良好機會，但是因為內戰的緣故，中國農業生產行程已大半中止，即現存的也不過是掠奪地力耗費地力的農業，並且因為重稅重捐的緣故，仍然無法和外國農業品競爭（由湖南到上海的運費比由紐約到上海的還貴！）工業生產更因為主要的銷場——農村——的破產無法進行因此工農業一齊更加衰落。

我們綜合上述五項的觀察，知道現時的世界經濟危機，對於內戰的中國至少有兩種最顯明的影響：

A. 經濟的更促進中國國民經濟的衰落，使中國人民的生活降低。平均每人每年生活費約為三十元的中國農民，現時的生活不過和一年前十五元的生活相當。與美國每人每年三千元，德國每人每年一千元，英國每人每年一千五百元的生活費相比，真是無法計算。即後進的日本每人每年

已有三百八十元左右；最落後的印度每人每年也還有一百元的生活費！我們貴國真不愧爲『禮讓之邦』『以勤儉立國了』！自然，一般租界裏和衙門中的官兒們，太太們的生活比鄉下的小百姓高得千百倍似乎是不算甚麼一回事的！（註三）

B. 政治的引起帝國主義，特別是美日英法德五國對於中國行積極的政治干涉與經濟的侵入。大家都知道，現時的南京政府，『文』的一方面是由美國（財政交通）包辦的，『武』的一方面是大部份由德國（陸軍）一部份由英國（海軍）包辦的。而外交的內幕更是由日本及美國英國左右着。今年德國工商業參觀團之來遊與駐德公使館裏的商務參贊所幹的玩意兒是一樣的：推銷德國帝國主義的商品到中國或者是定購軍火。美國事實上已爲南京政府的太上皇帝。最近美國的某學術團體且有卽行派兵二十萬用金五萬萬來華平『亂』的主張。英國則急急的派些遠東經濟調查團來。日本的力量足以操縱南京政府，已爲大家公認的事實。最近的東北出兵骨子裏也未必能掩飾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這些種種的事實與主張都證明了：世界的經濟的危機是急迫越趨是擴大，帝國主義越是要急迫的來管理中國，或加緊的叫牠的代理人來管理中國。

五、

我們現在正在世界經濟的危機與恐怖的中國生活着，爭鬥着。因為現時世界經濟的危機而大吹法螺而說『世界革命立刻到來』，是一種誇大狂惑的妄想。搖撼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根基是一個長時期的工作而且是從多方面去做的工作。我們只有加緊的把南京政府及北方政府推翻，然後帝國主義才不能加害於中國，才能停止內戰，進行經濟的建設，使國民經濟向上發展，逐步的達到社會主義。

(註一)數目字據國際通信第七十二期(八月二十六出版)I. Geowatzky的報告。此數目字與其他記錄相差甚遠，當然免不了有宣傳誇大的色彩。但因為他包含着短工及季候工的失業者，所以數目字雖誇大，而比較各國自行宣佈之數似可靠些。日本失業工人數目字係據最近報紙的消息。

(註二)投資數目字據何漢文著『中國國民經濟概況』的約數。利息平均按一分(10%)計算。

(註三)關於外國的數目字據Dresdener Bank die Wirtschaftliche Kräfte Nder Welt 1930。而且把一馬克按現值換算為中國幣一元的約數。關於中國的數目字係參考國內各種調查表引伸出來的。

中國內戰與文化問題

每個戰爭，特別是對內戰爭，都是社會在發展的行程上遭遇着不可解決的矛盾時底解決方法。

所謂和平，只是矛盾的兩種勢力劇烈鬥爭以後，戰勝者以強迫的力量所建立起來的社會秩序。

因此，內戰如果有歷史的意義，那必然的是交戰的一方代表着新興的社會勢力，他方代表着凝固了的舊社會勢力。內戰的結果，不是新的勢力壓倒了舊的勢力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遂行新的發展任務，就是舊的勢力壓倒了新的勢力，重新維持恢復舊的社會秩序。前一個叫做革命，後一個叫做復古。

每個社會制度都必然的經過發生成熟衰亡的行程。而每個制度的成熟期都具有與該制度相當的文化產物——意識形態。我們要批評某個內戰的意義，必先要審查是否在社會制度上的新舊勢力的衝突。所謂內戰的文化意義也只是要審查在內戰中代表新舊勢力的最高形態——文化或意識形

態的衝突。

中國的歷史與歐洲的相較有一個很顯明的歧異。歐洲的爭鬥歷史是進展的，是向前的，而中國的爭鬥歷史是循環的，是自限的。固然，中國社會自周末以來也未嘗不是三兩百年一次的動亂，三兩百年一次的換朝爭鬥，表面上看復像是和歐洲的歷史無殊；但是，在中國除戰國時的戰爭及其內含與歐洲古代的希臘內戰相似以外，自秦以後社會的矛盾祇是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之爭或地主與貧農之爭。抗戰的結果祇是遊牧民族同化於農業民族，而地主與貧農地位相互的倒置。所以，或者可以總括的說：中國的社會爭鬥是單調的農業社會的爭鬥，爭鬥的地域已受地理的限制不出東亞大陸的範圍，而爭鬥的內容與目的又是那樣簡單，那麼，爭鬥的結局必然是循環的互變。周代的文物制度典章是由遊牧時代到農業時代的黃金結晶。戰國時代諸子百家的爭鳴，實反映當時的商業資本已有很大的作用，社會形態比周代盛時為高。過此以後，我們祇看見因循與摹倣，除很少的例外以外，看不見創作與突進。這種事實當然不是偶然的。

在歐洲，戰爭的數量已比中國為多，而戰爭的內涵更比中國為富。古代希臘的文化是都市文化的代表物，而羅馬的文化是，結合融會東方的大陸農業的文明與海洋的工商業的西方文明底結晶。這種交流與影響的作用至近代而登峯造極。十六世紀以後，歐洲人以工商業的發展統治了世界的大部。此種工商業的發展對內反映出劇烈的宗教戰爭與革命戰爭，對外引起了無數的民族戰

爭。這樣：一方面以動的活的海洋工商業文明爲生活的基礎，他方面停滯於「安土重遷」的農業文明；一方面有錯綜的較高的文化交流與吸引，他方面自限於大陸的一隅，始終是循環無端，楚弓楚得的爭鬥。這個就是西方與東方文化之所自分，也就是東方文化停滯不進的原由。

中國目前的內戰形式上是開始於一九一一年之革命，而實際是遠始於太平革命一八五〇——六四。太平革命起於滿洲的官僚政治腐朽至於極度及英法來侵之時，也即是農業經濟衰落之時。當時中國社會之矛盾，除了和前代所表演的以外，還加上了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底文化的政治的及經濟的勢力呢萌芽。當時的矛盾是這樣：統治者是地主，高利商人，其代理人是官僚，軍官及紳士；革命者——太平軍——是貧農，城市破產者（三合會）。基督教的侵入爲太平軍的領袖所利用。他吸收該教原始的代表奴隸解放的性格（兄弟會！）爲反抗腐敗統治的意識形態所謂「禮教」的工具。他要形成平等的社會並要形成統一的近代的國家。在歷史的發展上看，太平革命是一件空前的事業，也是一個最有價值的運動。這個運動雖然因爲帝國主義與滿清的勾結及地主的禮教勢力底優勢（會國藩是其代表者！）而敗亡，但是，太平軍的本身組織薄弱，由貧農的統治轉變爲新貴族的統治，結果和人民脫離，也是失敗的主要原因。運動雖然是失敗了，而爭鬥的本質却已和從前不同。

太平軍失敗以後，中國社會的內部矛盾更加增長，帝國主義的勢力更加侵入。太平軍所要解

決的問題不但未曾解決而且更加積累起來。爲農民問題中心的土地問題，更因近年來工商業的畸形發展農業的崩潰而益形急迫；朽腐的官僚軍閥統治，更因民衆要求的急切而極度向民衆反攻。這樣的局勢不但不能消滅內戰得到和平，而且只有延長內戰。

現在我們要問：中國內戰的文化意義是什麼？每個戰爭，特別是內戰，都有一個極重要的經濟內含。如果那個內戰是結算前代社會制度，根本推翻前代制度的，那麼更是顯明的有一個文化的內含。我們認爲現時中國內戰是有結算前代社會制度的意義的。關於牠的經濟內含，現時流行的文獻已有一個展開的探討。我們現在着眼分析牠的文化內含，就是牠的文化意義。

文化是社會生活的結晶，而倫理，科學，藝術，哲學等屬於意識的形態的範疇，實爲一個已經長期的形成了的社會文化底代表。因此我們的分析，應着眼於上述的範疇。

如前而所述，中國實在是一個單獨的農業社會。因爲地理的關係，只長期的循環往復於農業社會的內部戰爭，貧農與地主爭換位置的戰爭。外部環居的是遊牧民族，對外戰爭無論是敗都不能增進中國社會文化的質量，因此小農社會的特質得以保持長久不變。這個就是中國文化的基礎。

在這個基礎上面，結晶而爲倫理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臆說，三綱五常的秩序；而「忠孝節義」尤爲使臣下子弟婦女片面的受長上父兄男子役使的「美德」。這個明明是宗法的封建的

在哲學方面，因為生活要求與生產效率極低的緣故，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和文化隔離，祇有極少數的有閒貴族可以從事思索。而思索的對象，在社會及政治方面為少數役使多數的事實，因此賢人政治的「牧民」思想為政治及社會思想的中心。極少數的原始的農業均產主義的學說，自漢以後也因為和封建的層階統治的秩序相悖被斥為異端而湮沒不彰。黃老無為而治之論，自然也是農業的秩序新建之後（如漢初及盛唐）或社會秩序極端破壞之時（如六朝）為樂觀的放任及悲觀的厭世底依據。淑世主義的人生哲學支配着全體的上流社會。和平，忠厚，習於故常，更為全社會的生活格調。像這種平庸單調的社會生活當然難於產出深刻精奧的玄學與歷史哲學。易傳「繫詞」與「禮運」「中庸」固然是包含着不少的抽象的哲理，然而始終是限於原始的幾個簡單概念不能更向前進展，成為系統的理论。至於「春秋」「綱鑑」等史書只可以叫做倫理的批評，和歷史哲學的範圍相差還遠。其他神祕奇談更不足道。我們在哲學的成就上去觀察中國及歐洲，更加確信：只有在較高的社會形態裏可以發生較高的文化，只有繁複錯綜的社會鬥爭可以促進思想的開展；而思想的開展更可以強烈生活的要求，擴大並加深社會的鬥爭。結果，文化水平不斷的提高。

自然科學的智識在中國始終被擯於「末流」，其被蔑視的程度較之歐洲中世紀時還要利害得

多，更說不到能成就爲自然科學的體系。

藝術的成就也離不了農業社會的影響。古樂亡後代之而興的是回教民族（在北部！）印度民族及南洋馬來亞民族（在南部！）的音樂。並且音樂也僅爲歌妓，乞丐，賣技覓食的和尚道士們所傳習，農夫農婦的山歌村曲不僅爲士大夫所不齒，並且爲城市居民所不解。戲劇的幼稚與雜亂恰與音樂相當。詩辭文藝僅留垂死的文字的軀壳，而藝術的高超的情感早已消亡。雕刻建築之術亦早隨經濟生活的衰敗而沒落。其器皿用具的藝術的價值，亦成爲歷史的事實而已。只有繪畫的藝術還是若存若亡若斷若續的有些表現。我們綜合的去觀察，不能不說：中國的藝術文化已經沉淪；卽在其盛時亦不過是農業文明的結晶：恬淡，幽靜，嚴肅，單調爲其內含的一面；而亂雜及幼稚爲其內含的他一面。而且藝術生活的精英在人的活潑潑的生存欲求；却是封建宗法的文化骨髓在於壟塞人欲，則藝術的精英已去，存者僅其枯槁的外表而已。

像上面：在今日的中國，一切爲文化代表的倫理，哲學，科學，藝術，都已隨時的過去而沒落，或者是因物質生活的低落而滅亡。我們站在這個中國歷史結算期的今日，當然會感覺着無限的悲哀，如果我們不張開眼睛向前展望，追求歷史的前路。

舊的已經腐朽毀滅，而新的還未形成。我們現在所遭遇的是一個過渡期的中國，一個疲痿殘疾面黃肌瘦的中國。

中國內戰的文化意義是什麼？各時代各民族的文化歷史告訴我們：文化的進展和其他的歷史行程一樣，是一個綿延持續的行程。一個長時期所形成的文化，如果還是與大眾的生活和諧的時候，牠的衰亡與沒落絕不是個人的意志可以促成。如果那個文化的歷史使命已經完結，那也不是個人的意志可以保障。整個的東方文化，特別是中國，是代表大陸性的農業社會的產物。日本島國已隨工業的發展而歐化——資本主義化，無條件的吸收了歐洲的個性文化。病夫的土耳其亦由游牧的傳統所遺下的「左手持可蘭經右手持劍」的奮鬥精神與山君士但丁堡所學來的歐化相合，走上了資本主義化的階段。龐大的印度，因數十年來的工業發展，正在醒覺起來呻吟掙扎，戴着宗教的假面去大規模的行資本主義的歐化。只有中國百年來歷史的難產到現在還留給我們以一個難題：保存國粹？無條件的歐化？還是其他？我們在無窮的歷史面前是要要求一個明確的答案。自然，像現時軍閥混戰與政客的勾串只是羣狗食人，狐狸當道，夠不上說些文化問題。但是我們明白：現時的軍閥混戰只是內戰中的一幕。我們如果把太平天國的革命連續下來觀察，那我們必須承認：中國是無時無日不在與舊的封建文化結算的大潮中間。固然，南京的文化（？）「以禮義廉恥爲立國之本」（見南京中央月刊）是和太原的「自省堂」約莫旗鼓相當，手來脚應。但是，那些都早已變成糞坑裏爬虫，祇有愈爬愈臭罷了，根本的問題不在那裏。以東方文化自傲的梁漱溟等所呼號的「村治」也不過是小農社會的復辟運動不會成爲廣泛的要求。自認爲民主政治

象徵的先生們也只有倒伏在『自省堂』的暗室裏去『借光』，根本的問題也不在那裏。成爲問題的是客觀的廣大民衆的要求：是資本主義的文化？還是保存國粹？還是其他？

中國舊有文化的衰亡，我們已經知道不是偶然的，是由於農業經濟的頹落。在這個頹敗的經濟基礎上面中國人已經過了快到一百年的生活（自太平天國起事前算起）。因此在客觀上，爭鬥的兩方，文化的貧乏與枯竭——特別在現時——是應有的現象。却是自歐洲戰後，特別是俄國革命的怒潮捲到中國以後，主觀意識宣傳播實在勝過客觀的經濟發展。因此，在中國目前的革命運動中的確是有兩個大潮：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及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所以就主觀上說，在革命的行程中，都是否定中國的封建文化，而要創造新的文化，雖然各人有不同的「反辭」（Antithese）。就客觀上說，如果無法挽救農業的衰亡，并使中國的經濟生活進入一個更高的形態，則反動的國粹意識固然是空想；而一切其他的否定「反辭」也只是智識份子們的閒談而已，於歷史的前途毫不相干。不過，在現時的中國我們可以決定：如果不是陷於朽滅，即必然的進入一個更高的經濟生活形態。因此，中國將來的文化，是新的經濟結構的函數。

怎麼是中國將來的經濟結構呢？牠一方面是否定緊束而支離的封建經濟，一方面又是要轉到一個新的集體的國家經濟向着社會主義 路上去。在這個路程的工作是一面從封建的束縛解說要獲得個性的自由，一方却又須自己緊束自己形成一個新的集體生活。這個自由而緊束的性格實在

是最近的將來中國文化的象徵。

一切舊時代的倫理，哲學，科學，藝術的渣滓都舊着要隨時代遺下來臭虫，虱子，蚊蟲……等污穢而被撲清洗滌。新的一切要從偶像的供奉與自然的威脅等危險當中樹立起來，在「人的」覺悟上面和舊時的一切鬥爭。同時，中國「人的」覺悟，恰好在世界的文化轉變期——由「個性自由」的奴隸文化轉變到「社會自由」的創作文化的階段。負擔中國歷史任務的人們，實在有雙重的責任。中國目前的內戰，客觀上也必然要盡到這種責任。

文化的爭鬥自然是歷史的前驅。在文化貧乏枯竭的現時中國社會，一切歐洲社會的產物會五光十色的乘虛而入，是必然有的現象。在日常生活中的雜亂矛盾，把歐洲的衣服飲食用具禮儀風尚一一倒置的模倣引用，恰好和思想上的雜亂矛盾一樣：把民主政治變成「督軍團」式的擴大會議，把無政府主義變成作官主義，把一黨專政主義變成親族專政主義……等等。像這樣雜亂的輸入歐洲文化，結果必然是鬧成「四不像」而且對於中國的社會要求是不能滿足的。批評的精神是在現時初覺的中國社會所必需的。一定要有批評的精神才能了解過去的污暗無光；一定要有批評的精神，才能澈底的了解歐洲文化的意義及其與中國的關係而系統的輸入進來。我們所要的純粹，是批評的文化；我們所反抗的是傳統，是偶像的崇拜。

中國內戰自太平革命以來既八十年。時間雖然不短，而所得的進展實在是不多。瀰漫全中國

的是封建時代的臭蟲、虱子、訟棍、師爺、新舊的士大夫政客，或者是拉皮條的買辦，教徒。現時的南北戰爭在歷史的意義上看固然是茅廁裏糞蛆亂鬥；但是牠是整個大潮中的餘緒，一個巨靈的暗面。我們——覺悟的革命青年們——如果要接受中國歷史的使命，必須要認識現時中國固有文化的貧乏的枯竭，與輸入的歐洲文化的雜亂與矛盾，拿着很緊嚴的批評精神與現時代的一切抗爭。要這樣，我們為革命所流的血才有價值，我們理想的中國社會才有曙光，我們的憤恨才能消除，我們的悲哀才能止息，我們的希望才能達到。

南京統治的前途及我們今後的任務

- 一、北方軍閥與改組派等系政客聯合反蔣底失敗及其原因
- 二、誰擁護南京政府
- 三、南京統治的具體力量其政治組織及其財政基礎
- 四、南京統治的意識形態
- 五、世界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與南京統治
- 六、南京統治穩定的先決條件
- 七、我們今後的任務

中國政治局勢的轉變，到現在不能不算已經有了一個新的段落。這個段落明顯的指出：北方軍閥政客的反蔣聯合已經失敗，反動的南京統治，在掙扎六七個月之後，重新得到一個相對的穩定。這種局勢並不是一種平常的；其將來的進展如何，不但有關於中國本國的機運，而且影響到世界歷史的變遷。所以我們應該詳細些去分析這個局勢的前因，

並推論將來的遠景。因為我們的目的在分析與推論，所以不單是批判的題辭，而且必須有簡單歷史的敘述與綜合。

一 北方軍閥與改組派等政客聯合反蔣的失敗及

其原因

北方反蔣聯合，骨子裏是封建勢力復辟及擴大的企圖，而幌子上却打着反蔣的招牌，甚至打着「樹立民主政治」的招牌。這塊招牌當然不是北方軍閥——特別不是典型中古社會的山西統治者閻錫山所能打的。西山改組二系的政客這次特別的賣力氣。事實上這次北方的政治口號及策劃是由西山改組一系政客負責的，特別應由改組派政客負責。所以我們的批評就應着重於改組派的主張。

改組派的頭目在臨離山西的時候發表了一段話，說：這次反蔣運動，軍事是失敗，而政治主張是利！我們批評及分析政治變動的人們，不應該把那談話當做平常的看待。我們應該分析那句話的內容并且要認為，那句話是失敗的象徵，是改組派失敗的開端與結局。

本來，中國歷二十多個朝代到現在，社會的變革與進展雖有過了不少的階段，而變革的核心理量本身，從概要的說：是「非意識的」「非自覺的」。變革的原因，反映出原始的農村人口

過剩，與官吏貪婪過度，及週期律的天災流行；大多數的貧農生活已經降到了『生理的存在臨界線』以下；因此那種非意識的非自覺的政治的爭鬥——叛亂——才突然爆發，行中國式的歷史的周期循環與跳躍。在這種過去中國式的換朝與『革命』中，一方面因為社會經濟始終是以狹小範圍的地方自給經濟為主——（少數的商業資本如鹽商，票號，等固然是政治上常佔有組織者的重要機能——如清代的「紹興老夫子」實在是官僚制度的唯一建設者暨保障者，（詳下）——但是社會生活的核心，人民的神髓，始終是農業的是地主的）他方面因為文字艱深，人民和文化隔離的緣故，所以暴動的發起者總是意志堅決，慙不畏死的土豪，而意識的領導者是士大夫階級。因為千餘年來的所謂『士』都是『手無縛雞之力』而意志薄弱的白面書生，祇知道陰謀與唆擺，諂媚與奉承，所以在『馬上得之』的時期——暴動變革期——固然書生是一個極等閒的附屬物，即在『馬上治之』的時期——文治期——書生仍然書生，仍然是『開基天子』的婢僕臣妾最高明的書生也不過是做些『文武并重』或『重文輕武』的條陳，或者是歌頌功德的文獻以點綴昇平，留爲開基創業『神聖英武』的天子本紀底材料而已。真實代表着大多數民衆的要求，始終忠實於民衆的要求，信仰與行動一致，站在民衆的先頭，不畏強禦，不怕人言，堂堂正正去幹的——新式社會運動家革命的政治運動家，爲政治綱領而奮鬥而死的人可以說千餘年還很少有過。有之只是古代及近古失敗了的商鞅王安石，是現世的孫中山先生。

在這樣的一個中國社會環境與傳統裏，我們本來用不着深深的去責備改組派的先生們。但是另一方面改組派的頭目自己還以為是政治主張「勝利」，一方面因為我們要結算最近過去的政治環境，所以有權利，有必要，先把改組派的沒落過程去分析分析。

爲什麼我們說，「政治主張勝利」那句話是改組派失敗的開端呢？

我們試回憶過去的事實：一九二六年三月廿日蔣介石的示威，叫汪精衛沉默的出亡，哼都不敢哼一句。一九二七年初武漢的革命運動正在黃金時期，而當時革命與反革命之分，在對於農民問題解決底贊成與反對。四月汪精衛由外國回來「復職」。一直到六月，汪精衛對農民問題的態度是曖昧的。六月以後汪氏很明白的發表了許多痛罵農民運動的言論，他的信徒們且有謂：「農民蠢如豚豕」并指農民配不上說自身解放，根本反對民衆的要求。當時汪氏一切的氣力都集中於軍閥的拉攏勾串，祇要是高級軍官說的，就俯首聽命，當時他的口號「討蔣」。果然不久蔣出亡了，汪氏就立刻由武漢「凱旋」入南京，聽從以桂系軍閥白崇禧爲基幹的，西山系政客所形成的「特別委員會」的戲弄，結束武漢革命的喜劇。所以，可以說「討蔣」是他這次——第一次——的主張。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廣州變起，蔣氏因受桂系的壓迫，單獨的難於「上台」不能不和反桂系的槍桿子勾引。汪氏就立刻上釣，立刻主張請「勞苦功高的蔣總司令」復職。關於人民的直接利

益，當然無暇去談，自然更說不上去執行。這是他第二次的主張。

唐生智的軍隊在武漢被解決了，蔣氏所倚於汪的，已盡善盡美！當然要被一脚踢開。汪氏一九二八年再沈默的出亡。

我們看看，到一九二八年爲止，汪氏主張了什麼？他的主張祇有兩個：「討蔣」與「擁蔣」！這些就是汪氏在這次到北方以前的政治主張。他那些主張都是站在對付蔣介石的立場上，不和人民發生關係。那些主張在他自己是失敗呢還是勝利呢？用不着人民去深究。却是拿着那些主張去作政治爭鬥，作新式的革命爭鬥，自然應該失敗。所以我們說：『政治主張勝利』那句話是改組派失敗的開端。

汪氏沈默出亡以後陳公博出台了。陳公博先生的確是不錯，因爲一面有「改組」的口號，使「改組派」三字居然成功了一個歷史的名詞，一方又有「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的「理論」，於是乎他老先生手收蔣氏的黨費，左手就辦起「革命評論」來了。蔣介石爲甚麼要接濟陳公博呢？自然因爲他要利用「拿筆桿的細漢子」陳先生多做些反桂系的文章去替他自已造成人民疾恨桂系的心理。這是陳先生的第一次主張。

桂系被削平了，陳公博對蔣的任務已經完畢，當然又一脚被蔣踢開了。於是乎有新的反蔣宣傳。左勾右挽的，改組派和「桂系」同志諒解了，聯合成立了，和馮玉祥的勾串也成功了。陳先

生就『大做作』的通起電來，數蔣十大罪，主要的是要求「驅蔣」及「改組國民政府」否認「三全大會」。他并且要入軍督師討賊，『勝則總理在天之靈，敗則以死繼之』，這是陳先生的第二次主張。這種主張當然也是和人民無關的。

時來運到，閻錫山的反蔣要求又成熟了。從南到北，有的是槍桿子，有的是爲預定位置捐輸而來的錢。這種狀況，當然改組派的革命就要成功了。「把南京政府整個的接收過來」就是他們所謂『革命』及『改組』的目的。所以「國民會議」雖是由其他各在野政團及人民團體熱烈的要求着，而改組的先生當時是批評的反對的。

跟着軍事的進展，叫西山改組派的政客更進一步的與閻密合。當時改組派的口號除了空洞的「樹立民主政治」六個抽象字眼以外，有「整個的黨」的主張，有「文武同志精誠的結合」的誠意。這樣一來，閻馮桂系的『武同志』與西山改組派的『文同志』就合成一體，成功擴大會議了。擴大會議的宣言，把中國現狀的責任一齊歸到蔣介石的身上，好像把蔣去掉，則中國太平似的。「整個的黨，還之黨員，統一的國，還之國民，」就是擴大會議最積極的主張。不但民衆的要求，革命的對象早已拋到九霄雲外，無暇聞問，而且連改組派三字，他們自己都不敢自承了！這時期的工作是集中於『討蔣』的『主張』。

跟着軍事的漸次失敗，知道整個接收南京政府已經無望，祇得一不做二不休的拼命的右傾。

不但西山派的主張整個由改組派接受下來，而且根本的要拋棄了從來一黨的專政的空談，把胡適之暨國家主義派的主張和口號移植進去：定約法，制憲法，開國民會議！這就是改組派最後的主張。果然，蔣介石十月三號的『江電』就有甚麼約法，憲法，國民會議等一類名詞出現了。改組派先生們所謂『軍事失敗政治主張勝利』就是指這件事罷！

改組派現時不能不算結束了——至少在革命的觀點及中國革命史的觀點上說，改組派的歷史任務已經被結束。我們要結算結他的總賬：改組派的政策及主張是以『討蔣』為中心，『擁蔣』為手段。改組派的理論是以『農工小資產階級聯盟』始，以『文武精誠合作組成西山，政學，改組等系的大聯合』終。改組派的立場是『有槍的便是娘』。

本來革命者是不怕失敗的，而且越是因為主張的不合時宜而失敗越有他的生命他的前途。失敗底有無價值在乎他的主張是否為廣大的民衆所要求而且是否為忠實於自己的信仰及主義而失敗。却是折衷主義的，不庸苟且的中國人到處都喜歡喜劇，喜歡團圓，喜歡平庸的生活過去；所謂政治家不惜把政治的爭鬥生活常做投機買賣，常做個人爭位置的陰謀。不惜學習梁啟超氏之『長』而『以今日之我和昨日之我挑戰』。因此黃老之學（當然這裏說的是陰謀權術方面）及『過橋拉板』主義遂為統治者及半統治者所崇尚。而且這種道理的崇尚與揣摩即為成功的捷徑。如果我們始終把改組派當做一種不常的舊中國的士大夫們看待，我們自無所用其批評。正國

爲改組派的領袖們還時時以革命自行文飾，所以我們不能不站在革命的觀點上去分析去批評。如果中國從此就要結束舊時代的卑污，那改組派的失節與沒落正足爲一般以革命自號的「偉人」和政治團體警惕，正足爲大多數痛苦無告人民的開闢一條自己振奮自己解縛的新路。

我們爲着追求北方此次反蔣運動失敗的原因，不能不先把改組派的總賬結算結算，現在我們應該把失敗的原因簡單些敘述出來：

第一：從社會基礎上說（參看本刊第一期上我那篇「中國到那裏去？」的論文！）北方此

次的反蔣運動是地主與舊式高利商人底統治對抗新興的南方買辦階級及一部份民族資產階級底統治底爭鬥。舊式的地主高利貸的經濟在現時的中國的環境及世界環境裏是墳墓裏的陳腐尸骸，是歷史上早應過去的朽物。閩錫山的怕死與其整個的部下抽「海羅因」吃白麵，就是那個陳腐尸骸與朽物的象徵。反之，南方——特別是東南的買辦與一部份的新興民族資產階級，雖是對內行着殘酷無比的剝削政策，對外是朝着下沉的命運；却是數年來的急劇的革命運動不但驚醒了無數下層羣衆作反抗地獄生活與奴隸待遇底鬥爭，而且也驚醒了許多被英美日本的教會學校及商業資本所陶養揄育出來的工商業者代言人，在紛擾的社會戰場裏明白了解本身階級的利害，了解本身的危難與前途，積極的起來奮鬥。蔣介石及其領導下的多數黨徒——特別是一般基督教徒，就是意識地及半意識地接受着那個時代的使命，爲工商業家謀進一部的進展，做東南新式買辦及民族

資產階級的積極代表者。蔣介石的積極，不怕死的去拚，恰好是和代表着北方地主及舊式的高利貸商人的閻錫山的怕死相對應。蔣介石在四年以前就要急急地去奠都南京，正是他半意識地去找尋他的社會基礎證明。所以此次北方反蔣的失敗，固然有許多的其他因素在內，而頹敗的北方社會，頹敗的北方農業經濟——半封建農業經濟——敵不過新興的以工業為中心的東南社會，實為一切因素的主因。只有這個主因才是決定中國資本主義進展的前途基礎。

第二：主觀力量底薄弱。如果我們不是機械的唯物論者，我們就應該承認，由過去的歷史動力所構成的人類個性天才在某種條件限度內可以克服客觀的障礙，可以催促歷史的行程。北方統治者的傳統意識形態雖然是比南京統治者的為反動為落後，但是如西山，交通，安福，改組各系的政客——一切凡依附於馮閻軍閥勢力的都未嘗不希圖建立一個南京式的政權，希圖把北方統治建立在一個新式的工商業上面，去發展資本主義，這種傾向特別是改組派表現得顯明；但是因為一方面那些『進步的』意識虛懸在半空，缺乏廣大深厚的客觀基礎，一方面因為那些所謂『進步的』意識，內部矛盾太多太大，缺乏一貫的堅決的明顯的主張，所以結果，那些許許多多的派別，只是極平常的政客集團，不能和民衆發生連繫，只有極簡單的做成閻馮——北方統治的代表者——的寄生，不但不能推動閻馮，改進北方的統治性格，而且代閻馮所牽倒，走上逆轉的路向，在這種薄弱空泛的主觀力量上面，南京的統治者，自然可以利用『和平』與『統一』的口號

去影響北方，去吸收北方的中等社會層，使閻馮——特別是閻——的舉兵成爲，「出師無名」成爲「背叛中央」的行動。

第三：從軍事方面觀察，我們更顯然於此次北方失敗的原因。軍事的力量當然是統治者力量集中表現。每個歷史上的爭鬥，雖然勝敗之數已由一般的社會條件所決定，却是最後的決定當因主力的衝突，常視爲統治者底城壁的主力軍底決戰結果爲轉移。北方軍閥軍隊大都爲清代末年所謂新軍的餘緒，——特別是馮軍——一切組織管理的規模與中下級幹部之技術的材能方面，都比南京爲高，軍隊數量更比南京爲優，而作戰的決算，北軍總是消極的防禦，無絲毫攻擊的精神。固然財政的困難，補充的不易，軍械的較劣，爲北方失敗的原因之一，而垂死之統率——特別是閻軍——及畏縮的部曲，在鴉片與海羅因的煙瘴裏再加上閻馮的互相猜忌，來和新起的比較的銳進與指揮統一的南京統率與部曲相比，自然失敗的較多。

第四：財政的比較充裕，使南京能運用公債政策，多量的取給於江浙兩省的銀行資本，不致如北方之直接剝掠農村，剝掠肉盡繼之以骨的北方農民，如馮軍的就地徵發的招致直接的人民反感，當然是南京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這個條件自然是由第一項的社會基礎派生出來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總括的說：此次北方的軍閥政客聯合反蔣的失敗，主要的固是由客觀的條件所先決，而主觀力量底薄弱而矛盾，實爲敗北底直接的決定原因。

二 誰擁護南京政府？

一切的政治領導——無論爲革命的及反動的——要成功爲有力而得羣衆信任，必定要有如下
的條件：第一，領導機關的綱領切合於其所要求的社會羣——各階級底要求；第二，領導的組織
須經過艱苦的戰鬥，使羣的社會羣相信他的領導忠實於綱領而且能堪任繼續的戰鬥，保障并發展
該社會的利益。南京政府在其成立的初期就完全建築在和大多數工農平民對敵的反動階級基礎上
面。經過武漢時期的『過火』運動，使長江流域的富有階級悉數轉入南京；經過一九二一年末廣
州的事變，使整個的南方富有階級更透過了香港的帝國主義統治者與南京相合。特別顯著的是
居留南洋及歐美各國的華僑富有者，右邊被壓迫於帝國主義的政府，左邊被紅色的運動所威脅，
遂相率積極的奔投南京的領導。一九二八年的『北伐』，雖然只是形式上的政權移轉，無實質上
的變革但是天津青島北京等處城市底上層市民，甚至整個北方窮僻的鄉村，凡有青年學生足跡所
及的地方都感受着一種新的波動。這個波動顯然是象徵着如下各階級的幻想：工商業者希望革命
勢力底到來，解除封建的束縛與剝削，希求進一步的發展；工人希求加薪與減工；店員也希望較
好的工作條件與生活條件；貧農與佃農希望減租與容易得到耕地；各級自耕農希望太平及減除捐

稅。上述的一切要求，差不多都隱蔽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青年學生差不多爲波動筋絡與血脈。進步的接近大都市的地方，婦女解放的聲浪也開始傳遍了。像上述這個波浪，在北方的大城市中，開始沖激，固然并不比南方爲遲，而接續的波浪實在是一九二八年所謂北伐『成功』南北『統一』以後。當着南京統治的階級性質，已被廣泛的南方人民認識清楚，敵友的位置已經辨得十分明白的時候，北方各省才開始羨慕及切望南京『革命』勢力的到來！這些事實，并不是證明北方民衆比南方愚魯過許多，而實是下面的一個原因：南方開首就成立了所謂南京政權，南京政府的一切舉動措施均直接由人民目見而身受，當着北方還呻吟憔悴於傳統的封建軍閥官僚統治下面的時候。這是一九二八年響作霖失敗前後的狀況。

一九二八年六月以後，黃河以北地區都全體掛着『青天白日』的旗子了，不久東三省也跟着易幟。等候及期望了好些時的國民黨統治，到了現時除了貼標語喊口號以外，只是每個地方多添了幾座衙門——黨部——多了許多穿中山裝的閩人。其他如苛捐雜稅，如貪贖枉法……等等舊時代的污穢，不但未曾滌蕩分毫，而且有加無已。無耻的『偉人』『同志』，更可以掛黨名以行私。革命的特權，不過如此，革命的效用也不過如此。這種狀況在南方早已爲人民所認識，而北方到現在才了解。這種失望與懷疑自一九二八年底起特別來得顯著。大城市的工商業者——主要的自然是商業家——一面因爲土地的附屬關係，無法和北方當地的統治者底利害背離，只有依存

屈服於官僚的統治，另一方面因為對南京所謂黨治的失望，消却從前對於南京勢力發展的興趣與同情。這種心理，由代表北方官僚資本的國聞週報社及代表新式工商業者的大公報表示得最明白。在這種狀況上面，改組西山及交通等系的政客所以有相當的活動基礎。也是閻馮所以要拉合上述各派，特別是改組派，到後幕裏去的原因。同樣，南方的買辦階級也因一時的失望或失勢於南京，而贊助改組派政客，企圖本身勢力的回復與發展。

這是這次大戰決戰以前南北重要地方趨附兩方庇階級分野。

大戰起後，大多數的革命青年及覺悟的平民大眾都站在反政府的行列。工商業家的大多數是站在旁觀的消極悲觀的位置。在這種狀態下面，自然積極擁護南京政府的表面上看祇有南京政府自身，即高級官僚，特別是與蔣有親戚關係的一系高級軍官及其他由私人率領的部隊。（其非蔣的直系的高級官僚軍官已四出接頭，這也是事實！）這種形態表未出大戰僅只是南北軍閥的混戰，其社會的歷史的意義十分的糺混而不清，隱蔽而不彰。但是，有胚胎的種子，縱能夠被抑制妨害於一時，而終有發芽的機會。兩類「種子」表面上看去是一樣的，都是帶着朽腐的外皮與臭氣；但是，因為胚胎的性質是不同的，所以愈在烈風暴雨及冰雪苦寒中愈能夠考試那兩種胚胎，愈能夠在「生存競爭」的場中行自然的淘汰。八月初旬，共產黨攻佔長沙，接着武漢垂危，當時的工商業資產階級底態度表示得最清楚：由對南京政府懷疑消極的狀態轉入利害關切的積極狀態。公

債的應募特別起勁，公債價格也陸續的轉高。當時的北方政府，軍事上并無絲毫失敗的痕跡，爲什麼工商業家并不擁護北方政府而擁護垂危的南京呢？這個理由是很簡單的：北方政府與南京政府雖然都是腐朽，都未有給工商業順序發展底設施，但是一方面因爲共產黨暴動的危機急迫的擺在眼前，完全潰爛的北方官僚統治，日夜還在睡夢中抽白麵金丹的北方統治，其鎮壓共產黨——鎮壓一切革命暴動的能力，當然比較南京政府爲低；並且從政府的質量上說基督徒的美國代理人，——忠實的代理工商業利益的部長們，有權勢的人們，無論文的方面武的方面都比北方做得有表現些。北方政府——擴大會議中——雖然也缺不了一位陳公博先生及其夥計，一位頌揚美國式的新資本主義的陳先生，一位以造鐵橋、造大電站爲救國總方案的陳先生，甚至還有不少種種色色的『民主象徵』先生們，有拿出資本主義的綱領和南京競賽的傾向，却是過去事實已經證明他們的無能，證明他們不過是北洋軍閥餘孽的附屬寄生物，不但他們的建議不會得着絲毫的效果，而且他們的建議也并不比南京買辦們基督教徒們的高明，所以跟着爭鬥的進展，南京政府的社會基礎反較明顯而穩固。

在大戰的浪潮中，南京買辦部長所籌備的全國工商會議，居然於停戰未久的十一月一日即行開幕了。從會議的職權上說，是僅備南京工商部的諮詢。從其參加份子的成份上說，是集各東南——差不多可以說全國——大銀行家商業家及新式工業家於一堂，很熱烈的去提案討論，真正

是像討論他們「家裏廟的大事」。列席的專家——以劉大鈞、李權時等爲代表——當然也是他們家裏廟的夥計們，是處理商業資本財政資本的說客。於八日的會期中，處理了十大類四百零六件的提案。像這樣熱誠的去解決「民生」問題，當然我們小民們不敢隨隨便便的像上海泰晤士報的洋大人記者一樣去鄙視那個會議，認他爲空談爲胡說；更不敢像——每每日新聞的記者先生一樣去吃醋，認他是一個單純排外的會議。我們承認那個會議固然一面是南京政府「凱旋」後點綴昇平的做作——和恭迎張學良入南京的作用一樣——一面却是南京的買辦統治抬頭象徵，至少是南京買辦政府要自己振作起來建立商工業資本主義秩序的意志底表現。從南到北從國內到僑邦，一切商工業的富有階級現時都有「久渴得梅久旱得雨」的心理狀態。這種狀態的成熟，當然不是偶然的，不是南京政府及蔣介石個人的幸運兒，而是胚胎的發芽作用，是應有的結果。固然，叩頭蟲式的中國工商業者不像十四、五世紀時的意大利商人階級——如威尼斯熱那亞等市府的——及十六、七世紀時的中歐商人階級——如德國的漢沙聯盟(Hansa-Bund)——有自立的權威與向外發展的力量，自己佔有軍隊與自己形成政治的組織，更比不上十七世紀以後的英國商工業階級，有高遠的計謀——如英國東印度公司，合資佔領印度百餘年才得到高度利潤——有支配政治、軍事、經濟的全權作用。甚至在南京統治的衰微期，東南買辦還有希望孫傳芳軍閥重來的心理，也和改組派的政客們所崇拜的一樣：「有槍的便是娘」；但是這些不過是中國商工業衰微的表徵，

落後的表徵，不能因此就抹殺了南京政府的社會性格——階級性格，更不能因此就抹殺了中國商工業者的主觀願望與其歷史作用。我們對於工商會議的討論與決議，對於牠的全般結構與進行經過，祇有證明了下述的一個真理：做南京統治的台柱子底中國資產階級是決然的要犧牲廣大的農民利益，要繼續殘酷的剝削農民——自然工人也在內——才能達到牠的資本積累，不，才能維持牠自己的生存。因為什麼？因為差不多大多數的商工業者同時就是大地主是買辦。大地主的利益是與佃農僱農及自耕農不兩立，而買辦的利益在更方便的去接受洋貨，做中間人行高度「不等價交換」的剝削。不明白中國經濟結構的人，一拿出工商會議四百零六件的提案來看，就會覺得非常的驚訝：為什麼關於農民問題的提案一件都未有呢？工商會議固然是工商業者自身的事，但是，廣大的中國，誰是最後消費者呢？誰是原料生產者呢？英國的鐵造工業資本家觀察印度問題底時候就馬上會發出如下一類的意見：「如果印度廣大人民特別是農民，每人每年多添製一件襯衣，則藍加士特（Manchester）——英國鐵造業的中心——的鐵造工場就會加開夜班還應付不了」。

（這個意見見於某經濟雜誌，原文已忘了！）可憐的中國資產階級，一天到晚只會蹲伏在租界裏，請白俄做保鏢，關於牠的乳牛底農民，一點都不能計及。照現時的農民生活來說，已經降到生物的生存界限以下，特別是北方的農民每年十餘元的生活費都保不住了！解決土地問題，解決農民痛苦，使他們的生活提高，不但是我們大眾本身的利益，而且也是有遠見的中國資本家底利

益。捨此不歸，而高談闊論一些不能直接執行之事，而始終以公債（平均有三分以上的利息）及其他高利貸的方法爲謀利的捷徑，像這些剝掠農工大衆兩身染着鮮血的中國資本家，當然只是手淫的取樂者，是病態的表徵，也怪不得鴉片烟、嗎啡針、金丹、白麵、海羅因、補腎丸、生殖靈等等寶貝，……等等「西洋文明」都深深的爲他們所接受呵!!!

三 南京統治底具體力量其政治結構及其財政基礎

如果我們不否認上述的分析，以爲南京政府主觀上是有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而客觀的又爲工商業者所擁護，那也不過是此次大戰以後才十分顯明的事，大戰以前是被很少的人們所承認的。在龐大的落後的中國內面，廣大的平民羣衆固然是十二分的落後，而資產階級則更加迷惘昏聩。少數有覺悟的中國資產階級雖然主觀上有較覺悟的意識，有較明白的主張，而缺乏具體的本身力量——槍桿子——更缺乏有堅強耐久的品性底代表者，所以領導中國資產階級的使命不得不落在蔣介石身上。蔣介石以堅決勇敢果斷的性格及縱橫捭闔的才能，在今日可以說已經得到勝利，戴了桂花冠（自然冠上有許多鮮血染成的紅纓子及紅頂子！）——實際上爲南京政府的中樞，爲南京政權動力的機輪，但是蔣介石的實際力量的確不是建築在他的客觀的社會基礎上面。

而是在與北洋軍閥餘孽異型的軍隊上面；而且他那個軍隊不是一短時期構成的，到現在為止已經過了六七年的磨練與實踐經驗。在六七年前——民國十三年開辦黃埔軍官學校時，局外的人夢也夢不到蔣介石今日會有這樣大的一個具體的力量。我們如果要確實估計南京的基本力量就不能不追求那個力量的過去及其現在。

黃埔學生，雖然今日已有特殊階級之說——這一層蔣氏自己似乎也已明白承認（參看他四中全会開會前的告同志書）——然而始終是蔣氏的基本幹部，始終是蔣氏所倚以生存基礎。黃埔學生的開始不過四百多人。從其所屬的社會成份上說，當然十之八九是小有產者。鄉村小農的子弟也不在少數。在當時複雜的政治環境——楊、劉霸佔廣州時代——與全國的癡固及腐朽的政治局勢中，國民黨的宣傳與努力當然是黃埔學生的靈魂，因為得着了這點靈魂，所以能和陳炯明的殘部及劉、楊作戰所向無敵，雖是黃埔學生所認識的當時還不過幾個口號，十二分的淺薄。五卅運動爆發以後，反帝國主義運動及革命宣傳已普遍於全國，而黃埔學生的聲譽也已經傳佈得很廣。因此第二期以後的學生，雖從階級的出身上說，依然與第一期的相同，而所受政治的刺激已比較的直接而親切。故民十五年北伐以前的黃埔學校，實為製造及薰染革命的青年軍人的唯一機關。因為當時軍事發展的要求遠過於主觀力量成熟的限度，故不但從軍事能力的觀點上說，黃埔學生無受訓練的機會，即就政治訓練的要求上說，他們也無求基本深造的工夫。然而當時革命勢

力發展的要求已經不是單純的軍事才幹，而目是要兼着做民衆的組織宣傳與煽動的工作。在這些工作上面，黃埔學生實曾盡過了很大的功用。這一點就是蔣介石所選籍的基本勢力底時代性而根本的和北洋軍閥異型者。十五年的北伐兵力號稱八軍，而直接能由蔣支配的不過兩三師團。而終之能摧枯拉朽的戰勝北洋軍閥，固然民衆的努力及革命青年的奮進爲主要的原因，但黃埔學生之發揮時代的機能，實爲使蔣勝利的重要條件之一。現時，黃埔學生已由四百餘人而擴大至一萬多。後起的諸期的學生，其冒險性及信仰的神秘性——在質的一方面說，當然已經低落，但其形成蔣的軍事力量的中心，以此爲制服及監視所謂旁系及雜牌軍隊的核心力量則日見擴大而奏效。原始的，前數期的黃埔學生因係多富於冒險性及革命要求的份子，故隨着南京政權的反動而有着劇烈的分化。蔣介石——南京的實際統治者——現在已經不是倚賴羣衆的要求以影響黃埔學生，不是倚賴思想的領導以發生團結的機能，而祇是單純倚賴宏大的財政力量爲利誘的帶本。所以現在蔣的政權所依的軍隊力量，無論爲雜牌旁系的及黃埔直系的都只用同一的方法——利誘。這種方法，在革命的開始時是難期有成的。到了現在，革命的作用被南京變爲反革命作用的現在，蔣介石所要求於黃埔學生的早已不是發揮其革命的機能，而是成爲特殊階級的奴隸。現時，江浙皖諸省，凡是南京直系勢力的地區，所有軍，警，民團，黨政，甚至於商工業諸機關，都已分佈了不少的黃埔學生。這些學生雖然實質上已成爲新興的統治者及有產者，而其作用則遠遠勝於普通

的官僚統屬關係，因為他們有比較豐富的團結性，而且有比較任何其他的勢力更活潑細密的組織。這就是蔣介石政權底縱剖面的主要結構。由會國藩時代所留下的「湘軍」，當然也已分別的由蔣接收。

其次我們應該知道，一個政權的形成，雖然有賴於武裝的力量，但是要使政權發揮其積極的功用則在於政治的組織與經濟的機能。所以我們現在要分析南京統治的政治組織。

在這個要求上，我們要得到一個很簡單的回答：南京政權下的政治組織，係整個的承繼傳統的官僚制度。所謂一黨專政，所謂爲政權發動總機關的全國黨代表大會，實際不過是軍官及各級官僚的替身，不過各級居統治地位者或其代理人的例會。維繫黨的紀律與信條其鬆懈爲近代政黨所僅見。所以嚴格的說，現時南京的國民黨祇是一個官黨，而其紀律及組織也不能不是官僚制度的。所謂南京中央的最高政治機關祇是形式上有了會議的拘束而其實是最集中的獨裁政制，和歷朝最高統治者的權力實質無殊，各省各縣的政府機關底權力也是毫無限制的。各級官僚機關的執行者都只是對上級官吏個人負責，因此對人民的關係與歷朝的制度無絲毫的差異。

從官僚制度的本身說，有幾種有組織的團體爲實際上官僚制度的保持者：第一，是所謂「紹興師爺」。此種團體的作用在舞弄法律的條文，（所謂「刑名」）補助各級統治者——特別是省，府，縣——去上下其手，及例行公事的執掌。因爲此種團體有比較完密的組織，全國各省府縣均

溥儀黨徒，而且內外官衙機關均有羽翼，所以政治消息比較的最爲靈通，而用人行政可以操縱。所以滿清末期的統治，實權是在彼輩手上。第二，是所謂「錢穀師爺」。中國田賦的凌亂錯雜而無稽考差不多是誰都知道的事。而爲全國中央及各省收入的正宗及大宗在民國以前不能不首數田賦。田賦收入雖有形式上的額定，而實際是由各級統治者包辦。各級官僚也不知究竟，實際是由所謂「錢穀師爺」包辦。所以「錢穀師爺」是中國實際上的審計負責者及財政負責者。收入的豐裕與短欠，對納賦者抽剝的緊密與疎鬆，完全由他們所決定。「鹽商」的組織也爲一極有勢力的政治因素。每省——特別是濱海各省區——的高級官僚到任，必先與「紳」「商」接頭。所謂「紳」當然是士大夫及地主的功名之士。所謂「商」則是真實的「經濟指導者」。而鹽商及錢莊的力量足以操縱財政經濟，實爲一顯著的事實。

南京政權是建樹於江浙。而「刑名錢穀」之「專門家」則以江浙爲大本營，（特別是紹興！）「理財」斂錢之術最擅長的鹽商及錢莊老板在江浙濱海之區更甲於天下。蔣介石的權力，武的方面已植基於黃埔（自然保定士官諸系及湘軍系更早已吸收入來，不過還不是主要成份），而文的方面則充分的接收「刑名錢穀」專家及鹽商錢莊的緒餘與精英。財政部現時的名角，幾於盡屬彼輩。少數歐美學生，在聯權上不過尸位素餐——其實這般人即使盡其材也還比不上那鹽商錢莊老板及錢穀師爺——而已。

數十年來內外貿易的進展，發生了新的買辦階級。國內商業及一些工業的開發，發生了新式的交通設備與銀行設備。故民元以來——特別是歐戰以後發生了些「新式的」政團。「交通」「研究」等系已組織於前，「安福」「政學」等系復成立於後。「西山派」的名詞更發現於民十四年。

那些許許多多的貨色，在政治組織上發生甚麼作用呢？他們雖然都是些失意官僚政客的结合，而在經濟基礎上却是和把持銀行，鑛山，鐵路，船舶及對外貿易機關的經理人有深切的關係；政治管理上是有不少的官僚經驗，所以表面上看雖然是些無聊無賴的人而實際每每足以翻風作浪而且可以操縱政權。袁皇帝之於「交通」段祺瑞之於「安福」與「研究」「政學」，閻老西之於「西山」等等各派的角色，不光是裝裝場面，打打幌子，像玩寶貝一樣就算了，要緊的是他們各系所依托的經濟基礎。此次改組派在反蔣運動中實際上也加入了一大批南北洋的買辦及銀行家。目前蔣所領導的南京統治雖然把東南大部份的買辦銀行家用公債政策抓住了，而漏網的及吃醋的還有不少南北洋的買辦與財閥。這種狀況，一方面反映出中國的社會經濟還未形成國民經濟的整體，還是以地方區域為經濟關係的疆界，一方面更是蔣介石所以終日徬徨的政策：怎樣去拉合南北洋的全體買辦及銀行家。天津的「國聞週報」及「大公報」可作為北洋新興商業銀行業的喉舌，而香港「工商報」則為南洋買辦經濟的代言人。蔣介石的「江電」（十月三日）說及大

救問題，粗粗的看去似乎是爲改組派政客及馮系軍閥而發，而細密地考察一遍，即知道癥結所在還不在彼，實在是要把「安福」「交通」「政學」「西山」「研究」等系，一切尙餘存在北方的官僚買辦銀行家的勢力通通接收過來。一來可以壯大蔣氏政權的社會基礎，二來可以消滅張學良的社會勢力，使張氏不敢輕於反抗。所以就政治組織的實際來說，蔣氏所領導的南京統治，已先後的把滿清時代及民國時代的餘存勢力和盤接收。一年以前，當改組派的真面目還未完全揭穿的時候，改組派曾以「軍事北伐，政治南伐」爲蔣氏政權之語，并以爲反蔣的張本，自然當時還有相當的理由。到了現在，改組派自己已經成了那一種的貨色。不久，或者會因爲牠——改組派——現時已經代表「北方之強」的緣故，「伐」到南京政府裏去。以對民衆作戰，以屠殺民衆爲歷史的南京政權，要用這種方法形成牠的結構，是當然的事。

最後，我們應該了解南京統治的財政基礎以作此章的結束，更以證明南京統治的實力及其階級性。

我們知道，剛是有了軍政力量與官僚政治的組織，如果缺乏了財源，缺乏了予取予攜的財政基礎，則南京統治仍然缺乏血與肉。大家都知道，蔣介石所以能縱橫捭闔操縱各派系及各直系旁系軍隊的原因之一在於有比較豐裕的財源。究竟東南財富如何？就過去數年來南京統治下的財政狀況而論，始終是構築於市經濟中的租稅政策及公債政策上面。（海關及其附加稅，厘金，各

極特稅，鹽稅等爲主體）每月三千萬元的剝削除浙江全省及江蘇一部外，出諸田賦者甚少，較之北方馮閣統治下直接徵發於農民，似乎是「慈祥」了許多。但是，如果我們一經加以考慮即知道南京的財政「政策」是現時農村破產及毀滅的狀況中底剝削方法。這種間接稅的剝削方法，實爲城市高利商人政權的唯一法門，也就是南京的財政政策。一年以來，除沿海幾個大都會以外，生產秩序幾完全停止或全被擾亂。一切地主豪紳及貪官污吏所掠奪得的資財都寄藏於租界及大都會中。故農村及各城市中遍地饑殍，而銀行及錢莊裏的通貨幾乎無處消納。因此公債地皮及其他獨佔的包稅或投機遂爲南京統治下豪富寓公及達官貴人的唯一事業。「公正的」三分利息之外更加以冒險的投機利潤。在這種財政基礎上面，一般銀行資本家或許還以扶助南京政府自豪。這些瀾人們當然不會想到這些高利究竟是背在誰的身上！自然，每年全國七八萬萬元的剝削以全國人口分配來說每人担负不過二三元，比之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担负還够不上百分之一。但是我們要知道，現時中國農民的平均生活最多不過每年二三十元。像這種非人類的地獄的生活，我們一定要負責去尋求牠的原因。固然，貪婪欺騙，搶掠，非法壓迫奴隸工作，是歐洲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初期赤裸裸地，鮮血淋漓地剝削殖民地的「正當」方法。驚人的高利貸更是中古末期至十八世紀的商業資本剝削農民榨取資本的「正當」方法。到一八三〇年的計算爲止，剛是南北美洲殖民地內所犧牲的黑奴在六百八十萬以上，紅奴白奴尚不在內。只是何屬殖民地爪哇的一省（Batavia）

and) 自一七五〇到一八一—不過六十年間，爲苦工而死亡的「豬仔」「黃奴」(中國同胞!)已達七萬二千人，其犧牲於南美洲，南北美洲，馬來半島，澳洲及菲律賓羣島的華工尙不在內。

「尊貴的」英國女王(Mary II)伊利沙伯，於十六世末期，不但公開的設宴招待海盜頭目 Francis Drake，而且尊貴的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 及 John Hawkins 也是戴桂花冠的「光榮的」海盜頭目。不但「尊貴的」女王伊利沙伯陛下公開的接受海盜的贖物，而且「光榮的」無敵的英國海軍，也不過是海盜們及其盜船發展出來的東西。由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約三百年間統制大西洋的海盜，是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特別是英國及北美殖民地(當時還未曾有美國!)的拿手好戲。頭等「文明」世界的紐約及波士頓城也曾經是海盜們的大本營。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的高利貸，似乎也可以賽過現時的中國。當時，無論在意大利的市府，無論在法國，英國及德國，因爲尊貴的王室貴族需要奢侈之故，及其他投機事業(如海盜團)之需六〇%至三〇〇%(六分至一年三倍還本!)的利息是并不希奇的事。拿現時上海各處的三分錢底買賣和他們比一比似乎還「公道」些! 七世紀法國路易十四朝的商人承包祝項制度(如現時中國的厘金印花，煙酒，鴉片，等包商制度!)以所得的五分之一歸之政府，其餘五分之四歸之私囊似乎現時中國各處的包商的「一底一面」還文明的多! 不錯，在前期資本主義的中國，在商業資本正在統治社會時的南京統治，輻有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的「歐洲老祖宗」底先例可援，有更「賢明的」規範可資借鑒。

殺人的血手還未洗淨的基督教的「歐洲文明老祖宗」現在就來譏笑南京統治，辱罵南京統治，說牠是野蠻，是有傷人道，比不上「文明的」歐洲，自然未免太「謙而虐」太「開玩笑」，但是，我們站在小百姓的地位去追尋歷史的事實與原因的，拿現時南京統治和當時的歐洲各國統治相比，還不免說一句：這不過小偷對大盜罷了！

四 南京統治的意識形態

在現在——革命的波浪震動全國的現在，除了極少數的蠢才，差不多人人都因為事實的教訓知到經濟生活是社會存在的基礎，社會意識也由社會存在的反應所派生。但是，多數的人們還未曾了解：遺傳的歷史力量所產生的意識，其轉變與消替往往比現存的社會關係底轉變與消替為遲；而先覺的——比較進步的歷史認識所產生的意識與意志往往在社會的先頭，為推進歷史的動力，不但不會被現存的落後的社會關係所障礙窒塞，而且必然要消除那些落後的社會關係的障礙窒塞向着理想前進，才能產生新的社會，盡到先覺者的歷史任務。反之，落後殘存的意識形態也可以阻礙歷史的前進。因此我們分析了南京統治的社會基礎及其具體力量之後，更進一步去考查現在南京統治中主要人物的意識形態。

在現時南京統治者當中，我們應該就其有思想及行動的表現而有相當權威——自然祇是對落後的人有權威——的來說。我們大概可以把他們分爲如下的各羣：

一、蔣介石羣 蔣氏現時事實上已經變成南京統治中唯一有權威的人物，成爲南京統治的象徵。所以蔣氏的主觀意識形態如何，不但從事政治的人們所應深究，即普通的社會學者也應加以分析。固然蔣氏是一個實行家，是一個意志堅強的人；理知的，意識的去學悟他自己的歷史任務，雖然有可推測的地方，但是始終是實行多於理想，而意志過於知能。不過就其生平及社會環境來說，尚多可紀的事。蔣氏是出身一個富厚的紳士家庭，據其自述，家教的謹嚴爲其少時的調育根基。中國典型式的家教當然就是「禮教」的體系。所以蔣氏的遺傳意識是孔子的，是儒家正統派的。因此「曾文正公家書」一類的典籍，爲蔣氏所終身服膺的讀物。在日本留學時期即與孫先生的革命運動接觸。日本維新後的景象及其歷程在當時蔣氏的民族革命心理狀態中，實爲理想的國家建設。中國沿海各租界的外國人的設備，也應該是蔣氏的模型。這是他的哲學的，倫理的，社會的，政治的憧憬。在蔣氏入世期，中國社會的變革即橫在他的眼前。當時國民黨內部的雜亂而無力，恰好和落後的全中國社會狀況相應。孫中山先生及陳其美先生的「行動哲學」——如果我可以這樣說——實深深的感動了蔣氏的心坎。當然在英雄氣概與色彩是免不了的，而且很重。拿破崙本紀是他特別愛讀的，時常擺列到案頭的。在多年的行動經驗中常與下層社會——特別是

青紅帶——相接觸，自然得到了不少的組織經驗與中國下層社會心理的認識。多年與『革命的』士大夫相處，更加令其了解士大夫的無能。俄國革命風潮捲到中國之後，他曾親自到過紅色的核心——莫斯科——去觀光，以後又多年與共產黨徒共事及暗鬥，當然得到了不少縱橫捭闔的策畧及方法。在上海的有產階級——特別大商家及銀行家——社會中，他也生活過若干時，也叫他了解有產階級的要求。這是發生蔣氏意識形態的輪廓。我們如果拋開了政治爭鬥底情感，我們應該很公平的簡單的說：蔣氏的靈魂是孔教。蔣氏的政治認識是維新後日本的典型。蔣氏的情感是中國家族的。因此，我們或者可以說，蔣氏的意識形態是中國式的。拿他的實踐的表現來說，當然是有許多新式的——歐洲的——成份在內，特別是他的組織才能。最近他受了耶教洗禮，雖然這件事在中國現時的歷史階段說是一件大事（詳下）是一個殖民地資本主義化的象徵，但是他的靈魂始終是孔教的。所以我們應該說：蔣氏的意識是『中國爲體西學爲用』的一流。

二、胡漢民羣 胡氏是科甲出身的人物，是在紳士社會中，奮鬥較久的一個，故孔教的意識形態沾染得較久，而實際舊式的爭鬥經驗亦較多。當同盟會創立時期，他是一個理論的代言人。但當時除發揮『春秋微言大義』『明夷夏之分』等一類孔子式倫理的政治概念以外，政治認識是日本翻譯界初期的餘緒。民國八九年間，俄國革命的浪潮已捲到東方來。當時與日本智識界接觸的中國『先覺者』，特別是政治運動家，無不從事唯物史觀哲學的瞻仰。胡氏即其中之一人。他

在建設雜誌中發表的論文，關於倫理之研究，（現時他那書叫做唯物史觀與倫理之研究）是其受唯物史觀哲學洗禮的憑證。但是不能因此就把胡氏算入異教徒——背叛孔教正統派的——的名冊裏面。他自民國十五年由俄國回來之後及在歐洲各國時對青年學生所發表的言論看來，現正在急急的去修正思想「過激」運動。當然連他自己的民八九年的思想也要連帶的被「修正」被否認。所以他是「勇於改過」的孔教徒。

三、戴季陶羣 戴氏的出身是傳聞的家庭。他在日本留學生的同盟會員中是年事最小的一個。早年的情感生活曾是激烈而悲壯的。民國八九年間，差不多和胡漢民等同時，也會受過唯物史觀哲學的洗禮，並且為社會主義運動政團發起者之一。胡漢民也曾稱贊過他是「替無產階級說話」（見胡著唯物史觀與倫理之研究三〇五頁）但是跟着中國革命的發展，跟着革命之由談論轉入於實際行動時期，他的思想就立即向後逆轉。五六年來，他的思想即以佛教的「八覺」為「天地」，以孔教正統派思想為「君」，據拾孫先生的——特別是在日本長崎的演說——「王道」及贊揚孔子學說的片段主張為「親」。唯物的歷史哲學早已由「師」的地位而攝之於「臣僕」。他是差不多和胡氏一樣，是改宗後再悔改的孔教徒。「青年之路」一本小冊子，就是他近時思想的結晶。他現時的主張，不但比蔣氏為右，而且有超過了胡漢民而右之之概。

四、李石會羣 稍稍留心中國時事的人，都會知道，李氏和吳稚暉那繼易培基諸氏是「無政

府黨』及『準無政府黨』罷？近來那般所謂無政府主義者的行動，我們已經是稍稍領教過，雖然他們的理論與主張，除了『分治合作』、『相安一時』等等之外，還無清晰系統的表現。他們雖無系統的理論足以影響青年，而有組織的去操縱學校及其他文化機關社會機關——如農工銀行——，去交接延納北方——最近是與東北張學良發生關係——的統治者，實爲蔣氏以外的一種不可侮的政治潛勢力。他們的意識形態雖然是絞雜的——暗晦的——如吳老頭的從「放屁」說到「精蟲」——「從東說到西」——但是骨子裏是中國孔子思想及黃老思想與歐洲的機械唯物論的自然科學底皮相底化合物。在現時的南京統治下面，每次的政治爭鬥發生，這一羣都是比較的站在右面。他們對於青年的影響實是反動的，而不像歐洲的無政府主義者一樣在主觀上仍然是革命的。

五、「名流」羣 此羣的人物，當然要以蔡元培氏爲中心。蔡氏是研究美術及哲學的人，在民國八九年時代爲全國所謂『文藝復興』的五四運動的象徵人物。「名流」二字在中國古典的意義是『清高』。在此羣中的角色，當然大部是教育界的人物，或在北京大學（五四運動的搖籃）出身的統治者，因爲蔡氏的力量大本營在北京大學。此羣人物的意識形態也無顯著的表現及清晰的系統。因爲他們都不直接地推動或參加政治活動（清高二字由此獲得！）所以不能有顯著清晰的意識形態表現出來。他們對於青年思想已失去領導的地位。他們的政治傾向是民主。其意識與歐洲的民主主義及自由進步主義者相當。

六、基督教徒羣 現時南京統治者中，具有基督教意識的人已爲數不少。在蔣介石加入之前，如孔祥熙，宋子文，王正廷，張靜江等已爲形成南京統治底主要基督教徒，當然，現時中國的基督教徒，特別是統治者的基督教徒，其主觀的認識是很淺薄的，我們還不能把他們的信仰程度與克林威爾之於清教徒主義，費得利大王(Friedrich der Große)之於理智主義(Rationalismus)或會國藩之於孔教正統派主義一塊兒說。他滿甯是被客觀的社會環境(美國留學及大商家出身!)所渾染，不自覺的墮之流蕩，決不會有歷史的覺悟力存於其間。

上述六羣的的意識形態雖不能盡包括現時南京統治者中主要人物的思潮，而且每羣當中還有不少的內部差別形相及衝突，但大概已經可以代表出來了的。我們現在要綜合起來，下一個結論：究竟上述那些意識形態是否已經可以代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所要求的動力？或者換過來說：如果中國要走上資本主義的路向，則現時及最近流行於統治階級中的意識形態會有如何的變遷？我得在歐洲滯留的時間，有一位崇拜孔子哲學的社會主義者曾問過我：孔子的教化，在中國是否有復興的可能？如果不能，是否有改良修正的可能？我的答覆是：不能，而且不必！我當時的答覆當然是站在廣大中國平民羣衆解放底立腳點上說的。我當然不能禁止孔教在反動的中國社會層在地主及買辦的中國統治中，有借戴季陶及梁漱溟等人們的軀壳去還魂的現象。孔子的教化，是封建宗法小農的中國社會底結晶(請參看革命行動第二期我那篇『中國內戰與文化問題』論文！)

澈頭澈尾都只有反動的（照現時的比例尺來說：）作用。即在孔教流行時代，也不過是盡了折衷調和的機能。如果中國的革命民衆，有一天翻身起來自動的管理自己，那第一件的工作，必然是推翻孔廟（其實現時的孔廟已荒廢了，再也用不着去推倒！）把那般所謂「正人君子」，「縉紳先生」先行細綁起來，把什麼「孝經」「禮記」等等（雖然大多數是偽作不是孔教自做的，但是我們這裏說的是社會學的孔子！）燒個一二十萬部——至少應把那些書網起來運到英國倫敦博物院裏去——然後再來慢慢的算賬。我每一想到或見到：面黃肌瘦的同胞他的地獄生活，甚至吃樹皮草根還是安之若素的忍欲生活，繁文縟節貌爲君子正人而貪婪苟賤卑污醜態無所不爲的新舊士大夫，「幽閑貞靜」的小脚與優游不進嗎啡針鴉片煙的夥計們，讀十年還不能通爲少數貴族所專有的，爲文化古國珍奇的象形文字，我只有「目眇盡裂」地恨不得把我們的身體立刻變成火把，變成毒藥，去燒殺那些搖尾擺尾，人面獸心的禮教先生，孔子信徒，及其老祖宗——孔教。中國民族落後困苦顛連無告的原因，雖然是主要的被決定於自然條件，但是禮教的大防與折衷調和的士大夫文化體系的傳布，致下層民衆無法得到解放的工具，孔子的教化實爲主因。牠實爲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罪人，所以痛苦的中國平民應該和牠——孔教——不共戴天！

現在中國的局勢，已顯明的是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可能。但是孔教雖爲一部現時的南京統治者所崇信——至少是虛偽的利用——而復古的去推崇孔教，用政府的力去推廣孔教，在資本主義的

展底緣故。在歐洲，在十六世紀以後的歐洲，與人文主義(Humanismus)及理性主義(Rationalismus)相伴而有基督教改革的運動。宗教的改革是其假面，而生活欲求的開展則爲其動機。加爾文主義的新教徒在英國有克林威爾的清教主義(Puritanismus)、清掃封建障礙，使英國的資本主義已殖下深固的根基。在美國，清教徒中的朋友會(Quakerism)如火如荼的去開發北美洲，造成今日北美聯合國的『黃金』世界。即被驅逐的法國新教徒(Hugenotten)流落在德國的都運盡了輔助發展德國資本主義的歷史任務。這種樣式的進步，種樣式的思潮，在歐洲是和天主教——舊教——的各派行長期的流血鬥爭，行決死的鬥爭才換出來的。履行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任務的南京統治，爲什麼能優容孔教及其門徒——無論是真是假的門徒——呢？就這一點來觀察蔣介石於苦鬥七個月之後，立刻到上海來受耶教的洗禮，或者就是他意識地及非意識地接受自己歷史任務的表現罷？

固然，維新後的日本，一直到歐戰爆發前，孔教的意識曾支配了統治者的大部及『進步的』羣衆，并且由此而發展了資本主義。但是當時的日本進展是在世界資本主義行自由競爭的時期，獨占的帝國主義勢力，還未曾達到；而且日本的孔教，是王明式的，有勇於力行，不計生死的神秘性，的確曾踏進了宗教的大門。不幸中國流行的孔教已成爲虛偽苟偷的護符，或爲尸位素

餐投降乞食的工具，其信徒雖身事五朝而不以為恥，或者狐狸埋狐掘，拆簡降身，勸進稱臣而甘之如飴，甚且以此自鳴得意，以為「主張勝利」。像這樣的「教化」，當然和日本當時的相差太遠了！

孔教在今日的中國，質量上已如上述，不能以日本為例，以為可以作發展資本主義的客觀要求，現存的孔教「信徒」，在主觀上說大都是中間曾經改宗的復歸者。孔教的作用雖然很明顯的是妨害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却有一個很大的作用：在消極方面幫助中國資本主義政權穩定。直接去防抑青年思想的發揚，而間接打擊民衆要求解放的生氣，使垂危的南京統治因此能在動搖中容易措手。這種消極的工作，胡季陶氏做得最多。如果以為南京統治現時已經說險，顯赫的武功自然應歸之蔣氏，而舌幹唇焦，不惜垂涕而道，則戴氏之「功」，為不可沒。其「修孔廟」的主張更十分具有「卓見」！

孔教之消極作用，現在不但未減，而且還在進攻的狀態中。但是隨着革命風潮之被鎮壓取消，這些消極的要求，即會隨之低落。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之形式與內含，已由客觀所決定為「殖民地的」一種（詳下），因此基督教的作用，在中國會隨資本主義的底大而擴張。固然，孔教在將來，或者會被進步的士大夫及紳士所利用以為保護地主利益增抗商人利益的武器，且為發揚「民族主義」的依據。康有為在三十年前曾一度意識地利用過。但是現在的局勢，已和從前不同。

從前的戊戌變法時期，其對象是腐朽的官僚制度及帝國主義的耶教，所以當時康有爲的孔教是革命的反帝國主義的。現時戴季陶的孔教，是頹廢的，是無前途的，而且是鎮壓革命的，所以激尾是反動的。

基督教之在中國，會發生如何的作用？這個問題因為南京政府之重新到達了相對穩定的階段及蔣介石之新行受洗而有趣起來。如上所述，基督教之在歐洲美洲，都靈過非常重大的歷史任務——發展資本主義。但是現時基督教的舊教固早已凝固爲舊時代的餘燼及週光，即新教的作用亦隨資本主義後期的形態而成爲發洩。但是，我們要知道：基督教的新教會隨商品經濟的發生而勃起，亦必隨商品及金融資本的輸出而進入殖民地及次殖民地裏去。英國的命運，已成爲待決之囚，祇有黃金鑲爛的美國，還似乎十分的煥赫不可向邇。基督教在中國的前途即相應於美國金元輸入中國的前途。事實上，基督教也成爲中國買辦及買辦化的統治者及半統治者底大國。次殖民地的中國資本主義其發展的命運已漸漸地移入中國極少數的商業銀行界手中——具有買辦意識的人底手中。故基督教在中國是有發展的可能。只有兩種力量可以肅清基督教毒害在中國傳播：保護地主利益的孔教及代表廣大平民羣衆利益的「反孔教反基督教的革命行動」。但是地主階級現時的歷史地位已日趨於危亡或同化於商工業階級，所以孔教不是自滅即漸漸的變質成爲贊許資本主義的「進步教」。反孔教反基督教的革命行動一日未曾成功則中國必定暫時會由孔教與

基督教聯合統治着。這就是我們對於南京統治底意識形態分析底結果。

五 世界資本主義的相對穩定與南京統治

如果我們不把現時世界經濟的結構與作用認清，不把世界資本主義的前途估量清楚，則不但不能推測南京統治的前途，而且也不能了解現時中國事變的前因。

日本現內閣——代表日本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政黨——的外相幣原在東京歡迎英國遠東經濟調查團宴會席上會有如下的演說：「……今日南美諸國之大發展，在半世紀以前，日本尚全然不知之。亞非兩洲諸地文明之登進與夫中國四萬萬民衆新思想的勃興，皆可表示今日世界廣大的新市場在開拓之中。在各不相妨之範圍內，不但英日兩國，即全世界各國亦皆有充分活動之餘地。我等一意整然的向市場前進，力求避免相互無意識的衝突，而共存共榮，實應爲國際間的原則。我等所欲者公平而無偏倚之市場也。」十一月一日東京聯合電報，原文載天津大公報，文句稍爲改順一些。）這是「和平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底演說。

十一月十五日，英國首相麥唐納——工黨領袖——在這次大英帝國會議的經濟討論閣後所開的工黨大會中演說：「任何英政府絕對不能對海外殖民地承認減少對外貿易（注意：這裏是指

英帝國聯邦以外的貿易！）或徵收食品稅與應用原料稅（這些應徵稅的食品原料是指由英帝國聯邦以外的國家輸入進來的！）之經濟政策（就是指保護稅主義者，即其政敵保守黨，特別是保守黨右翼的政策！）可得英國人民容許。他（麥唐納自己）不是自由主義或相類意義的主義的自信者，但在競爭劇烈的日子，在某種條件下，行使上述的經濟政策（指保護稅！）會把人民生活的程度降低，這是事實。此種狀況，不是絕對自由貿易的國家所能促成，而是其他行保護稅政策的國家降低工資向外競爭的結果。無論保護稅主義者如何辯護自己的政策，稍有常識的人都不會說：關稅的障礙可以維持人民生活底高的標準，可以保持合於人道的生活標準。他（麥）以為碰着這種難題的政府，應該有穩定的機會，不應搖動……（十一月十六日倫敦透電，原文稍加修飾附注以便閱讀）。這是世界經濟的危機奮鬥中，號稱代表工人利益的英國工黨領袖及現時英國統治者的意見。

德國資本家的輿論對於賠款問題曾先後有如下的意見：要德國賠款是可以的，但必須各國門戶開放，容納德國的商品。果然今年上半年的德國出口貿易額已達到空前的紀錄超過英國的了。

美國的銀行及工業家代表荷佛(Hoover)——現時美國總統，一個資本主義的樂觀者，因為救濟美國經濟危機的計劃大大的失敗，以致現時美國有不再舉他做總統的表示。

在紅色的蘇聯，因為資本主義前途估量的問題，一九二八年放逐了托羅斯基，一九二九年又

棄置了布哈林。

今年九月德國的國會選舉，極右與極左的政黨，都得到空前的勝利（特別是極右派勝利！）爲的是失業已超過三百萬人，無法救濟。

南美的阿根廷及巴西先後革命「易師」——即英國與美國的代理人，先後來互的爭鬥，爲的是經濟危機的威脅，去爭奪市場。

意大利的「領袖」(Duce) 墨沙利尼一天到晚在聯結巴爾幹各邦及土耳其爲消納意貨的市場，因此而公開的準備與法國開戰而不恤。

美國上院的披特曼(Pittman)先生及南京的美國顧問林白克(Linbarger)先生正在計議十萬萬盎司銀貸借給中國的計劃，目的在「救濟」中國的購買力及提高銀價，以增大美貨的銷場。

有三萬萬一千萬人民的印度，正在起來奮爭獨立與自由，提高、民的生活。

像上面這些零碎的材料及消息，幾於隨時隨地都可得到，俯拾即是。我們如果把那些意見綜合起來，可以發現在兩個營壘中——資本主義的及反資本主義的——都有相反的意見：樂觀的及悲觀的。樂觀的人們在資本主義的營壘中（以英國經濟學家Keynes及德國的Dombart爲代表）

估量資本主義尚有無限的前途；在反資本主義的營壘中（以H. Varga——第三國際的世界經濟專家匈牙利人——爲代表，以爲資本主義已陷入崩陷的泥塗中，不能自拔。悲觀的人們在資本主義

的營壘中（在英國以保守黨爲代表，在德國可以哲學家 Spengler 爲代表）以爲積極自衛的時機已到，或者以歐洲文明的喪鐘已經響了；在反資本主義的營壘中（以布哈林及魯易 Trotsky —— 印度共產主義者，近已被開除——爲代表）以爲資本主義已非常的穩定，且有成爲組織的資本主義（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的傾向。

究竟那一方面的意見對呢？我們要除去主觀臆忌的熱情，才能審判這個問題。很客觀的說：「量」的一方面來說，則日本幣原外相的判斷是有根據的。一直到現在，全世界中百分之六十的土地面積屬於歐洲，而全人口百分之六十是爲歐洲人所統治，即其餘百分之四十也差不多可以爲歐洲所影響，或被統治被影響於美國。

後起的蘇聯，雖然號稱占全世界面積六分之一，人口九分之一，爲資本主義的掘墓人，但是牠的經濟發展強度與容量在現時不但還比不上後起之美國，而且還要與中國同等，自覺的爲美國及英德法意各國的尾閥。從產業發展的程度看來，現時的世界，在歐洲除英國德國（現時德國資本主義發展及與其組織的機能已比英國爲高）可以名實相副成爲高度的資本主義國家以外，其餘歐洲各國——蘇聯也包括在內——尚在產業組織與進展期，還說不上已無發展的餘地。而且就英國來說，合理的工作尚在進展中。在美洲，北美合衆國（美國）固然是達到了高度合理化的階段，但是其西部及其鄰邦，還有很大的發展餘地。整個的中美南美，現在正爲美英的決鬥場而逐步

的向着資本主義前進。整個的澳洲（海洋洲）亦方在資本主義的行程中。斐洲已主要的在英國領地下面行自己的資本主義化，但大部還在蒙昧時期。龐大的亞洲除日本一隅及印度的一部已踏上了資本主義的堂奧以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區還在蒙昧草創的時期。「自然經濟」與「初期資本主義經濟」是其主要的成份。如果剛是這樣的把全世界五大洲的經濟數目字合起來看，那就不能說：資本主義還有很大的前途與遠景，因為全世界還有六分之五以上的土地方在發展的行程或蒙昧未闢，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是生活在初期資本主義的組織中，或者還在「半開花」及「野蠻」的狀態中他們的生活要求必然的要一天一天的抗進，如果他們得到機會。

但是，如果從「質」的方面去考察，當然可以得到正相反對的見解。一方面敵對資本主義的蘇聯，內部的矛盾雖然不能說已完全消除，而已能按部就班的前進，在全世界到處掀起革命的浪潮。另一方面，為世界資本主義主要的領導國家的美德英三國，在美國有六百萬，在德有四百萬，英有二百萬以上的失業工人。這種狀況的繼續已在一年以上，現時還未有處置及消納的端緒。這種狀況，實在叫第三國際的理論家及宣傳家有「樂觀的」理由，而「世界革命的萬歲」的聲浪在最近一年之內或者更會高入雲際，雖然是空談多於實際。

德國的經濟學者桑巴特（W. Sombart）是現時全世界中研究資本主義史的發展最有權威的一人——所以我的意思，桑巴特氏與其叫做理論家，毋庸叫做經濟史家——他在一九二八年秋天於

瑞士會議的「社會政策學會」(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中發表了一篇極有名的演說，他的意思，對於整個的資本主義的前途是樂觀——資本家的樂觀——而對於歐洲，特別西歐，是悲觀的。他斷定現時資本主義的特徵是：居統治地位の後期資本主義被新興的初期資本主義所侵迫。他的意思很顯然的以為在後期資本主義生活中的歐洲——特別是西歐——已經受後起的亞斐利加及美洲所威脅而失去其領導的地位。這種意見，當然是真實的，雖然我們對於他的樂觀或悲觀的感情，要恰恰地把握顛倒過來！客觀的情勢與主觀的力量——推翻資本主義的力量——現時正在爭鬥。故就實的方面來說，一邊有資本主義的擴大加深，一邊有歐洲無產階級及落後的殖民地廣大平民羣衆的醒覺，世界資本主義正活潑地轉變。要轉變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去，在我們的立場和見地上說是已經不成問題的；成爲問題的只是最近的一百數十年內的前途及用如何的方法，經過如何的階段。(在東方各國——特別是在中國有代表廣大平民羣衆利益的黨底產生與奮鬥，客觀上是能做到東方民族底解放，催促資本主義的死亡，得到社會主義的前途的。所以我們要在這種程途中奮鬥。——記者附註)却是問題的中心所在已經不是資本主義的內在作用及其行程的理論問題。問題的中心是：歐美的資本主義，特別是美德英三國能否在最近期間開闢更廣大的市場，建立資本主義秩序於「半開化」及「野蠻」的國家中，以銷納商品，容收金融資本，消極的解決失業工人的問題，積極的照「遠見的」資本家(如幣原)代表者的企圖，和諧的向前發展。這是世界史的

發展上的一個最重大不過的問題，也是資本主義本身的生死問題，是實際的而不是理論的。

在這樣的十分緊張嚴重的局勢下面現出我們對於南京統治的前途底斷案。

中國有四萬萬勤勞（這是帝國主義者所稱贊的！）的人口，有豐厚的善藏。就現時人民的平均生活（農民平均爲每年二三十元，工人爲八九十元的收入！）標準說，實在比不上現時任何一個最野蠻的國家。反過來說，如果平均的中國人民生活標準能提高一倍，則可以叫現時的日，英，美，德，各國的商品入口至少可以增加十倍，即由十二萬萬七千萬兩（一九二九）約增至一百二十萬萬兩。因爲現時中國每人每年平均不過消費三兩銀（四元）左右的洋貨，而在生活增高一倍以後（單就農民標準來說增至六十元左右，其購買力應至少每人每年可以增至四十元的緣故。像這樣的一個預期的進展，當然可以使英，美，日，德，等和中國關係已深的資本主義國家垂涎，發生片面的戀愛，何況現時的統治者又主要的是具有買辦意識的人，『雙思的』『團圓的』喜劇怎麼不天天在排演呢？目前資本主義能否在中國順利發展的問題，除關係於南京統治主觀力量，即關係於南京統治能否掃除內部障礙的力量以外，主要的問題祇是一個問題：英美日三國能否『精誠的結合』。在目前對中國投資的要求最劇的爲日英美的順序；而投資的能力最高及要求最急的則莫過於美國。英美日世界市場衝突反映於海軍的爭霸。倫敦條約以後，很顯明的，英美是要取協調的姿勢——見本會政治的主張，關於外交政策的分析——這種姿勢自然也適用於遠東。剩下來的

只有美國和日本的態度問題。佔有中國東北及中部南部主要經濟區域的特殊地位底日本，對於美國在中國的着着迫人，當然是一件最難堪的事。八十年來到現在的歐洲列強——最近加入了日本——對於中國所取的政策，都口是心非中國的政策，如資助土匪軍閥促成內戰等政策是橫行無忌的。當然祇把中國當做俎上肉，（好像十六世紀西班牙之於中美南美！）還未會把中國當做綿羊或乳牛，給以相當的「喂料」及生意的機會。這種政策的來源，讓經濟史家去詳述，我們用不着在這裏批評追究。却是世界經濟的發展，迫出現現在的問題：穩定還是滅亡？在這個基礎上促成英美日對中國問題的「讓步」，促成南京的進步與穩定的趨向。故現時世界政治爭鬥的場中，無一不是有利於南京的倖存與穩定。改變近代西班牙對美洲的劫掠式政策為「畜牧羊牛」政策，就是現時帝國主義者——特別是英，美，日——對中國問題相互協調諒解「合作」的機紐，就是脫除牠們自己危機的唯一方法。Pittman及Tinker等正在談判中的大借款「就是」「喂料」的香味，而蔣介石在「凱旋」回來以後立刻受洗，也是他不自覺的或自覺的做綿羊做乳牛的證明。

南京統治的前途，在客觀上是已經踏進了國際資本的道路中，——奔投到國際資本家的「牛欄」及「羊圈」裏面。這是無疑的事情。剩下的只有一個問題：南京從現在起統治的主觀力量是否以克服當前的矛盾？

六 南京統治穩定之先決條件

我們在上節已經把南京統治的社會基礎及其主觀力量分別考查，接着又把南京統治所處的客觀環境加以檢閱，而斷定其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雖然已經是大半決定了，而其發展的遲速，其自由途徑是變曲的還是坦直，則有關於政治者本身的動力底大小，有待於目前南京統治內部障礙排除的方法。此次南京召集的「四中全会」即是要統計力量籌備方法的表示，所以國際的資本固然是十分的關注那個會議的結果，而中國各地的中等社會以上的「先覺份子」也無不屬目於那個會議。空洞的無組織的中國統治階級——或者可以說帶士大夫氣的官僚——多說空話，大話，欺騙的話「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行而不力」，（見胡漢民氏四中全会開會演講辭）是必然的現象。但是隨着軍事的勝利，各方的「人心」——當然是中等社會以「的人心」——漸漸地趨附於南京，更屬顯然。所以「四中全会」的意義，與其說是很有價值的討論與決議，無甯說是有強烈的資本主義發展的要求與意志底暗示。

甚麼是現時南京統治發展——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呢？

第一，當然是北方的反蔣餘燼遠未熄滅而且時時有與「九千歲」的張學良連合再演「迫宮」

一草的可能。這個問題的中心是在張學良的傾向如何，再深刻些說，是要看日本帝國主義在後台怎樣的去拉線。在世界史的比較，蔣介石的南京統治很像一八六〇年左右的普魯士，而張學良治下的東三省則十分切近於當時德國南部各邦及萊茵河聯盟各邦或有傳統勢力的奧地利國。日本則相當於當時在拿破崙第三治下的法國。而蔣介石自己則很想模倣拿破崙第三的規模，因為他的地位是內資產階級與平民大眾對敵中產生出來的而其政策則是俾士麥式的。現時張學良態度的如何，在整個的資本主義的行程上說，雖然無十分大的影響，而對於資本主義在中國進行的速度及南京穩定問題是一個重要的關鍵。現時張學良如果不入北方政客的彀中，迅即舉兵「迫宮」則論理上一年之後祇有兩條出路：不是張的努力逐漸的歸併隸屬於蔣，隸屬於南京，即為南京所驅迫。究竟將來的變幻如何，我們不是預言家，不能武斷的決定。張之暫時的眷顧，對於南京是有利的。

第二，是農村經濟秩序恢復問題。現時在長江中部及南部與珠江流域的各省，已經有一個很廣大的農民戰爭，這是事實。這個農民戰爭之於中國歷史的意義和德國十六世紀時所演的差不多。十六世紀德國的農民戰爭，結果是地主得到勝利，在前期資本主義——商業資本統治時代——的中國，地主及商人的南京統治不顧忌的用屠殺政策去對付農民也是必然而且是已然的事實。

第三，是財政問題。南京此次之所以能戰勝馮閻。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由於比較充足的財政力量。現時「戰後」的費用，并不比戰時為少。國內公債已不能長久為商業及銀行界所供應。而

財政稍有缺乏卽足以影響穩定的前途，更不要說資本主義的『設施』。故外債的取得，實爲南京統治穩定之又一重要條件。

以上三項問題的能否決定，爲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順逆與遲速的條件。卽南京穩定底先決條件。我們知道，現時的南京統治內面，實充滿了無限的矛盾衝突。隨處都燃着爆發新內戰的可能。隨時都還有崩潰的危機。上述的三個條件不過是牠的特點。怎樣的在一年之內避免衝突的危機，怎樣的去彌縫裂痕，一面固然要看蔣介石的手腕如何，另一方面則仍然要看那些『相安一時』的『理論家』的名流去左來右撓。如果一年之內，的確是可以做到先決的條件，『相安』過去，則南京統治的資產階級性才可以完全的暴露出來，而反動的渾身遍染平民大眾鮮血的中國資本主義革命悲劇才算結束。百年以來的歷史難產（參看本刊第二期『中國內戰與文化問題』一文）才真正的產生出來。不過產出的不是康健壯碩的純血孩兒而是老氣橫秋半白半苛的雜種——孔教及基督教亂交所孕育出來的一團血『糞』了！

七 我們今後的任務

我們——革命的孫中山主義者本來負着一個唯一的使命：要把千餘年來的官僚政治推翻，把

帝國主義與買辦豪紳的聯合統治推翻，建設新的、不民的中國。即是：解放中國民族，建立以農工爲中心的平民政權，實現社會主義。所以我們不斷的在困苦艱難的景況當中去奮鬥。尤其是自一九二七年七月所謂武漢中央投降了南京以後要堅決的去奮鬥。我們的主要目的是要把這回中國革命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途。現時社會勢力轉變及爭鬥的結果，不民大眾已經被壓在下面了，凶惡的反動的南京統治已經得着勝利，雖然還未曾結局。中國自今以後或者會由得勝的 業資產階級統治若干時，行孔教與基督教的聯合反動政治特別是會更加進一步的由統治者去宣傳美國福音。羅斯福——曾爲美國的總統，廿世紀初期的美國福音代理人——有言：「英國的侵入埃及與蘇丹是埃及與蘇丹的幸福。英國之統治印度是印度人的幸福。同樣，對於古巴、巴拿馬甚至於全人類是一種幸福，而且是一種極大的幸福，像美國六年來對於上述國家的做法。美國的人民，中美地峽的各民族，及全人類都享福，如果我們去開築河井且保持運河附近的秩序……」（詳見 B. bishop Roosevelt and his time.）。這是美國工業資本主義時代老虎總統式的福音。我們再聽有名的人道主義者，首倡世界和平十四條原則的威爾遜先生底福音罷：「我們要證明我們自己是平等正直的朋友底前驅……我要在這個機會聲明，美國自此以後再不以強奪的手段去取尺寸之地。我們應明示出我們的任務：我們已經了解正當的使用我們已佔領地區的方法。并且那也是我門責任，叫他們（指被佔領地的人們——記者）明白我們只有爲人道的自由及民族的情感，絕不

計及物質的利益。」（美總統威爾遜在第六十三次國會開會的演辭）這是美國已經進到財政資本帝國主義時的福音。他的真正人類福音是怎樣實踐出來呢？當然說完了話就馬上武裝侵入尼瓜拉瓜、海地、聖多明哥，并不斷地與墨西哥糾纏，這是威爾遜式的福音！或者哈定總統先生的福音更好聽一些：「如果美國國旗底文明勢力不侵入墨西哥，則墨西哥的生產力不會有進步的日子，而且牠絕不會保有生產力。那一天可以把美國的文明勢力輸入進去呢，我現在還不能說，但是總有那一天。」（紐約時報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號）我們的小百姓——被人家罵做「蠢如鹿豕」的小百姓，當然知不到那麼多的世界「福音」，但是美國金洋大國的福音倒間接的領教過一些了！當然不久，哈佛先生的福音就會由他的信徒南京基督徒傳到。我們大家祇要聽聽孔祥熙先生的福音已經够了：「現在大家都嚷着地主剝削佃農，我孔某人也是一個地主，却知道是冤枉的。據我自己的經驗，不但我們做地主的不會剝削佃農，而且爲佃農所剝削。……」（摘記孔祥熙先生一九二七年三月在武漢中央會議對我的談話）他這個福音縱然不是美國的地道正貨却也不過夾雜了一些山西自省費的味道罷了！

革命雖然是失敗了，我們的歷史任務却仍然存在。我們的責任是在挽救革命，而且要轉敗爲勝。中國革命的開始已八十餘年，中間的失敗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次。但是每經一次的失敗。隨即得着一次新的勝利，人民覺悟力量即增加一分。一九二五年以來的中國革命在開頭會得到顯著的

勝利，但是從革命意識的領導及物質的實力來說，外來的成份多過本國的成份，機械被動多過覺悟的自動。這是這回革命所以開始能收速效而卒之要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革命的目的不但在於物質的解放。而實更主要的在於精神解放的。如果意識的覺悟未能達到相當的程度，則物質的解放決難做到的。如果奴隸們不是自己有解放的力量，則外來的「恩惠」及援助只是偶然的不可靠的憐愛，絕不是自由與獨立的保障。犧牲流血不是革命的損失，更不是革命的失敗，失敗的在機械般去盲動，在不知到什麼去流血犧牲，不了解歷史的任務與前程而任意被幕後人舞弄。十年前的一「五四」運動所以能成爲歷史的階段的緣故是因爲牠自發的，覺悟的啓蒙運動，雖然這些自覺的悟力是很淺薄很沒有系統，雖然他帶着資產階級的性格。一九二五年以來到現在的革命，只有行動的教訓，而沒有深入的系統的了解與覺悟，這一點當然是一個大時代的開頭所常有的，但不應永遠如此的。現時革命的失敗正是我們革命黨員革命平民的大衆鍛鍊新的爭鬥工具而求自己解放壓自己的機會。認識時代的使命，理解犧牲流血的原因，便是現時我們革命黨員在反動勢力高漲下面伴隨着堅苦的鬥爭行動中應努力的工作。不但我們自己要求認識與理解，并且要把我們的認識理解擴充傳佈給青年的勞苦民衆，使新時代的發動力量底蘊蓄，強大起來，準備好下次的決鬥與勝利的前途。這種工作在我們黨裏是持久戰的要塞攻圍的工作；在中國平民大衆裏是新的啓蒙運動。（關於此點我不日即作專文論之）初次啓蒙運動的工作，自「五四」以後已行分化與中

斷，現時正是接續下來去做的機運。一面有自己了解自己的覺悟，一面又有了解新世界新時代的覺悟；一面對封建社會——傳統的中國舊社會解放，得着個性發展的自由，一面又須自己緊束自己，對殘酷反動的中國孔教與基督教的聯合統治及世界資本主義鬥爭；這種批評的奮鬥工作，就是我們黨的神聖的工作，神聖的任務，也就是全中國青年勞苦民衆的任務。也就是新的啓蒙運動。我們現時失去的是許許多多犧牲了的青年同胞，而要得到的是人的覺悟與解放！

打倒孔教！

打倒基督教！

打倒偶像崇拜主義及工具主義！

打倒孔教及基督教在中國的聯合統治。

中國農工平民大眾解放萬歲！

一九三〇、一一、一〇

南京欽定的國民會議和我們所要求

的國民會議

東南沿海各省的賈辦，高利銀行業家，自從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利用農工的力量先後戰勝了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等以後，即揭開他們的假面，滿身染着鮮血地去屠殺農工，屠殺一切革命的平民大眾，屠殺他們昔日的聯盟者。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到現在的內戰，是那些賈辦、高利銀行業家們和他們的號賽者北方統治——地主及舊式高利商人的——爭生存的決鬥。在他們的決鬥中間，一面當然是利用了破產的農工平民大眾做他們的砲灰，犧牲了四五十萬人；一面却更擴大的屠殺要起來奮鬥，起來自己實現自己支配自己的平民大眾。

「牛兒在欄，羊兒在圈」刀子也磨得非常的犀利殺剩屠剩的中國平民大眾。應該而且可以繼續的被屠殺，如果南京統治的劊子手們願意。爲什麼劈頭來了甚麼「國民會議」的召集問題？

「打死狗才來講價」，「吊起來就捱得了打」，殺不盡屠不乾的中國平民大眾，老早就已經是給人家當狗兒和奴才看待，橫豎繼續的去打吊罷了，怎用得着講甚麼「民權」，甚麼「國民會議」？却是蠟兒鼓兒鬧得淫響，「西洋鏡」的廣告街頭巷尾都貼滿了，小百姓們也得擠上去看一

看！因為西洋鏡的廣告是一個政權的問題，所以在看「西洋鏡」以前，先得從中國傳統的政治形態上做一個輪廓的描畫。

一 「亞細亞」的官僚國家——東方專制國家

「亞細亞」的官僚政治，自秦代以來統治了中國兩千多年。這兩千多年中，雖然政治組織有過不少的變遷，却是在本質上始終無甚大差別。所以稱爲「亞細亞的」，是因為古代埃及，巴比倫和波斯等文化舊邦及後起的土耳其帝國，都曾有過和中國兩千年來約略相同的政治組織。這些國家中的政治組織，以集中官僚制度爲特質，統治者有無限的特權。牠們已不同於古代希臘的市民政治，又不完全同於歐洲中古的封建政治，更說不到中古末期的市府國家，所以在政治制度上可以用一個和上述那些範疇相異的名稱——「亞細亞的官僚政治」或東方的專制國家——去包括亞洲各主要的國家底政治形態。

在極幼稚的農業經濟階段中，特別在中國，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本來缺乏產生那樣龐大的集中的官僚國家底物質條件；但是共同農業設備的要求——在古代埃及爲尼羅河，在巴比倫波斯及中國爲人工灌溉及穀倉等設備——和被另一個生存條件所決定的對外的民族的軍事防衛與發展

底設施實爲使幼稚的農業社會需要國家組織底主要原因，實爲共同生活底唯一聯繫。因爲大規模的農業設備與軍事——特別是軍事——設備都是需要統一的規劃和緊嚴的號令，所以是龐大的，集中的；又因爲統治階級是由獨裁的權力所任免及育成，成爲一種特殊的國家服務員完全和生產關係脫離，所以是巨僚的，表面上是無社會階級的屬性的。

這就是「亞細亞的官僚國家」所以形成的原因及其特質所在。

共同的農業技術設備與對外戰爭已爲上述國家統一與存在的根源，所以跟着農業經濟的相落或戰爭需要的程度減低而必然的要影響到上述國家底統一與存在。

這是說明亞細亞官僚國家興衰轉變底緣故。

二 中國傳統的官僚政治

中國傳統的官僚政治底發生除上述的概略以外很明顯的是由於氏族社會底解體及交換經濟底大規模的展開及對外作戰底急辦。秦代，一方面以土地私有政策（特別是商鞅的策劃！）破壞了民族鄉村公社（井田？）底剩餘，擴大了交換經濟的境界，擴大了社會生活底範圍與需要；一方面受壓迫於外敵——匈奴——不能不大規模的去動員民衆，作反抗外敵的鬥爭；這兩個特徵是形

成中國第一次集權的中央政府底動力。所以，可以說：中國國家生活底真正的開始時期是由秦統一後起。因為國家轄境的廣闊以及職務的專門化，所以當時的國家政權雖然是以商業化的地主及商人為基幹，却是軍官與官吏的造就及選用，不能不開放給廣大的農民子弟及「儒生」——當時具有文學史學相當傳習的智識份子，但不是純孔教的——。

因為那些軍官及官吏都是和生產行程脫離了人們，所以那些官僚，實質上雖然服務於以商業化的地主及商人的基幹的國家——以地主及商人的利益為主的政權中，而形式上則甚似無階級的隸屬關係，為「第三者」的代表，「為正義及公道」而服務！這種官僚國家底階級實質，不但東方人一向是模糊不清，即西方人也是捉摸不到。在東方人是拘囿於傳統的習慣中得不到參證比較的機會，在近代的西方人，因為生活於狹小的，由市府發展出來的（如意，荷蘭等）或由大地主直接擴大起來的（如普魯士國及俄帝國）國家環境中，雖然很親切的知道他們國家的階級性質與其結構却從未會見過士大夫在中國的政治作用，所以很難得把中國國家的階級性抉發出來，甚至有些學者（德國的 Max Weber 即其中之一人）認為中國國家政權是在不偏不倚的無階級利益關係的文學家手裏！

秦代交換經濟底發展程度不能適應於秦代疆域的過度擴張，而且政治的剝削及徭役，怨毒深種於農村，所以秦代集中統一的政權，不久即被破產的農民及地方紳士所推倒。西漢初期的復古

反動是地方的農業經濟對抗商人的城市經濟的表徵；是由高度「跳躍的」中央集權底解體承接過來的「分離運動」。這一段由秦統一到西漢的分封，在形式及實質上都和第四五世紀時日耳曼蠻族侵入羅馬後所建立的封建國家相當。在表面上看雖然是一種退化，一種反動，而實際上是經濟生活的普遍化，深入化，使新開的「未開化的」地方，能和當時統制的生產關係和諧的發展。這就是在歐洲中古的封建時代及西漢以後一直到現在的中國——除了東南沿海各省一部以外——影響到政治形態底經濟與社會的投射力。

秦代所建立起來的官僚制度和漢以後的政治形態有甚麼大的差別呢？在經濟政策（在秦有「重農政策」的萌芽，而漢以後——特別是西漢初期——是「重農」的。）及財政（租稅！）政策上面，雖然看得出很明顯的差別，却是在政權的組織上實在無深刻的歧異，都保持着龐大的官僚的組織；所不同的是「中央」的權力強度已經減少，而鄉村紳士的參政機會（選舉）加多。這樣，代表商業化地主及商人的秦代官僚制度就轉變成為地主的利益為主的「分治合作的」官僚制度。孔教的「定於一尊」，就是當時——西漢初——社會關係固定化的映像，就是宗法與封建的小農社會意識形態最高的表現。由現存的社會關係產生了孔教的意識要求；更由孔教意識底固定擴大及加深了而且「統一」了當時的社會關係；這就是歷史上主觀與客觀相互遞變影響的好例；也就是二千年來地主，官僚，孔教「三位一體」的標本。如果到現在還有人說：孔子的教化

是「王道」而中國的官僚制度是「中立而不倚」的無階級屬性的特殊統治制度，那我們很可以判定，那說話的人不是棺材裏的活尸，就是被有權位的人們所購買的說客。

却是龐大的中國，農業技術極端幼稚的中國，雖然由特殊的內外條件構成了「統一」的國家，而統一的核心力量，始終是與小農經濟相應，非常的微薄。故除以極端殘酷的（如誅九族及聯律等？）「法律」威嚇人民誘勒人民以外，政治的力量始終祇及於社會的上層份子（士紳，商人），廣大的人民却幾乎完全和政權機關脫離，甚至於殺人等刑事及納稅完糧等唯一應與官僚接觸的事項都由地方的豪紳包辦；其他一切「細事」，在鄉村是由族長（如南方各省！）會議或鄉長（在北部中部各省！）處理，在城市是大部由商工業的行會處理。這樣，各級官僚，特別是州縣的「父母官」，自然可以「無爲而治」了！

在這樣的一國家裏，自然廣大的平民羣衆都變成統治階級的奴屬牛馬；而下級的屬吏對於上階官吏也不過是「奴才」！這種奴屬的牛馬關係，在歐洲主要的曾經過了一千年的時期，而中國則自漢以來直到現在除了少數的城市以外，還維持着牠的骨格，祇有在最近的數年間才大大的開始崩潰。

三 一直到現在為止的人民參政運動——『民權』運動

中國的『民權』運動，如果單從形式上說，太平天國在八九十年以前已發其凡：男女平權而且人們在人格上一律平等的政治學說及制度底雛形，太平統治的初期已透過變相的基督教義而會一度的表現過。却是從制度上及實質上了解傳統的官僚政治底朽腐與無能，實在從一八九四——五年（光緒二十——二十一年）中日戰爭後開始。中國敗後，康梁的士大夫『變法』運動，與孫中山先生的『推倒滿清』運動差不多同時的誕生。這兩個運動，雖然有改良與革命之別，及由上層的士大夫主動或下層平民發動之分，却是針對着當時朽腐無能的官僚及其制度，而求使中國從舊的政治形態，轉變到新的政治形態——人民參與政權運動，則二者實無甚多的差別，至少在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左右是有這樣的形勢。一九一一年（辛亥年）的革命大規模的爆發，不久即成立了南京的『民主』政府並且宣佈了臨時約法，「改正朔，易服色，開國會，」似乎是革命派的主張已經得到勝利；却是我們如果從實質上去考查，便要明白：辛亥革命的領導成份是在野的及在朝而不滿於現狀的士大夫多過其他的一切，所以結果，不但經濟結構上無顯著的變革，即就政治形態上說，也不過得着一個由各階段的實際統治者購買出來的「國會議員」以及「省議員

「做一個極短時期的裝飾品，外表變化而已。整個的中央及地方的政權中心，仍然在官僚手上，在代表地主及高利商人的成份手上，人民——當時主要的是買辦資產階級——當然湊不上去。南北方的新興買辦資產階級，因為得不到政權，並且受着歐戰後各國革命的強烈刺激，曾先後的假借種種名義及勾結各方軍閥，反對統治者底爭鬥。所以一九一四（民三所謂國會解散後）到一九二七（現在的南京政府成立時）的革命波動，雖然帶着種種的顏色，種種的包衣，並且經過了許許多多的曲折，而實質上，祇是辛亥革命的繼續，是新興買辦資產階級抬頭奪取政權的緒戰。這個比較長的時期的緒戰，因為相應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幼稚程度，敵我的陣綫常常混淆，而且產生不出一個明顯的，確實的資本主義政綱。因為新興買辦資產階級本身的薄弱及其與廣大民衆的隔離，所以不但實質的資產階級民主政治建樹不起，即形式上的議會制度也無法保持與建立。這是一九二七年（民十六年）以前「民權」運動失敗的概況。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國民黨中代表新興買辦資產階級的領導，已由軍事的勝利而奠都南京，建立起他們的政權中心。一向處在被支配地位的——在野的——買辦資產階級現時已一躍而居於支配者的地位，從前在野時的口號：「護法」，「開國民會議」的要求，當然是要拋到九霄雲外去，而主張「調政」！

自辛亥革命到現在，雖然是建立起來的買辦資產階級政權，雖然在政權核心的實質上已和滿清末年的統治及北洋軍閥統治有顯著的時代性差異——階級差異——，却是在表現上確比任何舊時代的

軍閥官僚統治還要反動，還要殘酷。滿清末葉及民國以來的北洋軍閥統治和牠對敵的不過是新士大夫，不過是無實力的買辦資產階級，而現在和南京統治對立的除了北洋的殘餘勢力以外，已經新起了一個龐大的農工平民大眾的革命力量擺在牠的眼前，所以溫情的「合法」手段比較的曾經能够在舊時施用，而現時得勢的買辦資產非以最暴虐殘酷的「訓政」方式，非以軍事獨裁的方式不能維持牠的存在。到了現在，廣大的平民大眾，真是到了求死不得的地步，那裏說得上甚麼「民主」與「民權」，所以數十年來的民權運動，其始因為新興買辦資產階級不過傳統官僚統治而失敗，一九二七年到現在，則因為買辦資產階級已經得到政權平民大眾被欺騙被屠殺而失敗。我們知道，歐洲式的民主政治，議會政治，不是理想的產物，不是少數天才家——如盧梭等——的創獲，而是統治者及被統治者力量底相對的平衡發展底結果。歐洲式的民主政治——議會制度所以不在中國建立起來，並不是因為東方文化，王道，等等抽象東西與西方格格不入，而是因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及農工平民大眾都受經濟發展條件底限制一齊的落後，或演着不均衡的發展行程。

南京統治前時所定的「六年訓政」，正是買辦資產階級保持發展軸自己政權底武器，正是牠抵抗一切進攻者的砲台，更是射擊平民大眾的砲台。

四 南京欽定的國民會議底性質及其前途

在現在，各在野政團都要求着『開國民會議』的政治環境中，反動的南京統治居然於『四中全會』決定了今年五月五日召集『國民會議』，並且於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規定了國民會議選舉法，甚至於到處都有宣傳國民會議的呼聲，是不是南京統治從此就會由軍事獨裁及寡頭專政的政權形式過渡到近代的民主政治？要答覆這個問題，必定先要明白南京所謂國民會議的性質。

第一，從職權上說，南京的國民會議至多祇是成爲一個南京統治——寡頭專政——的諮詢機關。關於這一點雖然還未曾有過『成文法』的規定，但是從南京統治的各種文件中已經充分的表白出來。所謂四中全會的宣言中有一段說：『將此一切根本問題開陳於全國國民。用齊一全國國民的意志集中全國國民的力量，以立民治民有民享之基，而表明本黨執政時期的責任。』南京政府的司法院院長王寵惠在去年十二月有一公式的演說：『我們不可以爲國民會議同國民大會是一樣的。……國民會議是解決目前建設中國的重大問題，國民大會乃是行使憲法職權，開會的時期，在調政 成之後，並不是在調政時期。』

像上述，國民會議只是一些被邀請的客人，是一種供南京統治者裝飾『太平』的玩具，當然

完全無權力無意志可言。所以從職權上說，恐怕比清末的「資政院」及袁世凱的「參政院」都還比不上。（詳下）

第二，從成分上說，雖然表面上還有容許農會，工會，自由職業團體及立案的大學等人民團體選出代表參與的規定，但是如果詳細些去考查規定的條文，即可以知道，就其規定的條文去做，必然只可以叫統治者的走狗及貪劣的豪紳等社會寄生者剝削者去充實所謂國民會議的代表。因為什麼？我們試詳細些去參證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所決定所謂國民會議代表選舉法的條文：

第八條內：（一）有「反革命」行爲經判決確定或尚在通緝中者；（二）褫奪公權者；（五）會禁中國國民黨，被開除黨籍或停止黨權者。以上均爲不能當選爲國民會議代表者！我們試問：自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到現在，所有被南京反動政府及黨部稱爲「反革命」「反動派」「準共產黨」而被褫奪公權黨領或被通緝的人們，有幾個不是打擊反動政府及黨部最力，而受惡於政府及黨部的人？有幾個不是打擊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最力，而被惡於官吏豪紳的人？有幾個不是犧牲自己而爲解放廣大的平民羣衆努力的人？我們敢斷言：過去三年以來到現在，一切被加以「反動派」「反革命」等名義而受殺戮禁錮的，都是中國社會中的精英，都是平民大眾的朋友及忠實代表者。原屬中國國民黨的真正革命黨徒，也先後因爲現時的南京黨部及其政府已爲極少數的買辦豪紳貪官污吏所盤據，不屑與之爲伍，而且決心積極的與反動的力量搏戰，所以先後的也被殺

戮禁錮或被通緝。如果把全國廣大平民羣衆中的積極份子除去，把國民黨中的革命份子除去，剩下來當然祇有隨時隨地可以被反動政府黨部蒙蔽的蠢才，或者是被統治者剝削者驅使的賤物。要這些蠢才及賤物去充『國民會議』的代表，當然是統治者最心愛的辦法，也是寡頭統治必然要做的辦法，我們本來無所用其怪異。

第三、從選舉手續上說，統治者更顧慮利誘之不足，而加之以威迫及經理作弊的機關。我們看，選舉法第九條上說：『國民會議代表之選舉，應分別設置選舉總監督及選舉監督；各省以民政廳長爲總監督，各縣以縣長爲監督，各市以市長爲監督……』我們試問：選舉監督所司何事？自然應該是公正的監察人，執行選舉法底考查的人，是防止選舉作弊的人！如果把選舉監督的責任委之於各級官吏，是不是等於叫貪官污吏去負『監督』選舉『防止』選舉的弊端？至於『各選舉團體之資格，由各該選舉總監督審定之』（第十一條！）則更使官僚有上下其手顛指氣使的機會。像這種公開的作弊作偽，製造選舉，公開的做收買及威迫的準備，只有無恥的反動政府才敢做出來！

第四、從代表當選人的資格限定上說，更看出當選人的階級性。該『選舉法』第十三條內說：『本法第五條第一款至第四款（指（一）農會（二）工會（三）商會及實業團體——記者）各選舉團體，其選出國民會議代表之當選人，應以從事於各該界業務并經依左列年期現尚未改業者爲

限：（一）從事於農業十年以上者（二）從事於工業或商業五年以上者（三）從事於教育事業五年以上者（四）從事於各種自由職業五年以上者」。我們要明白：現時的中國社會是在轉變期的社會。一切舊社會中的進步份子都在不滿足於舊社會舊職業的束縛及湮沒而起奮鬥，起來革命，至少是要離開舊時的職業而從事於新職業的尋求。特別是如下的各職業人等是被該原職業所壓迫無法爲生不能不離棄原職，討求生活：

一、佔全國人口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雇農，農業勞動者，佃農及自耕農的大部，或因土地日見荒廢無工可做無田地可佃，或因土地被捲買沒收不能繼續在鄉耕作，以致離村棄業，或爲兵士，或爲失業的流民，或爲苦役於城市。這些窮苦無告的各級農民，已因近數年反動政府的苛政，被驅於死亡或將就死亡之途，而現時的所謂選舉法，又規定非從事農業十年以上尚未改業者不能被選，則事實上無異剝奪占全國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公民被選權。一切勞動耕作的農民底被選權已被剝奪，則能被選的當然只有豪紳地主，公子少爺，或新改了稱呼的「同志」！這些豪紳地主子少爺，新起暴富的已可以用錢買收，其「良戶」「舊家」也可以受此法「從業十年」以上的抬舉。所以這個關於農業團體被選人的規定是十足十的「階級選舉法」！

二、工人及店員多係新從鄉間「逃荒」出來的農民——破產的農民底出身。他們因爲迫於鄉

間的死獄，所以不能不逃到城市中來討飯吃，雖然現時工廠裏及商店裏底工錢也還在人的生活水平綫以下（最繁榮的上海市，大多數工人的工資每月尚不到十元，店員則五六元是極普通的！更不要說次等及小城市及其他家庭工業了！）這些工人們及店員們，一面時時有吃不飽穿不暖的苦痛，一面又有失業轉徙的恐慌。五年以上的從業工人及店員，可以說在全體業員中得不到一半。因此被剝奪選舉權的又是廣大的工友及店員，而享受被選權的當然又只有大肚皮的每月坐收三分錢利息的投機寄生的大工業家，商業家，銀行家等高利貸者。

三、教育家及自由職業者多係新進的窮苦青年，窮苦的學生出身。他們一面已受舊社會舊制度的壓迫無法得到職業，而新得到的職業也因為官僚軍閥的貪污浪費乾沒，無法得到充足的薪俸。所以轉徙流亡，停職輟業實最易發生於這二種部門的職業家。現時的反動選舉法，豈不顧這種事實，一樣的規定為從事五年以上的資格，實際也無異於把大多數的新進青年教育家及自由職業者的被選權剝奪。這種剝奪實在比任何選舉限制為利害，因為現時中國的動力尚多蘊蓄在這二部門的職業者內面。

此外，我們應該特別提出說明的：反動底選舉法明白的規定：「前項農會工會商會教育會各團體以依法設立者為限」（！）我們知道，自從一九二七年南京反動政權建立以後，一面着手

大行屠殺，一面又解散一切農會工會學生會等等稍稍帶有革命性而真實的代表人民本身利益的集團，摧殘一切人民集會結社的權利。一面已把人民的集會結社的權利一筆勾消，一面又有人民團體選舉權利的規定底把戲。這種做法，是騙人還是騙軸自己！至於欽定的各「民衆團體」代表額底「分配」雖然在現在還未分配出來，却是大體上說已成爲「無關大要」的了！

綜合以上的分析，我們很可以說：南京此次要籌備的「國民會議」至多只會是一種比清末「資政院」及袁世凱的「參政院」還不如的一種欽定的御用的機關。因爲在職權上說，軸無發議及最後決定的力量，赤裸裸的祇作爲統治者的工具及諮詢顧問機關；而清末宣統二年九月開始集會的「資政院」至少還有議決國家預算決算稅法公債以及新定法典及修改法典等權，民國三年六月袁世凱欽定「參政院」尚有依照僞定「約法」代行「立法院」職權的說法。

在所謂國民會議代表的產生，組成及資格限定上說，已很明白的把大多數的直接生產者農民工人及多數銳進的青年職業者除外，把一切真正革命的黨徒除外，所以在表面上看似乎已採取「職業代表」選舉法的外形，而實際上選舉資格的限制比世界各國最落後最野蠻的財產限制階級限制更爲殘酷；因爲財產限制還未會完全把人民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剝奪，而現時的反動選舉法，一面已把選舉及被選舉者限於「法定」的團體，一面過把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全數剝奪，把一切真正，民的團體解散摧殘，所以剩下來或新成立的「團體」，祇是官僚軍閥的說客及其寄生

人，只是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黨棍的交易所，絕不會有多少人民的份子被選出來。所以事實上必然會是極下流的御用機關。這種欽定的御用的機關必然的是會和統治者的權力範圍及階級性相適應，而反映出牛鬼蛇神等種種色色分贓的形相來！

在我們已經了解南京所謂國民會議的性質以後，我們還要進一步去推論那個會議的前途。

我們知道，南京政權，在北方軍閥失敗之後，現時是建立於蔣張的聯合上面。而南京正統派內部的蔣胡之爭文武之爭等等，亦在在爲南京政權不一矛盾太多的證明。要圖這種聯合的『均衡』底保持，實爲這次『四中全會』決定籌備五月五號開所謂國民會議底唯一動力。換一句話說，這次所謂國民會議召集的動機，並不是因爲人民的主張得到勝利，並不是因爲『民權』運動的高漲，而實在是因爲一而有張學良所代表的北方勢力強迫着要求實際參與政權，一面爲買辦勢力的抬頭，（此一點可以工商會議的表現及最近上海總商會的通電爲證！）不能不用這種『換皮不換骨』的辦法去相對的滅除統治者當中的敵對。更要用這樣辦法去欺騙已起來及要起來的人民。

我們知道，『政治制度是政治爭鬥的結晶』（本會的政治主張第二十頁），如果不是有強大的羣衆力量，強大的爭鬥力量，代表着被壓迫者的要求去反抗統治者，則決不會有民主政治，不會有人民參與政權的機會。現時的政治局勢告訴我們，統治者內部衝突敵對的勢力只有促成南京統治由軍事獨裁及寡頭專政的形態轉變變成多頭專政及分權的形態。形態雖稍有變遷，而實質是了無

差別。所以現時南京所籌備的國民會議還不能說是民主政治的啓蒙表現，雖然是有一些影跡。軍事獨裁及寡頭專政的實質是否能轉移改變，只有待決於民衆運動，待決於廣大被壓迫的平民大眾底團結與鬥爭力量底形成。如果從此以後，廣大被壓迫的平民大眾能在極困苦艱難的局勢當中團結起來，努力於政權參與的鬥爭，則「民主」政治的端緒雖不能開始於預備召集的欽定國民會議，但是可以和統治者對敵的爭鬥中逐次形成出來的。只有平民自己的力量是決定自己政權——平民政權——底機輪與支點，放棄了平民大眾底組織與發動鬥爭底工作，而惟高談「人權」「約法」「憲法」——如新月派——那是「癩蝦蟆想吃天鵝肉」的空想。立脚在和南京統治一級的立場上，而唯倡「反蔣」的口號或剽竊一二在野各政派的口號——如改組派及其剽竊新月派的口號——在軍閥官僚的荷包裏去定什麼「約法」「憲法草案」，那只是自己騙自己的蠢才及不知大體的俗物所玩的把戲。所以，如果我們要推論南京欽定國民會議的前途不能不斷的說：如果廣大平民羣衆不能趕快的起來，自動的組織起來，參加反軍事專政及官僚政治的鬥爭，則不但五月五日的國民會議只會是變成統治者的工具，（究竟五月五日能否開成當然還是一個很明顯的疑問，因為或者南京政權到那時已經被新起的內戰搖動了！）不會有絲毫民主政治的頭緒，而且以後也不會有的，只有叫傳統的官僚政治繼續下去。怎樣去推翻二千年來的官僚政治，官僚制度，推翻現時買辦資產階級與豪紳地主的聯合政權？只有待決定於爲建立平民政權而爭鬥的革命行動底努力！

五 我們所要求的國民會議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傳統的中國官僚政治實為支配了中國廣大平民羣衆近二千年的政治組織。南京統治權，雖然在實質上漸漸轉入新式買辦資產階級的手中（最近南京政府任命上海著名的銀行老板錢某做法國公使，更表現得露骨！）而現時，因為牠要和革命的平民大衆對敵作戰的緣故，不能不把傳統的官僚政治整個的接收過來，而且南京統治在經濟結構上不必能脫離地主及一切封建的殘餘勢力作對抗革命民衆的鬥爭。所以在南京統治未曾崩潰以前，不但不能澈底的掃清傳統的官僚政治的毒害，不但不能貫徹『民主』革命的使命，不能造成近代的『民主』國家，而且必然的要隨革命的平民大衆勢力的高漲而更加腐敗，更加貪污，更加無恥的掠奪平民大衆。

代表中國廣大勞動平民羣衆利益底政黨有一個主要的任務問題擺在上面：如何去解放勞動平民羣衆。自然，我們不是空洞的『民主主義』者，——如改組派的『生們一樣——只是要求抽象的民主政治，而把經濟制度，『經濟的民主』要求拋棄在一邊；更不是美國信徒的『人權』主義——如新月報的胡適之及羅隆基等——丟開了一切現實的社會要求，祇是要求為資產階級的人

們或名流們所能享受的甚麼約法與憲法，一句話：祇是要求把英美的政治形態整個的移植到中國來。像上述二派的主張，不但是不會實現，即使實現，也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與勞動平民無關。我們始終認爲，政治制度是政治鬥爭的結晶，而所謂「民權」祇是被統治被壓迫者經過長期的奮鬥以後所得到的報償。中國勞動平民大眾做統治者的牛馬奴隸已好幾千年，現時的唯一要求是要翻身起來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發展自己，而其最切近的第一步目標是要推翻傳統的官僚統治，建立真正由人民直接參加及組織起來的政權，而在形式上是由士大夫執行，是完全和生產者隔離的政治形態，所以傳統的官僚政治是雙重寄生，雙重剝削的。要掃除寄生剝削的成份，首先在山人民自己組織政權，行使政權。所以我們的爭鬥目標是平民政權。在這個目標——建立平民政權的目標上，我們第一步要求開國民會議。

甚麼是真正的國民會議？

第一，牠必須是由人民直接產生。因爲只有人民自己可以了解自己的痛苦與要求，只有了解自己的痛苦與要求的人們才可以代表廣大痛苦無告的平民羣衆，可以受痛苦平民羣衆底委托。所以必定要人民有直接選舉委派他們自己的代表底機會和方法才能產生出真的國民會議。怎樣才能夠使人民直接選舉和委派他們的代表呢？一，是要有絕對的集會結社言論通信居住底自由。一切的政治行動及要求都是集體的，社會的，絕不是單獨個人的。所以要達到政治的目的。必定是經

濟利害關係最密切的人們聯合起來，行共同的爭鬥才能達到。反過來說，如果經濟利害相同的社會羣——階級——不能有自己團集的機會，不能有集會及言論通信居住的自由，則其政治的權利已被完全剝奪。南京統治，一面完全剝奪了人民一切的自由，一面又說開國民會議，這種騙人騙自己的無恥，實歷史上所僅見，所以我們首先要要求頂起碼的政治自由——集會，結社，言論，通信，居住，等自由。二，一切的人民團體，祇要不是帝國主義及軍閥官僚底走狗，都應該有選舉代表參與國民會議的權利。南京欽定的國民會議，在代表選舉法上用種種苛例剝奪人民團體底選舉權利，結果，祇會是御用的機關及團體才得有選舉國民會議代表底權利。三，被選舉的人——國民會議代表，祇要是屬於各該人民團體的，不受性別，資格，學力，財產，從業年限等等的限制。南京的國民會議代表選舉法是用資格從業年限等的規定剝奪真正勞動人民底被選權的，所以我們要反對，而要要求解除一切的限制。

做到了上述三點，人民才能得到選舉及被選舉底機會，才能有直接產生人民自己代表底可能。

第二，他必須是以各生產部門的職業團體代表為基幹所組成的，我們知道，官僚政治——無論為亞細亞的官僚政治或歐洲近代資產階級民主的官僚政治——的通病在和生產行程隔絕，因此那些政府機關中的職員，尤其是議會中的說客，都只是一些勾串奔走的寄生蟲。在中國，民國以前不用說，即入民國以後，參眾兩院的「豬仔議員」及現時南京統治中底各級黨部和政府機關，祇

是「上衙門」的官兒，和人民不發生絲毫的連繫。所以結果祇有人民代表之名而行剝削寄生之實，現時南京欽定的代表選舉法，雖然名義上有農會工會等團體代表參加之規定，但是，一來被限制於資格，二來被限制於代表額數的分配（現時各團體代表名額底分配雖未規定，但必然的結果是欺騙及偏私，可斷言的。）再加上各種威嚇利誘挾持掣肘的辦法，各生產部門，特別是農民工人，很難有真正的代表得參加所謂國民會議，是必然會有的事實。佔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工平民及其他在現時的經濟階段還有相當生產作用的職業及準職業團體，如果不能在將來的國民會議，發生主要的作用，則所謂國民會議，直不過是變相的官僚機關，士大夫機關，御用的機關，說不上代表國民。所以我們要求以各生產部門的職業團體代表為基幹而組織成的國民會議。

第三他必須有全國最高的主權，我們知道，國民會議，必須是根據「國家主權在人民」的原則而組成的。在歷史上，十七世紀的英國革命，是因為國會與王權並立，而且王權要壓迫國會權，所以革命爆發，結果國會得到勝利——雖然國會的成份是商人及下級紳士為多。十八世紀中葉及末葉的美國和法國的革命，也曾經用人民的力量推翻了特殊的殖民地統治勢力與封建的特權，而由全國人民的代表會議先後製定了憲法及建立人民的政府，雖然當時的所謂民主政府是資產階級的——法國所謂第三階級的——成分居領導的地位。無論為英國，美國或法國的革命，所爭的都不過是空洞的條文，空洞的憲法；所爭的焦點在於國家的最高主權。所以現時的中國革

命，如果是要盡到他的歷史任務，則將來的國民會議，正應該是接受國最高主權的機關，是真正的人民體意志的表現機關。只有這樣的一個機關，才可以配得叫做國民會議，才可以解決中國民族自己的運命，才可以解決平民大眾自己的運命。像現時南京欽定的國民會議，只配說是統治者的工具，是各地方實際有力者——軍閥，官僚，豪紳。地主，商閥，學閥，黨棍等——底代表會議，或其僱傭的會議。並且形式上，連『僱傭會議』名稱都配不上，因為那個欽定會議只是有權接收南京政府的政治報告，而無權規定及監察一切的政治設施。

我們所要求的國民會議，當然是要一切權力屬於他的；他應為全國的最高主權機關，能解決一切問題（自然制憲的職權在內。）；他要在執行機關之上，而不是作執行機關的附庸；他要行使立法及監察的職權，而不是為現時的所謂立法機關及監察機關的派生物。

必定要做到了上述三項的要求：由民直接產生，而不是為官僚所包辦；以生產者為主幹，而不是變相的士大夫集團并且最後而且最要的——有最高的主權，而不是統治階級的工具；然後才能說到是具有真正的國民會議的條件，而且才配得上說是國民會議。我們代表平民羣衆利益的政黨，必定是為實現這種的國民會議而努力。全國窮苦無告而勞作最多的平民大眾也應該為實現那種要求而團結起來，作反抗特權階級的鬥爭。

我們相信，在現時無法無天，一切由軍事長官及極少數的特權階級獨裁的中國，要實現上述

的要求，當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然不是立刻可以做到的事。我們認為，爲實現真正的國民會議而鬥爭，是中國平民大眾的一件最重要而且最切身的工作，是一件歷史的工作。只有被壓迫的平民大眾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以充實的力量壓迫現時的特權階級，才可以叫現時的黑暗統治退縮，才可以肅清黑暗殘酷的統治而得到「民權」。只有勞動的直接生產者——農工平民大眾得到了政權，建立了平民政權，才可以進行經濟的解放，社會的全體解放。而我們所要求的國民會議也就是建立平民政權底第一步工作。

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在他的革命綱領上關於「平民政權的組織」上說的很詳細，我們現在試引述在下面：「要收平民政權的實效，必須以有組織的職業團體代表構成中央及地方的政權發動機關。因爲只有如此才可以使參加生產各部門的民衆確實的和政權聯接而不發生隔閡；只有如此才可以澈底的剷除官僚制度及軍閥政治的積弊，不再發生新的官僚政治。同時，我們以爲：歐美流行的地域選舉代議制度，容易釀成少數操縱多數弊端，此種弊端中國過去的「豬仔議員」及現在的「黨衙門」等怪象都因爲民衆和政權隔離，才會發生。要消除及預防上述的弊端及怪象只有由職業團體代表掌握政權的方法。

我們主張：各職業團體及準職業團體應按下列的比例數派遣代表以組成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

國民大會：

直接參加生產的農民工人8%

其他各職業團體及準職業團體占6%

臨時接收政權，議訂憲法的國民會議，應按此原則組成之。各地方權力機關應以地方的職業團體為單位按上述原則組成之。

必須用這樣的組織才能使平民羣衆相信革命黨的領導，才能免除那些假借「調政」及「以黨治國」的名義去壓抑平民羣衆制削平民羣衆的流弊。其次，我們反對歐美流行的三權分立制，而主張立法機關不與執行機關分離，一切權力屬於國民大會，在國民大會之下設立執行機關，各地的權力機關為省民大會，鄉民大會等」詳行動委員會於去年九月十五日內戰正烈的時候會發佈要求開國民會議的宣言，內中有說：「國民會議在目前是復興中國革命的最急迫的工作。國民會議的構成應以十三年冬孫先生彌留時所發表開國民會議的方案與目前民衆的現實要求為基礎。所以我們現時最主要的工作是要聯合起中國的被壓迫人民，在各種職業（農工商自由職業及準職業如學生婦女，兵士警察等）團體的組織上面團結起來，自動去開國民會議。各種上述的團體代表，按農工代表佔百分之六十，其他的代表佔百分之四十的比例組成國民會議，以推翻軍閥官僚的統治，形成人民自己的政權。必須我們自己有了政權才能有力量去解決土地問題，及取消不平等條約；才能得到和平，永遠停止內戰。我們所要的是自己的政權，因此我們所主張的國民會議

是真正人民代表所組成的國民會議，絕不是袁世凱式的欽定約法會議，或段其瑞式的善後會議，及最近北洋軍閥及改組西山等系的政客所主張的預備立憲式的恩賜國民會議。這些只是造毀亂國的把戲，絕不會得到永久的和平。祇有我們廣大平民羣衆自己的覺悟，自己的組織，可以形成堅強的力量，可以形成真正的國民會議，以發動革命，保護革命，完成革命，實現永久的和平。」（見「革命行動」月刊第二期第三頁！）我們對於平民政權及國民會議的主張已經十二分明顯的表露於上述二種的文件。

以新興買辦資產階級爲核心的南京反動統治能否維持到今年五月五日去開他的欽定的國民會議固然現在還是一個問題，而革命的孫中山主義者，革命的中國農工平民大眾，必然的要在上述的意義上面去實現我們所要求的真正的國民會議，並且由國民會議以達到平民政權，達到我們的歷史任務，進行社會的解放！

反對南京欽定的國民會議代表選舉法！

反對欽定的國民會議！

全國民衆自動的起來，召集真正的國民會議！

一切權力屬於國民會議！

（十九年一月五日稿）

現時國際及中國的形勢與我們鬥爭

底路向

一、國際底形勢

1. 世界經濟危機之現狀

2. 世界經濟危機中底核心問題——世界問題底核心

a. 農業的危機

b. 銀價低落問題

c. 擴大世界市場問題

d. 各國關稅壁壘問題

e. 德國賠款問題

f. 蘇聯領域內外底市場問題

二、國際形勢底前途

三、中國本國的形勢



1. 中國農村經濟的繼續崩潰

2. 反動南京統治底對外關係

3. 南京統治能穩定嗎

4. 現時中國各政黨底現狀

四、中國形勢底前途

五、我們底鬥爭路向

中國革命——民族的平民革命——底前途及我們黨的鬥爭路向，不但是我們黨所最應着眼的問題，而且是全中國革命民衆所關心的事件。要把前路認清，一面固然是立場的問題——即黨自身的生存意志——；一面更需要把現實的問題全面綜合起來。一九三一年現在已經過去四分之一，一九三一年及最近的將來底現狀與前途，在現時差不多大部份已經可以估量出來。拿着綜合，估量出的結論和我們黨的意志融合起來，就可以形成黨的鬥爭路向，自然更可以概畧的解答中國革命前途的發問。現在試分三個階段說明於下：第一、國際的局勢與前途；第二、中國的局勢與前途；第三、我們鬥爭的路向。

一 國際的形勢

1. 世界經濟危機之現狀

由一九二九年下半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到現在，雖然有若干經濟部門已有「稍好景況」的徵候，而實際危機底最高度，似乎大部份還未曾達到，換一句話說，危機似乎還要繼續的擴大與加深。一九二七——二九年上半年期的世界資本主義黃金時代，對於資本家——特別在美國與德國——現在已變成神話，變成了天堂生活所引起的「破落老良戶」的夢幻般的迴憶與悲哀底對象。這種廣大而普遍的迴憶與悲哀的現象，自然驚醒了并且打擾了「子孫萬年」，「永保勿替」的平庸的一切上層階級底清夢。整個世界——尤其是黃金的美國——現時都正在經歷一個偉大的「革命」，如果我們把革命認為是社會的內部變革，而不僅僅限於政治形態的突變。這個偉大的「革命」——現時的世界經濟危機——可以說全世界的人類都一致的參加。自然有自覺的與非自覺的及直接的與間接的參加之別。這個革命雖然不是以武力暴動的形式展開出來，却是牠之影響於經濟結構及社會組織——在日常生活及政治生活方面——特別是政治爭鬥方面有空前的威權與動力。

現時經濟危機的狀況，可以下述的簡單數字表示出來：

一、失業工人數目（大部份據日本東京工商會議的調查）截至三月底止。

國別

失業人數（單位百萬）

美

六、〇五

德

四、七〇

英

二、七二

俄

一、一五

意

〇、八四二

日本

〇、三二二

法

〇、一

至於一九三〇年末對一九二九年末失業者之增加百分數如下：

（據英國帝國化學工業協會調查）

國別

一九三〇對一九二九失業增加百分數

美國

一四九 %

英國

七二

德國

四八

意大利

五五

加拿大

四九

澳洲聯邦

三一

因此失業工人，在各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均有顯著的增加。

二、物價的低落（據英帝國化學工業協會調查）

國別

物價下落百分數（一九三〇年對一九二九年）

美國

二六 %

英國

三三

日本

一八、三%（此數據Varga的報告）

法國

一五

德國

一一

意大利

一九

因此物價下落，還在繼續。生產底改善仍然無望。

三、生產力底降低（據Varga的報告）

工業生產力降低百分數（一九三〇年末對一九二八年）

國別	美國	德國	英國	加拿大
輸入量減少%	三二	二二	一五	一四
輸出量減少%	一六、三	二六、二	一八、五	六、四

四、對外貿易額底減少（據Vareg報告）

（一九三〇年對一九二九年）

國別	美國	日本	德國	英國	法國
輸入量減少%	三八、七	三三、五	二六、九	一六、二	六、四
輸出量減少%	二八、二	三四、一	一六、三	二六、二	一八、五

因此，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其對外貿易，無一不減少，特別是日本和美國所受的打擊最大。在上述四項簡單數字項下，我們可以概括的知道：在工業生產部門，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

『自然的』十分制限牠的生產；應該可以按供求的原則，叫商品的價格一天一天加高，使對外貿易——市場關係——狀況改善，使危機循環的一個環扣：由市場的沉滯狀態轉入市場旺盛的狀態——脫離了危機重新轉入『經常的』狀態。却是事實告訴我們是相反的：危機的狀況，依然在繼續中，這樣，我們不能進一步去推求現時世界經濟危機底核心問題。

2. 世界經濟危機中底核心問題——世界問題底核心

我們在本刊第二期上，有一篇短文：『世界經濟的危機與內戰中的中國』曾說及現時世界各理論經濟學家對於危機原因底爭論問題。這種爭論，因現時危機的擴大與加深而化。在我們的立場上，自然是承認『生產過剩』或『消費不足』（即工資增加率小於生產力增加率！）為危機發生的主因。這個主因，雖然是資本主義底內在性格，却是，如果我們在現實的意義上取否認的手段抹殺其他一切派生附屬的原因，那是不的當的。至於不深究牠的原因及其行程，惟高喊『世界革命萬歲！』那更不是實際政治負責者應取的態度。我們現在不是討論危機理論的問題，而是要說危機問題的核心。即說明現時世界政治問題底要點。所以現在，我們應該把世界經濟當中促成或增進危機的因素，及與危機最有關係的問題簡單些敘述出來。不過是十二分的簡畧的罷了：

a. 農業的危機

農業危機的發動，起於美洲及澳洲等地，農業生產之『過度』的擴張（如果我們想到：在中

國每年要餓死近千萬人，各工業國家有許多人沒麵包吃，那當然不是過度生產了。）這些地方的廉價生產的農產品，已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一八七〇以後！）由美國開始向歐洲壓迫進去，使歐洲大陸各國不得不採取農業保護稅政策以防止歐洲以外國家農產品的競爭。却是在歐洲大戰時及戰後，均刺激着美洲——特別是南美——澳洲各地帶的農業國家以突飛的速度擴大他們的耕作範圍。同時，因為機器耕作的便利，使工作速度加大，科學設備的增加，使收成加多等原因，使全世界農產品的收穫在相對的及絕對的數量上都大大的加多。因此，農產品在市場經濟上的突然增加，以致價格大大低落。而農產品價格低落的狀況，其表現在世界農產品市場（主要的在美國及加拿大。）上的，一九三〇年比一九二九年之間其最大差：小麥價格低落了33%大麥低落了28%以上，玉蜀黍低落了25%其他如橡皮，糖，咖啡等工業原料及日用品價格亦無一不大跌特跌。這種農產品跌價的景況，當然為使農業國家經濟凋蔽及破產的原因。

我們知道：農民在全世界人口的比例數上佔大部——至少為30%——因此工業品消費市場是建築在農民身上（除亞洲一路份自給自足的原始經濟狀態以外）。現時因為農業危機除了地方性的以外，已被及於全世界從事農業生產的人民，所以工業品的消費力——購買力——自然要受大的影響。即使購買力的絕對數不減少，而在全人口的購買力百分數上必然要減少。因此，農業危機，可以很有力的影響并促進世界經濟的危機——特別是工業的危機。

一面有農產品價格降低的壓迫，（農產品價格與工業品價格比較，農產品價格低落更甚。）一面又因為城市人民生活標準的增高速度遠過於農業人民，引起農業工人的不滿而需要加高工資，因此農業經營者因為生產費用更加增高的緣故，不是改用機器，即無法繼續經營。因此，在農業部門上，資本主義顯然有集中及進展的現象，即：大資本經營的農業能繼續的存在與擴大，而中小規模的農業，必然轉入崩潰與衰敗的途程。農業工人，因為合理化的緣故，更加向城市集中，為失業的後備，壓迫城市工人的生活標準。這樣：農業的危機就直接增大及促進工業的危機。這種傾向，在美國是直接親身承受的苦楚；在東歐南歐南美洲澳洲及亞洲大部份國家中，這種危機的擴大，可以威脅世界資本主義的本身。

b. 銀價低落問題

差不多與此次世界經濟危機發生，同時，發生了銀價低落的事實。銀價為什麼低落呢？當然是有經濟的原因和政治的原因存在：經濟的是因為銀生產——特別是副產物的銀——的數量超過了用銀市場的需要；政治的原因是因為由銀本位改為金本位的國家大大的增多（如印度，安南）因此需要減少，同時新改命本位而原日用銀的國家，亦行銀傾銷政策（特別是印度）使銀更充斥於市場。並且有些用銀的國家（中國）因為內亂及農村經濟破產的緣故，商品流通的行程加長，而交換經濟的範圍縮小，使平均每人祇佔小量的銀貨也表面像『過剩』的集中於少數的城市

(如上海!)；更加以高利貸者的投機，與對外貿易的逆差等等都是使銀價低落的原因。銀價低落，在理論上本來應該不能影響於其他商品底交換價值及人民的生活標準；却是因為以銀計算的。「工資」及「所得」的國家，因受政治力量的壓迫使大多數人民的生活標準不能適應於物價的高漲(照銀計算)而得到相對的保持——即照銀計加高薪水!——，又因為經濟上，處在貿易逆差地位的國家，不能在國際上保持交換的均衡，致使逆差之數不能以生產品出口為抵償之具。(在以80%以上的農產品為出口商品的中國，受農業危機的影響更加促進此逆差的加大。)因此，銀價低落之後，內亂中的中國人民生活，相應於銀價低落的程度而降低。有廣大人民的中國，牠的生活程度降低，可直接打擊世界經濟市場是顯然易見的事。

銀價低落，不但因為用銀國家購買力減低緣故，使世界經濟危機增大，而且認為銀價低落無定，影響到市場經濟的安定問題。使交換經濟底最重要因素——商品流通行程底秩序發生妨礙，即間接影響到生產的機能。不僅是中國，即一切與中國相類的國家——或與用銀有關的國家，如印度，南洋羣島等——均在此種搖動不安的狀況中。所以穩定銀價或救濟銀價的問題，在有遠見的領導的資本主義國家看來，的確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在世界經濟危機中，更是一個核心問題。

c. 擴大世界市場問題

資本主義，好像是一個「長頸鵝」鄉裏俗語說：「長頸鵝，食穀多，一邊吃，一邊荷」！資本主義一天存在，便沒有市場充足的時分。因為什麼？因為主義內在性格永遠是求利潤。求利潤必須擴大生產力；因為利潤率有降低的傾向，更須加速度的去擴大生產力。生產擴大之後，一面爲出賣商品起見必須找適應的市場，一面因爲工人生活底不滿必然會爲增加工資而鬥爭。鬥爭的結果往往是加工資；而加工資的結果會減少了資本家底利潤，又必須擴大生產以爲補償。生產再擴大之後更需擴大市場。工資增加率永遠比生產力增加爲小，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內市場在發展到某種限度以後永遠是相對的縮減。敵手方及殖民地商品之出現於世界市場，又爲某個資本主義國家底國外市場日益狹隘的原因。市場底永遠不足，實爲資本主義的本質。不過，市場底永遠不足，是內在性的問題。却是市場底無法擴張，是資本主義發展到某種一定的限度以後才會成爲事實的。在週期的危機中，如果能得到新的市場，能擴大市場的容量，則危機的一時解救是可能的。在這個觀點上面去說現時資本主義脫離危機市場問題。

在現時，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因爲生產擴大，市場狹隘的原因，發生危機。資本主義要避免危機及救濟危機只有從如下的兩方面着手：第一，國內市場底安定與擴大；第二，國際市場——主要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底地方——底安定及擴大。因爲要安定及擴大國內外的市場，所以各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政治問題在現時的經濟危機中起了極大的內變。

現時世界各主要資本主義及落後國家底關稅壁壘比歐洲大戰以前更高，是一件極顯著的事實。這種事實祇有證明自由貿易及自由競爭的時期，在歐美各主要國家中已經過去。本來，在理論經濟學上，自由貿易的原則，似乎可以永遠適用於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而不至發生障害；但是，一方面因為資本主義還未曾成功（并且不會成功）一個自動的有機的結構底統一體（如一個國家中的國民經濟）使在統一體內發生自動的調整作用，他方面又因為落後的後起的——如中國及印度——國家底反抗，所以資本主義國家底相互衝突及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底衝突就以關稅壁壘相互的加高為戰鬥的武器而自由競爭的原則就變或政治掠奪與併合。使用關稅壁壘底武器在這個資本主義國家本身的觀點上看是不得已的辦法：「除非一切別的國家關稅壁壘都撤廢了，不然我們是無法撤廢或減低的！」或者：「我們的產業和別的國家狀況不同，非加以保護不可！」這些就是歐美各主要國家統治者的底口頭禪，差不多每天都可以聽着他們自辯或對罵。這些也就是「國民經濟」比「世界經濟」在現時這個階段所以更重要的原因，而且為白里安（法內閣外交部長）的「歐聯計劃」必然要失敗的總原因。

因為各主要國家關稅壁壘的不斷加高——特別是美國——已使相當發達了！的世界經濟有向後倒退至十七八世紀「重商主義」時期的狀況，甚至於有倒退到封建時代領國主義的自給自足經

濟趨勢。因此高度發展了的生產技術，特別是高度發展了的工業國家，受了很大的限制。這就是牽涉到市場的關稅壁壘問題所以成爲危機核心問題之一底緣故。怎樣去解決這個問題？這是資本主義本身應該解決的一個問題！究竟能解決嗎？這是我們所要論究的。

e. 德國賠款問題

大家都知道，歐洲大戰後戰敗國所「應」負的賠償責任，差不多完全由德國單獨負擔起來。自「楊格會議」以後，賠償的數目現時每年平均約要二十萬萬馬克（現時合中國二十萬萬有奇）。這大宗的款項表面上是付於從前的協約國，而實際除一部由法國及意大利等國收用以外，大部都間接轉入美國手裏。美國一方面用關稅政策關係作牠的大門，一面又打開荷包，接收一切國家的現款，這是和德國賠款問題有關而引起美國金元過剩病——飽食病即美國經濟危機的一個病因。

其次，我們要問：德國應付的賠款從那裏取來的呢？當然，在「私經濟」上是十二分的加重了人民的壓榨，而在「國民經濟」上祇有取價於大量的商品輸出超過。怎樣才能使商品輸出有大量的超過額呢？自然「合理化」是唯一的方法；而「合理化」中底增高生產能率及減輕成本——特別是相對的減少工資——爲雙管齊下的手段。這樣，就使德國商品之在世界市場，相對的一年比一年擴大。在一九三十年的結算，輸出超過一十六萬四千三百萬馬克，雖然還不能完全以此補償賠款的總數，却是在輸出商品中之工業製成品（對原料及半製品而言）數量已經超過了英國的，

甚至超過了美國的。這種狀況，一方面自然是德國資本家底（因禍得福），他方面又是廣大的世界經濟危機促成的因素。因爲什麼？因爲一方面德國本身合理化的結果生出五百萬的失業工人——自然，一半是因爲合理化，一半因爲世界市場底一齊縮小，不過兩者是互相關聯的——促成社會及政治的騷亂不安；一方面更因爲德國市場的相對擴大，侵佔了英國及美國等國底內外市場，使德國以外底資本主義市場大大的縮小，因此而促成或擴大其他各國底經濟危機。

所以關於德國賠款的問題是一幕資本主義的悲劇：免除或減少德國賠款的負擔，則一切與賠款直接有關的受益人——如法，意，美等——因爲受了眼前的大損失而必然的要反對；而且他們恐怕德國在賠款免除減少之後，更加有侵奪世界市場能力，更須加以「裁制」，所以免除固是難於做到，即減少也是問題的。如果照常負擔下去，則擴大及加深了德國本身內部的危機，而且也加大了世界經濟的危機。慕索里尼的修改凡爾賽和約的提案，動機是在抗法聯德，是意大利的自私政策；却是問題是世界的。這個問題怎樣了結呢？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重大事件，更是世界經濟危機中底重要問題。

f. 蘇聯領域內外底市場問題

本來「社會主義經濟是無市場的」，這個概念，至少是一般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信仰的。却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生產品取如何的形式，被分配於社會成員底問題，即社會主義社會底社會

形態問題，不但其現時庸俗的後輩（Epigones）中缺乏明確的了解，即在那些天才的開宗者心目中，似乎也還缺乏深刻的認識與描畫。如果，我們同意於「社會主義經濟是無市場的」底前提，則現時的蘇聯國家，一面因為需要對外貿易的緣故加入了國際的市場關係；一面更因為現時國內生產力底薄弱與分配機關不健全，國內到處都形成了市場；那我們就不能不說：現時蘇聯的經濟，無論對內對外，都還只是在國家資本主義底階段。國家資本主義的構成，無論在內容及外延上都不能完全脫去了資本主義底實質，雖然大部剩餘價值底收受者不是資本家個人而是集體的國家。這是蘇聯經濟結構底本質。

在這樣的本質上底蘇聯經濟，自然和現時的世界經濟還是息息相關。

並且我們還要進一步說：現時的蘇聯經濟，一方面固然是促成世界經濟危機底動因之一，他方面又是最近的將來穩定世界經濟底鑰匙之一。爲什麼？我們試檢查一下蘇聯的對外貿易狀態：

第一，輕工業品底輸入，雖然在國內人民消費極端節約的狀態及遞減的傾向下逐漸的可由國內供給（一部份的「有餘」狀態（所謂傾銷問題）是政治的非經濟的。），却是還不是完全可以自給。

第二，重工業品——特別是生產工具部門——底輸入，是一種經常的而且佔入品中底主要成份。現時蘇聯自己雖拚命的着眼於「生產工具」生產，却是在最近時期內還未必能做到。

我們試把著名的蘇聯自己決定的「五年計劃」（一九二八——一九三三）去估量蘇聯經濟與

世界市場底關係：

輸出品，預定由一九二七年度（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之七萬萬七千四百萬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二年度（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之二十萬萬四千七百萬盧布，即增加了一六五%。而且預計五年之間輸出品的總價格約有七十萬萬！并且輸出品中之農業產品預期由四九·五%增至五〇·五%；工業產品（森林鑛業，食品及其附屬工業等在內）預期由五〇·六%降至四九·五%。

輸入品，預定由一九二七年度（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之九萬萬四千五百萬盧布增加到一九三二年度（一九三二——一九三三）之十七萬萬〇五百萬盧布，即增加了八〇%。而且預計五年間輸入品的總價格約為六十二萬萬盧布。并且輸入品中之生產用貨品（工業底運輸業設備，原料，半製品，農業必需品等）預計於五年內由一九二七年度之八四·三%降至七四·七%；純消費用貨品（一般消費品，衛生品，底文化必需品）由一五·一%增至一六·五%。

現在，我們就該概括的對於蘇聯國家經濟與世界市場底關係，下一個斷語：

蘇聯經濟對於世界市場底擴大作用，——如果五年計劃不受特殊意料外的障礙——比任何其他國家還大。因為除蘇聯以外，中國人民的消費力（即與輸入貿易有關的）對於世界貿易的影響至多於五年之內祇能由每年十五萬萬元增加到三十萬萬元左右，（現 每個金盧布約值中國二

元)在輸入貿易的比較上，當然比蘇聯的吸收力還小，而且還未能担保五年之內，在中國能有上述假定的順利進展。雖然蘇聯的輸出增加比輸入增加還大，却是輸出品中的工業品在最近的將來還不能和高度發展的工業國競爭，這是事實。所以蘇聯的國內市場底擴大，是有益於資本主義國家的；而其輸出品增加，在客觀上祇會衝入落後的國家中(如中國)並且會增加世界各國的關稅障壁。

我們上述的判斷，並不是虛構的，是十分實在的。蘇聯的市場，已是世界經濟——當然主要的是資本主義的——底尾閘，而且蘇聯是自覺的要做成資本主義的尾閘。所以在現時資本主義的政府一面大叫「紅色帝國主義」的危險準備戰爭，一方面却十分親切地接二連三的到蘇聯國內去講究推銷商品底信用借貸的方法(特別是英美德三國)。

怎麼樣去爭奪蘇聯市場，實在是現時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消極的解除經濟危機，而積極的「繁榮」世界經濟的核心問題之一。

一一 國際形勢底前途

我們在上面敘述了幾個現時世界經濟危機中底核心問題。現在我們要結論那些核心問題底解

決法——即資本主義解救自己的方法及其可能。

我們根據上面的敘述，即可以大概得到一些見解：第一，資本主義在歐洲雖然好像已經達到一種「成熟」的狀態（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謂末期——第三期的狀態），却是分立的國民經濟（無論是資本主義的或蘇聯的）始終是規定世界經濟底核心力量。因此，所謂資本主義底危機及其自救底問題，毋寧是各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自身底問題。資本主義到現在，即在歐美的主要國家中，還未曾達到成熟的狀態，因為牠——資本主義——在客觀的條件及主觀的心理——資本主義代表統治者及心理——形態中，都還未十分感覺到構成一個統一有機體的可能與必要。因此，對於農業危機及救濟問題，銀價穩定問題，關稅壁壘消除問題，減少或免除德國賠款問題等等：一切應有整個的世界規劃才能解決的事件，都還只有片斷的插說（Epiodot）而缺乏系統的設計及執行力量。國際聯盟及白里安的「歐聯運動」，雖然帶着強烈的資本主義統一性，却是因為國民經濟的活力與自存的要求，始終勝過世界經濟之連繫，所以不能不成為一種臆說，或官僚的機關。

怎樣去解決——或部分的解決農業的危機呢？在現時我們祇看見下述的可能：在「自由競爭」的原則上，農業部門消極的自行限定生產力，積極的張大城市及其他落後國家人民底農產品消費力。同時，各工業國與農業國當中，重新行一種國際的分工（即工業與農業，及農業中各種

專業部門——如絲茶與小麥棉花底分佈等），使生產組織底合理化一步一步的進行。但是這種合理化的工作，不能希望由各國的聯合來進行（詳上）。現時正在羅馬舉行的國際穀物會議，也恐怕說的多過實行。因此，農業危機底解救，只有在盲目的自由競爭底狀態下使每個國家內的大資本的高度企業得到勝利，大多數的中農及小農，會不可避免的被現時的危機犧牲了去。同時，有組織的；工業國家中 表農業利益底成份，必然會主張比較長久些使用農業保護稅的方法，因此，而自給自足底狀態繼續下去。

怎樣去穩定銀價呢？現時銀價所以動搖及低落的緣故，主要在於生產方面底失調底存銀囤底拋銷政策，更由於中國政治的不安，所以銀生產方面底統制者——美國——及拋銷方面底印度統治者——英國——是否能聯合，是解決這問題底前提。現在美國的銀拋銷政策——所謂對中國借款問題——已因種種的牽制。主要的當然是英日，而不能實施，即使實施，恐怕更增加銀價的低落與動搖。而且中國的資本主義秩序絕不是短期間所能建立起來的。所以用政治的方法去解決銀價問題，似乎已經無望。結果仍然是殘酷的「自由競爭」定律在盲目的行使其威權。中國如果還在內亂期間，那銀價的穩定似乎是無法測度的事。如果一旦中國建立出一個經濟秩序——無論為資本主義的或非資本主義的——出來，則即使金本位的施行一時未能成為事實，却是，只要銀生產方面有相當的調節，則用銀的國家底工資及其他國民所得——形式上也須適應於銀價低落的程度

而增加。就是說，對於用銀國底人民購買力不會有多大的影響。而銀的需要就比較的能測度。才
能使銀價穩定。

因此關於銀價穩定的問題，如果中國在最近的將來，不能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秩序，這個問題
恐怕是不能解決。

怎樣去解決德國賠款問題呢？這個問題終究解決的困難和不可能既如前述。却是一面德國有
延期付款(Moratorium)的提案，一方面美英法各國也分別有重新「清理戰債」(特別對美的債
務)的空氣。所以問題的要點不在賠款底完全免除，而在是否在某種形勢中可以減少及延期付償
的問題。照現時的形勢說，如果世界經濟的危機不更加深刻化，足以危害「整個資本主義」底存
在，則問題不會有如何的解決。如果危害的局勢到來，延期付償「清理」都是可能的。這種形勢
決不能有利於解救目前的危機。

怎樣去解決市場擴大問題呢？現時資本主義國家，解決這個問題底着眼點已如前述，却是軸
的前途如何是要看「國際聯盟」的權力能有如何的發展及東方各國政治前途。現時國際聯盟的權力，
也似白里安的「歐聯運動」一樣的空虛，所以歐洲各國間底關稅障壁及其他妨害「國際的經濟分
工」底障礙，只有消極的在危機十二分擴大時才有相當的辦法。現時市場擴大前途，最有把握的
只有兩個：蘇聯需要底增加。及資本主義國家中以加高工資降低利潤的方法去擴大國內市場。此

外東方政治的局勢，除印度因自治運動已有相當的成熟，在最近將來消極的不至於妨害國際市場以外，在廣大的中國，對於國際市場的貢獻是不大的，雖然作用是不小。所以市場問題底解決，主要的仍是依自由奪取——自由競爭，不過是以一國為單位罷了！——的手段。如過去的週期危機底行程一樣，由危機的極度轉到新需要底增加，作危機過度之後得到新的「好景」。整個的計劃是不會有的。亞洲南美洲及東南的各國，在政治比較安定底農業危機得到相當救濟以後，總計起來自然是一個很廣大而有期的市場，却是甚麼時候才能安定底農業危機過去呢？這是現時不能決定的問題。

現時德奧的關稅聯盟問題已經引起很大的波動。這個問題的動盪雖然是政治，而核心所在仍然是經濟的，即市場的問題。

英國保守黨的分裂運動及工黨的內潰，主要的原因仍然是解決英國市場底爭論。

美國共和黨——現時執政的——權威底失墜與民主黨勢力底復興，特別是極端派運動底開展也是經濟危機所引起，即是國內外的市場問題底反應。

日本民政黨所以能相當的鎮壓政友會底打擊，也是因為日本在目前底階段，政友會的積極干涉中國的政策比較民政黨「溫和的」經濟發展政策更足以增加日本的危機。

在這種種的國際形勢當中，我們應該綜合起來做一個結論：

世界經濟危機終止時期現時雖然還看不見端倪，却是我們可以作如下的判斷：

一、現時的世界經濟危機不足以引起所謂世界第二次的大戰。

二、國民經濟——或國家經濟——的穩健發展及「合理化」，為歐美進步的資本主義國家所
要依循的途徑；特別是落後的東方國家及其他農業國家——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國家，
更因為國民生活要求底昂進，必然會從今以後形成或提高各國國民經濟底機能與活力，
以參加及提高國際的經濟生活。因此國民經濟，還是最近將來的經濟生活底核心。

三、今後國際政治的有力的三因素：各帝國主義國家，蘇聯及各新興的民族國家——如印度
及中國——會有一個時期并行的向外發展。

在上述的三個判斷上面，我們自然要認為：所謂「世界第二次大戰」的立時爆發問題，不是
主觀的願望與宣傳，便是和事實相遠底臆說。並且我們要進一步說：即使因為某種意料外的條件
大戰爆發起來，也還不過是以歐洲為中心的問題。並且，照現時歐洲內部的社會力量分野來說，
大戰即使起來，也不過促成歐洲各國政治底左傾。在東方各國，平民的民族獨立自決運動，一方面
雖有大大的失敗，一方面在潛伏勢力中却有顯著的進步，不過還未曾判定最後的結局。但是，我
們可以說：最近的將來是有利於東方各國底平民革命運動的，無論大戰爆發與否。而東方各國底
平民革命運動，實為在現時的世界形勢中不可避免的帶有必然性的世界推進底一種特殊動力。

三 中國本國的形勢

1. 中國農村經濟底繼續崩潰

兩三年來的中國國民經濟，從出入口貨的價格上看，雖然像有顯著的進步；却是這種貨價的增加，並不是表示中國經濟生產力的高昂和人民平均的生活改善。毋庸是相反的：第一，因為銀價的低落，一切貨價均用銀幣計算，自然覺得十分的加多；如果用金價換算是相反的。第二，因為在世界經濟危機發生以前，貨價（以金計算）比從前數年為高所以即使以金值換算的貨價覺得增多，而貨量則甚至兩年來有日就減少的傾向。這就說明人民的生活并未會改善而且降低。

第三、中國的出口貨，並不是在「以有餘易不足」的——自由貿易原則——狀態下輸出到國外去，而甯是官僚軍閥及各大商業家以政治的力量（如租稅及高利貸），以欺騙方法及獨占的形式（即不等價交換）去掠奪農民生產品，再將此種掠奪得來的農民生產品，輸出國外，為官僚軍閥大商業家們償付高度的奢華消費及行高利貸的資本積蓄（祇上海一地積存現款已數萬萬，當然都是掠奪農村底剩餘）底方法。所以雖然中國的出口貨貿易能繼續保持或有若干的增加，並不是中國農村生產力增加的結果（除東三省以外）而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及城市平民在高

度的政治剝削及商業資本剝削下面飢餓死亡底結果。再就入口貨的部門說，一方面糧食部門有急劇的增加，這是農村破產底顯著徵候；一方面城市消費品（如汽車汽油紙烟人造絲及其他高等消費品）底增加，表示城市中寄生剝削者底增多。這是就出入貿易上判斷農村經濟底狀況。

在農村生產方面，一九三〇年雖然是世界的大豐年，却是中國情形却十分衰落。現在分述在下面：

如西北地區，則因水利設備的完全荒廢，（最近陝西的「引涇」工作雖在進行而能得到灌溉的利益的甚少。河套一帶的灌溉設備是由有義氣的土匪經營者。却是區域也不大）及鴉片白丸毒害底加甚，土地耕種底面積生產力均有顯著的衰退，而軍事徭役及徵發的增加無已，使人民生活標準大大的降低。再加以蒙古方面貿易為蘇聯所獨佔，中國西北部的商品市場受着莫大的打擊。因此西北各省的農村秩序完全崩壞。甘肅省內的回漢種族鬥爭，陝西的餓殍，山西緩遠的兵變等無不表示出農村經濟的沒落。天津海關的稅收減少，為必然的結果。

如長江各省——特別是中部及西部——本來是中國農村經濟的重心；但是一方面政治剝削無限的增加，一方面年來農村秩序差不多大部破壞，商業資本活動的範圍大大的減小。集中於城市的高利資本，除以投機獨佔的形式行慘的掠奪外，完全凝固於銀行錢莊內面，農村金融來源完全斷絕。這種狀況，必然更加大農村破產底速度。新破產的及早經破產而久離生產行程底流氓

無產者，當然一天比一天積累起來，因此使農村暴動底形勢更加順利。中流以上的農村社會成份，現時已完全離開了土地，離開了生產的機能，集中到城市市場中來，增加寄生剝削的成份，使城市的生產機能減低，使城市剝削農村的程度增高。更增加這個地區的農村潰滅底速度。

如西南各省——以廣東爲主要省份——本來是商業資本統治最顯著的地區。除廣東以外，其廣西雲南貴州三省，本在極幼稚的農業階段，本來人民的生活已甚低下。近年以來，在反動軍閥的統治下面，政治的搜括與商業的搜括並行，特別是鴉片與賭博的間接掠奪農民，爲使農村經濟崩潰的利器。絲業因世界市場的狹小及日本的競爭大部破產，因此而最富厚的商業資本地區——廣東珠江三角洲——他不得不衰頹，因此更促進農村的破毀。南洋及其他世界各地的華僑往時每年匯本國的工資，本來爲補償中國輸入超過的重要成份，却是現時一方面因爲世界經濟危機之波及，一方面更因爲帝國主義者的排外，使大多數的僑工及小商人完全無法生存，結果不能不逃荒而回到原籍——主要的是兩廣及福建——裏去，增加了流氓無產者的數量及城市的寄生人。這種事件，當然也是促成農村崩潰的因素。西南各省在這種狀態下，行着農村破產的進程。

我們現在試更進一步去檢查東南及東北二地區的農村狀況：

東南之江浙二省，經濟上早已成爲中國重要地區（特別是自明末以來）。資本主義的規模在此二省最爲明顯。照理，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雖然城市的工業受益最多，却是農業經濟也應該

得到相當的益處（土地價格的增加，差額地租的相對加大，農業工人工資的加多，農業過剩人口的減少等）；却是因為現時東南的資本主義雖已被統制於金融資本，而大部份的經營狀態及其結構尚離不了前期資本主義的素質。居統制地位的金融資本，主要是高利貸資本，而不是生產資本，所以不是近代資本主義的。商業資本的作用在東南還佔主要的地位。再加以現時南京統治下面的財政政策，一切租稅及公債的取給，雖然都以間接稅的形式取之於城市而不取諸農村；却是間接稅的轉嫁，一切都大部份負擔在農民——一部負擔在城市消費者身上。事實上，現時南京統治底貪污與揮霍為空前的，這種空前的揮霍與官僚軍閥的搜括，都是取之於農村。也可以說，反動南京統治是建立在江浙兩省的農民剝削上面。雖然牠的政權是限於城市。因此，牠必須用間接稅方法以剝削農村；其次，東南的絲業已受世界工業危機及日本競爭的影響先後破產，而農村的豐收又受世界農業危機的打擊，不得不和國外廉價的農產品競爭，結果農民的收入也大大的減少，這些一切，都已經可以充分的說明工商業最發達的東南地區底農村破產狀況。前期資本主義時代的農村，在歷史上最受打擊的時期；却是困苦艱難慘酷的狀況，在今日的江浙二省實比十六世紀的歐洲各國農村為甚。

現在剩下的，只有東北地區：

就最近的東北地區經濟狀況說，大家都會以為，東北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現

時已成爲中國的黃金區域，成爲中國本部人民的避難所。因爲：東北三省佔有全國80%以上的鐵路線長；土地的分配，每人平均比本部各省大過六倍以上；佔中國出口貨第一位（約爲全國出口貨總數30%）的荳類完全由東三省出產；土地的肥沃；重工業原料的豐富；農業繁殖容量的偉大；一般的經濟組織底近代化（如銀行、交易所、保險、倉庫、運輸及農業生產機械化等）；每年客留內地十萬以上的移民（每年由內地移到東三省的約三十萬，却有二十萬是春去秋回的）；農業工人生活比河北山東二省高三倍（東三省僱農平均每人每年工資百元，河北山東二省約三十元）；工廠工人及手工業工人的生活，平均比東南工業區高二倍（東三省新式工廠工人工資約爲每月三十元，而上海爲十二元；東北的手工業工人每月工資約爲二〇元，而上海約爲一〇元）；而且現時國際的投資（特別是日本）正在十分踴躍的增加，政治的秩序又從未會破壞；這些簡單的敘述及數目字都足以證明東三省現時的經濟機能與地位已在全國任何區域之上。

却是我們如果詳細些，深入些——特別就去年秋到現在的狀況來觀察一下，就會得到相異的結論，至少在農村經濟的觀點上會非常的驚訝：

現時的東北農村經濟，也已進入於崩潰的程途。爲什麼？待我們簡單敘述出來：

東北三省的富源，在於農產品的豐富。而荳類及麥類的輸出——特別是荳類——尤爲一切收入的基礎。因爲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爲荳類主要銷場的日本及英、德、荷蘭等國——特別是日

本——均不能不減縮生產的範圍及節約生產投資。因此而荳類的銷場受着莫大的打擊。同時因爲農業危機的擴大及延長，一切農產品都大大的跌價（詳上國際欄）因此二事：第一，市場的縮小；第二，產品價格的減低！使東三省的主要輸出量大大的降低，輸出品價格大大的減少，因此而使農民收入受着莫大的打擊。據統計：（中東經濟月刊七卷一號山陽君的計算）一九三〇的東三省特產（豆麥及木材毛皮等）的輸出總價，以金元計算比一九一九年減少三分之一，以哈洋銀元計算則減少二萬四千萬元以上，而今年度（一九三一）的預測，因爲豆麥等特產品的市價現時比一九三〇年度上半年期又低落了三分之一以上，因此本年度輸出品品的總價又須比一九三〇年度減少三分之一以上；即以哈洋銀元計算，本年度的輸出總價會減少一萬三千萬元左右。本年度比一九二九年度則共減少約哈洋五萬萬元。而因世界市場的停滯，一九三〇年糧食（豆與雜糧合計）積在東三省未能輸出者約五十萬噸，而今年（一九三一）的積存將更多，因爲一方面比較的豐收，一方面市場的吸收將更小。

這兩年來五萬萬元哈洋的短收，實爲現時東三省農村破產的第一個重要因素。其次則爲東三省政府的財政剝削。東三省的政權雖比較的穩定，却是因爲政權完全是在高利商人及地主手上，所以一切的剝削一方面在私人方面是透過商業及農業的經營，而在「公」（政治）的方面則租稅及不兌換紙幣的剝削實爲重要的手段。因此，東三省有秩序的（穩定

的)剝削并不比南方「無政府的」剝削爲小。我們現在舉幾個實例：在租稅一面，平均每畝二角的田賦雖然比較內地爲輕，却是一切駐防軍隊的徵發及貢賦，都是無價的(這是封建時代)取之於農村。每次戰事發生(特別在張作霖被炸死的前後)臨時戰費的抽剝也爲數不少。而尤爲利害的是不兌換紙幣的剝削。奉天官票(奉票)過去之剝削人民，已爲甚著名的事實。現時雖然已名義上以法定價格(六十元奉票值一元大洋)穩定；却是新紙幣(官銀號及殖邊的大洋券)的基礎一樣的未曾穩固，將來隨時有低落的可能。其吉林的吉帖與黑龍江的江帖現時還在以加速度跌價的行程，散佈在農村中(官場用種種方法欺騙農民，致落後的農村只好受用落價的不兌換紙幣，而不能得到其他貨幣!)此種在二省發行的不兌換紙幣，牠的增發速度比落價的速度還快，因此農民的生產品以通貨膨脹(Inflation)的形式，被大商家及政府無價的掠奪了去。一切企業，無論爲農業及工商業(特別是錢莊、糧棧、油坊、當舖等等)均爲極少數的官僚及高利商業資本家所經營。他們佔有了一切，操縱了一切，剝奪了一切。(在吉林，有一句流行的話：「除了剃頭店以外，水衙官錢號都經營了!」)所謂官營企業，實際也只是在極少數的官僚軍閥商業資本家手中，絕不是普通所謂公營企業或國家企業的性质。

這是租稅、徭役、不兌換紙幣等等的剝削。形成東三省農村經濟崩壞的又一個因素。

上述他兩個因素：其一是經濟的——特別是國際經濟的原因；其二是政治的，是使所謂中國

的黃金區域由極盛到衰頹，僅農村經濟崩壞的主因。

現時崩壞的程度雖尚不至於如長江及南部各區，但是潛伏的危機到處都很大：金融來源幾於斷絕，使農村的生產資本無法得到，農民的購買力完全消失。使商業陷於停頓的狀態。高利的借貸（平均年利由5%到10%是普通的）無法償還，土地的價格大大的低落。這個行程，一面促成所謂鬻匪的增多，一面更促成富豪兼井的機會（本來東三省的農業經營已是大地主的）而使自耕農及小地主無法生存。

本來東三省經濟及政治勢力的分野是以長春為樞軸，由日俄兩國平分。日本的勢力固是日增，而蘇聯的勢力也正圖恢復。現時，蘇聯正在利用銀價的低落及鐵路運輸方便的機會，以多量的「廉價」商品向滿洲一帶侵入。在現時農業危機的狀態下，日俄在中國的經濟鬭爭，必然會更加劇烈。這是所謂中國黃金地域——東三省的農村經濟崩潰的危機。

綜合以上的事實，我們可以下一個結論：

在前期資本主義時代的中國社會經濟。現時已在總崩潰總轉變的時期。農村的破產及危機，在全國各地區無一處不進行着或潛伏着。極少數都市的發展，只是由政治剝削及商業剝削所累積起來的結果，是蠶食的，寄生的，絕不是生產的。這種行程，雖然在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的歐洲

也會經過，但是區域之廣與現象之慘（每年餓死的以千萬計）在現時的中國是空前的。

2. 反動南京統治的對外關係。對內是專制，對外是屈服。只靠由英法德美日美各國的援助。

我們知道，完全和全國民眾作敵的南京統治，必然是一天一天的跑到最黑暗最殘酷的路上去。現時的反動南京統治根本和太平天國時期的滿清統治無殊。在這種形勢下的南京統治，牠的根本任務只有是順從帝國主義者的意圖去摧毀全國人民的生命，而叫全國人民的生機斷絕，還說甚麼外交？還有什麼外交的意義？却是南京粉飾太平的做作，雖然在對內政策上因其暴虐與無恥，完全露出馬脚，而牠還以為全國民眾可欺，想在外交上去粉飾牠的罪惡。南京政府成立以來到現在，除了利用武漢革命時期的餘威，得到了帝國主義相當的妥協以外，試問那一樣不是投降屈辱的，那一樣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去做的？

一九二七年南京砲擊事件本來是革命民衆與帝國主義者之爭。却是帝國主義者的砲火所殺傷的人民被焚的房屋，不但絲毫得不到損害的撫卹與賠償，而且現時還要對帝國主義者賠償與謝罪！日本出兵濟南及屠殺焚掠濟南事件，不但得不到絲毫的撫卹與賠償，而且得不到絲毫的保障，使以後這種事件不致於發生。

南京政府所最趾高氣揚，日日宣諸於口的就是所謂關稅自主。現時的關稅真是自主了嗎？

切新訂的各國關稅協定及商約，實際都是以所謂「互惠」，「最惠條款」的意義，欺騙人民，把

帝國主義者從前所享的特權，變相的繼承下去。（見行動第二期「南京政府的對外關係」一文）而且得到了所謂關稅自主以後開始了些甚麼呢？關稅自主真正意義本來應該在設法提高國內的生產力，使人民生活標準增高。却是現時南京政府利用所謂關稅自主的名義，除以實惠依然給帝國主義者以外，祇見到無理的增稅。這種增稅，絕不是保護本國的工農生產，祇是增加人民的負擔，減低人民的生活；祇是供南京「無底」的「揮霍」及「利誘」的「憑藉」。所以所謂關稅自主，對本國人民是一種無恥的欺騙與掠奪，對帝國主義者是變相的投降。

剩下的就是現時所謂取消領事裁判權的問題。這個問題和上述的關稅問題本來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中的華盛頓會議及以後的會議都已有相當的眉目。現時的狀況，決不比從前好了許多。所謂領事裁判權的取消，在南京統治期中，至多祇是因爲帝國主義者已經得到南京政府順從的保證，而加以相當的「恩惠」，絕不是站在人民平等的基礎上而行的交涉。因爲南京政府早已是中國人民的仇敵，帝國主義者是明白的。

現時中俄會議的前途究竟如何呢？

一九二九年的中俄（應該叫中蘇）戰役，實開千古兩國交戰的奇聞。交戰的雙方，都未具交戰的決心，而戰後的「議和會議」又始終懸而不決。甚至現時的會議，是「開而不會，會而不議」，先後停頓及一年而絲毫不辦，實千古的奇談！這個原因究竟在那裏？這個原因，一面在南

京政府的動搖，一面世界形勢的規定。讓我們說明在下面：

蘇聯的外交政策，在現實的條件下面，不能不對東方各國妥協。現時在西方受着嚴重的壓迫與包圍，不能不設法在東方得到後方安全的保障，所以牠一面極力與日本交接，一面又不能不與中國的統治者接洽。我們可以說：無論中國政權在任何人手裏，而蘇聯要向中國統治者接頭是必然的。

其次，南京統治底薄弱動搖而無力，是誰都知道的事。如果在現時動搖狀況下面，蘇聯立刻與南京締交，會得不到結果；而且蘇聯還希望局部的外交辦法，單獨的對統治者進行交涉，所以東北更不能不依違遲疑而有所待。

在這種奇特的中俄會議局勢中，我們可以看見：國際外交的情勢。同時更可以看見：蘇聯和南京統治開會言和的原因。

此外，南京政府與美國的血緣關係（這種血緣關係，由南京政府內的基督徒交接出來）已因借款問題的挫折而稍現疎遠，南京政府現時盡力和國際聯盟拉攏，企圖因此得到「金借款」，這當然是「騙子碰着光棍」！

南京政府現時對日本因蔣張聯立政權的關係，一天比一天的更加屈伏。

牠和英國的關係已日趨於冷淡，因為南京政府的統治底薄弱而無力已為英工黨政府所揭穿。

（見四月三日路透電，軍英外長韓得森的演辭：）

在我們分析了南京統治的對外關係以後，我們能得到甚麼結論呢？

南京統治在初行建立的時候，曾利用了武漢革命民衆的聲勢與權威，得到了相當的便利；却是現時相應於南京無能，相應於被民衆敵視程度底增加，一天一天的被帝國主義者統治底殘暴，貧劣所屈伏與奴視。精神上已變成十九世紀末期帝國主義者對滿清的狀態。

3. 南京統治能穩定嗎？

我們在本刊第三期上對於南京統治已經做了一次詳細的分析與估量。我們當時的結論大意是：南京統治是有穩定的可能；但是附帶於三個先決的條件：第一，各方反蔣勢力的處理能否順手；第二，帝國主義的借款能否得到；第三，能否解決農村暴動底勢力。這三個條件是靜的方面，而更重要的還是動的方面；在最近期間代表中國平民利益的革命行動能否起來，行積極的推動革命的工作。我們現在試順序的先去答覆那三個先決條件：

第一、北方反蔣的勢力：南京不但無法處理而且增加了不少反南京統治的勢力。我們看看閻錫山雖然已逃避大連，而山西軍政的處理依然還被其操縱。馮玉祥依然在山西境內組織部衆。韓石馬孫的聯盟形勢日益顯明。奉系首領雖然受制於客觀的條件（東北今年的經濟危機，見上）及主觀的懦弱，不能爲北方反蔣勢力所拉合，却是北方的大勢所趨，張學良個人亦不能反抗，而

且他也不願意對抗。而且奉系內的舊派與北方各系勢力均有淵源。所以北方的軍事勢力——是革命的還是反革命的當然是另一個問題——整個的看是反蔣的。雖然不能自動的爆發，却至少會響應附和「反南京統治的勢力」底起來。西南的反蔣勢力不但未減，而且在擴大中。廣東的反蔣勢力——如陳濟棠部——最近且公開的與桂系往來，時時有加入反蔣運動的可能。四川的內戰隨時可以牽動其他地區。長江一帶的雜牌隊伍，當然時時都有倒戈的可能。至於蔣「嫡系」的隊伍，落伍的則以分編不勻而抱怨，日見乖離；進步的則以南京政府事實上已成爲獨夫專政，祇有極露骨的欺騙與利用，稍有血性及革命歷史的份子都由容忍及痛心疾首的狀態轉入尋找革命出路而積極的決心反對南京統治的狀態。這種狀態不是平常的。所謂「嫡系」的隊伍如果一旦發生動搖，已經可以決定南京統治的運命。所以在反蔣及反南京統治的武力上說，南京統治方面是危險的。

第二，南京需要大批的外國借款是人人知道的事，南京政府的財政報告——當然是假造的成份居多，我們只要問一問蔣介石所用的秘密費開銷在那筆賬上就夠了！雖然極力的掩飾現時困難的狀況及借款的必需；却是照現時軍費及秘密費的浪費揮霍狀況來說，即便把上海高利貸資本以公債形式掃數取去，仍然是不過敷衍一時，而且事實上萬做不到。美國的銀借款已因日本的吃醋及英國的印度拋銷銀貨政策底對抗而不能成爲事實，國際聯盟的金借款更是癡人說夢。所以財政的後盾，南京絲毫不能得到。

第三、原始的農村暴動，本來是前期資本主義進展期常有的事。却是現時的農村暴動，而實在主要的是由於南京統治底橫暴與貪污所產生。南京統治現在已匯集一切最腐朽最反動的舊勢力而以赤裸裸剝削骨的方法對付人民，那必然要促進農村的破產，這是農村暴動的客觀條件。只有新起的——代表中國廣大平民羣衆利益，代表生產者利益的革命行動才能推翻反動的橫暴貪污的南京統治，南京政權口是製造成農村暴動的機關，所以牠之不能鎮壓農村暴動是必然的。

綜合起上面的答案，知道南京統治穩定的先決三條件實在無一已經具備。所以南京統治的動搖是可能的而目更是必然的，要救中國廣大平民於死所更是必要的。因這對於救國前途更

4. 現時中國各政黨的現狀

上面，我們只分析及答復了南京統治穩定底先決條件是否充分底問題。但是祇及於靜的方面。現時我們更要進一步去說明動的方面：

政黨的作用在於組織羣衆，奪取政權，實行黨的綱領——黨所代表的社會羣衆底利益。所以無論任何的政黨——革命的及反革命的——如果牠不是建築在單純腐朽的槍桿子上面——如現時的南京的蔣黨——那必須動員羣衆。所以凡是有羣衆作用的，就是說，不是個人的政黨，牠對於社會的作用都是有機的，動態的；在不斷的爭鬥程途中，鍛鍊黨目的鬥爭力量，發揮黨的鬥爭機

能——發揮社會的活力。中國社會雖然在現時世界中是很落後的，但是動的方面，其蘊蓄着社會活力正在一天比一天增加。所以現時我們必須剖析各種有組織的政團底現狀，以結論中國形勢的前途。

南京的官黨，現在已是執掌政權的，但是牠的組織，相應於現時中國經濟的破碎零落，相應於統治中國社會的上層寄生剝削份子的狀況，不但是已經失却動員羣衆的機能，而且內部的腐爛已經人人皆知的事。自胡漢民被扣後，南京官黨的黑幕也已經揭穿，赤裸裸的祇剩下蔣介石獨夫個人，站在他後面的只有利誘來的婢僕奴才。所以南京官黨早已失却革命政黨的資格。

改組派自從軍事投機失敗以後，已完全沒落，完全被羣衆所丟棄。因為牠既無理論的指導又只有投降勾串的行動。牠的沒落必然性，我們在行動第一，二，三期中已充分說出。現時更加證明我們分析的正確。殘留下來的上層份子所幹的甚麼擴大會議，至多不過是如過去政學系等的把戲，卑不足道。

國家主義派，該派的理論，只是歐洲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初葉的唾餘。他們對於中國經濟的結構十分模糊，對於社會進化的規律也未會夢到。所以他們不能了解中國問題及世界問題的全面，更說不到中國各種具體問題。國家主義派的活動基礎始終是一部份落後的青年及中年以上的智識份子。他們反映着將滅亡的下層士大夫的要求。牠的政治背景是最落後的軍閥。所以牠雖然

在各地學校中都有相當的組織，却是牠的前途只是替某種軍閥打先鋒，替將毀亡的士大夫找出路。說不上去解決中國問題。

四 中國形勢底前途

依據上面的敘述，中國農村經濟底崩潰正在全國各地區繼續進行着。反動的南京統治，在其對外及對內的關係上，消極的不能解免牠的危機，更不要說積極的無法解決人民的要求。最近南京欽定的『國民會議』（詳見行動第四期的論文）底表現，更加證明我們分析的正確：南京欽定的國民會議，實際會比袁世凱的約法會議及段祺瑞的善後會議更加無聊更加臭腐。因為這個欽定的國民會議完全只會是由敵對人民剝削人民的份子所集成，所以人民除了消極的『掩耳不聞』，『掩鼻而過』之外，只有積極的以革命行動反抗整個的反動統治，決不會對於那個『會議』有甚麼興趣。所以就客觀的經濟狀況及現時統治者底腐爛狀態看來，如果不是因為有突然的特殊的外力幫助，反動的南京統治，必然會更入於搖動狀態。却是在野的各政黨，因代表新的士大夫及一部份的軍閥，不配去解決中國問題；究竟中國問題怎樣的去解決，而且誰去解決？

五 我們的爭鬥路向

我們——革命的孫中山主義者底唯一責任在繼續中國革命，復興中國革命；而其目的在平民政權，實現社會主義。實現社會主義是我們最後的目的和理想，而解放中國民族，及建立平民政權則為現階段必須經過的工作途程。如果蔑視了或者拋棄了現階段的必須工作行程，則不但和客觀的事實相違而得不到結果，並且必然的要妨礙中國民族解放及平民解放的神聖要求。我們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在現階段的唯一責任在完成民族及平民解放的任務，因此我們要繼續及復興的革命就是民族的平民革命。只有民族自己可以解決及完成民族的要求；更只有平民大眾自己可以在民族革命行程中完成平民大眾的解放要求。我們反對國家主義派並不是反對牠國家獨立的要求，而是反對牠的社會基礎——反平民利益的社會成份——及其現時所依附的反動軍閥，更反對牠的主觀的侵略政策（這一點是蘇索利尼所擅長而和國家主義派相同的！）中國除非是永久動亂，永久分裂，如果不然，必然要在代表平民大眾利益及要求的本黨領導下面統一起來。而且本黨也已決心要完成上述的任務。

世界現時正由三種勢力支配着。如果蘇聯自己以為牠的存在與發展是由於帝國主義勢力的分

立與衝突。那我們所代表的被壓迫民族的勢力——特別是中國革命更是在蘇聯與帝國主義長期對立的矛盾中一種必然的存在與發展。蘇聯的存在與發展固然不會妨害中國革命及人民的解放；而革命的中國更不會妨害蘇聯的存在與發展。蘇聯與帝國主義會有比較長時期的對立——至少數十年——這是事實。而廣大的中國人民——佔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民族應該而且可以站起來進行解放的工作更是事實。英法美日各國的人員聚集在莫斯科，而由蘇業力與蘇聯揭穿無恥及無智的底黑幕，肅清其陰謀，推倒鮮血淋漓的民賊與獨夫，推翻南京統治，是革命的孫中山主義者天職，也就是本黨的歷史使命。

第一、本黨怎樣去解決中國的問題？

關於我們黨解決中國問題的具體方案——革命綱領——已經詳細說明於本黨的政治主張中並且屢次在本刊中申述。現時不必在此細說。

我們認為現時中國問題中底核心問題是：

第一、如何消極的救濟農村底繼續崩壞及積極的在新的經濟制度下提高農業生產力的問題。

我們以為流氓無產者底增加是由官僚軍閥高利貸者底統治。必定要推翻官僚軍閥高利貸者底統治——南京統治。反動的南京統治在政治上是造成流氓無產者暴動的犯罪人，而在經濟上

是障害農村生產力甚至空塞農村生產力的毒物。只要南京統治顛覆，則新的人民政權才可以進行新的農業經濟的建設。才可以肅清中古時代的農村生產法，進行科學合理化。而其過渡時期底第一步工作，在立刻解決農村耕地問題。（詳細辦法，詳本黨政治主張第一期行動）必定立刻解決農村耕地問題，才能使無地的農民得到耕地，耕地不足的農民，相對的得到充足的耕地，而寄生剝削的地主非自行勞力工作即須被懲罰。這樣才能使農村生產秩序在新的社會形態下面恢復起來。才能真正的解決農村中的矛盾，才能解決城市寄生的毒害。

第二、如何撲滅軍閥的根源底問題

我們以爲：撲滅軍閥底再生，只有廣大平民羣衆的覺醒及人民自己的武裝——平民革命軍底建立。

第三、如何去肅清傳統的官僚政治底問題。

我們以爲：要肅清傳統的官僚政治祇有喚起廣大的人民羣衆的政治意識，而由職業代表組織政權的方法。所以必須要 面用上述方法組成全國的中央政權，一面更組成各級的地方政權。

以上三事爲現時中國問題底核心，而其最具體的事項則有如下的事項：

我們的行動綱領：

一、推翻反動的南京統治。反對欽定御用的偽國民會議。

二·立刻召集真正由人民代表組成的國民會議，以接收全國的政權。

三·依照國民會議組成的原則，組成省民會議，市民會議，縣民會議，鄉民會議等地方政權機關，以接收各級地方政權。

四·立行由國民會議，宣佈無條件的撤廢一切不平等約條，收回租界。

五·立刻解決農民耕地問題，以耕地農有為原則。

六·立刻確定並實施勞動法案，保障生產者的工作及生活。

七·立刻撤廢一切苛捐雜稅，由國民會議重新訂定合理的稅率。

八·改訂各級公共機關服務人員的薪俸。以提高下級服務人員薪俸，降低上級服務人員薪俸為原則。增高警察及士兵的薪餉，並改良其待遇。保障一切公務人員的安心服務，不許由長官隨意任免。

九·沒收一切貪官污吏軍閥土豪劣紳的財產，將其按法治罪。釋放現時的政治犯。

十·由人民團體按額抽丁，組成人民的武力（平民革命軍）以消滅一切反革命的武裝。

本黨——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員會——已堅決的要履行革命的任務，要做到上述的條件。

全國革命民眾，應該大家一齊起來，一齊去推翻南京統治。推翻了南京統治才能掃除帝國主義的勢力，才能肅清軍閥官僚的毒害，才能解決人民生活的要求，才能建立人民的政權——平民政權，

才能消滅內戰得到永遠的和平。進行經濟的建設；由民族的完全解放達到社會主義之路。

全國革命軍，應於大舉一役以來，一齊北進，肅清南京路。肅清上海（完）

本系——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部 一九三一年四月三日稿

十、由人民團體發動，組織人民自衛隊，以抵禦一區內革命軍之進攻。

十一、對於一切有官職之軍閥士紳，應予撤職，其財產充公，以資救濟。

官制及軍制。

十二、取消警察及士紳之特權，其財產充公，其人員由工人充之，不准由士紳充之。

十三、地方自治公共機關，應由工人充之，其財產充公，其人員由工人充之，不准由士紳充之。

十四、立院選舉一區一區之代表，由工人充之，其財產充公，其人員由工人充之。

十五、立院選舉全國之代表，由工人充之，其財產充公，其人員由工人充之。

十六、立院選舉全國之代表，由工人充之，其財產充公，其人員由工人充之。

十七、立院選舉全國之代表，由工人充之，其財產充公，其人員由工人充之。

十八、立院選舉全國之代表，由工人充之，其財產充公，其人員由工人充之。

十九、立院選舉全國之代表，由工人充之，其財產充公，其人員由工人充之。

怎樣去復興中國革命——平民革命？

一 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及南京統治形成的過程

一·中國革命之史的回顧

二·一九二五——一七年的革命黃金時代

三·革命黃金時期的社會矛盾

四·革命黃金時期的人民武裝

五·革命領導的矛盾

六·南京反動統治形成的過程

二 復興中國革命的手段

一·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

二·革命運動中農工及商工業資本的作用

三·怎樣去發動革命？

四·怎樣去解決農民耕地問題？

五·怎樣去組織平民革命軍？

六·怎樣去肅清新舊士大夫的成份？

七·平民政權的特質

中國革命的前程

怎樣去復興中國革命——平民革命？

已經失敗了的中國革命——平民革命，在這四年來的奮鬥歷程中，却得着深入社會層裏的組織的進展。所以四年來革命很像是失敗，而在社會發展的機能上說，實在是一種進步。在一向無組織無認識的落後中國社會裏，那種潛行的發展更是一種空前的進步。

現在：一方，南京統治的腐朽無能已經牠在牠自己的沒落中表演出來；一方，表面上失敗了被壓在下面，而實際上有着潛行的發展的平民大眾，現在已經快要從地下攢出來，要接續了過去的工作，撫摩着他們自己的傷痕，踏着英勇的親愛的兄弟們的死屍枯骨，重新向黑暗貪污殘暴的統治進攻。

平民大眾的敵人是黑暗殘暴的南京統治，是帝國主義者。我們平民大眾的敵人，本來和從前的——四年以前——一樣，不過舊時的軍閥地主豪紳多穿了一件大套——南京統治。却是這件外套籠罩了包含了一切：舊時代的一切與帝國主義所遺贈底一切總和。

「被壓在地下的兄弟們囚徒們快要扒起來了，已經快要繼續他們的神聖工作——平民革命——了。這個工作對舊的說是復興革命，對將來說是創造新的社會。這是承先啓後的神聖工作。」

我們——受苦受難的平民同胞們——我們是要起來扒了，並且要堅決的扒起來，和鮮血淋漓殺人不眨眼的南京統治者決鬥。我們應該在決鬥之前有一個周詳的作戰計劃和情報的搜集。這樣，我們就要很簡單的了解過去革命失敗的原因，和將來我們應從事工作目標：

一 中國革命失敗的原因，及南京統治形成的過程

一、中國革命之史的回顧

自秦代以來酣睡了約二千年的中國民族，被官僚政治，被地主士大夫束縛麻醉了約二千年的中國人民，只有在朝代轉變期中行着不自覺的政治爭鬥。除此之外，大多數人民，都被統治者看

做馴服的牛羊，隨意的去牧宰看守。不自覺的與帝國爭鬥。領其亡也。大多數人只，認爲這可憐

明末，西歐的商業資本勃興，牠的波浪已經撒到中國來。基督教（當時是舊教）的文化（？）已經隨掠着地通商的船艦而侵入。中國東南的商業也跟着勃興擴大。明末東南學派（如黃宗羲顧亭林輩）的社會意識及政治已經帶着強烈的新興商業資本形態（民族的及民主的）的色彩。這種意識，以後和舶來原始的基督教義相結合，附麗於破產農民身上，構成了洪秀全所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這個運動表示了社會歷史空前的變化——從具有政治的新組織和新經濟政策來說——，却是因爲革命的社會基礎底鬆懈脆弱，而領導者意識的模糊，終敵不過帝國主義與民團的聯合襲擊。這是中國革命——有社會意識的革命——第一次的大失敗。失敗的結果是復古。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失敗，在：失却農民的基礎，而整個運動領導在失意的士大夫手中。失敗的結果也是復古。

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黃金時代

一九二五年復行開始的中國革命運動，已具有和以前不同的形勢：從認識上說。已經了解帝國主義與軍閥的罪惡，從組織上說，已經着手於發動廣大勞苦平民羣衆，因爲這種認識，這種組織都是「新式」的，在被壓迫剝削最甚的農工平民大眾面前是好像天降福音和簇新的武器，有了這種福音和武器自然可以大大的開展出爭鬥來。在新興買辦階級面前，因爲還不懂得組織的

機能和作用，另一方面也覺得封建軍閥妨害他們的發展，所以在革命運動的發軔期，表示着甚強烈的同情與贊助。復次：下層的軍閥，南方的小軍閥，因為在政治的轉變中，特別在軍事開展期中，可以擴大他們的勢力範圍，可以抬高他們支配政治的威力，所以對於南方革命運動也表示歡迎與熱望。這是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所謂「北伐」開始時南方各社會層的趨向。這些社會層的趨向及要求雖然是各別的；但是在對抗北洋軍閥改善自己生活環境的要求上是一致的。或者更可以說：因為各社會層要求及趨向的不一致，更要求「北伐」，以減少當中的對敵矛盾。這是一九二六年「北伐」出兵時的形勢。

「北伐」出兵以後，各社會層發生了甚麼變動呢？在後方根據地廣東，因為工人運動的開展對當地的買辦商業資本發生正面的衝突。這種衝突，買辦商業資本當然是要受損失的，却是那種損失，在對香港罷工及封鎖香港，開發黃埔港的行程上，有許多土著的商業資本得着非常的利潤，差不多可以補償過來。農民運動開始猛烈的發展。鄉村中開始了猛烈的鬥爭。這是在後方廣東根據地的狀況。

北伐軍一天一天的往前進。因為北伐軍所過的都是農業地區——湘，鄂，贛——當地的農民，也開始接受了新福音（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土劣，減租）及得到了新武器（農民本身的組織——農民協會）。因此而北伐軍到處得着人民的歡迎，因此北洋軍閥望風而潰，北

伐軍所向無敵。

「一九二六十月十日革命軍攻克武漢。不久革命軍又攻克南昌。北洋軍閥的中心吳佩孚孫傳芳先後崩潰。武漢南昌攻克以後，已形成民衆運動的炮台。特別在武漢，因為當地工商業有相當的基礎，而經濟及政治上又足以縮短長江各省，因此，在武漢的政權掩護下的民衆運動，自然可以推進并影響全中國的主要地區。當時情況是怎樣：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先後的組織起來。在城市中的工人及青年學生爲動力的機輪，鄉村中的農民也已開始搖撼地主政權的工作。革命羣衆的聲勢懾服了一切在城市及鄉村中的中上層成份，更懾服了一切當時服務於政府中的文武職員，叫他們不敢爲非作歹，叫他們不能不日夕辛勞，奔走不暇。人人心中都感覺着舊的一切的動搖新的一切要快到來。當然，上層份子要感到不安和恐怖。這是革命黃金時代的縮寫。

三、革命黃金時期的社會矛盾

每個革命——無論何種性質的——所以能成功的原因，在：第一，能動員廣大羣衆；第二，能集中廣大羣衆的攻擊目標，使羣衆爭鬥的對象顯明而一致；第三，有堅強而統一的領導；第四，羣衆本身有充分的武裝組織。一九二五年開始的中國革命，是不是有上述的條件呢？具備的很少。而所缺乏的正是革命成功所要求的最要條件。我們且敘述在下面：

本來，中國革命，帶着極迫切的民族解放的要求。在民族解放及打倒軍閥的口號下面；應該

容許民族資產階級的動員，而且資產階級也必須動員參加——甚至於領導——才對。却是相應於中國前期資本主義的結構及商業資本與土地的關係，一切居經濟支配地位的所謂資產階級，始終意識上還脫離不了地方主義的支配，而且和士大夫官僚糾葛不清，所以維持現狀及苟安畏怯，是中國經濟支配者的特質。整個的革命運動是由青年運動與工農運動爆發起來。我們看：一九二五年以前的「五四」（一九一九）運動是如此，一九二五年的「五卅」是如此，「三一八」運動：……「港澳罷工」運動也是如此。大部分的商業資產階級及極少數所謂新式工業家（少到等於〇）從來不但未曾發起反抗帝國主義反抗軍閥的運動，而且祇有在已經爆發了的運動中生起「取消」及「敵對」運動的作用。當中最覺悟的最急進的——自然祇是中小商人！——也不過是附隨革命。這是商工業者的態度及對於革命的作用。工人和農民及具有革命意識的青年學生，當然革命勢力所及的地方已先後的組織起來，而且組織的很快。雖然數量上不能根據當時所謂黨部的報告（那時的報告多屬於誇張）却是數量很多，表現出比任何其他羣衆為有力，是不錯的。這就是說：在那時，廣大的人民羣衆是已經發動起來，或者將要起來。

從爭鬥的對象來說，當時的兩個中心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是可以成爲極普遍的口號，並且也已爲大多數的人民所接受。表面看很象爭鬥的對象已經顯明而一致。但是，如果我們詳細些去考察一下，就要明白：在這兩個口號中間，實包含着無數的盾矛要求。不但對於帝國

主義及軍閥的解釋有各的不同（如胡適之博士之對於『帝國主義』及四川防區的將軍們對於『軍閥』的釋義一樣），而且對於具體的要求，更是複雜而衝突。當著北伐軍內的小軍閥們未曾長大的時候，他們也是跟着叫打倒軍

閥的口號。當著蔣介石的統治未曾形成的時候，他更是高唱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此外，工商業者及政府職員，對於帝國主義和軍閥的認識及其本身的要求，自然和廣大的農工平民大眾的要求有若干的差別。

農工平民大眾的希望，第一消極的在解除壓迫和苛稅雜捐，第二在積極的能得到更高的生活改善。他們在軍事鬥爭期中，只等待着，『革命軍』的成功，以為在『革命軍』勝利之後必然的可依照宣傳的政綱去做，所以盡他們的一切以幫助『革命軍』。

『革命軍』佔領武漢及南昌之後，『兌現』的時期應該就要到來。因此，商店的店員，工廠的工人。鄉村的農民，都盪盪地起來，各各提出解除本身的痛苦口號及要求。那些種種的要求當然很多是很原始幼稚的；都是在久經壓迫束縛的人民羣衆中，饑不擇食，渴不擇飲，是應有的狀態。却是恰好那些要求就無處不和城市及鄉村的實際統治者衝突。那些衝突隨著時局進展及民衆的起來日益深刻化。於是乎上層份子開始造成一普遍的口號：『黨軍可愛，黨員可殺！』我們大家應該明白，那時上層階級所仇視的黨員不是現時貪官污吏及黨衙門裏關人騙子無賴，而是號召

民衆組織民衆的積極份子。那個口號，恰恰爲新軍閥所利用，以爲節制民衆運動的藉口。這是革命黃金時期中，革命勢力範圍內的社會矛盾底表現。在這裏就表現出所謂「全民政治」的破漏，愈是在民衆運動發展的地方，這些矛盾和破漏的表現愈深刻而明顯。

四、「革命黃金期」的人民武裝

革命是一種劇烈的政治鬥爭及社會鬥爭。這種鬥爭是必然的要以武力抗爭的形式展開出來。一方面，在社會的內部必定是已經埋伏着明顯的矛盾要求利害衝突，因此，即便未達到總爆發的時期，而暗鬥明爭都在潛行着。另一方面，一旦到達了衝突劇烈的時期，必然要用全副武裝力量作判定死生存亡的決戰。所以革命一開始就必須進行革命民衆本身的武裝組織以準備反抗敵人，反抗反革命武裝，及消滅反革命的武裝。一九二六年的「北伐」名目上雖然一切軍隊都裁下了，「國民革命軍」的名號，而實際，則除極少部份係自由革命意識的軍官（注意：也僅僅有一種意識而已）統率以外，大多數的隊伍，都是由舊統治者的武裝和流氓式的「酋長」武裝改裝過來。新成的隊伍（黃埔學生所組成的），也只是意識上比其他隊伍強些，實際是在代表舊社會勢力（至進步的領導者也不過是具有買辦的意識）的領導——如蔣介石——下面，剛剛起來或者快要起來的人民，依然是赤裸裸的站在下面聽候命令及「派差」，無絲毫的武裝力量。極少數的所謂工人糾察隊或農民自衛軍，或者是因爲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面，增加了革命領導的矛盾（詳下

）或者因爲本身的脆弱，表現不出甚麼力量來，所以統統整個的說：一九三六年的『北伐』，並不是真正的人民運動，人民的鬥爭；實在祇是在北洋軍閥統治崩潰的途中，新起的處在反對地位軍人，乘機崛起奪取北洋軍閥統治地位的一種軍事鬥爭。在這種運動中，固然包藏不少真正決心革命，決心爲人民犧牲的黨徒及官兵，但是一來因爲數量太少，不能超過反動的勢力，二來因爲領導權在舊勢力手中，不能掙扎出來，所以一天一天的隨着社會勢力的轉變，隨着反動勢力的抬頭，整個的陷入舊統治舊勢力的深淵裏去而不能自拔。我們如果考在各國革命的歷史，就知道：如果革命的人民不能形成自己的堅強革命武裝，則一切的理想，都必然的變成爲幻想，而且果與理想相反。拿破崙第一雖然是英雄主義者，雖然是以超人的材力構成了他十多年的英雄成績，征服了全歐洲；却是如果不能徹底的執行一七八九年以後革命的政綱；不能代表當時廣大市民及農民的要求，以組成堅強的武裝，則他的失敗必不會等到一八一四年。克林威爾在英國，開闢了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肅清了封建的城堡，固然是因爲他具備了超人的材力及勇敢果決的性格；但是，如果克林威爾不能以清教徒的狂信，爆發了城市商人手工業者及農村下級紳士與農民的鬥爭要求，不能形成一種全新的自覺的建立在人民身上的武裝組織，則他的失敗斷屍，必不等待到一六五九年。拿破崙之所以勝利，不但在繼承大革命時代的政治路線，而且更繼承大革命時代政治化了的軍隊組織及訓練（大革命時代——一七九二年前後，法國『無神黨』的軍隊中已有

很細密的政治組織，（有黨代表行政治訓練及組織的職務），使軍隊中的官兵都相信爲民族的光榮及人民的勝利而戰，克林威爾的「鐵軍」——特別是他的騎兵——是完全政治化了的軍隊，不但全體官兵都參與政治的運動及要求，而且實在是政治鬥爭中最勇敢而最覺悟的份子。並且時常表現出，他的軍隊中的士兵比較官長還要覺悟，還要熱誠的行政治鬥爭。這樣，克林威爾才能有力量去抵抗王軍，去折毀無賴豬仔式的「長期議會」，建立獨裁的政權。拿破崙及克林威爾的政權雖然都是爲商工業家開闢道路的，却是，我們要因此了解：祇有革命羣衆自己本身構成的武裝，才能摧毀敵人，才能保障革命的勝利。一九二六年的中國革命，只是利用了新舊軍閥中的敵對矛盾，稍稍沾潤了一點軍閥的餘光，播送了兩個口號：「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及乘機發動了若干城市及鄉村之人民，做爭鬥的準備。却是這點餘光，是用了極大的犧牲才換得來：被屠殺了百十萬人，犧牲在前後方的數十萬人，餓死的千百萬人，被監禁的幾萬人！這種犧牲的結果，在物質上是增長了舊統治勢力的武裝，而精神上是叫喚起在監牢地獄中的若干奴隸！

五、革命領導的矛盾

上面已經說過：要使革命成功，必要有堅強統一的革命領導。不能發動廣大的羣衆或不能組織人民羣衆的武裝，固是談不上革命，却是最重要的還是革命領導的堅強和統一。前面的革命，很明顯的埋伏了一個失敗的重要原因：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領導并行存在，而且公開的向敵對的程

途發展。所以會發生這種現象，自然由於歷史的及社會的條件，即是由於中國人民本身沒落，與當時國際政策的失當。很客觀的說，中國平民大眾，應該早就要形成本身的政治組織。却是因為歷史的社會的條件所限制，使國民黨的領導整個的被豪紳高利商人所篡奪，廣大的平民大眾無所依歸，不過，分化到如此，還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的事情。在一九二七年武漢政府存在時，如果國民黨中有堅強的領導，有明確的政綱及實行政綱的勢力，則失敗決不至於如是之慘。這雖然是歷史的遺憾和空想，却和實際相差不遠。因為同時有兩個領導，其中之一是完全投入豪紳地主懷抱中，其他則入於投機空想的道途，結果和人民的現實要求完全違背，因此而革命受着空前的失敗與挫折。

六、南京反動統治形成的過程

我們如果了解南京反動統治形成的過程，最好方法就是綜合前四革命失敗的原因和經過。因為前四的革命，人民本身并未形成堅強的組織，而且更未形成堅強的武裝力量，更說不上堅強的自覺的領導，所以失敗是必然的。革命雖然是失敗，而人民潛伏的力量却是依然發展，依然得深入而擴張。剛上台的南京統治是和平民羣衆爭鬥產生出來的。南京統治的領導者蔣介石，在本質上具有買辦資產階級的性格，而且在事實上亦會得着南方買辦階級的擁護。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初開始的時期。蔣介石的領導亦未嘗不口頭上左傾，以抽象的口號欺瞞民衆。隨着爭鬥的開展，因為

買辦資產階級本身的薄弱，必然的要向右邊去找尋爭鬥的聯盟者才可以應付爭鬥的要求，才可以鎮壓起來的民衆。故武漢及南昌攻克以前，是蔣介石的領導利用民衆的時期，以後，則爲敵視民衆屠殺民衆的時期。在南京統治初行建立的時期，本來包含着無窮的南北軍閥在內，因爲蔣介石的領導一面要對抗民衆，不能不與一切舊勢力合流，一面要抵抗本身內部的反叛，更不能不與一切新舊軍閥爭取落後的上層成份，爭取一切由滿清時代袁世凱時代及北洋統治時代的舊勢力以充實他——南京統治——的力量和社會基礎（見「革命行動第三期那篇『南京統治的前途和我們今後的任務』論文）。所以內戰每發生一次，南京政府更在傾覆一次，內部的貪污殘暴及腐敗無能即增加一倍。所以南京統治的形成過程即是中國舊勢力復辟的過程。無論古今中外，在轉變期中，結果只有兩種可能：革命的勝利或反動復古的勝利。南京統治是建立在和革命對抗的過程中所以結果只是反動復古！

南京統治，在時代的意義上說，應該是以買辦資產階級爲核心的統治，確是，因爲買辦資產階級本身的薄弱及缺乏自己的武裝（這種性質的武裝，只於民國十三年廣州陳廉伯所領導的商團近之）更加以歷年來的內戰，所以結果只是增加了新舊軍閥的武裝，增加了脫離任何社會基礎而單純爲軍閥式的武裝。這種武裝，不但不能增進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且從狹義的說，更妨害了他們的利益。特別是各地方的商業資產階級，因爲在所謂「統一」的進程中受到損害，所以分裂運

動日形加甚，而且內戰成因，便隨着農村經濟的崩潰而增加。

所以，總括起來，可以說：南京統治實在還未曾形成。在其形成的行程中即自己摧毀自己。這種形成與摧毀的兩矛盾行程正分頭的發展，或者會發展到牠自己的滅亡為止，促成牠——南京統治——滅亡的革命行動。

二 復興中國革命的手段

一、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

我們在「革命行動」及「行動日報」及其他本黨刊物中，已屢次討論到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現時我們可以更具體的說：中國革命核心問題在：

在經濟的意義上說：肅清中古時代的殘餘 特別是落後的破碎的小農經濟生產，應該加以改造。同時，帝國主義侵入後的買辦高利貸經濟應該加以清盤除治。目的在：以集體的力暈構成「計劃經濟」(Plan-Wirtschaft)或「國家經濟」(Staats-Wirtschaft)，一面使生產力加速度的發展，一面使分配向着平均的路途——向着社會主義的路途。

在政治的意義上說：鑲除官僚政治及軍事獨裁，使士大夫地主豪紳專政的傳統的政治形態激

底掃清。目的在由人民直接掌握政權。而目的使政治組織與經濟生活密切而不相分離，澈底掃清士大夫「空談誤國」及「一部論語治天下」的黃老政治及儒家政治。更是掃清了牧民宰民的毒害。

在社會的意義上說：掃除「名分」、「偶像崇拜」甚至於買賣人口，奴役人民的社會意識及社會行爲。特別在文化的設施上，掃除士大夫階級專有「文化」（當然他們所謂文化只是搖頭擺尾的臭東西）的不平，及士大夫階級「寄生文化」，「蠹蝕文化」，而代以人人所應有的「生產文化」「創造勞動文化」。

當然，我們承認政治的變革及社會的變革，均爲經濟的變革所發生，但是，我們殊不忽略：如果人民不能有組織的去掌握政權及覺悟的去運用政權，則一切經濟的變革是祇自然的演化而不能使其與人悟的要求相適應。所以我們要不顧一切的堅決的去實行政治奮鬥，去發動羣衆，進行而組織機會的爭鬥。這就是我們所謂革命的意義和我們要從事的工作。

二、革命運動中農工及工商業資本的作用

前回革命的失敗原因，我們已經分析過。我們更加明白：前回革命運動的核心已經是農工羣衆。工商業家在前回革命運動中，祇盡過很小的機能，而且主要的是盡了反動的機能，雖然工商業家在中國革命性質及其意義上說，應該有作用而且應該積極參加的。

中國的新興工業，已經是十二分的微薄，而且在其經濟的關係上，不能完全脫去了官僚資本

及軍閥政權的「保育」。商業資本，本來就帶有寄生蠹蝕的高利貸性質，所以澈底的履行民族解放及工業革命的歷史任務更是困難。但是，過去工商業者之反對農工運動及加入反動的營壘，一半是因爲經濟的和社會的關係，一半是盲動政策所迫成。如果中國革命要勉強的變成沒收工廠，沒收店產的幼稚行動，那工商業者之反對是必然的。但是，中國革命的實際要求，在現階段的確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而實是帶有劇烈的工業革命性。在英國，工業革命是由工商業家所領導。在法國，工業革命也是由市民爆發出來，而且完成了牠。在美國，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及工業革命當然更是由市民領導着。祇有日本和德國，工業革命是由進步的具有工業意識的地主政權，自動的完成。中國革命——工業革命——雖然在時代上和十八世紀末期和十九世紀初期歐美各國的革命有顯著的差異，却是客觀的需掃除中古時代的遺骸與提高生產的機能，則與前時代的歐美各國所演的無甚大的分別。所以現時應該認清的焦點祇在：革命的核心力量或領導的力量是屬於那種社會成份的問題，我們對於這個問題已經明白的答覆了的——（詳我們的「政治主張」）——就是說：中國革命必然的要以農工爲核心，而其他一切被軍閥官僚地主壓迫剝削的成份都會圍繞在農工的周圍，構成廣大的革命羣衆，以履行革命的任務。中國革命對外負着對抗帝國主義得到民族完全解放的任務，所以必然是民族的——或如過去所謂國民革命。但是，不但對外要履行國民革命的任務，而且對內要履行掃清中古時代的遺骸，造成新社會秩序的任務，必然免不了社會的徹

突，所以又必是受壓迫剝削的平民大眾團結起來進行平民革命。所以要估量中國革命的性格，要以簡單的象徵名詞代表他，應該叫做民族的平民革命。「國民革命」的名詞在過去曾經普遍的稱道着，但是因為他的內含與實際的表現，已非常模糊不清，所以我們可以簡單的稱呼中國革命為平民革命。我們已經明白平民革命，是以農工為核心的力量。但是如果我們忽視了或者錯認了中國工商業的作用，那革命必然的要更經一度的失敗，而得不到結果。我們所以反對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的盲動路線，就是因為牠過高的估量中國社會，而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手段去行動，結果，使城市中心的工商業者，被迫而入於反革命的道途，而鄉村中的自耕農也被迫而流於放逐流浪的地位，使城市及鄉村的生產機能窒塞，使人民的生活降低，使土豪劣紳及貪污殘暴的官僚軍閥更容易得到脅從的成份。這是過去革命失敗的經驗，我們必須緊記。所以發生那種現象，第一就是因為陳獨秀的盲動政策，第二就是因為過去國民黨的領導是地主豪紳的成份佔優勢，現在我們已經臨到革命復興的關頭，我們必須正確的重新估量中國各種社會成份的作用，而適當的運用牠們。

中國工商業雖然在經濟的關係上不能完全脫離了地主豪紳軍閥官僚的關係，却是其客觀的性格是要革命才行。就是說：必然的要使工業革命有相當的成就，他們才能得到出路。而且，中國社會現時還在前期資本主義的階段——落後地區甚至於還滯留在封建的時期，生產及分配的機能，國家的集帶經濟還不能完全執行。所以，除國家資本的建設外，私人的工商業尚應有一比

較長的時期，令其有限制的存在。因為祇有這樣才能使生產及分配的機能不至於窒塞，要這樣才可以輔助國家集體經濟的發育與長成。我們認為中國工商業者，祇要牠們不是積極參加或支持反革命政權的，都應叫他們有生存的機會。農工大衆是革命政權的核心，而被官僚軍閥壓迫抽剝的工商業者在對玩官僚軍閥的爭鬥中，應該可以附隨在農工大衆的周圍。農工大衆是主人，而工商業者則是管理及組織一部份生產機關的僱傭。那些僱傭如果反客為主固然是不行，而在困苦顛連幼稚落後的中國社會經濟中，能適當使用僱傭，却是鞏固自己政權及輔助自己發展的必要手段。所以我們對於工商者的態度是有限制的容認的。這點，在我們的經濟政策上已明確的表示出來。當然，我們是站在農工大衆的立場上去運用。而不是如時下那些先生們面上高叫着全民政治，實在是代表着買辦資產階級或地主豪紳去欺騙工農平民大衆，或者是非自覺的爲買辦地主豪紳的要求所催眠暗示，活現士大夫的性格，隨着反動的勢力之波而流！

三、怎樣去發動革命？

很明顯的困難問題擺在眼前：中國平民大衆，完全沒有武裝，而反動的統治階級則由頭到腳都被長槍迫擊砲包圍着，一天到晚磨牙擦爪的去劫掠人民。其次，因爲交通條件的缺乏，和由歷史的條件所決定的文化的落後（其實不啻是落後，簡直是無文化可言！因爲所謂文化的肥料——經濟力——都被那些蠹蟲們坐食乾淨了。）使平民的團結發生很大的困難。這就是反動統治所以

能比較的維持存在底緣故。

但是，我們由經驗知道：中國革命有一個特殊有利的條件，在：一切所謂智識份子——除了極少數已經爬到上層統治階級裏去或做成洋大人的以外——都客觀的非革命不可，而主觀的又已先後接受了革命的薰陶，不能在反動的碾碎中度日。這些份子，在家庭經濟的環境說自然都是小有產者為多，表面上看，很像都無固定的社會分野及隸屬，但是，因為整個的世界環境和社會環境，是革命的，是前進的，而現時的農工羣衆，又皆先後的進入政治運動的舞臺，所以青年智識份子，容易具有農工羣衆的革命意識，也是由中國的特殊社會條件所決定的。

革命的智識份子現時已經分佈於農村中及城市中，特別是在新興反動統治的軍隊中服務，甚至在灰色的掩蓋下面，假裝着為統治着的核心，這種狀況，自然是使革命羣衆的組織不發生十分大的困難，而且在反動統治的胎中，使革命的力量早熟。

兩種力量為決定中國革命復興命運的基本條件。第一：農工及青年羣衆的本身組織底擴大而深入；第二，具有農工平民意識的青年軍官能自覺的接受革命的任務，自反動統治的營壘中，發出來，做掩護人民起來的前衛。沒有前衛，則感情式的革命的青年軍人容易受困難而變志或遇順境而自私。（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多少好的青年革命軍人都因為上述的狀況而墮落了。）沒有後者，則散漫而薄弱的羣衆，沒有組織及武裝的機會，更說不到推翻整個的反動統治。固然我們這

種區分，只是因爲事實的便利。實際，無論是在普通社會中或在軍隊中，必定要是農工本身，或具備農工解放意識的人們，才能負擔及進行革命的任務。所以，可以普遍的叫那些人爲革命的農工平民，革命的農工平民的本身組織武裝，實爲復興中國革命的必備條件。

四、怎樣去解決農民耕地問題？

四年來的革命失敗，祇有叫一般落後的人們知道羣衆的勢力尚在潛行的發展，叫一般比較進步的人們，了解農民耕地問題，在中國革命所佔的地位。許多人說：中國革命的核心問題是土地問題，這話當然是有可置議的地方，但大體是不錯的。土地問題解決的要求，在從前祇是由一般急進份子高叫着，其餘的人，不但反動的社會成份，因爲本身的利害關係拚命的反對和忽視這種要求，即與土地無切身利害關係的社會成份，也因爲不了解，這個問題的意義，而盲目的害怕或懷疑。現在的情勢，當然已經是兩樣。

我們黨解決中國土地問題的原則是：

第一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使中國土地的生產機能，漸漸脫離個人主義的經濟進到集體經濟——社會主義。因此土地問題解決的最後目的是土地國有——土地社會化。

第二是根據現時事實的要求，因爲應付封建殘餘及前期資本主義時代的整個生產關係，故首先使土地的佔有和勞作的矛盾和限制生產發展的障礙——即高房租農民無地或耕地不足的問題

題——得到解決。這就是「耕地農有」或「耕者有其田」的原則。

上面的兩種原則一是着眼在現代的實際要求；其二是着眼將來最後的目的。

我們試引述本黨對於土地問題的主張於下面。（見本黨政治主張單行本四三——五三頁）

我們爲着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必須達到土地國有的目的。但是在目前的階段如果立刻普遍的實行土地國有，則不但容易引起農民的反感，妨礙革命的進行，而且必然的因爲生產技術落後的緣故，管理及經營均發生困難，以致農民不能安心改良土地，生產力低落，甚至使農地荒廢。這樣不但是提高農業生產的方法，而且會更增加農民的痛苦，使農民離村的傾向，比歐洲資本主義國家中所發生的爲更甚。所以我們原則上主張土地國有，而用耕者有其田爲過渡的辦法。

農民離村的傾向，普通的說，是因爲資本集中和聚中的緣故，使多數農民保不住固有耕地，所以才不能不離村別求生路；同時又因爲在大資本下面，城市工業發達需用多數工人，所以只得集中城市去求生路。只有夢想着農業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的人們，才會承認農民離村有百弊無一利，同樣也只有中了公式主義化的毒的人們，才會絕對的承認農民離村是好現象，才會主張犧牲農民利益以促進工業的發展。我們的主張主要的是這樣：一方面實行大產業，關鍵產業及獨佔性產業的國營公營，以免產業資本家之自由剝削，一方面實行耕者有其田爲土地國有的過渡，以免地主的奪取和剝削。只有這樣才是合理的辦法。中國的農業現在已快到完全破產的地步。大多數

的農民除了賣身爲兵，爲奴隸（到外洋去底「豬仔」！）之外，祇有做土匪及流寇的出路，否則即不能不束手待斃（如西北各省的饑民）並且因爲農業經濟在中國爲國民經濟的軀幹，關係於全國人民的存亡，所以我們現在要把中國農業破產的主要原因詳細些敘述出來。

一、經濟的原因 構成經濟的原因的是：生產技術的幼稚，耕地的過份分裂，人口分配的不平均，地主及高利貸與商業資本剝削的凶暴，家庭手工業底破產，國際農業底競爭，農村資本底缺乏。

二、政治的原因 主要的在政治剝削與掠奪，（如苛稅預徵糧錢，鴉片稅，不兌換紙幣，使用惡幣，勸捐軍費，徵用犂畜及現物等）國家農業設備（如水利，模範農場，穀倉等）底荒廢，運輸交通機關底破壞，國家對外貿易政策（如所謂「互惠」政策）及財政政策（如包稅及厘金公債等）底反動等等。

上述各種經濟的及政治的原因，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各自獨立，其實是互相關聯，而且循環的互爲因果，因爲生產技術幼稚的緣故，各級農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十二分的低下，凶暴的地主，要得到豐裕的生活，只有用統治的威力以重租高利剝削農民。因爲城市工業不能發展。所以城市及農村所累積的資本只有購買土地，因此自耕農日益減少，同時農村的過剩人口無法由城市容納，大都壅塞在農村中，因而佃農日益加多，農村的耕地日見分裂。耕地過度分裂的結果，更不能利

用現存的進步的生產技術，因此生產能率十分降低。因為各地方人口分配不均的緣故，致一東北「西北」各省區，有地無人耕種，而東南各地的農民每戶平均不過得到數畝耕地，實在不敷生活的需求。因此農民以借貸爲生，終身受高利貸的盤剝。因此自耕農的土地被其捲去，變爲佃農，佃農變爲僱農。佃農受制於土地主，必須納全世界所未有的高度佃租以求得土地耕種，半死半活的生活實在比農奴時代更爲悲慘。僱農更受着非人類的勞役的拘束，做兩足的牛馬。更有許多其他過剩的人口求爲佃農僱農而不可得，不能不流爲兵匪流寇。在閉關時代，家庭手工業還在盛行，大部份的日用品可由農村及附近鎮市自給。開關以後，帝國主義者以廉價商品侵入農村，家庭工業於是崩壞，因此農村人口過剩的現象日益加劇，而商業資本的剝削日益加深。國際的農業，特別是在南北美洲，及英、法、荷蘭、日本，的殖民地（印度、安南、爪哇、台灣等）利用其高度的生產技術及貿易政策或特殊有利的生產條件以較低廉價格的農產品輸入中國，本國農產品無法與之競爭（特別是因運費高昂納稅繁重的緣故），因此沿江沿海對外交交通便利的地方，外國農產有壟斷市場的趨勢。因此農民的收入更加減少，農業的荒廢無法倖免。至於農村資本的缺乏，一方是由於生產技術的幼稚無法有剩餘生產的積累；他方更由於政治的剝削使農民皮肉不存；及最近商業資本之集中於都市，用公債，特稅，包稅，貿易獨佔等方法，間接去剝削農民，使農民生產品赤裸裸的無價的被軍官僚閥買辦等所掠奪徵發，更談不上農村資本問題。因此

農業的生產或完全停止，或以自殺的方法，耗費地力，使生產能率大大的降低，土地改良完全絕望。

像上面所述的經濟現象，雖然表面上是生產行程上的結果，而實際多由於反動的政治力量所促成。政治的剝削及掠奪，當然驅迫大多數農民陷於破產流散。國家農業設備底荒廢，當然使生產技術更加落後，更加無法改良耕地。運輸交通機關底破壞，當然使交換行程壅塞，使農民不能不低價售賣農產品不能不高價購買工業品，而生活水平更加降低。國家的反動貿易政策只有使外國農產品，更容易壓倒本國產業。反動的財政政策，只有把一切租稅負擔轉嫁於農民身上。像這些的政治因素，都是促使農村加速度的破產。因為農民破產的緣故，更增強統治者的反動，行更苛酷的掠奪，以促農業經濟及全國國民經濟的滅亡。像這樣：政治原因與經濟原因的交互循環，遂有數十年來使中國內戰不能停止，使中國民族物質的文明與文化同陷於消亡的地步。這種現象如無法消滅，中國人民必無死所，更不用說社會主義基礎的建設無絲毫希望。

我們認為要消滅上述的現象，使農民得到解放，使全國的國民經濟向前發展，應有如下的農業政策。而政策中的耕者有其田底辦法實為實行農業政策的先驅。因為一切政治的經濟的剝削所加於農民的結果是：土地更加集中，大地主剝削佃農及僱農更加利害，農民離村的現象更加普遍。就是說，都集中於土地問題。在現時全國約80%的土地由佃農耕種，全體農民約80%為佃

農；佃租平均約佔主要生產量80%。在現時嚴重的農村破產現象底下，如果無法首先使農村剝削停止，使農民返村，使農業生產行程恢復，則一切其他農業政策，甚至全國的政治設施都無從着手。而首先解決土地問題實行耕者有其田的辦法實為消滅農村的寄生，使農民返村及使農業生產行程恢復的唯一手段。也只有如此，革命勢力才能得到大多數農民的擁護；只有如此，工人失業的現象才能減滅，工人的生活標準才能增高。

我們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具體方案與程序如下：

甲 立行宣佈耕者有其田的法令，不耕作的人不能有耕地。

乙 立行宣佈免納佃租，其耕作中的佃農及僱農可暫行保有原來佃耕土地的使用權與收益權，聽候詳細辦法解決。但地主回村並能實際耕作者，主佃兩方，暫時共享土地使用權與收益權，其形式以契約定之。

丙 由國民會議規定土地法，并斟酌各地方狀況，分別規定農戶佔有耕地的最高額及最低額。及國家收買土地定價法。

丁 在允許私人佔有耕地最高額以外的土地，應由國家以全國國有土地為抵押，發行五十年長期土地公債，按照國民會議所規定的土地定價原則及各地方政府所決定的土地價格，收買歸為國有。在最低額以下的土地，應強迫使其互相合併或加入合作社經營之。

戊 國家以外的公共團體所有土地亦按私有土地收歸國有法，由國家收買爲國有。

己 一切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的及其他反革命的團體的全部財產應沒收爲國有。

庚 所有一切收爲國有的土地應由土地管理機關按照土地分配原則及各地方標準負責分配於耕作的農民。原有佃耕的佃農，及無地的僱農，與退伍的革命軍人等應有同等機會領用土地，但只限於使用權與收益權。

辛 領用土地而不行耕作，或怠工，耕作不力的農民，應被剝奪其土地使用權與收益權，耕作私有土地的農民犯以上條件則并剝奪其佔有權。

壬 不准私行買賣土地，必不得已時的土地佔有權及使用權的轉移按土地法得土地管理機關的允許而後行之。

我們一般的農業政策如下。

甲 消滅寄生剝削的大小地主，使不耕作的不能保有土地，而要從事耕作的人民隨時可以得到土地耕種。即是實行耕者有其田，使農民安心改良土地并提高生產力。

乙 改訂田賦，清丈田畝，依照各地收益情形及農民收益狀況，釐定稅制。

丙 積極利用科學方法以振興水利，及一切農業改良的設備，發展內地交通，推廣農業教育及研究，辦理農業調查，廣設模範農場，務使各農村均能進行農業實驗及改良的工作。利用國內

外的資本廣設農民銀行，供給農村必需的資本。

丁 提倡及促進農業合作。利用生產合作，使各農戶能自由聯合行大規模的耕作，用進步的技術以改造農業。利用販賣及購買合作以消滅商業資本的剝削。利用合作以消滅高利貸。

戊 辦理國營及公營的農業，盡量的應用新的技術及經營方法，使農民澈底的明瞭大農業及小農業的利弊。使農民能逐漸的志願的由私營及合作的階段進入農業社會化的階段。

己 速行辦理移民及墾植事務，使人口與土地的比例能相對平均。

我們認為：中國的農業制度整個的說，是小農制。而其內部的矛盾複雜，實比任何國家爲利害。解決現時矛盾的主要着眼點當然是要調整個的經濟政策——國家資本主義——相適應，一方使集體化的根基逐漸建築起來，另一方面，仍然須設法獎勵生產力的提高，因此而個性的農村經濟還要在相當時期內允許其存在。

第二、我們認為：土地的新分配及管理，必須由革命的政權機關去實行。甚麼是革命政權機關呢？當然在國有兩民會議，在省，市，縣，鄉等有各該地方省民會議，市民會議，縣民會議，鄉民會議等機關爲革命政權機關。必定先要使農工平民掌握政權，使人民大家有了政權，然後土地的新分配，及管理才能奏效，而且在過渡時期——即全國或全省政權尚未完全在革命人民手上之時期——縣民會議，鄉民會議，實爲一最重要的革命政權基礎。土地問題的解決，如果

等待到全國的測量登記完畢才能實行，則不但爲中國地區之廣，交通之陋，非數十年後不爲功，而且土地關係之複雜及自然條件的分歧，更非舉國一致的標準辦法所能奏效。土地問題的解決，在中國我們很明白的認識，是帶有強烈的地方性的，而且是急迫不能久待問題，必須立時去做才行。因此，地方的政權機關，特別是縣民會議及鄉民會議，實爲履行本黨土地綱領的基礎。

總括起來說：我們解決農民耕地問題的方法是着重在用政治的手段。而不是用沒收的手段所謂用政治手段，是以革命的人民——農工平民得到政權爲前提，當然不是依靠那些大人先生新舊士大夫等統治者和半統治者的恩惠和慈悲，更不是等待真命天子的出現！

五、怎麼去組織「平民革命軍」？

我們已經完全明白：所謂國民革命在南京統治的蔣介石領導下面，已經變成了比滿清末造及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軍隊還要腐敗，還要引起人民的反感：軍官則狂嫖亂賭吸煙勒索無所不爲，剋扣餉糈，屠殺人民，無所不爲，士兵則顛連困苦，無可告訴，國民革命軍在一九二四年開始組織的時期，當時所謂黨軍！——幾於被人民奉爲神聖。在一九二六年開始「北伐」的時期，也深深的得人民的擁護，而且對北洋軍閥如摧枯拉朽所向無敵。爲什麼？當時的黨軍及國民革命軍，能有如此的光榮，而現時在蔣介石領導下的軍隊反爲腐敗潰朽到如此的程度呢？這當然是一種制度所育成——是買辦豪紳統治與大多數人民對抗的必然的結果。人民的反抗力愈大，則蔣介石

領導下的隊伍，必然愈加腐敗，因為，一方面，買辦豪紳必然要借用利用奴隸式的軍隊武裝才能鎮壓人民，才能監守人民，才能長久屈服於蔣介石——買辦豪紳的代表者——的收買放縱政策下面，甘心作虎狼獵犬以絞殺人民。

「國民革命軍已隨蔣介石所領導的南京統治的形勢成而腐敗，亦必隨蔣介石的政權崩潰而掃除牠的舊枵，恢復牠的新機。現在潛伏在國民革命軍內面而忠實於農工平民大眾的份子，必然的能了解他們自己過去的光榮而與新起來的人民打成一片，形成新的革命武裝——平民革命軍。」

甚麼是人民革命軍呢？

第一、平民革命軍是代表農工平民的。他必然是由平民大眾當中的最勇敢最緊決的先鋒份子所集成，而不是懦怯游移，為個人或其他一切寄生剝削成分底工具的。

第二、平民革命軍是一整個的有機體中之一部。牠和平民政權密接不離。牠不但應參加政權的組織，而且應為革命政權中之最覺悟的成份。因為他自己就是農工平民中的先鋒份子。

第三、平民革命軍的待遇，只在職務上有官長士兵的分別，却是在生活上應無甚大的差異。不但現時反動統治上的軍隊中。官 驕奢淫佚，貪污殘暴，士兵顛連困苦，無所告訴的毒素應根本掃除肅清，而且應該根本改訂士兵和官長的薪餉及其他一切生活條件。務使全體官兵生活成為

合理的人的生活，而且使官兵的生活和農工平民生活打成一片。

第四、平民革命軍是不斷的在政治訓練及勞動訓練中學習的。政治訓練於軍隊中的生命，也就是平民革命軍的神經系統。過去的國民革命軍中的政治訓練祇是表面的。——所謂「賣膏藥」！——而且在整個反動統治的隸屬下，除了進行無關痛癢而擁護軍閥個人的所謂「政治工作」（反動軍閥們嘲笑政治工作的人叫做賣膏藥者甚或叫做姨太太）外，也必然無其他工作可以被允許表現出來。如果人民已經起來，則平民革命的社會性格必然更加清礎而確定。這樣，平民革命軍的政治訓練就是訓練農工平民大眾自己，就是叫自己明瞭犧牲及作戰的目的，而永遠不會被野心家所利用。

不但是政治訓練，而且是勞動訓練——生產訓練——黨更爲平民革命軍所心習。如果我們認爲現存的統治是買辦地主豪紳官僚士大夫的寄生剝削的統治，那他們的奴隸軍隊當然更是寄生的寄生。他們對於生產機能是有害的。爲建立平民政權及促進社會主義而鬥爭及犧牲的平民革命軍，當然無時無刻能和生產脫離。在過度的革命時期，固然必須徵集生產農工平民入伍，在革命後的建設時期更須輪流叫直接生產的農工平民入伍，使入伍後的官兵重新進到生產的行程裏去。而在營時期，也時常須接受科學實驗的生產教育。

總括起來說：平民革命軍必然是成爲人民——農工平民的武先鋒，是永遠爲解放中國民族建

立平民政權促進社會主義而生產而犧牲作戰。

六、怎樣去肅清新舊士大夫的成份——寄生流浪的智識份子？

每個有歷史認識而站在農工平民立場上的人，都可以明白：二千年來，居統治地位的人都是所謂士大夫。士大夫的特質是不了解社會，更不要說參加社會的生產行程；是處在絕對寄生剝削的地位。使士大夫在中國發生而且長久的保持——近來的大學生及留學生也大多數是新士大夫！——他們優越地位的緣故，自然從遠因說是小農經濟社會的殘存，而從近因說，則因為中國文字艱深，大多數的農工平民和文化隔離。士大夫在中國早已成為文化的貴族，他們所買的文化，實際不過是些風花雪月，無病呻吟，或咬文嚼字，欺騙愚弄人民而奉承其主人的下作技能而已。

舊的士大夫，現時已隨封建時代建築物崩潰衰敗而漸漸的滅亡。剩下的除了躲在窮鄉僻壤裏做冬烘先生，依然遺毒鄉村青年子弟以外，即一體的隨南京反動政府的樹立而鑽到政權機關裏去。但是因為南京反動政權的基礎，係以買辦為核心，所以買辦化的新士大夫，比舊的殘敗下來士大夫更顯得煥赫。

「舊的士大夫們雖然是腐敗，是落後，但是還曉得遮遮掩掩去幹，似乎還有一點兒『廉恥』（其實他們是未有的）。新士大夫却是兩樣：口裏說的天花亂墜，一天到晚只羨慕着新的『

文明」：電影院，跳舞場是他們理想的園地，時式裝扮是他們生活的命根。最進步一些的，也不過是一些流行的名詞。一句話：整個的被美國式買辦「文化」所征服，已經完全失却農業社會的根基。却是吸收的只是享樂的表面——或希望得到這種虛偽的「文化」來享受，而歐洲文化的根底，絲毫不曾觀察。因此買辦文化在中國所孕育成新士大夫，對於中國社會，不但無絲毫增益，而且祇有加甚，中國官僚的貪污剝削，只有使南京統治多添了一些點綴皮表的東西。這是新舊士大夫在中國的作用！

當前的中國復興關頭，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怎樣去消極的防止新舊士大夫在中國社會寄生生活。積極的使青年的知識份子參加社會的生產工作？

「由千餘年傳統的關係所形成的『身份』觀念，使一般所謂知識份子和生產的農工平民站在對立的地位。不勞動的生活成爲知識份子典型。更因生產落後的緣故，工商無由發展也無法有成。有生產作用的工商業家。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惟一的出路；『做官』！不論是做豪紳地主的官；或洋大人的官——買辦。」

近數年來革命的進展，農工平民大眾已先後站起來。這數年來社會大變動，搖撼了整個的舊社會秩序。處在中下層地位的知識份子——青年學生也先後的被震動着。特別是被世界的大轉變震動了。數年來中國社會的大進步是什麼？並不是生產力的提高和新社會秩序的建立，而是其反面：

由舊社會秩序崩潰的途中所孕出來的結果：大多數的青年學生已脫離了舊社會藩籬底束縛，了解舊文化的虛偽空洞，而根本的接受了生產的意識，根本的要拋棄了地主豪紳的文化——禮教——要和生產的農工大衆，站在同一的立場接受新時代的使命。這種大進步的象徵是：社會科學是經完全奪取了中國的文化領域。而經濟學的探討和生活的努力找尋，實爲使中國由新舊士大夫時代到新社會秩序——生產的而不是寄生剝削的——形成的前驅。自然現時流行的所謂經濟學的研究，以至於一切所謂社會科學讀物與其被了解的程度，還是十二分的淺薄，還多只是新名詞的玩弄，多少帶着新士大夫，新式冬烘先生的習氣，却是，這是開步的啓蒙時代所必然，而且爲實踐的前一步底表現。這些表現確是進步的，而且是革命的。

新時代的開始，不但是在思想的戰線作戰，而且更是在實際的行動上去勞作。所以現時，引導啓蒙時代的中國青年——具有農工平民意識的青年——到實踐的行列裏去；到真正摧毀舊社會的寄生剝削秩序，建立生產勞作的新社會秩序程途上去，才是真正解決中國青年問題唯一道路，才能真正的把新舊士大夫肅清。

這個工作，也是『革命行動』的重要工作之一。

在這革命時期——現時——的中國青年，只有無條件的加入農工平民的行列，學習生產的意識與技能，從事於組織和活動的工作——革命工作，才能洗滌舊時代的卑污，這是第一步。

在農工羣衆中，一面從事於組織的活動，一面即形成政治，經濟的生活軀幹，行自己支配自己的內在發展。這種組織愈是擴大而深入，則新社會的條件愈見成熟。這是第二步。

自然，所謂政治的生活軀幹是包含政治的管理，軍隊，警察等等職業機關而言。所謂經濟的生活軀幹，係指合作社，公營及國營生產機關及其他一切金融運輸等等機關而言，必定要在潛伏的時期，在政治爭鬥的行程中，已經行着內在的發展，才能於革命勝利以後執掌政權，才能形成新的政權，才能着手新社會的建設。而執掌政權以後，這種工作，更是公開的發展出來。這是第三步。

上述的三步都與青年知識份子息息相關。不但是息息相關，而且爲革命的革命的能否復興能否完成，則中國青年能否大部份進入上述的行程中爲一必須估量的條件。

革命行動的根本任務，當然在繼續中國革命，復興中國革命，完成中國革命。而發動廣大農工平民大眾，吸收引導有爲的青年——當然不是老朽腐化及反對平民利益的成份——到農工平民大眾的行列裏去，進行平民革命工作，則爲積極的使平民革命成功，消極的消除肅清寄生的新舊士大夫成份的偉大工作。這種工作，祇有命革命行動能實現牠，而且完成牠。

七·平民政權的特質

我們黨的中心主張之一，在平民政權的建立。

甚麼叫做平民政權？我們的黨刊革命行動第三期及第四期中已有所論列。而且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亦已具體的解釋過。現時不必重贅。

平民政權的特質在：

第一、平民政權是生產者的政權。牠不但要根本鏟除寄生朽腐的官僚政治，而且要積極的發揮生產增進機能。

第二、平民政權是反對特殊階級的政權。牠不但是在構成的成分上和傳統的政權不同，而且牠要適應於國內生產力發展的程度，而使全國人民生活大眾化，平民化。所謂「文武歧途」或鄙視勞作的傳統的士大夫身份差別固然要摺清，而且在勞作的報酬上加以根本的變革。在原則上，無論担任何種職務的公共機關人員，只應有職務的不同，而在待遇上應無十分大的差別。只有這樣，才可以把新特殊階級重新產生的危險免除。而且只有這樣，才能適應於生產者政權；平民政權的本質。也祇有這樣才能把現時南京反動統治厲害淫佚，掠奪貪污的穢跡鏟除，同時才能使一般勞作最多而報酬最少的下級人員——特別是士兵警察及下級服務人員的痛苦免除。當然，這種原則的實現，是和全國農工大眾生活的整個向上超升的程度相適應的。不但社會的身份差別和經濟生活的懸絕會由平民政權加以消除，而且更是在文化的設施上普遍的建設平民文化——見本黨政治主張關於「文化政策」之部——以解除身份及特殊階

級意識形成的武裝。

總括說一句：

平民政權是由生產者所構成，而進行社會，經濟，文化的解放。並使之平民化的一種權力機關。

三 中國革命的前程

我們在上面一部曾經訴說了我們黨決定復興中國革命的手段，即在革命的過程中到奪取政權後所應着手的重要問題及其方法。現在我們應該總結幾句。

中國革命是一件空前的事情，是一件對外對內——特別是對內的社會方面——行空前革命的事情。這種事情如果不是確實了解中國社會客觀的要求，把握着中國社會本身，喚起中國社會本身的自覺，而僅僅機械式的，工具式的去盲動亂動，則結果當然只有消極的作用，而不能夠發生積極的建設，形成新社會秩序的機能。

現時全國的革命青年，全國的農工平民大眾，已經先後的集合在新的革命領導下面了。所以有這樣的成績，並不是主觀力量的超人，而是歷史的發展所必需。誰能認識這種的要求，而緊能

決的加入革命的行列，加入革命的行動，積極堅決去做的，就是推動歷史的「功臣」，就是時代的驕子。誰阻礙這種歷史的要求，妨害革命行動的，誰就是歷史的罪人。功罪的批判，只能由歷史及廣大農工平民羣衆去做。我們的爭鬥路線，不但在中國是一種偉大的工作，而且在世界必有其偉大的意義和影響。只要革命行動在中國貫徹了他的主張，實現了他的時代使命，那他在世界歷史的地位，更是偉大。如果中國革命由中國人民自己去復興，那不但可以恢復中國人民自信的活力，恢復中國民族自信的活力，而且更進一步可以促成世界的轉變，促成世界大同的實現。這是我們全國平民大眾們，特別是黨員，同志們應該深切認清的。

一九三一，六，二五。

我們爲什麼要推翻南京的蔣政府

——推翻南京統治？

——我們要求的是什麼？

現時，全國上中下三層社會層都一致的要反蔣，反對現政府，都一致的希望蔣政府的崩潰。反蔣已成了民意！任是究竟爲什麼要反蔣？你如果問一百個人：——在無組織的大羣衆裏——就或者會得到九十九個不同的答案。你如果去問各個政派，就會得到和各政派的數目一樣多的答案。

雖然答案有許許多多的不同，但大概可以總括爲如下的二項：

第一、因爲蔣政府是貪污殘暴的，牠除了縱容軍閥官僚閹宦親貴去拼命掠奪人民壓迫人民以外無所事事。叫人民無法生存。

第二、因爲蔣政府是縱容在鄉村中造亂的。蔣政府一面包庇土豪劣紳，叫他們更苛刻的去勒索鄉民，一面又縱容腐朽的官僚去剝削鄉民，用金錢買收的政策去奴使軍人，所以結果是：農民

無所依賴的日益增多，被迫而加入爭生存的鬥爭，使整個社會秩序陷於動亂。

上述二項爲蔣政府結怨於全國人民的根源，也就是全國人民所以一齊起來反蔣的緣故。全國人民現時所需要的是生命的安全與職業，需要和平與吃飯。因爲蔣政府是給全國人民以危害及失業，使全國人民無生活的前途，更說不上和平與統一，所以全國人民都起來反對牠而且要推翻牠。

我們！代表全國廣大平民羣衆的本報——是十二分的同情於全國反蔣的要求。而且要積極起來推翻南京統治的。但是我們應該很周詳的思考一下：

爲什麼會造成貪污殘暴的蔣政府？並且進一步：怎樣才可以在蔣政府推翻以後造成真正的人民政府，確保和平與統一，得到安甯與職業？

貪污殘暴的蔣政府是一種制度——南京統治。政府之所以貪污殘暴是因爲官僚制度所以存在。是爲因人民不能參與政治，不能監督政治。軍事獨裁所以發生，是因爲極少數的統治者保有武裝對抗大多數人民的反抗。要根本的撲除官僚政治及軍事獨裁必須廣大的人民起來有組織的自由和言論的自由，能表現人民的權力。

所以我們——代表廣大平民羣衆的本報——決心以下述的中心綱領去反蔣，反南京統治，推翻南京統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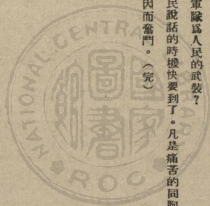
一、恢復民衆運動

二、召開真正的由人民代表組成的國民會議接收全國的政權解決一切問題。

三、以省民會議縣民會議鄉民會議接收各級地方的政權。

四、變軍閥奴才式的軍隊爲人民的武裝？

全國同胞們！我們人民說話的時候快要到了。凡是痛苦的同胞都應該一致起來，了解痛苦的
原因，並爲除去痛苦的原因而奮鬥。（完）



蔣政府——南京統治——必然要崩潰的

原因及全國人民當前的急務

我們——本報——已經屢次說明了蔣政府及南京統治所以結怨於全國人民的原因；並且說明本報的中心主張在：撲滅官僚政治及軍事專政，解決人民大眾所要求的問題。

現時南京統治的掌權者已經手脚忙亂！——如恢復李濟琛的黨籍，決定不行編遣等等。蔣介石最近的宣言和通電，是預告了南京統治已由動搖而入於崩潰的程途，是預告了他自己的失敗和沒落。

我們——一切受南京統治壓迫最甚的同胞！應該先要了解：爲什麼蔣所領導的南京統治會必然的崩潰？

很顯明的一個事實擺在我們的眼前：蔣政府現時已失去了一切的社會基礎。就是說：蔣政府的設施已違背了全國人民的要求，遭受了全國人民的仇視——除了極少數的上層官僚軍閥走狗及閹宦親貴以外。

南京政府樹立不過四年。四年之中，不但對於人民無絲毫的益處，而且祇有一天一天的叫人

民流離失所無所依歸，叫人民遭受空前的壓迫與屠殺。蔣政府保持政權的惟一方法祇是：利誘。四年以來，團結在蔣的領導下的，不是現成的昏庸老朽，就是由蔣的金錢所腐化的卑鄙醜惡的貪官污吏，殘賊懦夫。在蔣領導下的人，蔣只怕他不要錢，只怕他不擾害人民。貪污殘暴的就是他的忠實信徒，守正不阿的就要受他的疑忌排斥囚逐。因此，四年以來，蔣所領導的政府已爲貪污殘暴的民賊所盤據。這種表現，當然喪失了精神上的權威，必然的要進入於最兇惡貪殘的路程，要招致全國人民的反抗。無論任何朝代，無論任何國家，所以能有建國的力量及規模，至少必須具備方新的朝氣與道德的權威——道德的權威，當然是由代表，廣大人民的要求所發生的。——才能做到。無論任何朝代，無論任何國家，如果統治階級已經失却精神上裁制統馭的能力，失去了除舊佈新的能力，而祇靠威迫利誘的卑鄙方法，祇靠放縱荒淫的方法去保持政權，那即是宣告了他自己的滅亡宣告他自己的壽終正寢。滿清末造是如此，袁世凱的末年是如此，蔣介石的統治也正是如此。所以從皮相的觀察——先不說社會力量的相互關係——來說，已經可以斷定蔣所領導的南京統治的沒落與敗亡。這本來是皮相的常談，一般短慮式的老先生都可以看到料到。

但是，我們從事政治運動的人，或者是有覺悟的同胞，應該更進一步的去觀察：

蔣所領導的南京統治所以會失却精神上的權威及使用最卑鄙醜惡殘暴手段去保持政權的原因

在：一種制度的存在。這種制度祇是代表最少數人的利益，違背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及要求。南京

統治的財政政策只是掠奪，只是無情的掠奪。南京統治的經濟政策祇是叫全國農民破產，工人失業，一切有職業的無所依歸。極少數的官僚軍隊祇有公開的掠奪貪贓剝皮及骨，不管大多數的人民轉輾溝壑。這是官僚政治及軍事專政的特質，這是整個的制度所產生。

現時，事實上，蔣政府已和全國人民作對。蔣政府已爲民賊與獨夫代表機關。而且牠本身已自己宣告了動搖和沒落，手脚慌亂。只要全國人民起來，多數必然會壓倒少數的獨夫與民賊，必然可以洗滌舊時代舊制度的卑污。這就說明了蔣政府——南京統治——崩潰的必然性。

全國痛苦同胞們！獨夫與民賊所組成的南京政府崩潰是必然的。但是我們要了解我們自己的責任和當前的急務。

第一、我們要了解：我們人民自己才是國家的主人，才是決定自己命運的樞紐。等待及消極都是造成獨夫民賊掌權的原因，都是造成官僚政治及軍事專政的原因。只有我們大家一齊起來參與政治干涉政治才是解除痛苦的方法。目前我們參與政治權利已經完全被獨夫及民賊所剝奪，我們首先要要求組織的自由及言論的自由。這是開步走的工作要求。

第二、我們要了解：蔣政府的貪污殘暴是一種制度，是一種制度存在的結果。蔣介石個人果然是罪不容誅；但是任便他個人有天大的惡本事也够不上造成今日全國人民的痛苦狀況，一個社會制度是由社會的實際力量關係所構成。構成蔣政府的權力的，構成南京統治的權力的並不剛是

蔣介石個人的兇暴殘酷的手腕，並不剛是蔣介石及其親貴閹宦，而實在是因為人民本身未有權力，現在的蔣政府，現在的南京統治固然是貪污殘暴，但是，如果廣大的人民，全國被壓迫的同胞不能有堅實的組織和力量，不能有自己支配自己的權力，則我們決不能造成廉潔的政府，決不能希望任何政府有解決我們人民本身要求的可能。過去二十年的歷史，可以證明我們的觀察，可以為人民的借鑒。我們全國人民固然是反蔣，我們更反對蔣政府所以形成的制度。我們全國人民固然要推翻南京的統治，我們更須鏟除南京統治所以形成的根源。所以我們全國痛苦的同胞要認清現時貪污殘暴統治形成的原因，不可僅僅注意蔣的個人。如果以為把蔣介石個人除去即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那必然的結果就是失望。我們全國痛苦的同胞一定要有自己堅強的組織及明確的要求，才可以澈底剷除貪污殘暴的蔣政府底根基，而保證將來人民的勝利。

推翻南京統治。肅清官僚政治。剷除軍事專政。樹立潔廉政府。解決全國人民的要求。實現永久和平的統一。

附錄

十六年十一月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

衆宣言

中國現在已入到一個新的局勢。在此局勢的下面：帝國主義者由消極的暗助反革命勢力的時期，進入到積極的進攻中國時期，直接的間接的打擊一切民族的解放運動，更以兵力佔據中國內地及各口岸。北方的舊軍閥，在風火殘生的景况中，從新希望其勢力之擴大延長，因此對於民衆更加甚的絞搾毒殺，長江中部及東南各省之新軍閥，無處不假託中國國民黨之旗號，以欺騙民衆，以行其侵害剝削的私謀；地主、土豪、紳士、買辦更在此民衆勢力暫形退守的局勢下面，對工農羣衆加緊其殺戮和剝削，以相報復，因此形成新的黑暗反動時代。在其他一面，革命的民衆，由希望解放的空想而進入於實行鬥爭，由依靠「好政府」盼望「真命天子」的殘夢中驚醒，必然的要在血泊掙扎，去進行新的解放自己的工作，在這樣的一個新局勢之下，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特對全世界及中國革命民衆，將此黑暗局勢的由來及本黨責任，鄭重宣告：

中國國民黨是由牠的偉大的總理孫中山先生所創造，代表全中國勞苦民衆的希望，經過四十多年的奮鬥：首先和國內的腐敗滿清政府決戰，其次和繼承滿清封建勢力的袁世凱及其他軍閥爭鬥。最近數年來，更把牠的根基，建築在民衆本身，以作最光榮的革命決鬥。牠的行動綱領，已表現於孫中山先生所手著的三民主義當中。三民主義的真正意義，是：反對帝國主義到底。要得到中國民族的自由和獨立，并使國內各弱小民族能自由獨立。民權主義，是：要推翻封建特權階級，和一切少數宰割多數的反動勢力，由大多數勞苦民衆，自己建設平民的政權。民生主義，是：要推翻少數剝削多數的經濟制度，把中國從貧困慘苦的地獄中拔出，以勞動民衆所生產的一切歸勞動民衆享受。這就是孫中山先生根據中國的特殊環境，所擬定的革命大綱，也就是他的黨徒行動奮鬥的準繩。和大多數民衆的希望。

但是革命勢力的增加，必然引起反革命勢力的反動，更促進黨的投機妥協搖動份子的現形。自本黨總理孫中山先生生時，即一面與敵人奮鬥，一面更須與黨內的叛徒決絕：在一九一二年滿清推倒以後，本黨現在努力肅清封建勢力，而帝國主義者極力援助封建勢力的代表者袁世凱：本黨叛徒宋教仁黃興等更阻撓妨害革命的進行，以致辛亥革命的行程中斷。孫中山先生不絕與當時的敵人及叛徒爭鬥，故有中華革命黨之改組。一九二四年本黨重行改組爲中國國民黨，更擴大力量於下民衆，因此帝國主義者及封建軍閥的仇視，與其他社會上層的統治份子的懷疑加甚。本

黨總理孫中山先生更努力與一切敵人及黨內的叛徒決鬥，因此而革命勢力擴大，使全國勞苦民衆均聞風興起。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敵人之進攻愈甚，本黨叛徒之陰謀愈張，因此有西山會議派之產生！願本黨同志的努力，將該派叛徒肅清，而黨的威權愈振，至於舉行北伐。北伐之意義，是：一面希望以接受革命宣傳的軍隊，搖動北方的封建營壘，及打擊帝國主義者的威權；一面喚醒在封建勢力下支配的勞苦農工民衆，促進其組織。以直接鬥爭得到解放。因勞苦民衆之援助及同情，故北伐軍能不絕地戰勝久據長江上下游的軍閥。不料北方軍閥才告崩頹，本黨指導下的軍隊領袖，即乘本黨組織尚未臻完善，民衆力量尚未十分充足的時候，圖收戰勝之功爲己有，與仇視農工民衆的反動勢力勾結，反口相噬，因此有南京僞中央之組織。南京派叛徒，實爲新軍閥及土豪紳士地主及剝削農工份子的集團，他們只是收買窮苦兵士與北方軍閥爭雄，他們拿『打到北京則革命成功』的口號，以欺騙民衆，其實不過欲取舊時反動勢力而代以新的反動勢力。因此本黨多數同志，率領工農羣衆，與南京派叛徒決裂，並聲討其假借黨部名義之大罪。當時革命勢力集中武漢，本黨同志，以爲南京派叛徒已被消除，則革命的中央領導當然可以信任，以爲當時即可以實行革命的綱領，故在本年夏間，長江中部之民衆，多自奮起以進行革命的爭鬥。不料武漢中央的上層份子，乃陰謀叵測，藉名行私，一面空言欺騙本黨同志及革命民衆，一面即非難革命民衆的要求，直至農民大舉與鄉村封建勢力鬥爭，及要求土地，而中央份子的假面具，遂一齊揭

穿。最近更不惜自食其言的與南京叛徒連合構成反革命的統一戰綫。本黨同志及工農羣衆，方曉得中央上層份子，直與南京叛徒無別；其欺騙民衆，動搖本黨，其罪過於南京叛徒。現在已證明本黨的上層領導已完全違背而且背叛本黨第二次大會的付托，革命民衆的希望。他們——無論爲南京爲武漢，皆竊取中國國民黨之旗號，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義之內容，其實已爲舊勢力之化身，軍閥之工具，民衆之仇敵。帝國主義者，初時嚴於中國革命民衆勢力之勃興，尙取消極的防備，及見本黨叛徒之毒手，始放膽積極以繼續其侵噬之策略，於是有最近帝國主義直接派兵進入內地及各口岸之舉，有任意拘捕屠殺人民之事。北方軍閥，本殘蠹餘光，朝不保夕，因本黨的內變故復放膽反動，冀延殘喘；而其對農工羣衆之剝削，革命之屠殺，更甚前時。地主，土豪，紳士及一切社會的統治勢力，前時稍受革命勢力之打擊，多已斃跡；今見本黨信徒依附其勢，遂乘機反攻，其報復農工革命羣衆之兇暴，爲前此所未見。此種反動的黑暗局面，實爲目前景况。

本黨以爲中國民衆之痛苦，根本原因，在：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地主豪紳，及大部分與他們聯合的高利資本家的共同勾結所構成之中國政治經濟勢力的統治。雖此種統治勢力相互間之利害，絕不能和容，甚於互相吞噬火併；而其對全國勞苦工農民衆的壓搾剝削，不過有程度之差異而已。最近數年來之革命運動，更足以證明一切上述之反動勢力，無不先後以壓迫殺戮革命民衆爲事，甚更詳述中國目前經濟組織之概況，以證明革命勢力之基礎爲誰，反革命之成份爲誰；在

陝甘西北一帶，封建地主尚專權柄，不但役使農民供其奴隸，征收佃租以供揮霍，而且征取所得，復以高利貸諸農民，席捲餘土，以肥本身，便利用政治權威，武裝軍隊，以供調遣，專營商業，以累積資本。政治經濟的統治集於一身。東北一帶——尤其是滿洲三省，爲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張作霖等之洩慾場。一切土地，鑛山，銀行，工商業及交通工具，除帝國主義之所有，卽爲張作霖等之御用品。治軍閥，官僚，地主，豪紳，工商業資本家於一爐。在外，中古時代的遺物仍是遺存。鄉村勢力悉爲地主豪紳。此等人更與地方政府之貪官污吏——軍閥爪牙勾結，以絞榨農民及手工業者爲務。在東南沿海一帶，雖有大規模商業若干及新興工業，稍稍將中古時代之封建秩序革除，而因帝國主義經濟勢力之壓迫，大部分商業資本之累積，均用之購買田地及鄉村高利貸。因此大部工業者，或爲封建軍閥官僚之替身，或成爲封建地主之兼職。而尤爲中國民衆仇敵者，則爲帝國主義所盜竊強佔之「租界」。此種地區，一面爲暴力強奸之武庫，一面爲經濟榨取之支點；更爲包藏一切貪官污吏搆逃民衆血汗之軍閥土豪紳士及反革命叛徒之天堂。此等賊徒叛黨，朝括有所得，夕卽輸之租界，盡情揮霍，明朝又因帝國主義者之援助播弄得入內地重行席捲劫掠生產民衆。故沿海口岸租界。爲內地人民膏血之吸引的貯積場。現在再分析中國各級被壓迫剝削民衆之景況：佔全人口約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尤其是佃農及僱農，他們已苦無土地可耕；卽重租所佃之土地，其生產所得之餘，亦爲剝奪征取殆盡。因此顛沛流離，無以爲生，或過地域

界的非人生活，他們不絕與鄉村及城市之仇敵爭鬥。他們由各個鬥爭失敗之經驗，必能於最近與城市之革命勢力重心聯合，以作大規模組織的解放爭鬥。他們的勢力，必為中國革命的重要成分。新興產業工人，數量雖較農民特少，而因其生活刺激較為強烈，及經濟政治環境惡劣之故，其對於政治的覺醒程度，實較任何階級為高；其爭鬥決心，實較任何階級為堅決。其對於革命之成績貢獻，已為數年來中國歷史上不可磨滅之事實。他們必為中國革命之機輪。手工業工人及小商人，因失業破產而淪於滅亡者，不可勝數。他們的政治覺悟，不如產業工人，而在爭鬥之必要上，他們必須在城市或鄉村中加入革命之行列。青年學生，百分之九十九出身上述窮苦破產或將破產之家庭，一方面無求學之機會，一方面無謀生之方法；故除一小部分為舊勢力所矧持收買利用以外，大部分必須走入革命的隊伍。因此，中國被壓迫剝削的革命民衆為：工、農、手工業者、小商人及青年學生。其對抗的仇敵為：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地主，土豪紳士及其他們相結之高利資本家者。中國之經濟組織，雖十分落後，還未曾達到完全工業革命的時期，但因其特殊之政治境遇，最受壓迫剝削之農工羣衆，成為革命的政治鬥爭之主要動力。少數的資本家，不與封建勢力聯盟反動，即寥落不足數。其必不能欺騙工農民衆以收資本主義革命之漁利，蓋可斷言。而中國革命之結果，其政權主要的掌握在工農為中心的平民羣衆手上，其經濟建設，必超越資本主義之毒害向社會主義前進。中國國民黨即本此使命在其偉大的領袖孫中山先生的精神領導底下，

去團結領導被壓迫剝削的革命民衆，向一切反動仇敵進攻，得到最後的勝利——把三民主義的革命綱領完全實現。抑尤有進者：中國革命，其勢力所在，不但有國內之多數工農及其他革命民衆；并且中國革命是由廣大工農羣衆勞動，其利害實與全世界工人相關。因此，必能得到世界革命的工人同情。又因其受帝國主義的侵害而圖謀反抗，其利害與一切被壓迫民族無殊。因此，又必能得到一切壓迫民族的同情與援助。全世界的革命民衆及其政黨表示深切的同情，且更認為世界的革命政黨爲牠的革命朋友。本黨更認定過去的缺憾，過失，悉爲本身組織不良之故，以致歷年不斷的受舊勢力的侵入欺騙反叛，妨害革命的效果；此後當特別努力於組織的健全，使一切投機巧騙份子不能依附潛入。本委員會特本此意旨，與全黨同志之希望，臨時組織此行動委員會。本會之責任，在：宣告南京武漢的偽黨部中央之罪過，以革命手段中止其受第二次大會委託之職權。並臨時行使革命指導之機能。一面迅行籌備召集全國各省市代表大會，以選出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行使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一面籌備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以解決一切革命問題，並重行選舉正式中央執行委員會。本會職權。到全國各省市代表大會成立日起，即行取消，以明責任。

目前中國之反動勢力，雖極其殘暴兇惡，而國內勞苦民衆之覺醒來衝破反動的營壘，得到最後的解放和勝利！

中國革命萬歲！

世界被壓迫剝削人民解放萬歲！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

十九年九月十五日對時局宣言

自從民國十六年七月以後，本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已入於失敗時期，南京派的叛徒背叛民衆於前，武漢中央的上層領袖們亦降服南京於後。中國人民迫切的要求，民族的解放，民權的確立，主義的實現，早已爲南京及武漢派的上層領袖所丟棄，而先後變爲：投降帝國主義，軍閥專政的官僚統治與野蠻狠毒的屠殺剝削，較之從前北洋軍閥時代尤爲殘酷。本黨唯一領導者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與主張，已全部被那些叛徒們所拋擲。所謂國民黨機關，都已變爲掠奪人民，屠殺人民的中樞。革命的中國已變成昏暗無光的地獄。

本黨一部分的中央同志，及各地方負責同志，因爲要挽救革命的失敗，要實現革命的主張，要繼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使命，以貫徹革命民衆的要求，乃在中央領導機關破產以後，於十六年十月有本會組織。

三年以來南京的極端反動政權，使人民痛苦日益加深。更有所謂武漢中央的反動叛徒，因被南京拋棄之後，假反蔣之名，與最朽腐的北洋餘孽及官僚政客相勾結，以構成北方的軍閥官僚統

治——北方政府——，希圖與南京政府作屠殺人民掠奪人民的比賽。全中國痛苦無告的人民完全在這種重重壓迫上倒懸着。在此種嚴重局勢下面，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特鄭重的對全國國民衆宣言：

中國人民痛苦的原因是帝國主義及本國官僚軍閥的聯合統治所構成的壓迫與剝削，因為這兩種勢力的互相勾結，使內戰不能停息，而國民經濟日即於破產。故中國革命的目的在：肅清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推翻千餘年來的官僚統治及軍閥統治，由人民自己行使政權；發展產業，並使產業組織化社會化。向着這個目的底運動是革命運動，違背這個目的底運動或禁抑上述運動的是盲動及反動。

南京的政權開始即與革命民衆對抗，屠殺人民加緊剝削人民。變民衆運動爲屠殺恐怖。變二五減租爲加倍交租。變保護佃農爲保護地主。變加工資加薪餉運動爲減工資減薪餉的命令。變青年運動爲蒙蔽青年屠殺青年。變發展產業爲消滅產業。變減除苛捐雜稅運動爲加捐加稅勒捐軍餉勒派公債的苛政。變打倒貪官污吏爲獎勵貪官污吏。變言論自由爲言論箝制。變國民會議的要求爲軍閥獨裁爲閹宦政治。變打倒帝國主義運動爲投降帝國主義。這些壓迫人民反剝削人民的手段，只有日甚一日。這種反動的黑暗統治如繼續存在，則人民有饑餓，恐怖，死亡，或被屠殺。我們全國被壓迫的民衆必須推翻南京的反動統治，才能够得到出路。

北方政府實爲北洋軍閥的餘孽閻馮等與西山改組政學交通安福等系的政客官僚士大夫的集團。他們與南京一樣的壓迫民衆。一樣的代表豪紳剝削農民。一樣的壓迫工人。一樣的聚斂青年屠殺青年。一樣的加捐稅勒捐軍費，徵用民物。一樣的縱容貪官污吏勒索人民。一樣的箝制言論。一樣的行軍閥獨裁及官僚政治。一樣的使工商業凋落。一樣的反蔣只是希圖擴大軍閥官僚政客士大夫的地盤及權利。牠和南京政府一樣的是人民的仇敵，是革命的仇敵。必須根本推翻牠，人民才有出路。

在上述那些反動與惡劣勢力籠罩之下的中國，國民經濟現在已到了完全破產的地步。農民輟耕，工人失業，商工業破敗。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現在無地可耕，或耕作經年而不得一飽，因此流爲土匪，兵士，奴隸，實爲全國變亂主要原因。而帝國主義與新舊軍閥之間尚在互相勾結，造成國內繼續不斷的軍閥混戰，使民生日趨凋敝，民權日就墮落，民族頻於危亡。本會負有復興中國革命的使命在此革命生死存亡的關頭，不能不號召全國被壓迫的民衆起來，反對國內的軍閥混戰，主張在孫中山先生遺教之下，由民衆自動的召集國民會議。由國民會議解決一切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特別是要儘先對外宣布無條件的廢除不平等條約，對內立即實行耕者有其田，使土地問題澈底的解決，與發展國民經濟。務使人盡其力，地盡其利，財盡其用，貨暢

其流。使國民經濟日趨繁榮，使軍閥政治永絕根株。使帝國主義的列強無從施其勾結侵掠的伎倆。則中國的自由平等可期達到，中國革命亦可成功。

國民會議在目前是復興中國革命的最急迫的工作。國民會議的構成應以十三年冬孫先生彌留時所發表開國民會議的方案與目前民衆的現實要求爲基礎。所以我們現時最主要的工作要聯合起中國的被壓迫人民，在各種職業（農工商業）及準職業（如學生婦女，兵士警察等）團體的組織上面團結起來，自動去開國民會議。由各種上述的團體代表，按農工代表佔百分之六十，其他的代表佔百分之四十的比例去組成國民會議，以推翻軍閥官僚的統治，形成人民自己的政權。必須我們自己有了政權才能有力量去解決土地問題，及取消不平等條約；才得到和平，永遠停止內戰。我們所要的是自己的政權，因此我們所主張的國民會議是真正人民代表所組成的國民會議，絕不是袁世凱式的欽定約法會議，或段祺瑞式的善後會議，及最近北洋軍閥及改組西山等系的政客所主張的預備立憲式的恩賜國民會議，這些只是造亂毀國的把戲，絕不會得到永久的和平。祇有我們廣大平民羣衆自己的覺悟，自己的組織，可以形成堅強的力量，可以形成真正的國民會議，以發動革命，保護革命，完成革命，實現永久的和平。

本會負着中國革命的責任與使命，牠必然要在痛苦民衆的先頭，向一切反動的仇敵衝鋒。牠更準備着在最近期間奪取新的革命根據地以集中革命勢力，振起中國人民革命的力量與自信，去

完成革命的任務。

全國痛苦的同胞們！大家起來！大家團結起來！

推翻現時的軍閥統治！立開國民會議！

實現永久的和平！

完成中國革命！



二十年四月反對南京偽國民會議宣言

反動的南京統治，自從一九二七年（民十六年）利用人民的力量戰勝了北洋軍閥以後，即行建立。四年以來，反動統治的工作祇是：壓迫及屠殺人民；勾結帝國主義，由秘密的賣國到公開的賣國；拼命掠奪人民以供官僚軍閥威靈俸底揮霍。統治的成績是：全中國國民經濟破產，人民餓死的千萬計，被殺戮的以百萬計，現時還生存的是不知死所！共產黨即乘此機會行其盲動亂動的陰謀，以加大破產的速度，以陷全國人民於死地。

反動的南京統治知道現時這種狀況不能繼續下去，知道牠自己的危險迫在眼前，知道牠從來的威脅利誘政策不能鎮壓人民的反抗。因此牠又改換腔調，想用偽造民意的方法以欺騙人民，以減少牠自己賣國殃民的責任。這就是南京五月五日所要召集的欽定御用的傀儡會議——所謂國民會議底由來！

南京現時所製造出來的偽國民會議，祇是軍閥官僚買辦洋奴地主豪紳黨棍學閥的代表機關。

這些「代表們」都是屠殺人民的兇手，剝削人民的貪污官吏，蒙蔽欺騙人民的教師，所以由他們

構成的是十足的反革命御用機關。牠只有容讓反動統治的一切。

在這種全國危亡，農工平民大眾完全無所依歸不知死所的關頭，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特鄭重的對全國人民宣言：

中國現時唯一的生路是平民革命。唯一的生路是由廣大農工平民大眾一齊起來推翻現時的軍事專政及官僚政治，以人民自己的力量構成平民政權，實現全國的和平與統一，進行新國家的建設。爲達到上述的目的，我們固然需要國民會議。現時南京御用的國民會議，祇是人民的仇敵所構成，所以我們要堅決的反對牠。我們認爲：要救中國於危亡，救人民於死地，必須推翻南京反動統治。

本黨對於國民會議的主張已於去年（十九年）九月十五號發佈於宣言中。以後，南京宣佈召集偽國民會議的時候，本黨更詳加指出其欺騙及包辦陰謀。不幸現時已一一不出所料！

現時全國人民的唯一任務是：全體起來反對反動的偽國民會議。否認偽國民會議一切決議和行動。推翻反動的南京統治。由人民自動的召集國民會議，以解決人民所要求的問題。現時我們大家已在生死的關頭，祇有堅決勇敢的革命行動。是起死回生的辦法：

1. 全國農工平民大眾一致團結起來！
2. 推翻反動的南京統治！

3. 反對偽國民會議！
4. 否認偽國民會議之一切決議和行動！
5. 人民自動召集國民會議！
6. 建立平民政權！
7. 打倒帝國主義！
8. 解決耕地問題！
9. 發展國家資本！
10. 促成社會主義！
11. 完成中國平民革命！



革命行動發刊詞

自民國十六年革命失敗之後，整個的中國復由更反動更黑暗的勢力統治着。日常的生活祇是恐怖，屠殺，飢餓，死亡。

南京統治及北方擴大會議現時正在向帝國主義者爭寵，對民衆行屠殺掠奪的比賽，要使中國人民永遠沉淪，要使中國永遠成爲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歷史告訴我們：中國現時所需要的是民族的平民的解放，中國人的事要由中國人解決，也只有中國平民自己可以解決。

我們在這層層圍攻的地獄裏，我們祇有認清我們的使命與目標，向着仇敵們突擊，才能衝破地獄，得到出口。本刊同人本着他們自己的責任，在本刊發表平民的呼聲與鬥爭的意志，要喚起全國被壓迫被剝削的平民羣衆，在我們的革命綱領下面團結起來，準備向仇敵們決鬥。

政治主張

目錄

- 一 中國社會的結構
 - 二 中國社會的歷史前程
 - 三 我們的爭圖目的
 - 四 我們的爭圖手段
 - 五 我們具體的方案
1. 平民政權之建立
 2. 外交政策
 3. 經濟政策
- A 對外經濟政策
 - B 對內經濟政策



(一) 金融機關有及一般的財政政策

(二) 大產業，關鍵產業，獨占性產業的國營公營，及促進合作社的組織

(三) 『耕者有其田』及一般的農業政策

(四) 城市及農村經濟發展的均衡

4. 社會政策

5. 文化政策

一 中國社會的結構

政黨負着解決政治問題的責任，而每個政治問題都是經濟及社會的要求的反應，也可以說是在某個時代裏特定的社會的全般結構的反應，所以我們先要明白了解中國社會的結構，然後才能着手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現時的中國究竟是一個甚麼社會呢？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有下列的幾種，可以代表流行的見解：

第一個答案：中國現時還是封建的社會

第二個答案：中國現時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社會

第三個答案：中國現時正在由末期封建社會及「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向着資本主義社會過渡。上面的三種答案，各各言之成理，相互排擊詆毀。究竟那一個對呢？我們以為必需先有正確的定義和科學的根據。才不致陷入錯誤的爭論。並且我們知道，要了解一個社會的全般結構，必須從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三方面去觀察分析，把牠們的結果綜合起來，然後才能得一個明確的結論。我們現在先下封建社會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定義。我們認為封建社會的經濟方面，主要的是：以政治的力量佔有土地的地主對農民（或農奴）行生產品之剝削和掠奪，並壓迫農民做無償的勞役，所謂自足自給經濟佔社會經濟統轄地位。封建社會的政治方面，主要的是：居統治地位的階級是廣大土地的佔有者，他們有軍民財政的全權。封建社會的社會方面，是：在這個社會內有梯子式的階級或身分差別，各階級和各身分中間有嚴整的界限，如地主和農奴，商人和貴族，手工業的雇主與學徒，地主與王侯等等。反映這個梯子式的階級和身分差別的社會意識是「名分」「禮教」，是「上下有序」「尊卑有別」的要求，是主奴從屬主義。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方面，是：工廠工業的大規模商品生產佔社會經濟的統轄地位，生產者主要的是工錢勞動的工人，他們和生產手段分離。資本主義的政治方面，是：工商業者及金融資本家居統治階級的地位，國家政策，視工商業者及金融資本家的利害為轉移。資本主義的社會方面，是：社會的階級差別，主要的是工錢勞動的工人和資本家，而流行的社會意識是自由主義，是個人主義。

定義既經確定，我們再去考查中國社會客觀的內容。

如果我們只是根據西北西南等落後省區的社會結構來說，那我們就很容易肯定第一個答案，以爲中國現時還是一個封建的社會，因爲在這些區域內面還是以自給自足的經濟爲主，官僚政治的封建性更保存得完整，如甘肅馬氏，不但自身擁有廣大土地，而且累代爲官，官衙的徭役供應還是十分盛行，在許多地方，人口的買賣，奴婢的養育，等等，是公然由社會官廳承認的。

如果我們只是根據沿江沿海鐵路的地區的經濟結構來說，那我們又容易得到第二個答案，以爲中國已經是形成了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因爲不但那些地方的農村經濟已經完全爲資本所統治，農民爲商品而生產，而且在都市中已經有近代資本主義的影像，新式工廠到處可見。

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如下的事實：70%以上的人口住在農村中。差不多80%的人口住在城市中。差不多只有30%的人口住在有新式工業影跡的城市裏。其餘的城市差不多只是行着簡單再生產的手工業及半農業的城市。產業工人的數量，連煤礦工人及碼頭工人計算在內也不過佔全數人口0.5%（千分之五）在各地農民所生產農產品當中，自行消費的，平均約佔20%拿去和手工業及機器工業製品交換的平均約佔20%其餘的40%的農產品是被地主，商人以田租高利貸及「不等價交換」（商業的欺騙），等等形式，被政府以捐稅徵發掠奪的形式剝削了去。再從工業的消費量來說：農民每人每年平均收入約爲三〇元，其購入工業品的價值至多爲收入的10%，城市

人民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約爲五〇元，其購入工業品價值多至爲收入的 $\frac{3}{5}$ 。又中國人民全體所消費的工業品中由外國輸入的約佔 $\frac{1}{5}$ ，由本國自製的約佔 $\frac{4}{5}$ ，而且本國自製品中，手工業生產品約佔其大部分，由新式工業所製的不過佔其小部份。又，在中國的新式工業當中由外國人資本經營的佔 $\frac{80\%}{100}$ ，本國人的不過佔 $\frac{20\%}{100}$ 。如果我們考慮這些事實，那麼，就可以得到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影像：中國的社會經濟從主要點說，實在還是在農業手工業生產的階段中。在這個階段中地租雖然以土地私有及自由買賣的形式發生出來，而實際上主要是由政治掠奪發生的。商業資本的高利貸和不等價交換，雖行着極凶暴的積累，而不過是工業資本發生以前的現象，並非近代資本主義（工業資本）的本質。其他官僚的剝削及政府的捐稅也是封建政治的附屬物，與貢賦徭役實無二致。微弱的本國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一方面受着帝國主義的壓迫競爭，他方面因爲農村破產的緣故，得不到消場，所以不但不能發展，而且最近有日行破產的現象。因此，爲中國社會經濟的主體之農業手工業生產，一方面因政治的掠奪及帝國主義經濟的競爭而日就崩壞，他方面則無法過渡到一個近代資本主義生產的新階段，只是殘留在原日的階段中，不絕的朽腐，不斷的爭扎，這個就是從經濟方面觀察中國社會所得的結果。

在政治方面，我們知道：現時中國的政治組織是封建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雖爲歷朝統一的集權組織的骨幹，而實則每個行政區域內的官僚首長都保有任免下級官僚及自行徵收賦稅訓練

兵馬的全權。強盛如元代及清初的統治，皇帝且不能多所過問，更不必說到每個朝代的衰微期和現時的腐敗統治。中央政府徒具形式的統一規模，一切放任於省區的官僚（曹吳時代有巡閱使現時有幾省剿匪司令）省區的官僚更委之于縣（清代更有道，府，州，等）最後才有縣官的爪牙聯絡着紳士們（士大夫或地主）去宰制農村。每個官僚形式上是對職守負責，而實際是對他們的主人（長官）個人負責。這樣形成一個多階層的統治。各個階層，都是以首長官僚為中心，而以血緣及過去的主屬關係去團結及佈置爪牙僚屬，構成一座很高的而專以壓迫剝削人民，包辦軍民財政為務的金字塔，塔底是農民及其他平民羣衆，塔尖為皇帝總統或主席總司令。從官僚的出身來說，他們都是士大夫，商人不過佔少數的一部。士大夫抵是由地主或其他佔經濟特殊地位的家庭出身，即不然，也會在服官以後很快的變成地主，和其他經濟的統治者。士大夫的意識主要的，是禮教和名分。因此我們要斷定，中國的政治組織，實際上還是變形的封建統治。

在社會方面，我們知道農村中，特別是南方的農村中，還帶着很濃厚庶民族社會的色彩。差不多在全國中，血緣關係是支配社會生活的中心。婦女固然是普遍的奴屬於男子，而奴婢僕役的買賣及處分尤為地主家庭中自由的事件。士大夫的「禮教」「名分」的意識支配着社會的大部。

像這樣的一個社會的全般結構，我們固然不能根據牠去承認上述第一說，以為中國還是一個封建社會；同時我們也不能根據牠去承認第二說，以為中國已經是近代資本主義的社會。我們只

是認爲，中國現時的社會，在形式上固有異於古代的封建制度；但，就其內容的性質而論的確還離不了封建勢力的支配。因此，整個的中國社會，還滯留在封建勢力支配階段，還是前資本主義的時代。同時又因爲帝國主義勢力支配着中國的緣故，使中國社會益呈複雜的狀況。這兩種支配，都是使中國社會不能向前進展的大障礙。

（註·上文的數目字係以現存的統計及記錄爲基礎引申出來的，不十分可靠，但大概可以相信的。）

二 中國社會的歷史前程

由上面的分析看來，中國實在是一個很複雜的社會，而構成中國社會的封建殘餘成份及前資本主義的成份實比其他的成份較多而且重要，現在我們要問：中國社會底歷史前程到底是什麼？我們在答覆以前，先要限定問題的意義：如果題意是指較遠的將來的前程，那麼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是社會主義的社會，因爲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的歷史前程，中國不能獨在例外。但是我們現在所要求答覆的是緊接着中國社會現階段的前程。

推測一個社會的歷史變遷，應着眼於下述的事件：第一，一般的經濟條件；第二，各階級的

力量。我們現在應用這個觀點去推測中國社會的歷史前途。第一，從一般的經濟條件去考察。

根據上述的分析，中國的社會經濟現時主要的還停滯在封建殘餘及前資本主義的階段。因此，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實未曾具有。現在要問：是否中國必需經過資本主義的革命，形成高度的資本主義，然後才能過渡到其他的社會形態？

我們的答覆是否定的。為什麼呢？

1. 因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半獨立的國家，主要的國民經濟機關都在帝國主義者手上，帝國主義者一面挾其高度資本主義大量生產的商品和巨額的過剩資本以破壞中國的農業手工業經濟，同時壓抑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使之不能長成；他方面更挾其政治的力量以延長中國內戰，使中國不能得到資本主義所必需的統一，以維持帝國主義者自己的統轄地位。中國的資產階級實無獨立的進行資本主義革命的能力。帝國主義者固然不許中國平民羣衆行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也不許中國資產階級形成與帝國主義競爭的中國資本主義。

2. 因為現時的中國是處在生產技術十二分發達的時代中。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歐美各國的革命，固然類似中國現時的革命一樣，同是推翻封建勢力，消滅障礙生產力發展的因素底革命；但是，當時歐美各國的生產技術比較現時世界的生產技術實在已有天淵之別，因此當時歐美各國的革命，不但因為領導革命的是資產階級，要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而且在生產組織上亦非形成目

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不可。在現時的中國如果平民羣衆掌握政權，如果農工階級能成爲政權的重心，則必然能變於現時歐美資本主義的覆轍，開始即應用現時的生產技術以建設國營及公營的大規模的產業，並能運用政權，防止私人資本主義的弊害，使資本逐步的社會化，絕不致於以利潤，利息及田租等形式把資本化的剩餘生產物積累在私人手裏，重新形成私人資本主義。

第二，從各階級的力量去觀察。

1. 我們首先估量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中國的資本主義因受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壓迫束縛的緣故，不能順利的發展。以致本國的資產階級並非單純的工業資產階級，而是與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及地主等相結的買辦，高利貸者及商業資本家爲多，即極少數的新興民族資產階級，也是依存於帝國主義的政治及經濟的勢力以保障資本的安全，因此本國的資產階級的政治意識是暗昧的，牠們一方面不能澈底的掃除封建勢力，無力改造落後的經濟組織，他方面不能堅決的反對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

2. 其次再估量中國大多數平民羣衆特別是農工階級的力量。中國大多數的平民羣衆，特別是直接生產者的農工階級，牠們在數量上佔中國人民的絕對大多數，牠們在政治上受着嚴重的壓迫，在經濟上受着慘酷的剝削，十二分的需要解放的爭鬥。牠們現在雖然因爲反動的政治壓迫，大部份無法進行直接鬥爭的工作，却是已經有不少的份子從事鬥爭，客觀上，在不遠的將來，那

些被壓迫剝削的大多數平民羣衆必然的會參加偉大的政治鬥爭及經濟鬥爭。也必然是要牠們參加政治的鬥爭，才能形成代表牠們自己利益的平民政權；要掌握了政權，才能進行經濟解放的工作——向着無剝削的社會前進。資本主義的建設對於廣大的平民羣衆，特別是農工階級是無益而有害的事，因此覺悟的農工大衆，絕不會在自己掌握政權之後再去倣效歐美，形成近代的私人資本主義。

因此，從各階級力量去觀察，我們可以決定，需要社會主義的農工大衆力量，現時已比資產階級爲大，而且在最近的將來還要迅速地增強擴大。

我們綜合以上的觀察，知道中國只有兩條出路；或者是淪爲國際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叫中國永遠受帝國主義的支配；或者是由中國大多數的平民羣衆自己起來推翻帝國主義及封建軍閥的統治建立平民政權，進行經濟的解放。

如上所述，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在中國雖還未曾具備，但是處在生產技術十二分發達的今日，如果以農工爲中心的平民羣衆能奪取政權，則必能立即運用國家力量，進行國營及公營的大規模產業建設，防止私人資本主義的弊害，發展生產，爲產業社會化的基礎，向着社會主義前進。像這樣的經濟政策，爲由現時前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辦法，這種過渡期的經濟組織，我們可以叫牠做國家資本主義。

國家資本主義的內容與趨向是因執掌政權的階級分別而不同，即：如果政權在資產階級手裏，則此種組織適為高度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對本國的勞動階級行高度的剝削與對敵國競爭的工具，現時的德、美、意，日均有此種顯著的傾向；如果政權在廣大的勞動民衆手裏，則能在產業大規模發展的條件下面，使資本逐漸社會化，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工具，現時的蘇聯已採用這種組織的辦法。我們所主張的國家資本主義，當然是平民政權下的國家資本主義。

我們認為運用過渡期的經濟政策——國家資本主義的組織——為平民政權建立後必然的出路。祇有這種出路可以解放中國人民，可以達到社會主義。

三 我們的爭關目的

上述的中國社會的歷史前程，是客觀的必然的趨向，然而却不是不須革命的鬥爭就可以自然而然的發現出來的，並且，只有在革命的鬥爭進程當中才能實現出來。

我們相信，實現上述的中國社會歷史前程的革命，不是一個單一姓的革命——不是純民族革命，不是純民主革命，不是純社會革命——而是一個複雜性的一種革命，具有民族，民權，民生三種革命性而以社會主義為歸宿的革命。我們更相信，這個革命不是先後繼起的三個革命——民

族革命，民權革命，民生革命——的歷史階段合成的，而是以同時並存的三種革命對象——帝國主義者，封建軍閥地主，以及依附前兩者爲生的高利盤剝的，反動的資本階級——爲對象的。這種特殊的革命方式，是由中國的特殊條件所決定，而中國廣大的平民羣衆底參加革命的鬥爭，實爲決定將來中國命運的樞紐。

孫中山先生的主義，完全是適應上述的環境和要求而生的產物。因爲他一向站在大多數平民的立場上，所以他的思想內容，自始即沒有離開社會主義的道路；尤其是他晚年的主張，很明白的指示我們向社會主義的前途去奮鬥。不幸孫先生的叛徒們，非特曲解了三民主義，而且還假借孫先生的名義去作他禍國殃民的掩護。這麼一來，不獨革命中斷，而且把三民主義弄得撲朔迷離，爲民衆所厭聞，好些革命份子遂亦因噎廢食，想拋棄了三民主義去別求途徑。

我們堅決的相信，三民主義這個名稱雖然被叛徒們所盜竊，牠的內容雖然被叛徒們所曲解，但三民主義的真相，却並不因此而受絲毫損失。我們要努力去打倒這些叛徒們，恢復中斷的中國革命。只有使三民主義更加具體化，使牠更加切實的適應大多數平民羣衆的要求，並堅決的使他們的要求實現出來的人們，才是忠實的中山主義的信徒。簡單一句話，我們的鬥爭目的就是實現三民主義。具體的說，我們爭鬥的目的，是要澈底的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要使平民羣衆取得政權，要實現社會主義。

四 我們的爭鬭手段

我們已經明白了我們的目的，我們必須更進一步的去找出實現目的的方法，這個實現的行程，就是我們的爭鬭的手段，我們應取的主要方法是下面這樣：

1 要澈底的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一定要喚起並組織廣大的民衆，使其覺悟的參加反帝國主義的鬥爭。只有廣大的民衆覺悟起來，組織起來，才能無畏的反抗帝國主義之鬥爭，直接由國民會議決定，立行取消一切不平等的條約。復次，我們相信：中國革命可以擴大並影響於被壓迫民族與階級的解放鬥爭，同時世界被壓迫民族與階級的革命運動也可以促進中國革命，聲援中國革命

中國革命的勢力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工作中可以並且應該與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階級聯合起來作爭鬭的同盟。所以孫先生臨死的時候還要囑告同志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我們一定要聯合以平等待我的 命勢力及民族，而排斥及抗拒不以平等待我，蔑視中國民族要求的勢力及民族，才能解放中國。

2 平民羣衆要取得政權，必定要用平民羣衆的本身組織形成堅強的力量，去推翻千餘年來傳

統的官僚政治。過去的換朝與革命，都只是新舊的封建統治者的交替，新舊的士大夫階級
的交替，和人民隔離。所以人民必然會受欺騙。過去的豬仔議員及最近的「黨衙門」都是
好例。即虛偽民主的歐美流行的代議制，也不是廣大平民羣衆要求的制度，他們所要求的
是和人民利益關切不離的政治權力與組織。

3 要實現社會主義。一定要在以直接生產的工農爲重心的平民政權確固以後，運用政權去發
展生產，統制生產，使生產組織化及社會化。

五 我們具體的方案

上面所說的，只是些要點，現在更把各種問題，做一個具體的說明。

1. 平民政權之建立

平民政權涵義和先決條件。政治制度是政治爭鬥的結晶，因此所謂政權是統治者權力的具體
表現。我們的黨是代表大多數勞動羣衆利益的黨，黨的要求是大多數勞動羣衆的要求。凡是自
食其力而不剝削他人的，無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參加生產行程的份子，都應該是勞動者，也就
是我們所代表的人們：如直接參加生產的各種工廠工人，手工業者，自耕農；佃農，雇農，及

設計生產，管理生產與担任運輸分配等等及其他輔助社會生產的職業人員。這些直接的及間接的參加社會的人們都是被現存封建勢力及資本勢力壓迫着，都是要求解放的平民。所以我們總稱上述這些人們爲：平民羣衆。這個廣大的平民羣衆既要解放，自然要奪取政權。這個已經奪取得的政權，必定掌握在平民羣衆手裏，因此我們叫做：平民政權。構成平民羣衆的工人與農民，因爲他們所受的壓迫最爲利害，更因爲數量較多而爭鬥較勇的緣故，必然的成爲平民羣衆的重心。因此所謂平民政權，就是以工農爲重心的爭鬥同盟。并藉參與政權的比重，保障這個重心。奪取政權的過程就是廣個廣大的平民羣衆向目前的統治者作經濟的和政治的爭鬥，即等到推翻整個的反動統治，確實建立自己政權爲止的過程。

建立平民政權的先決條件是形成平民羣衆本身的組織。無組織的平民羣衆至於一盤散沙，雖多無益，只有堅強組織之下，平民羣衆才能發揮他們的偉大的威力。在今日的中國，在平民羣衆的組織當中，最切實的莫過於職業組織，如工會農會等。只有職業組織能使從事各種生產的平民生切發的利害關係，只有職業組織能够團結他們。其次重要的是準職業組織，如學生會，婦女組織，兵士組織等等。喚醒平民羣衆和組織平民羣衆：這是平民政權的必要先決條件。只有這樣才能真實的集中平民力量，只有這樣才能有力量從根本上推翻官僚政治，軍閥勢力及其他一切封建遺骸，而把政權收歸平民手裏。主張平民革命而不盡全力

去喚醒平民，組織平民，從事於政治和經濟的鬭爭，等於自欺欺人，完全是假革命的行為。至於害怕民衆組織，藉口於民衆組織之不易節制而去禁抑輻的人們，那當然無疑的是反革命了。

平民政權的組織，要收平民政權的實效，必須以有組織的職業團體代表構成中央及地方的政權的發動機關。因爲只有如此才可以使參加生產各部門的民衆確實的和政權聯接而不發生隔閡；只有如此才可以澈底的掃除官僚制度及軍閥政治的積弊，不再發生新的官僚政治。同時，我們以爲：歐美流行的地域選舉代議制度，容易釀成少數操縱多數的弊害，此種弊害與中國過去的「豬仔議員」及現在的「黨衙門」等怪象都是因爲民衆和政權隔離，才會發生，要消除及預防上述的弊害及怪象只有由職業團體代表掌握政權的方法。

我們主張：各職業團體及準職業團體應按下列的比例數派遣代表以組成全國最高權力機關的國民大會：

直接參加生產的農民工人占80%

其他各職業團體及準職業團體占40%

臨時接收政權，議訂憲法的國民會議，應按此原則組成之。各地方權力機關應以地方的職業團體爲單位按上述原則組成之。

必須用這樣的組織才能使平民羣衆相信革命黨的領導，才能免除那些假借「訓政」及「以黨治國」的名義去壓抑平民羣衆剝削平民羣衆的流弊。其次，我們反對歐美流行的三權分立制，而主張立法機關不與執行機關分離，一切權力屬於國民大會，在國民大會之下設立執行機關。各地方的權力機關爲省民大會，縣民大會，鄉民大會等。

c. 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 我們認爲，在歷史地理及經濟的條件上，過去的中央政權都只是形式統一，並且妨害了地方人民的發展。我們主張，應將中央權限縮小至最低限度，除外交軍事以及關係全國產業統制，全國的交通及全國的財政事項，等等必須中央舉辦者外，其餘應由各地方負責自行治理。只有這個分權的原則，才能使龐大而落後的中國，向上發展。當然我們是要堅決的反對一切軍閥割據式的「聯省自治」和無政府的「分治合作」。在另一方面，我們主張，應於最短期間根據經濟地理國防的種種條件，將現今的省區，從新施行一種合理的劃分，因爲這樣才能使各省區均等發展。

d. 政權的保持 要從根本上撲滅軍閥產生的根源，必須做成人民的武力。過去數年來的事實已經昭示我們，人民武力不是單靠什麼「以黨治軍」「黨權高於一切」的空話可以做成的。要建設人民武力，必須一面限期實現普遍的徵兵制度，一面暫時用職業團體強迫徵兵的方法，使各生產部門的民衆，在取得政權以後按額抽丁入伍，組成真正人民武力以保護革命。只有

由有組織的城市並鄉村的平民職業團體確實的掌握政權，才能使廣大的平民羣衆熱誠自動的形成自己的武力，保持自己的政權；所以平民的職業團體的政權和人民的武力二者有不可分的關係。

2. 外交政策

3. 國際的形勢 大戰以後的世界顯然的區分成四種力量。這四種力量之一面是獨自形成，一面是互相交錯的影響或排擊。我們中國的革命，是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環扣，是重要的一頁。所以要了解中國革命與世界的其他政治力量的關係，就不能了解現時支配着世界政治的力量因素：

一、帝國主義者的力量——帝國主義者的基礎雖在牠對牠本國的生產者並消費者的剝削，但牠牠的生命却是依存於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剝削的。所以各帝國主義者對於市場爭奪彼此間雖有不可調和的衝突，然而同時却也因此各帝國主義者才會對於革命勢力——尤其是殖民地及半殖民地的革命勢力——的鎮壓有其共同的利害，常常聯合起來。

大戰以後美國的帝國主義已經有壓倒英國的帝國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以一九三〇年初的倫敦海軍制限會議表現得最明白。支配了世界大部數百年的英國帝國主義，自從歐戰以後，一方面市場縮小，工業衰頹，資本輸出減少，無法避免國內的社會鬥爭的擴大。他方面更不

能抵抗日美的進攻，使原日在南美，加拿大，南洋羣島印度等的地方政治的及經濟的支配勢力大大的縮退，現時的英國正在防禦戰的時期。這個防禦戰的陣綫，在歐洲，是被美國所威脅，不能不對大陸——尤其是對法——收英美協調的形態；在亞洲，是被埃及，印度與正在興起的中東革命所威脅，作繼退却前的反攻，對於日本作繼續的讓步。這道防禦陣綫一方面是爲維持帝國主義聯合的依據，他方面却是構成帝國主義者互相衝突的預備。「團結大宗主國與殖民地自治邦，構成親密的經濟聯盟」，爲目前英國的政策要點。但是這種政策只是病者無聊的哀號，決不是真能做到的辦法，因爲殖民自治邦已經大部份具備了獨立的條件。

一九二五年五卅以後直到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的前夜，英國在華的經濟勢力幾乎爲日本所侵代，因此英國的東方政策在此時期爲退守的時期，而聯美抗日的傾向十分明顯。濟南事件以後英國對日的經濟爭鬥已入於反攻的局面。日本的讓步與最近美國新經濟力的來侵，引起英國在東方有聯日抗美的可能傾向。因此整個英國在中國的政策是往復於聯日抗美及聯美抗日之間。

美國在大戰以後已成爲世界金融資本的中心，並且差不多享有全世界主要生產額之半。牠一面挾其過剩的資本，使世界各國，尤其是歐洲及南美，加拿大等，爲其政治的經濟的附庸；他方面更因爲牠本國的工農業能相對的平均發展及有很大的消費力的緣故能盡量的行高度

合理化的生產。但是，現時生產過剩的危機却首先由美國爆發。美國內部的社會危機，現時並不比任何國家爲小，因此美國帝國主義向外發展的要求，必然更加迫切。

美國對於中國的策畧始終是以「門戶開放」爲口號，想用純然的金融資本的勢力，使中國加速的殖民地化。牠想幫助南京政府用武力去統一地方軍閥；正因爲他想藉此：第一，打破各地方的英日勢力；第二，討好於希望統一的多數國民；第三，鎮壓中國的革命勢力；第四，直接扶植中國新興的資本階級，使爲己助。總而言之，牠是想藉此以發展他的帝國主義的勢力。他對於蘇聯東部也有拓殖的企圖。像這樣的太平洋獨霸政策，必然的要和英國及日本衝突，雖然他在歐洲現時與英國正有協調的姿勢。

日本，自歐戰以後，資本主義的發展，加速的前進。他的市場差不多一半依靠中國印度及南洋，一半依靠南北美洲。他的工業原料的取給大部份是依靠中國。他的投資經營，在中國東北及東部已經有根深蒂固的基礎。因此，日本資本主義的運命，完全依存於中國及美國。更因爲敵對美國及英國的緣故不能不在中國確立更穩固的根基。這種要求就是日本對華政策的出發點。也就是牠和蘇聯妥協緣故。

日本對於中國行着一個三重政策或所謂三段姿勢（三段構）：第一段是利用中國的所謂中央統一政府，獨霸中國，（如牠對袁世凱的政策）如果這段的策略不成功，就退一步行第二

策 扶助一個北方大軍閥使其替日本當守衛黃河流域以北的走狗，以防禦英美勢力的北侵（如牠利用段祺瑞和張作霖）。如果這一策也不成功，牠第三段就用死力抓住滿蒙，使滿蒙爲日本所謂特權範圍，（如像張作霖橫死時日本所表示的態度）。日本關於中國問題對英美俄及中國所採用的方略，始終不出三段姿勢的一段。

其餘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如法，如意，甚至後起的德國，雖然在世界政治上有很大的作用，却和遠東，特別是和中國的關係不比上述英、美、日三國的重要。

二、蘇聯的力量，蘇聯因爲地域佔全世界六分之一，有強大的羣衆參加政治爭鬥，生產作用上有很大潛伏勢力，并且因爲地理的位置不易爲外力所進攻，所以他仍然是一個世界力量的重要因素。但是，因爲革命後的復興問題及原來的經濟組織比西歐十分落後的緣故，現時還要集中精力的內部的建設。因此雖然在宣傳上對帝國主義取完全敵對的方式，而實際不能不和帝國主義，特別和日本妥協。蘇聯現在也是在一個防禦戰的時期。

三、第二國際領導下各國社會黨的力量。這個力量，特別是在德國及英國與其中歐北歐的國家中，保有左右政權的相當能力。但是牠們的作用只是限於在各該本國。並且在牠們的對外政策上，幾和帝國主義者本身無甚大的差別。特別是牠們的殖民地政策，對於被壓迫民族

——如印度，安南，荷屬印度，中國等——一樣的行高度的壓迫政策。他們對於中國的政

策，完全是跟着帝國主義者的腳跟走的。

四、被壓迫民族的力量，這個力量正在奮鬥及發展中。牠們是一面獨自的反抗壓迫牠們的帝國主義與其代理人，一面是要聯合世界各國革命的勢力增大爭鬥的聲勢及催促解放工作的完成。在現時覺醒中的被壓迫民族在近東有埃及，土耳其，阿拉伯，波斯，阿富汗；在遠東有印度，安南，中國，朝鮮，菲律賓，特別是中國與印度為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力。牠們的共同敵人是帝國主義，牠們的共同目的是民族解放。

我們的政策：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知道，在現時的世界中有四種相異的力量。這四種力量中的第一種——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必須針對牠們之間的矛盾，用種種方法努力和牠爭鬥。第二種——蘇聯——力量，客觀上是我們的朋友；第三種——各國的社會黨——在牠們的綱領上應該可以做成我們的朋友；但是在實際對外政策上是反對我們要求的，我們應該提防牠們，並且攻擊牠們政府的反動政策。第四種——被壓迫民族們——是我們真實的朋友，真實的政治聯盟者。我們應該聯合起來，共同去反抗帝國主義，達到民族的解放的目的。

因此我們具體的外交政策如下：

一、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二、重新訂立完全平等的條約；

三、對蘇聯，以雙方完全平等恢復邦交；

四、與各弱小民族結成親密的關係，建立反帝國主義的聯盟。

3. 經濟政策

根據我們上述的分析，我們知道，緊接現階段的中國社會的歷史前程為國家資本主義。即是說：國家資本主義為由現階段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底經濟結構。

國家資本主義底本質主要在：第一，集中。以農工為重心的平民羣衆，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上的國家權力把一切大產業，關鍵產業，特別是帶有獨占性的產業由國家專營，并獎勵公營的企業，使發展生產所必需的資本蓄積由國家及社會集積起來，不致於完全以利潤，利息及佃租的形式歸私人所有。更運用由國家集中的實力行有計畫的經濟建設。第二，干涉。為促進全國產業的發展，適應廣大羣衆的消費需要起見，允許經營中小規模的私人企業；但國家利用其集中的金融機關與財政政策以防止私人資本主義勢力底膨脹，并使其逐漸的社會化。

現時中國主要的國家經濟機關，大部份掌握在帝國主義者手裏，國內的產業，一方被壓抑於帝國主義者，他方被妨害於封建的殘餘，還在十分幼稚的階段。故平民政權建立以後，即應立刻消除帝國主義者在華的經濟統治勢力，消滅封建的殘餘，在集中與干涉的兩個原則下面建設國家

資本主義。

我們把經濟政策區分爲二部，即A對外的；B對內的。

A 對外經濟政策

對外的經濟政策主要的在：消除帝國主義者在華的經濟統治勢力，以建設本國的產業。爲國民經濟樞紐的關稅權，現時名義上中國自主雖被「承認」，而實際是爲帝國主義者所限制掌握。所謂「互惠」政策，更爲帝國主義者片面的掠奪中國的手段。銀行被其壟斷。交通運輸機關被其獨占。鑛山爲其經營。而賭欺及其他政治的剝削（如私運軍火等）與毒害物品（如私運嗎啡，鴉片，高根，海綠茵，士丁甯等）尙不在內。這些狀況如不根本的改變，則全國人民生產的結果必大部份被帝國主義者掠奪而去，國民經濟無法向上發展。因此我們對外的經濟政策如下：

1. 關稅權絕對的自主，並用高度的保護稅政策以保育本國工業的發展及救濟農業的衰頹。
2. 收回一切銀行，鐵路，航業，通信機關，鑛山及其他重要的由外資經營及外人管理的企業。
3. 設置國家特許的租營制度，在產業落後，資本貧乏，技術落後的中國，利用外國專家以開發各種產業，組織各種產業，實爲有利的事件。但因放任及被強迫的結果，致造成現時帝國主義經濟勢力在中國橫行的現象。不但產業無由開發，而且日就衰微。因此我們一而應如上所述，絕對的取消帝國主義者在中國的經濟特權和收回其經濟基礎；同時我們應設置租營制

度，在一定的年限內，以完全遵守中國的法律及其他有利於財政及工人爲限，允許外國投資團在本國經營企業。中國政府有完全制御的權柄。這樣，一方面可以免去從前的毒害，一方面可以收開發產業的利益。

B 對內經濟政策

要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向上發展，除擴清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勢力以外，必須澈底肅清封建的殘餘。我們所認爲封建殘餘的，除政治及社會的領域以外，在這裏特別注重於經濟的領域：現時的中國，在割據分立的軍事封建勢力下面，造成無數的破碎支離的「經濟體」。這些破碎支離的經濟體，一面依賴於地方官僚軍事的壓迫勢力及商業資本爲彼此區域間接的紐帶，他方面却因爲官僚軍事的統治及商業資本的剝削而使以農業手工業爲基礎的落後經濟體更瀕於破滅或倒退於更幼稚的形態。這種形勢特別是在北部及西北，西南各省爲著。地主的勢力普遍的與官僚及軍閥相結，爲剝削農民的最下的一個統治者。他們掠奪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形式是：佃租，勞役，自由加租加捐，徵發物品，徵用人丁牲畜，強種鴉片，濫發紙幣等等。這些剝削的形式無不由於政治的權力，與資本主義時期的自由競爭的剝削不同，因此我們叫做封建的殘餘。必須肅清這封建的殘餘才能進行積極的經濟建設。

因此我們擴清封建殘餘的對策如下：

1. 廢止厘金制度，包稅制度，廢除現行的稅率，特別是一切苛捐雜稅及不合理的田賦。

2. 消滅惡幣，不換紙幣，軍用票等等，軍閥的財政設施及其他依存於封建軍閥政權的掠奪制度。

3. 消除官僚軍事機關的浪費。

4. 消除產業發展的障礙，特別是佃租，高利貸及地方公所行會等不合理的制限等。上面所述只是消極的政策。我們積極的經濟政策却在於有計畫的經濟建設。其主要事項如下：

1. 金融機關國有及一般的財政政策

2. 大產業，關鍵產業及獨占性產業的國營公營並促進合作社的組織

3. 「耕者有其田」及一般的農業政策

4. 城市及農村發展的均衡。

茲分別詳述如下：

(一) 金融機關國有及一般的財政政策

我們知道，自由競爭的工業資本主義，到二十世紀已變形為獨占的金融資本主義。金融資本主義，底特質在：一切產業機關由極少數的大銀行控制，而國家的政策，主要的由金融資本家支配。這種現象在產業越發達的國家越是明顯，因此成為帝國主義後期的特徵。金融資本不但對外

有控制外交政策的力量，而且對內爲集中資本，支配國家財政及國民收入，統一的施行經濟建設的中樞。因此金融資本主義爲資本主義發展之最高形態。在這種形態中的資本主義，牠的一切經濟的基礎和社會主義的已相差不了。不過金融資本的國家政權操在少數金融家手上，爲他們自己的利益罷了。資本主義發展到這個階段，無產階級只消一旦發動，把一切中樞的機關——特別是金融機關接收過來即可以實行社會主義建設。落後的中國，牠的金融機關在國內還大部份在封建的高利貸商業的錢莊，當舖等手上，他方面則被控制於帝國主義的銀行。雖然有不少的中國資本家經營的新式銀行，但牠的業務主要的是在投機的買賣，而不是產業的控制，而且資本還是非常薄弱。這種現象，是半殖民地特有的。如果中國的平民羣衆取得政權，一方面爲着顛覆封建官僚的統治，必須把那些爲封建官僚統治的財政基礎加以改造清厘；一方面必須把一切可用爲國家金融機關的設備如各銀行及大錢莊等，分別由國家有價的收用；特別是帝國主義在華的金融機關，必須分別收回；以構成國有金融機關的基礎。至於收回金融機關所需的資本，可用發行公債的辦法籌劃出來。金融機關集中的收爲國有之後，對於吸收人民儲蓄，利用外資，推廣國際貿易，統一幣政，調整金融，發展產業，以及其他一切控制資本運用資本等等爲國民經濟中樞的事務，自然容易進行。

上述種種，皆爲建設國家資本主義的要務；但必須輔以一貫的財政政策，才能確實得到控制

私人資本，使資本逐漸的社會化的效果。因此必須實行抽收累進的所得稅，資本收益稅，遺產稅等。同時，更須在廢止現行的稅率之後，切實的另訂合理的稅率，統一幣政，實行金本位制，使全國人民負擔公平，使產業向上發展。這樣，私人資本的逐漸社會化便容易做到了。

(二) 大產業，關鍵產業，獨占性產業的國營公營，及促進合作社

的組織

在產業落後的中國，新式大規模的產業，還十分稀少。現存的大規模產業大部份由外人及外資經營。其中關鍵產業（製造生產手段的產業，如鋼鐵工業，機器工業，造船業等）在本國更十分二的幼稚，差不多全數仰給於帝國主義者。獨占性產業（如鐵路，運輸，鑛山等）差不多全數由外人獨占。其餘中小企業雖屬不少，而實不能應本國的需要，因此每年對外貿易入超之數日增，以致本國工業無法建立，產業日就衰落。

在平民政權建立之後，一方面用金融國有政策以集中資本，收回由外人經營的產業，及本國的大規模的私人企業。一方面即將集中的資本建設大規模的產業。在半殖民地的落後的中國，也只有用集中資本的統一的計畫才能建設大規模的國家的產業基礎，才能把資本積蓄於私人手上的弊病逐漸的消除，為產業社會化的準備。

除國營產業之外我們必須用國家權力及人民自覺的力量推行產業公營及合作社的組織。我們

在政權上主張地方分權及地方自治制度，因此自治團體——如市政府縣政府等——應行產業公營，以免一切大產業事務集中於國家，致管理官僚化的弊病，更形擴大。自然，工人及消費者參加產業管理，實為救濟及預防產業管理官僚化的善法，我們必須採用。同時，我們知道，在產業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工人和生產手段脫離，實為社會爭鬥的動因。在中國，雖然因手工業及自耕農還相對的保留，生產者與生產手段脫離的弊害還不如歐美之甚。但是，大產業國營公營的辦法，尚不能包括產業的全部，小規模的私人企業必須允許其存在。使能輔助國有公有產業進行生產。因此，生產者脫離生產手段的事實還是相對的存在。所以，我們除盡力發展國營公營產業以外，必須推行合作社的組織。各種合作社，應一面由國家力量補助及提倡，一面由生產者及消費者自行組織。這樣不但可以防止及救濟生產者與生產手段脫離的弊害，並且可以養成生產者管理產業經營產業的技能及共同生活的習慣，為將來產業社會化的階梯。

(三)「耕者有其田」及一般的農業政策

我們為着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必須達到土地國有的目的。但是在目前的階段，如果立刻普遍的實行土地國有，則不但容易引起農民的反感，妨礙革命的進行，而且必然的因為生產技術落後的緣故，管理及經營均發生困難，以致農民不能安心改良土地，生產力低落，甚至使農地荒廢。這樣不但不是提高農業生產的方法，而且會更增加農民的痛苦，使農民離村的傾向，比歐洲

資本主義國家中所發生的爲更甚。所以我們在原則上主張土地國有，而用耕者有其田爲過渡的辦法。

農民離村的傾向，普通的說，是因爲資本集中和集中的緣故，使多數農民保不住固有耕地，所以才不能不離村別求生路；同時又因爲在大資本下面，城市工業發達，需用多數工人，所以只得集中城市去求生路。只有夢想着農業社會主義的烏托邦的人們，才會承認農民離村有百弊無一利，同樣也只有中了公式主義化的毒的人們，才會絕對的承認農民離村是好現象，才會主張犧牲農民利益以促進工業的發展。我們的主張主要的是這樣：一方面實行大產業，關鍵產業及獨占性產業的國營公營，以免產業資本家之自由剝削，一方面實行耕者有其田爲土地國有的過渡以免地主的奪取和剝削。只有這樣才是合理的辦法。

中國的農業現在已快到完全破產的地步。大多數的農民除了賣身爲兵，爲奴隸（到外洋去底「豬仔」）之外，祇有做土匪及流寇的出路，否則即不能不束手待斃（如西北各省的饑民）並且因爲農業經濟在中國爲國民經濟的樞幹，關係於全國人民的存亡，所以我們現在把中國農業破產的主要原因詳細些敘述出來：

1. 經濟的原因 構成經濟的原因的是：生產技術的幼稚，耕地的過度分裂，人口分配的不平均，地主及高利貸與商業資本剝削的凶暴，家庭手工業底破產，國際農業底競爭，農村資本底缺

乏。

2. 政治的原因 主要的在政治的剝削及掠奪，（如苛稅預徵錢糧，鴉片稅，不兌換紙幣，使用惡幣，勒捐軍費，徵用牲畜，及現物等）國家農業設備（如水利，模範農場，穀倉等）底荒廢，運輸交通機關底破壞，國家對外貿易政策（如所謂『互惠』政策！）及財政政策（如包稅及厘金公債等）底反動等等。

上述各種經濟的及政治的原因，表面上看來似乎是各自獨立，其實是互相關聯，而且循環的互爲因果。因爲生產技術幼稚的緣故，各級農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十二分的低下。鬼暴的地主，要得到豐裕的生活，只有利用統治的威力以重租高利剝削農民。因爲城市工業不能發展，所以城市及農村以累積的資本只有購買土地，因此自耗農日益減少，同時農村的過剩人口無法由城市容納，大部壅塞在農村中，因之佃農日益加多，農村的耕地日見分裂。耕地過度分裂的結果，更不能利用現存的進步的生產技術，因此生產能率十分降低。因爲各地方人口分配不均的緣故，致「東北」「西北」各省區，有地缺人耕種，而東南各省的農民每戶平均不過得到數畝耕地，實在不敷生活的需求。因此農民以借貸爲生，終身受高利貸的盤剝。因此自耕農的土地被其捲去，變爲佃農，佃農變爲雇農。佃農受制於地主，必須納全世界所未有的高度佃租以求得土地耕種，半死半活的生活實在比農奴時代更爲悲慘。雇農更受着非人類的勞役的拘束，做兩足的牛馬。更有

許多其他過剩的人口求爲佃農僱農而不可得，不能不流爲兵匪流寇。在閉關時代，家庭手工業還在盛行，大部份的日用品可由農村及附近鎮市自給。開關以後，帝國主義者以廉價商品侵入農村，家庭工業於是崩壞，因此農村人口過剩的現象日益加劇，而商業資本的剝削日益加深。國際的農業，特別是在北美洲，及英、法、荷蘭、日本，的殖民地（印度、安南、爪哇、台灣、等）利用其高度的生產技術及貿易政策或特殊有利的生產條件以較低廉價格的農產品輸入中國，本國農產品無法與之競爭（特別是因運費高昂納稅繁重的緣故）因此沿江沿海對外交通便利的地方，外國農產有壟斷市場場的趨勢。因此農民的收入更加減少，農業的荒廢衰落無法倖免。至於農村資本的缺乏，一方是由於生產技術的幼稚無法有剩餘生產的積累；他方更由於政治的剝削使農民皮肉不存；及最近商業資本之集中於都市，用公債、特稅、包稅、貿易獨占等方法，間接去剝削農民，使農民生產品赤裸裸的無價的被官僚軍閥買辦等所掠奪徵發，更談不上農村資本問題。因此農業的生產或完全停止，或以自殺的方法，耗費地力，使生產能率大大的降低，土地改良完全絕望。

像上面所述的經濟的現象，雖然表面上是生產行程上的結果，而實際多由於反動的政治力量所促成。政治的剝削及掠奪，當然驅迫大多數農民陷於破產流散。國家農業設備底荒廢，當然使生產技術更加落後，更加無法改良耕地。運輸交通機關底破壞，當然使交換行程窒塞，使農民不

能不低價售帶農產品，不能不高價購買工業品，而生活水平更加降低。國家的反動貿易政策只有使外國農產品更容易壓倒本國農業。反動的財政政策，只有把一切租稅負擔轉嫁於農民身上。像這些的政治因素，都是促使農村加度的破產。因為農民破產的緣故，更增強統治者的反動，行更苛酷的掠奪，以促農業經濟及全國國民經濟的滅亡。像這樣：政治原因與經濟原因的交互循環，遂有數十年來使中國內戰不能停止，使中國民族物質的文明與文化同陷於消亡的地步。這種現象如無法消滅，中國人民必無死所，更不用說社會主義基礎的建設無絲毫希望。

我們認為要消滅上述的現象，使農民得到解放，使全國的國民經濟向前發展，應有如下的農業政策。而政策中的耕者有其田辦法實為實行農業政策的先驅。因為一切政策的經濟的剝削所加於農民的結果是：土地更加集中，大地主剝削佃農及佃農更加利害，農民離村的現象更加普遍。就是說，都集中於土地問題。在現時，全國約 80% 的土地由佃農耕種，全體農民約 80% 為佃農；佃租平均約佔主要生產量 30%。在現時嚴重的農村破產現象底下，如果無法首先使農村剝削停止，使農民返村，使農業生產行程恢復，則一切其他農業政策，甚至全國的政治設施都無從着手。而首先解決土地問題實行耕者有其田的辦法實為消滅農村的寄生，使農民返村及使農業生產行程恢復的唯一手段。也只有如此，革命勢力才能得到大多數農民的擁護；只有如此，工人失業的現象才能消滅，工人的生活標準才能增高。

我們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具體方案與程序如下：

甲 立行宣佈耕者有其田的法令，不耕作的人不能有耕地。

乙 立行宣佈免納佃租，其耕作中的佃農及僱農可暫行保有原來佃耕土地的使用權與收益權，聽候詳細辦法解決。但地主回村並能實際耕作者，主佃兩方，暫時共享土地使用權與收益權，其形式以契約定之。

丙 由國民會議規定土地法，并斟酌各方狀況，分別規定農戶佔有耕地的最高額及最低額。及國家收買土地定價法。

丁 在允許私人佔有耕地最高額以外的土地，應由國家以全國國有土地為抵押，發行五十年長期土地公債，按照國民會議所規定的土地定價原則及各地方政府所決定的土地價格，收買歸為國有。在最低額以下的土地，應強迫使其相方合併或加入合作社經營之。

戊 國家以外的公共團體所有土地亦按私有土地收歸國有法，由國家收買為國有。

己 一切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等的及其他反革命的團體的全部財產應沒收為國有。

庚 所有一切收為國有的土地應由土地管理機關按照土地分配原則及各地方標準負責分配於耕作的農民。原日佃耕的佃農，及無地的僱農，與退伍的革命軍人等應有同等的機會領用土地，但只限於使用權與收益權。

辛 領用土地而不行耕作，或怠工，耕作不力的農民，應被剝奪其土地使用權與收益權，耕作私有土地的農民如犯以上條件則并剝奪其佔有權。

壬 不准私行買賣土地，必不得已時的土地佔有權及使用權的移轉應按土地法得土地管理機關的允許而後行之。

我們一般的農業政策如下：

甲 消滅寄生剝削的大小地主，使不耕作的不能保有土地，而要從事耕作的人民隨時可以得到土地耕種。即是實行耕者有其田，使農民安心改良土地并提高生產力。

乙 改訂田賦，清丈田畝，依照各地收益情形及農民收益狀況，釐定稅制。

丙 積極的利用科學方法以振興水利，及一切農業改良的設備，發展內地交通，推廣農業教育及研究，辦理農業調查，廣設模範農場，務使各農村均能進行農業實驗及改良的工作。利用國內外的資本廣設農民銀行，供給農村以必需的資本。

丁 提倡及促進農業合作。利用生產合作，使各農戶能自由聯合行大規模的耕作，用進步的技術以改造農業。利用販賣及購買合作以消滅商業資本的剝削。利用信用合作以消滅高利貸。這些合作的進行，即為農業社會化的過渡。

戊 辦理國營及公營的農業，盡量的應用新的技術及經營方法，使農民澈底的明瞭大農業及

小農業的利弊，使農民能逐漸的由私營及合作的階段進入農業社會化的階段。

己 進行辦理移民及墾殖事功，使人口與土地的比例能相對的平均。

(四) 城市及農村經濟發展的均衡

商工業支配農業及城市支配鄉村的傾向，是資本主義社會內一般的傾向；因為。在大量商品生產經濟破壞了自給自足的經濟之後那些握着大量商品生產的城市商工業者，自然會在實際上支配並壓迫那些難行大量生產品的鄉村農業。結果，城市繁榮，農村凋弊，城市膨脹，農村萎縮，城市集中，鄉村冷落等現象，便不可避免的發生出來。這些現象，從工業化的觀點上看來，雖然是進步的，而從人口及食糧政策的觀點上看來，却是反動的。為什麼反動的呢？因為城市經濟和農村經濟的不均衡的發展，一方面會引起國內糧食不足，民食非依靠海外不可的畸形現象（如像在英國）；在另一方面會引起困難的剪刀問題（農工業發展步驟不一致的問題）使社會主義的建設的路上發生巨大障礙（如像在蘇聯）。

我們認為，在經濟落後的中國，城市的繁榮，膨脹和集中也是必然的趨勢，然而我們却須得並且也能夠預防農村的凋弊，萎縮和冷落。我們一方面要用合作社的辦法，防止農村之被壓迫被支配；一方面要用金融政策及租稅政策調劑城市和農村間的不平衡的發展。我們認為在消極的防止和積極的調劑兩種政策一面，一定可以免除國內食糧不足的毛病，一定可以解決困難的剪刀問

題。

4. 社會政策

我們認為，我們在積極方面，固然應該用種種方策，努力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同時在消極方面，也應該施行種種社會政策，以救濟社會上現存的弊病。我們以為應該竭力改良工人的生活，確定女工童工的保護法，危險工作保護法，地下工作保護法，確定八小時工作制，（地下工作六小時）確定工人罷工權，確實施行工場法，使工人逐漸參加生產管理。施行種種社會保險，成立職業介紹所。規定工資與生活增加的比率，縮小勞心努力職員薪俸的差額，提高士兵和警察的生活，給退伍士兵以土地與資本，使其耕種。創設無價的平民醫院，育嬰堂，卹養院，孤老院。禁止納妾或蓄奴及人口買賣。

5. 文化政策

我們認為：特殊的士大夫階級專有智識，平民羣衆無法及無機會識字知書，更說不到專門智識，這件事是中國廣大的平民羣衆的痛苦及屈辱的原因之一。我們爲着消除士大夫階級，爲着解放大多數平民羣衆，必須堅決的主張下面的文化政策：

a. 文字普及政策。

(一) 限制文言，流通白話。

(二) 限期普及注音符號及簡字並統一讀音。

(三) 普及文盲救濟運動。

h. 教育政策

(一) 限期推行無償的義務教育制。

(二) 普及政治教育。

(三) 舉辦普通的農業教育，勞動教育及其他職業教育，其目標在使農民子弟及各職業團體的職工能直接受必需的教育，使學得其用，用本於學。

(四) 關於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的教育，以實證的應用的研究為着眼點，使其普遍的深入於全國各地方學校。並極力防止學術脫離社會，陷於空談，致有產生新士大夫階級的危險。

(五) 確定教育經費，改良各級教師之待遇，保障教師職業之安全，規定養老金制。

(六) 認教育為社會事業，只由國家監督，不由國家包辦。

(七) 確立國家會考制，打破學校修業期滿獲得文憑制。

(八) 停止教會在中國的文化侵略工作，一切教會學校應由中國收回自辦，其他外國文化機

關亦然。

我們奪取政權之直前及直後應該做

的是什麼？

這篇文章是鄧演達同志的親筆遺稿，從未發表，大約是鄧同志被蔣匪逮捕前不久寫的，解放後經季方同志自滬尋來，特翻印以供黨內同志之研究。

(一) 誰都知道，政黨的行動目的在奪取政權及實行黨的綱領。並且誰也知道，革命的政黨奪取政權的唯一方法是發動羣衆與組織羣衆，因為要發動羣衆參加政治的鬥爭，所以要組織羣衆，而羣衆的組織作用，只有在爭鬥的行程中才能發揮出來，所以要發動羣衆與組織羣衆，唯一的方法是在找出羣衆的要求與現存的社會秩序底矛盾點，更發揮這個矛盾點，使之行敵對的運動。

我們的黨，是代表勞動羣衆的要求的黨，而在這個時期內，廣大的平民羣衆底利害實與工農羣衆的要求大部分相符合。因此我們在廣大的平民羣衆中間發生爭鬥的領導作用爲現時一切工作的中心。

同時，我們知道，我們黨所主張的平民政權，是由職業團體所產生所組織的。所謂職業團

體，並不是在奪取政權以後才新組織起來，必定要盡量的，盡可能的在日常的爭鬥工作中，在開始行動時，就形成了各職業團體的爭鬥組織，並且在各職業團體的組織中找出各團體的直正領導者，各團體的領導者，不但是要使他們在黨內發揮黨員的力量，而且要在各該團體中發揮組織的及推動的力量。

青年爲羣衆的先導者，尤其是在文化落後的羣衆裏，青年能發揮廣大的作用，因此推廣及深入的做青年運動，使活潑有爲，純潔無畏的青年團集在黨的旗下爲黨的重要工作。

已經團集在本黨旗下的青年，如果不設法使情和勞動羣衆發生關係，即是說：發生職業的及生產的生活意識及日常爭鬥的聯繫，則青年的幻想與熱情往往錯用而流放，並且常至於失望墮落，因此我們的黨，必須設法使有爲的青年進入各職業團體的爭鬥組織中去。

在現時的狀況，在都市中只能作經濟的鬥爭，而同時必須準備作政治的鬥爭，如國民會議促成會，取消苛捐雜稅促成會之類，必須目前就設法組織起來，等到公開活動的機會一到就能迅速的運動前進。

工人運動及商民運動都應該分別的即刻進行。

在鄉村中建立農民運動的基礎，爲目前本黨必須進行的重要工作，因此我們必須一面吸收農業學校的青年，使其分佈到農村中工作；一面吸收國民學校的教員，尤其是年青的教員，使其確

實的了解我們的綱領，到我們黨裏來，去進行農運的工作，真正的農民和工人同志的吸收，爲工作發展的重要條件。我們每個黨員必須時時刻刻提防自己脫離了生產的意識，消失了勞動的意識，并且要盡力的去吸收工農同志充實我們的黨。

固然，在落後的中國，羣衆所遭受的政治壓迫與文化奪取的程度比現在的任何國家爲甚，因此羣衆的興起不是短時間所能完全達到。因此我們不能忽略軍隊中的工作，但是在現時的狀況，如果我們不能集中我們的幹部在一個地方，不能設法把同情於我們的軍隊集中在一個地方，則最近的將來的發動，奪取一部份的政權底希望，仍然無法達到。所以我們必須設法集中我們的力量去進行我們的軍事工作。當然我們的軍事工作應該注意中下層的。

(二)奪取政權(只便初時只是一部份的)之直後，我們應該做的是甚麼？這個問題我們現在拿出來并不是空想，而是充實及促成我們現時工作的一種必要。

我們必須設想：在奪取政權的前夜必須已有如下的條件；

1.當地黨的工作已經有相當的基礎。

2.發動的軍事力量能在我們黨的指揮底下。

在這兩個條件下面我們是可以進行奪取政權的工作的。

我們取得一部份的政權以後，我們應該立刻做的是什麼？

在這裏，我們要預先明白的是；過去及現在國民黨的失敗全在於空談及行動與宣傳相反，我們爲着確立革命的基礎，爲着使羣衆相信我們，必須立刻把我們的政綱在羣衆面前實行。同時我們必須很迅速切實的抓住羣衆，要羣衆了解新的政權是他們的，由他們竭力的去擁護，因此我們的行動綱領如下：

1. 組成革命委員會以臨時接收政權，及全權處分革命期中，人民會議成立前的政事。
2. 立刻進行組織該省的省民會議於首府或附近地區，以接收省的政權，此省民會議即按本黨的平民政權原則組成之，各縣及鄉村的新政權亦即行新組。
3. 立刻由革命委員會及省民會議頒佈「耕者有其田」的法令，按本黨預定的綱領施行之。
4. 立刻取消一切苛捐雜稅，由革命委員會及省民會議重新按本黨政綱規定新的稅率。
5. 立刻由省民會議決定各職業團體抽丁入伍辦法，構成新的人民武裝。此種新入伍的士兵應在黨的武裝幹部領導下面，一切軍隊應改稱平民革命軍。
6. 立行設立以下的各種訓練班：

a. 平民革命軍幹部訓練班。

b. 政治管理訓練班。

c. 民衆運動訓練班。

d. 農業改造訓練班。

茲分述各訓練班的工作要旨如下：

a. 平民革命軍幹部訓練班：目的在把黨的軍事工作人員及各職業團體的青年領導者加以武裝的訓練，以担任新的軍隊幹部的工作，這個訓練班工作的要旨在：切實的了解過去軍隊中的腐敗貪污的習慣而澈底的掃除之，同時，在新的原則上面，即：提高士兵的生活，減低官長——尤其是上中級軍官——的生活，軍隊社會化及政治化的要點上面去養成新的幹部及學習新的訓練法管理，使人民的武力能逐漸的形成。

b. 政治管理訓練班：目的在撲滅現有的官僚政治及防止貪污，而用新的組織及工作方法組成由鄉村到省的各級政治管理的工作人員，入班的學生應為農村及城市中的職業團體的幹部及本黨的工作員，務必在短期中使其了解新的政權的運用法及政治經濟的設施要領，新聞通訊人員的養成要附於此班。

c. 民衆運動訓練班：目的在發動與組織羣衆一面養成在革命勢力下的民衆運動的工作人員，一面養成在反動勢力下的區域中作民衆運動的工作人員，此種人員應由各職業團體及黨部中徵集來的。

d. 農業改造訓練班：目的在養成農村及國家公營的農業的改造人材，第一期以造成合作運動

的人材爲主，而輔助土地機關實行耕者有田的方案，亦爲主要的教材，訓練的對象，因此農業調查及丈量等方法，亦爲該班必修的課程，該班的人員應以自行耕作的農民子弟爲主。

這樣在短期中（三個月——六個月）我們的精力也應該和革命期一樣，集中在摧毀敵人的營壘，及「堅強我們自己的營壘」，兩個標語下面，這樣，我們才能紮硬寨，打死仗，擴清全國的反動勢力，建立統一，獨立，自由，平等的新國家，完全實行我們的綱領。



編完以後

揚子江在暴跳，黃河在狂叫，珠江在怒號，太平洋也在哀鳴，爲了我們革命的導師，中國勞苦的工農平民大眾解放的導師，全世界弱小民族解放的導師，英勇卓絕的鄧演達先生，被酷毒的反動者慘害了！

我們中國的革命，自民十三起而澎湃，到民十五是達到了最高潮，民衆革命情緒的熱烈，黨底工作的長足進展，真是無限的希望展現在大眾面前。可是，那革命認識不清楚者，得到了地盤，名利的毒氣薰了他們的心，傳統的臬雄心的暴露，封建思想的劣根性沒有消滅，於是，不但忘記了革命，甚至叛逆了革命，出賣了革命，自身成了反動者。所以在民十六寧漢分離，國共分裂以後，一方是藉清黨之名義，來殘忍地慘殺大批真正革命的同志，青年與工農被殺者不計其數；一方是被激起了極端的憤怒，於是盲目的暴動，也犧牲了無數的革命同志，斷送了多少勞苦的工農大眾。由是，民衆的革命心理破碎了，革命情緒沒落了，中國的革命就此中斷，而全國勞働大眾解放的曙光，被那烏烟瘴氣淹沒了，勞働大眾只得在昏天黑地裏受幾重壓迫而掙扎着過地獄的生活。

可是，革命是客觀的社會環境所需要，是歷史的車輪必然的轉動，雖然反動者在如何地防範，如何地壓抑，如何地摧殘，但，壓力愈甚，反抗力也愈甚，民衆在比舊軍閥更毒的新軍閥變本加厲的屠戮，蹂躪，剝削，高壓之下，對革命的要求隔外熱烈的需要的，而真正革命的同志，雖受了一度大挫折，而也會消極變成積極，嘆惜變成怒吼，放在旁邊的重大的革命擔子，又會勇敢地挑上自己的肩頭。

鄧先生的能力，鄧先生在中國前階段革命史上的功績，是誰都知道了的，無庸我來多說。而自民十六中國革命破碎，反動勢力意得的時候，鄧先生爲了各種關係，便順便到國外去考察一下，他在德國，除實地的考察外，悉心的研究政治經濟，社會科學，但是他中國人民的一份子，他是跟孫中山先生努力了多年革命的，他不能放棄革命者的重任，他看到中國政治更形腐敗，政局更形混亂，工農勞動大眾的生活更爲痛苦，革命的要求已經刻不容緩，所以他前年五月，毅然決然，冒了絕大的危險，秘密回到中國來努力中國革命復興運動，他用數年的悉心研究與精密的觀察與一般革命同志商榷了發表他的政治主張，從事復興中國革命的工作，担負起完成中國革命的重任，爲了解救工農勞動大眾，與一切反動的勢力作殊死戰。

自從鄧先生回國，直到去年八月十七日被反動的統治者勾通了帝國主義者在上海被捕，雖然只是短短的一年多些的時間，但是在鄧先生有力的蘇美日指導與各同志共同努力之下，與夫現實

的客觀環境的需要，工作的進展非常的迅速，很短的時間已經奠定了中國革命復興與到達完成的鞏固基礎。

但是將頹崩潰的反動者在他們迴光反照裏是如何地疾恨革命勢力的重行抬頭，於是他們費盡了心血，用盡了心機，把復興中國革命唯一的領袖，解放工農勞動大眾的唯一導師鄧先生逮捕了，從帝國主義者宰割的租界移解到了帝國主義者的工具走狗反動統治者的手裏，從上海警備司令部轉解到了南京蔣介石的總司令部，拘禁了幾個月，蔣介石多方向之游說，向之利誘，向之威逼，但鄧先生始終不肯屈服，抱定他革命的政治主張，因為這不是人的問題，這是革命勢力與反動勢力的衝突，所以鄧先生終於被慘害了！然而，鄧先生的偉大，在整個的中國革命史上，永遠不會茫滅的光榮記錄。

鄧先生死了，這是殞落了中國革命的朝陽，這是我們工農勞動大眾絕大的損失，我們怎不要傷心痛哭！然而，死者已矣，來者可追，我們要痛定思痛的團結我們的隊伍，整齊我們的步伐，踏上鄧先生的血跡，準備我們的血來建築到達中國革命完成的大道，建築到達世界社會主義實現的長橋；我們要認清，鄧先生的精神是不死的，鄧先生的政治主張已經昭示了我們，雖然今後鄧先生不能親自領導我們，但是鄧先生的遺教已經很足夠了，他已經判明了中國社會的結構及國際形勢給我們看，他已經告訴了我們「中國到那裏去，」也已經告訴了我們「怎樣復興中國革命，」他

已經指示了我們「怎樣去推翻反動的統治勢力」，也已經指示了我們「復興中國革命的手段」，並且他還詳細地指明了我們「現時國際及中國的形勢與我們鬥爭的路向」，現在鄧先生雖然死了，但鄧先生的精神與主張已經散佈在我們每一個同志的血管與腦海裏，我們更應該把鄧先生的主張撒播到每一個工農勞動的腦海裏，喚醒他們，也希望勞動大眾的朋友們自動覺醒起來奮鬥，我們應該抱了堅固的犧牲的決心，努力幹去，貫徹鄧先生的主張。

鄧先生回國後在忙煩的工作裏所留下來的文字已完全收集在這本冊子裏了，這是鄧先生對中國的文獻，也是中國革命者唯一的寶庫，願革命的同志大家精密的研討而廣播罷。

鄧先生被害了，是殞落了中國革命成功與全世界弱小民族解放的朝陽，看呀！揚子江在暴跳，黃河在狂叫，珠江在怒號，太平洋也在哀號！這是如何痛心的事呀！

然而鄧先生的被害，是中國革命高潮到來的信號。願革命的同志們！一致團結起來奮鬥前去！

編者，二二，一，丑。



發行人：楊

逸棠

地址：香港堅道
一三七號

承印人：永發印務有限公司

永樂街一四九號
電話二二二五七



1010/8019



中華民國 癸卯年 九月 廿日

73200
國家圖書館



001707600



7
籍
H. K. \$2.00